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人文与社会译丛

全世界受苦的人

Frantz Fanon

[法国]弗朗兹·法农著 万冰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全世界受苦的人

Frantz Fanon

〔法国〕弗朗兹·法农 著 万 冰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世界受苦的人／(法)法农(Fanon, F.)著;万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ISBN 7-80657-832-3

I. 全... II. ①法... ②万... III. 欧洲-殖民统治-非洲-
社会影响-研究 IV. K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1681 号

Copyright © 1961 by François Maspero.
2002,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Franc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2-124号

书名 全世界受苦的人
作者 [法国]弗朗兹·法农
译者 万冰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200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址 <http://www.yilin.com>
地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9 字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57-832-3/1·601
定价 17.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握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遂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2002 年版序言

阿利斯·谢基

《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于 1961 年 11 月底由弗朗索瓦·马斯普罗 (François Maspero) 出版社出版, 当时本书的作者弗朗兹·法农因患白血病, 正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贝斯泰达 (Bethesda) 诊所里与死神作斗争。为了在付印出版时不被查封, 本书是在半地下的困难条件下印刷的, 它一开始发行, 便在“有害国家内部安全”的主要罪名下被查禁了。在 1959 年, 同样由马斯普罗出版的法农的前一本书《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个年头》, 以及其他一些有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作品 (如莫里斯·马施诺 [Maurice Maschino] 的《拒绝》, 莫里埃纳 [Maurienne] 的《背叛者》, 或早些时候亨利·阿莱 [Henri Alleg] 的《问题》), 都发生过这种事情, 这种查禁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然而, 此书却流传了, 且新闻界对它作出了巨大的反响。通过复杂的发送途径, 经由突尼斯, 法农于 12 月 3 日收到一本样书和一些剪报, 其中有让·达尼埃尔 (Jean Daniel) 于 11 月 30 日在《快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章, 可以说是篇赞扬文章。法农在听了别人给他读这篇文章后, 辩驳道: “当然, 但这并未诠释我作

品的精华。”几天以后,法农于 1961 年 12 月 8 日谢世,年仅三十六岁。

事实上,1925 年他生于马提尼克岛上法兰西堡的一个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兄弟姐妹众多,童年时代在老殖民世界成长,那时他还不惯于对奴隶制探询。然而,法农在十分年轻时便参加了戴高乐主义力量——第五部队——重新整编加勒比人的志愿者。在这一投入的过程中,他获得了他那抵抗文化,但也体验了日常平庸的种族主义。复员后,他戴着十字军功章(是未来的萨朗[Salan]将军颁发给他的,他常说这是他同这位将军惟一共有的东西),于 1945 年回到马提尼克岛,通过业士学位考试,并常与受人爱戴的塞泽尔(Césaire)来往(他十分钦佩塞泽尔,但已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当时,塞泽尔决定把马提尼克岛看成是个法国的省。

法农很快又到法国,在里昂继续学医。与此同时,他热衷于哲学、人类学、戏剧,并很早就投入精神病学专业。同时,他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但参加一切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并协助编辑《达姆达姆鼓》,这是为来自殖民地的留学生而办的一份小期刊。特别的是,他于 1952 年在《思想》杂志上写了第一篇文章《北非的综合征》,文中他探究了北非工人,他们远居他乡,忍受成为一个“天天死去活来的人”之苦,他们被与自己的出生地和目的割离,变成一件物品,一件被哗啦啦扔掉的东西。

他在圣阿尔邦精神病医院待了十五个月,在医院里,法农很重要地遇见了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这是位西班牙裔的精神病科医生和反佛朗哥斗士。这对法农在精神病学方面及他未来投入战斗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在医院里找到的是在他所有记载中探询的精神错乱的交点,而不是身体和精神的结合点,结构和历史的交叉点。1953 年,他通过了精神

病院的医生资格考试。于是他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卜利达精神病院的医生。他的第一本书《黑皮肤,白面具》已于 1952 年由瑟伊出版社出版,这多亏了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

在阿尔及利亚,法农不仅要面对精神病院里通常的精神病学,而且还得对付阿尔及尔派精神病科医生们关于“土著的原始状态”的理论。他逐渐发现当时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的现实。起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改造病科,他负责向病科引进已同托斯盖勒一起实施的“社会疗法”。他也因而不停地改变照料病人者和精神错乱者的关系,他同欧洲人,但也跟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著们”一起,力图恢复他们文化的语词所指对象,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社会生活组织,一切能成为意识的东西。这一小小的精神病学的革命既得到医务人员——大部分是参与政治者——的认可,也为当地的战士们所承认。法农的名声远扬。此时已是 1955 年,且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了。

法农不明白法国社会党政府面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竟这么糊涂,他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愈来愈闻名。“阿尔及利亚之友谊”运动同他接触,这是一个对政治犯家庭予以物质支援的人道主义协会,实际上由民族主义的活动分子们领导,他们与占领卜利达附近的游击队基地的战士们有联系。对他提出的第一个请求是负责医治一些患精神紊乱的游击队员。

就这样,法农通过精神病学和政治活动之间的毛细作用,投入了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斗争。1956 年,他在一次致总督罗伯特·拉科斯特(Robert Lacoste)的公开信中,辞去了自己那精神病科医生的职务,他在信中写道,他无论如何不可能想使一些人摆脱束缚,使他们“在一个把无权利、不平等和杀人当作合法原则的国家里规矩些,在这个国家里,当地人在自己的家乡经常精神错乱,生活在一种绝对失去个性的状态”。法农被驱逐出阿

尔及利亚。

然后于 1957 年第一季度,他在法国过了三个月,在此逗留期间,他对阿尔及利亚必然独立的信心并未得到反响。由于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法国总会的帮助,他抵达突尼斯,在那里设置了民族解放运动海外组织。中断结束了。

法农在突尼斯继续进行精神病学和政治的双重活动。他成为 FLN 的日报《圣战者报》(El Moudjahid)的小组成员。他从内部目击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矛盾,包括目睹了政治代表和军队之间的愈来愈大的争论。尽管他经常感到失望,然而他仍然是位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捍卫者和经常革新的精神病科医生。他愈来愈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感兴趣,1959 年底,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任命他为黑非洲的巡回大使。这是非洲国家独立的年头。法农真正是位巡回者,他不遗余力地从加纳至喀麦隆,从安哥拉到马里,以便推动为真正的独立而战斗。他甚至考虑一条从马里出发,穿过撒哈拉大沙漠和会合阿尔及利亚战士们的战线。

但是在 1960 年 12 月,法农在突尼斯逗留期间,发现自己得了髓细胞性白血病。他还剩下一年的活命,在这一年中他写了《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本书——惟一由他自己选定的书名而不是出版商选择的——是由一位自知患了不治绝症的医生所写的。

在跟时间和死神展开一场真正的赛跑中,法农想让人递送最后的使命。给谁?给受苦的人,他们基本上不再是十九世纪末工业化国家里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无产者。法农与之谈话的这些全世界受苦的人是贫穷国家里的不幸之人,他们真正地想要土地和面包,然而当时西方世

界的工人阶级——经常是种族主义的和显然对海外居民一无所知的人——显出对其从中间接获利的殖民地的命运相对地冷漠。

这部著作既不论述经济,也非社会学甚至政治的评论,它是一个有关殖民地国家的状况和变化的呐喊,甚至是个警呼。法农在整部著作中,紧绷政治、文化和个人的弦,重视对被统治者的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统治的后果。他着重分析了不仅是整个人民的,而且是一些个人的奴化,以及他们解放的条件,这种解放首先是个人的解放,是“人的非殖民化”。

《全世界受苦的人》是弗朗兹·法农的最后一本书。1952 年他二十五岁时已开始写了《黑皮肤,白面具》,1959 年写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个年头》,这本书是由弗朗索瓦·马斯普罗出版的早期著作之一。他也写了许多文章:已提到过的《北非综合征》,一些精神病学方面的文章,以及特别是在 1956 年第一次黑人作家大会上的《种族主义和文化》,然后是于 1959 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二次黑人作家大会上的《文化和民族》。在所有这些文章里,论据的展开不仅是基于理论,而且建立在实际经验,他思想发展的出发点的基础上。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关于种族主义的思考与某些单方面宣布的文化统治联系在一起:这并非偶然事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涉及在工作中,同样也是在殖民地形势中的文化压迫制度。如果不阐明统治文化施行压迫的结果,那么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就是徒劳的,这种压迫触及团体、政治和文化,但也是精神的压迫。

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继续对统治阶层所施加的奴役作这种探询。这个统治阶层破坏集体并使集体变质,也使个人在其变化中变质。此书重新采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论据和解放的条件,使其在政治斗争方面更激进,把个人的解放同

政治和文化结合起来。此外，在最后的两章中，一章是写文化及其与民族建设的关系，另一章是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双方产生的创伤性的精神错乱。

法农从自己的特殊经历出发，由贴近的经历写到他投入这一经过始末——他必须构思和传送的经历。作品本身遵循这个进展：构成这本书的五个不同主题的章节安排得像摘录，像一首诗的诗节，在这些诗节中掺入了一些严格的分析节拍，但正如年轻的法农在谈到他第一本书《黑皮肤，白面具》时所说的那样，这些节拍总是试图用一种除含义外，产生并非只受操纵概念束缚的理解的语言写就的。

人们曾可能且可以责备法农混淆了谈话的类别和水平——政治、文化和心理的分析——责备他搬移了精神病科医生的经验，这些对付精神错乱的材料并不适合政治领域。人们曾可能责备他的风格，认为这风格是抒情和先知性的。但异乎寻常，正是这种风格却成为法农的现代特色。作为精神病科医生，他那悬而未决的主观经验使他直接接触不幸的人们。

人们也责备他强调暴力。然而法农从经验上知道对个人施行暴力的后果：这个人对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借助不带个人色彩的铁石心肠或通过他间歇发生的可怕的暴力冲动进行侵犯。应该把这种暴力组织成为能导致超越的解放斗争，而不是否认它。在《种族主义和文化》中，法农这样对自己的治疗措施作出结论：“占领者的被扭曲和僵硬的文化得到解放，终于向成为兄弟的人民的文化开放。两种文化能互相对照，互相丰富。[……]一旦不可逆转地排除了殖民法，果断地承担起不同文化的互相的相对主义，就具有普遍性意义。”而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他也指出这种黑人世界和白人世界之间的超越：“这两者都应摒弃他们可敬的祖先们的非人道的声音，以便产生真正的沟

通。”这种超越的观点也存在于《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中,尽管在此期间这种观点在政治斗争中激化了。

法农曾渴望萨特为本书写篇序言,岂料这篇精彩的序言似乎比书中本文的读者更多。然而,序言却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法农的忧虑和语气。它主要针对欧洲人而言,导致本文和他介绍的内容之间不和谐。法农本人是对所有其他人讲话,实际上是跟他们谈未来,在未来“对他人的畏惧”将被超越。这篇序言尤其激化了法农对暴力的分析。的确,萨特为暴力辩解,而法农是对暴力进行分析,并不把它上升为的本身,而只是看作一个必要的过渡。因此,萨特的文章不时采用鼓动犯罪的语气。例如这样的句子:“读一读法农的书;你们知道在他们无能的时候,杀人的疯狂是被殖民者们的集体无意识”,或还有“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举两得,同时消失了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这些句子削弱了法农建议的意义,因为它们似乎不再是说明暴力的理由,而是在为真正的杀害个人作辩护。人们处在犯罪之中,而不再是处在这种一切人固有的暴力之中,这种暴力是为了能够存在于自身的可能中而发出的呼吁。法农在读萨特的序言时未作任何评论,一反他的惯常做法,他保持异常的沉默。然而,他却写信给弗朗索瓦·马斯普罗说他希望将来有可能表明自己的看法。

《全世界受苦的人》在七十年代被看作是本引路明灯之书,它主要结合第三世界主义,优先政治的突出部分,牺牲了他对被压迫者所处的精神错乱的原由一再探究,然后,将此抛到脑后,随之法农的整部著作被视为过时的。他的政治胆识被认为不再适用——既然这胆识同所谓过时的非殖民化时代结合在一起——以及带来由事实使之落空的希望。法农是否高估了农民群众在解放斗争中的力量?碰巧当时在阿尔及利亚斗争的背景

中,大部分战士正是农民。我们别忘了法农是在写一丝不苟的历史经历。然则,正如他在《全世界受苦的人》第二章《本能的伟大和弱点》中解释的那样,他认为农民的积极性也能像革命一样,同时产生反响。

他是否低估了宗教的力量?事实上,他重又参加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并不表现为伊斯兰教的革命,它团结各种不同倾向——1956年的苏马姆河大会纲领——,尽管其鼓动者们反对,但大会并未提出宗教中心论,倒是提出要依靠多数。法农呼吁正在进行非殖民化的国家创新,创造一个新人,这个呼吁不是被非洲国家的变化撤销了吗?后来的地理政治论的发展不是与他所有的希望背道而驰吗?事实上,这种发展倒是证明了他担心的变化不是凭空无据的(在《民族觉悟的不幸遭遇》一章中)。

法农分析一个偶然的现实,而如果人们将他的书限制在他那时代的背景下,他的书则只能被理解为“落后于形势的”,而不是被理解成一种对可能的东西的呼吁。他从现实出发,表达自己的希望。是否他的希望未实现使得这现实变成错误的了?大家清楚知道这个现实,包括暴力这一现实,今天在说到它时已不再用殖民压迫或第三世界的未来等字眼,而是说成为不平等的扩大,南北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排斥,把庶民简化为物等等。

非殖民化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四年之后,大家见到一个向经济世界化的“强权”前进的世界,这个现实写在南北关系中并一天天显出轮廓:非洲国家的政府安排了有组织的腐败并使之成为制度化,发达世界的石油、医药及其他的大公司建立的这种腐败。同时,以不干预的名义,但尤以要维持经济上的帝国主义的名义,就是这个发达世界却对损害一切渴望民主的解放运动、损害一切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参与活动的行为,表现出无动于衷,法农梦想这种管理,并为此他从已从事的精神病科医生变成被

压迫人民事业的斗士。

但这个现实不仅仅涉及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它也关系到我们那所谓“发达”世界中的不平等的扩大，在这个“发达”世界中记录着那些贫困的人必然的生活不稳定和失业，哪怕是给这种必然性一个局部的位置而不是个空想的位置：这就是排斥的位置。法农驳斥这种现实，因为他不愿每个人的生活是“死到临头”，每天苟延残喘，这使生活被理解为“不是欣欣向荣或繁荣昌盛地发展，而是经常和身边的死神作斗争”。法农渴望凡是人都是自己历史的主题和政治的主动者。

从卢旺达到波斯尼亚，从阿富汗到中东，不免除美洲和欧洲，绵延着一个处于战火和血腥中的分裂世界，在那里，暴力不断，接踵而至，那里的国家感到震惊，并对他们挑起的民众暴力感到愤慨，这种暴力造成使人失掉人性的恶性循环，在个人的和集体的层面上破坏二十一世纪的几代人的思想、生活和未来。

今天，人们又谈论阿尔及利亚战争，现在终于把它称作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三十五年中，它被叫作“事件”。人们重又披露和揭发酷刑。但许多现代文章对当时冲突的两个阵营的暴行却背对背地推卸责任，不利于对武力不对称的分析。法农曾对他当时的两个世界的力量比例作分析，这两个世界互相隔绝，排除一切对话，今天世界上许多地区难道不仍然在这么干吗？要明白这点：当两个世界之间不缔结任何一个条约时，当通过话语进行考虑的一切空间再关闭上大门时，当较强的世界自称是另一世界场所的拥有者时，不管这个场所是领土、文化或心理的，那么什么东西发挥作用呢？正是对这个世界的预料警告了法农，并促使他写《全世界受苦的人》。

他也觉察到战争——包括解放战争——的创伤性后果，无休止的后遗症，导致暴力的重演和种族的、同一性的倒退。这些

倒退经历正在结束的世纪的历史，并在一个既新而又十分古老的想法的基础上开创新的世纪：把另一方表现为邪恶的化身，而把自己表现为善良的化身。法农已在其《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分析殖民地的形势时描述了这些形象：殖民者认为被殖民者是邪恶的化身。此外，他指出这种外形化在主观上所起的破坏性后果：被指为邪恶者受到监督，先是感到羞愧，然后是仇恨。这个过程今天具有奇怪的现实性。

因此，必须超越写这部作品的历史时期的局限性，并根据我们的现代特色来重读《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在南方及北方，被发展所遗弃的人成倍增多，且还有人们那不断增大的屈辱和主观上的压垮，面对全球化，这同样的现代性把所有这些人轻飘飘地指定为“一无所有”的人：没有祖国，没有国土，也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身份证件，没有说话的空间。

读一读或再重读一下《全世界受苦的人》能帮助了解当一些人这样地保持在被剥夺的记载中时所发生的事：暴力，求助于种族和同一性的倒退。但除了这些强调的主题外，法农的现实性还在于：一方面，在一个背对背地互相推诿的时期，他有预见地、唯物主义地分析精神错乱和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对人的存在主义或文化主义的看法（或甚至在心理分析方面，一种割裂周围世界的主观冒险的观点），他试图设立一个介绍身体、语言和精神错乱的知识新构成，作为政治前途构成中的必要经验。这种尝试其实离马尔库塞（Marcuse）的尝试并不那么远，或者更进一步说，离维也纳的政治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忧虑也不远，他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迫逃亡到美国，遭到排挤和压迫。

那么，法农之所以表现为一种世大的现实性并非偶然。从他的出身和经历，到对这一时期突出的受创形势作斗争，都印证了上世纪的那些事件，而他则是事件中的角色之一。

从他的生活和思想活动来看,他也是现实的: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和排斥个人的时代里,年轻的法农所写的那句将他的全部思想付诸行动的话“啊,我的肉体,你要始终使我成为一个爱提问的人!”超越了人们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垮台,在我们时代的许多年轻人心中引起共鸣,不论他们讲什么语言和出生于何地。

1961 年版序言

让·保罗·萨特

不久以前，地球上二十亿居民，五亿人和十五亿土著，那五亿人掌握圣言，其余的借用圣言。一些被出卖的小国王、大地主和一群伪造的假资产阶级充当这五亿和十五亿之间的中间人。在殖民地，真相暴露无遗；宗主国则喜欢掩盖真相；必须让当地人喜爱他们，可以这么说，像爱母亲那样。欧洲的精英着手制造优秀的殖民地土著；他们选择一些青年，用烙铁在他们的额上印上西方文化的原则，在他们大打哈欠的嘴里塞进一些黏糊糊的豪言壮语，把他们的牙粘住了；在宗主国短暂逗留后，把他们遣回他们自己的老家，弄虚作假。他们的弟兄们对这些生动的谎言再也没什么兴趣了；谎言四处回荡，从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我们喊出“帕台农神庙！博爱！”之类字眼，在非洲和亚洲某些地方，一些人张口就是“帕台农……博爱！”这是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结束了：只是嘴上这么说说而已；黄皮肤和黑皮肤的发言人还在谈论我们的人道主义。但这是为了谴责我们的不人道。我们高高兴兴地倾听这些苦涩的奉承话。首先骄傲地惊叹：怎么？只是他们谈话？然而，要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培养！我

们不怀疑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理想,既然他们谴责我们不忠于这理想;对于这一举动,欧洲对其任务深信不疑:它曾使亚洲人希腊化,创造出希腊-拉丁黑人这一人种。我们完全在我们之间增加实践:然后让他们去大喊大叫,这样会使他们好受点;爱叫的狗不咬人。

另一代人来了,他们转移了问题。他们的作家、诗人以难以置信的耐心,试图对我们解释我们的价值不适合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掌握这些价值。这大致想说:你们把我们变成了没心肠的人,你们的人道主义声称我们属于全世界的,而你们实施的种族主义却使我们与众不同。我们听他们唠叨,心中十分坦然: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花钱雇来读黑格尔著作的,而且他们也很少读,但他们不需要这个哲学家就可知道可怜的良心卷入矛盾之中。毫无效果。因此,让我们使他们的不幸永远延续下去吧,他们只不过说几句空话而已。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如果在他们的呻吟中带有请愿的影儿,这将是要求合并。当然,允诺这要求没有问题: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就摧毁了建立在过度剥削基础上的制度。但只要在他们眼前拿着这根胡萝卜就够了:他们就会快步地跑。至于造反,我们对此十分放心:哪一个有觉悟的土著仅仅为了要变成像这些欧洲好儿女那样的欧洲人而去杀他们呢?简而言之,我们鼓励这些伤感,但一旦把龚古尔奖授予一个黑人,我们并不觉得是件坏事:这是1939年以前。

1961年。听好:“我们别把时间耽误在枯燥无味的絮叨或令人作呕的模仿上。我们离开这个欧洲,它一面没完没了地谈论人类,而一方面却到处碰到人就杀害,在它自己街上的各个角落,在世界各地。有几个世纪了……欧洲以所谓的‘精神冒险’的名义,扼杀了几乎全部人类。”这是一种崭新的口吻,谁敢用这

种口气？一个非洲人，一个第三世界的人，一个从前的被殖民者。他补充道：“欧洲取得这样疯狂无序的速度……因此它走向深渊，最好离这深渊远些。”换句话说：欧洲完蛋了。这是个不好说出口的实情——我亲爱的欧洲大陆同胞们，对不对？——但我们大家在骨子里是信服的。

然而，必须保留意见。如果有个法国人对其他法国人说：“我们完蛋了！”——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从1930年起差不多每天发生——，那么这句话充满狂怒和爱的激情，说话的人和他的同胞们牵连在一起。然后他通常补充说：“除非……”大家懂得下文是：再也没有一个错误要犯了；如果他的叮嘱无下文，那么，而且只有，国家即将分裂。总之，这个讲话是连劝告带威胁，而这些话越是发自民族间的交流，就越不会令人反感。相反，当法农说欧洲走向失败时，他不是发出警告，而是提出诊断。这位医生并不认为也不宣告无救——人们看到了奇迹——，也不给它治愈的办法：他从外面，根据他能收集到的征候，指出它正濒于死亡。至于医治它么，不：他脑中有其他的操心事；不管它是死是活，他都不予理睬。由于这个道理，因此他的书引起议论纷纷。如果您感到尴尬，打趣地嘀咕道：“他给我们写些什么呀！”那么您没抓住这议论的真正本质：因为法农什么也不给您“写下”；他的作品——别人认为如此热情——对您而言却是冷冰冰的；他书中经常谈论您，但从不跟您谈话。黑种人的龚古尔奖和黄种人的诺贝尔奖完了：被殖民者获桂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讲法语”的前土著使这个语言服从一些新的过分要求，运用这个语言并惟独对殖民者们讲话：“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土著们，团结起来！”多么大的降级啊：作为父亲，我们过去是惟一的交谈者；现在儿子们甚至不再把我们当作有资格的对话者了：我们是谈话的对象。当然法农顺便提到我们那些臭名昭著的罪

行：塞提夫、河内、马达加斯加，但他不是费劲去愤怒声讨这些罪行：他是利用这些罪行。他之所以使得殖民主义的策略，和那些使移殖民同“宗主国人”团结和对立关系的复杂手法不知所措，那是为了“他的弟兄们”；他的目的是教这些弟兄挫败我们。

总之，第三世界通过这个声音暴露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说话。大家知道人类不是清一色的，从中发现还有些是被奴役的人民，有些获得了假独立，有些为获得自主权而斗争，最后，有些人获得完全的自由，却一直生活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中。这些差异产生于殖民史，就是说源自压迫。这里，宗主国仅限于付钱给一些大地主：在那儿，宗主国通过分而治之，制造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在别处，宗主国一箭双雕：殖民地既是剥削之地又是移民之处。因此，欧洲增加了分裂和对立，制造出一些阶级，有时是种族主义，千方百计企图挑起和加大被殖民社会的成层现象。法农并不掩盖这点：为了反对我们，老殖民地应反对自己本身。或确切地说，这两者只不过是穿一条裤子者。在战火中，所有的内部障碍都该熔化，唯利是图者们和“买办”们这些无能的资产阶级，始终优先的城市无产阶级，贫民窟的“流氓无产阶级”，大家都应该站在农村群众——真正的国家和革命的预备军——的立场上；在这些殖民主义断然停止发展的地方，如果农民起来造反，很快就以“彻底的”阶级出现，他们经受赤裸裸的压迫，比城市里的劳动者受的苦更多，为了不至于饿死，除了打破所有的结构外，别无他法。如果农民胜利，这将是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如果阻止农民的冲动，如果被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新国家虽然表面上是个主权国家，但仍然在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中。加丹加的例子相当说明这问题。这样，第三世界的团结未完成：这是件正在进行的事业，所有的被殖民者通过每个国家在独立之前和独立后，在农民阶级的指挥下团结起

来。这就是法农向他的亚非拉弟兄们阐述的：我们要么一起到处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要么被我们从前的暴君一一打倒，他什么也不隐瞒；不掩饰弱点，也不掩盖不和及骗局。这里，运动出师不利；那儿，在令人震惊的成功后，运动失速；其他地方，运动停止了；如果想再搞运动，必须要农民们把资产阶级抛入大海。读者严格提防最危险的束缚：领袖、个人崇拜、西方文化，并且也要提防过去遥远的非洲文化的重返：真正的文化就是革命；也就是说趁热打铁造就的文化。法农高声谈论，我们这些欧洲人可以听到他的意见：其证据就是你们手中拿着他写的书；他难道不怕殖民势力从他的直率中捞到好处吗？

不，他什么也不怕。我们的手段过时了：这些手段有时可能延迟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我们不要想像我们能调整自己的方法：新殖民主义——宗主国的这一懒惰的梦想——，这是虚无飘渺的空想；不存在“第三势力”，或者不如说这是些殖民主义已扶植上台的资产阶级吹牛大王。我们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不太有办法左右这个十分觉醒的世界，一个接着一个甩掉我们的欺骗。移殖民只有一个依靠：武力，如果还有武力时；土著只有一个选择：奴役或主权。您读不读法农的作品，这对他又怎么样？他向他的弟兄们揭穿我们的老诡计，当然我们没有备用的诡计，他是对他们的说的：欧洲把它的爪子伸向我们的大陆，必须把这爪子割破直到它缩回去为止。时机对我们有利：在比塞大、伊丽莎白城、阿尔及利亚乡村，除了全球所知道的事情外，什么也没发生；那些集团笼络反对党派，他们互相威吓，让我们利用这种瘫痪状态，进入历史，蜂拥而入，使这瘫痪变成全球性的；战斗吧：在没有其他武器的条件下，刀子般的坚韧足矣。

欧洲人，读读这本书，进入书中。在夜间的黑暗中摸索几步后，你们会见到有些陌生人聚在火堆旁，走过去，听听他们：他们

在讨论留给你们那些保护他们的商行和雇工们的命运。他们可能会看见你们,但他们将继续他们之间的谈话,甚至并不压低嗓门。这种满不在乎打击心弦:父亲们,黑影的造物,“你们的”造物是些死灵魂,以前你们给予他们光明,他们只向你们说话,你们不用答理这些幽灵。儿子们不知道你们;一堆火照亮和温暖他们,这火不是你们的,你们,在相当距离的地方,觉得自己偷偷摸摸,夜间活动,冻得麻木:各人轮流;在这将出现另一曙光的黑暗中,你们才是幽灵。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思忖,我们把书扔出窗外。既然这书不是为我们而写,那为什么要读它呢?为了两个目的,其中第一个是法农向他的弟兄们解释你们,并替他的弟兄们拆卸我们那奴役的机器:以此来使你们在客观事实中自我发现和感觉。我们的受害者通过他们的创伤和锁链认识了你们:这就使他们有了如海的铁证。只要受害者给我们指出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了。这是否有用?有用,因为欧洲濒临灭亡的巨大危险。但你们还会不会说,我们生活在宗主国,而且我们谴责暴力。的确:你们不是移殖民,但你们并不更好些。你们把你们的开路先锋们派到海外去了,他们让你们发财;你们曾通知他们:如果他们让血流得太多,你们就矢口否认;同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个国家——在外国豢养一伙煽动者、挑衅者和间谍,人家抓到他们时,这个国家就矢口否认。你们如此宽宏大量,如此人道,把对文化的爱一直推向矫揉造作,你们装作忘了你们有殖民地,并用你们的名义在那儿屠杀。法农向他的同伴们——向他们中的某些人,尤其是那些有点太西方化的人——揭露“宗主国居民”和他们的殖民地代理人的利害一致。你们要拿出勇气读这本书:因为这第一个理由,此书使你们感到羞愧,而这种羞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革

命感情。你们明白：我也不能使自己摆脱主观的幻象。我告诉你们：“一切完了，除非……”欧洲人，我从一个敌人那儿偷了这本书，我把此书变成一种医治欧洲的方法。你们要利用这书。

* * *

第二个理由是这样：如果你们撇开索雷尔(Sorel)^①的法西斯主义的胡言乱语，你们会发现自恩格斯以来，法农第一个重新揭示了历史的推动者。但不要认为他性格太激烈和童年时的不幸使他对暴力有某种不知什么样的古怪爱好：他只是诠释形势，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但这足够他逐步地组成辩证法，虚伪的大度使你们看不到这辩证法，但这辩证法制造出了我们就如同制造出他一样。

上个世纪里，资产阶级把工人们看作是妒忌者，因贪得无厌而放荡不羁，但资产阶级注意到把这些粗人包括到我们的物种中：如果不是人和自由人，他们怎么可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法国、英国，人道主义被宣称是普遍的。

随着强迫劳动，事情迥然相反：没有合同；除此之外，还必须恫吓，因此出现了压迫。我们的海外士兵们拒绝宗主国的普救说；在人类中实施限制：既然没有人能不犯掠夺他同类的罪行，奴役或杀害同类，他们原则上确定被殖民者不是人的同类。我们的打击力量接到任务，改变这种实际上是荒谬的态度：下达命令把附属的国土上的居民降到高级猴子的水平，以证明移殖民把他们当牛马使是无罪的。殖民暴力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威吓这些被奴役的人，它企图使他们失掉人性。为了清除他们的传

① 法国作家，坚决拥护在阶级斗争中使用无产阶级暴力。——译注

统,为了把我们的语言替代他们的,为了摧毁他们的文化而不把我们的文化给他们,将不惜一切;把他们累垮。他们挨饿,生病,如果他们仍然抗拒,那么害怕会使他们干完活儿:用枪瞄准农民;一些平民来住在农民的土地上,用马鞭强迫农民替他们耕种。如果农民反抗,士兵们就开枪;如果农民让步,卑躬曲膝,那么农民就不再是人;羞愧和害怕使其性格产生裂痕,使本人蜕变。一些行家里手把事情办得迅速果断:“心理学科”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洗脑也不是今天才有的。然而,尽管作了这么大的努力,在任何地方都未达到目的:在刚果,有人砍黑人的手,在安哥拉,做得并不比这差,有人最近在那儿把不满者的嘴穿了洞,用挂锁把他们的嘴锁上。我并不认为把一个人变成牲畜是不可能的:我说的是如果不使人变得十分衰弱是达不到这种状况的;仅仅靠打骂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在缺乏营养上使劲,奴役是件麻烦事:在制伏我同类的一个成员时,减少他的收益,给得那么少,一个家禽饲养场人最终所花的代价比他赚到的更大。因此殖民者不得不在训练一半时停止:结果既不是人,又不是牲畜,是土著。挨打,营养不良,生病,担惊受怕,但只到一定程度,不管是黄皮肤、黑皮肤或白皮肤,他总是有着同样的性格特点:懒惰、狡诈、偷窃,他们不靠什么生活,而只知道武力。

可怜的殖民者:这就是其暴露无遗的矛盾。据说他得像精灵那么干,杀死那些他所掠夺的人。然而这不可能:他不是应该去剥削他们吗?由于没有把屠杀一直推向种族灭绝,把奴役一直推向使之愚蠢,他张皇失措,行动计划被推翻了,一个无情的逻辑把这行动计划引向非殖民化。

不是立时三刻。首先欧洲人统治:他已完蛋了,但觉察不到;他还不知土著其实是一些假土著:听他说是为了消除或驱逐他们身上的毛病才伤害他们的;三代以后,他们的主要本能不会再

产生了。什么本能？是促使奴隶杀害他们主子的本能？他怎么不意识到是自己的残忍反治其身呢？在这些被压迫农民的野蛮中，他怎么不发觉自己那殖民的野蛮呢？他们浑身所有的毛孔都吸入他自己那种野蛮而消除不了。理由很简单：这位蛮横人物被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害怕丢失这个权力冲昏了头脑，全然记不得自己曾经是个人：他以为自己是根马鞭或是支枪；他竟至于认为驯服“下等人种”是通过他们的条件反射而得。他忽略了人的记忆力，记忆是抹不掉的；而且可能他从来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有由于内心根本否定别人使我们变成的样子，才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三代？从第二代起，儿子们刚一睁眼就见到了他们父辈的战斗。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他们是“受过精神创伤的”。为了生存。但这些不断卷土重来的侵略非但未能使他们屈服，反而把他们抛进无法忍受的矛盾之中，欧洲人早晚要为这种矛盾付出代价。这之后，不管别人训练他们，还是用羞愧、痛苦和饥饿教训他们：只会在他们身上引起狂怒，其强度同对他施行的压迫力度相对等。你们说他们只知道武力？当然，起初只是殖民的武力，不久就只会是他们的武力了，就是说：以其人之道，反治其身，犹如我们从镜子里照出自己的映像那样。你们不要弄错，由于这种狂怒，这种恼火和怨恨，由于他们经常想杀死我们，由于害怕松弛的强劲的肌肉经常变细，他们是人：因为殖民者想要他们是干粗活的人，但他们反抗。这种仇恨虽然还是盲目的、难理解的，却是他们惟一的宝贝：这是主子挑起的仇恨，因为他企图让他们变得愚蠢，他想熄灭这种仇恨，但失败了，因为自己的利益驱使他半途停顿；因此，由于压迫者的权势和无能为力在假土著们身上转变成顽强地拒绝牲畜般的生活条件，他们还是人道的。其余的大家都明白了；当然他们是懒人：这是消极怠工。奸诈，手脚不干净：当然；他们那微不足道的

小偷小摸表明一种尚无组织的反抗的开端。这还不够：有些人赤手空拳地扑向枪口；这些是他们的英雄；其他一些人以杀害欧洲人来使自己成为人。殖民者把他们挫败：匪徒和受折磨者，他们的折磨引起群众惊恐。

受到惊吓，对：在这个新时期里，殖民侵略使被殖民者的心灵上感到恐惧。由此，我并不理解为他们仅仅对我们那用之不竭的镇压手段感到害怕，但也害怕激起他们自身的狂怒。他们被卡在我们对准他们的枪口和这些吓人的冲动——这些从心底升起而他们不总是意识到的杀人欲望——之间：因为首先这不是“他们的”暴力，而是我们的，这种暴力掉转过来了，增强了，并使他们痛苦；而这些被压迫者的第一动作是深深地埋藏他们精神和我们精神遭受的这一不可明言的怒火，然而这怒火只不过是他们人性的最后壁垒。读一读法农的书：你们会知道在被殖民者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共同的无意识就是杀人这一蠢念头。

这种压抑在心头的愤怒，由于不爆发出来，萦回和蹂躏着被殖民者自己。为了摆脱它，他们竟至于互相残杀：由于没有对付真正的敌人的能力，各部落之间互相交战，为了维持他们的敌对，您可以依靠殖民政治；这位兄弟向他自己的弟兄举起刀，以为一劳永逸地摧毁他们那共同的令人厌恶的可耻形象。可是这些赎罪的牺牲品并不缓解他们血腥的渴望；他们只有在变成我们的同谋时才不肯向机枪进军：他们拒绝接受的这种失掉人性，他们将主动地加速它的发展。在移殖民高兴的目光下，他们用超自然的壁垒互相提防，时而使可怕的古老神话再现，时而用细致的宗教仪式互相束缚：这样，着魔的人在遭受时刻勒令着他的怪异动作的同时，逃避了自己那深藏心中的需求。他们跳舞，这使他们有事干而不闲着；这松弛他们那痛苦地绷紧的肌肉，而且

舞蹈悄悄地,经常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模仿那他们说不出口的“不”,和他们不敢犯的杀人动作。在某些地区,他们使用这最后一招:着魔。从前,这是单纯的宗教上的事,是信徒与神圣事物的某种沟通,他们把它变成反对失望和屈辱的武器:舍菲兰特、别迦摩教会信徒们、至圣降临到他们身上,操纵他们的暴力,把这暴力消耗在鬼魂附身的状态上,直至暴力枯竭。同时,这些上层人物保护着他们:就是说被殖民者通过比宗教束缚走得更远的方法,来抵御殖民的奴役。总之,由于这惟一的结果,他们兼受这两种束缚,且每种束缚各自因对方而加强。这样,在某些精神病中,由于厌烦每天受凌辱,有幻觉者们在某个早晨竟听到天使称赞他们的声音;嘲笑也因此不断:从此,嘲笑和赞扬互相交替。这是一种防卫和结束遭遇:人分崩离析了,病人走向精神错乱。对于几个严格挑选出来的不幸者,再加上我上面谈到过的这种另外的着魔:西方文化,你们会说,如果我是他们,比起雅典古卫城,我会更喜欢我的舍菲兰特。好啊,这下您明白了。然而并不完全明白,因为您不是处在他们的地位。还没有到这地步。否则,您会懂得他们不能选择:他们兼而受之。两个世界,成为两种着魔:他们整夜跳舞,清晨他们挤在教堂里听弥撒;裂痕一天天地加大。我们的敌人背叛他的弟兄们并成为我们的同谋;他的弟兄们也如此。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同意下”引进和维持下来的神经官能症。

既需要又不承认人类环境:矛盾一触即发。况且爆发了,你们跟我一样清楚这一点。而我们是生活在爆炸时代:因为出生率的上升增加了匮乏,新来者们要稍微更加担心生存,而不是死亡,暴力的湍流卷走所有的障碍。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有人眼睁睁地看着杀害欧洲人。这是个自食其果的时候,是暴力的第三时期:暴力反过来转向我们,打击我们,而且超过其他那几

次,我们只了解这是我们的人。那些“豁达大度的人”仍然变得迟钝不开窍:他们承认我们对土著不够礼貌,在可能范围内给予他们某些权利则显得更合理、更谨慎些。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只要求不用介绍人就能一批批地被吸收进那大门紧闭的俱乐部——我们一类的人:而现在这种野蛮和疯狂的发作,并不比那些恶劣的殖民者更加宽容他们。宗主国的左派很为难:他们知道土著们的真正命运,土著们受到无情的压迫,左派并不谴责他们的造反,因为知道我们干尽一切坏事,才引起这种反抗。但左派认为无论如何总得有个限度:这些游击队员应当牢记要表现出骑士风度;这将是证明他们是人的最好办法。有时候,左派申斥他们:“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将不再支持你们了。”他们不理睬这套:对于左派给予他们的支持的益处,他们也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们一开始战争,就发觉这一严峻的事实:只要我们存在,我们大家都不相上下,我们大家都曾利用过他们,他们没什么要表明的,他们不会宽待任何人。惟一的职责,惟一的目标是:想尽办法驱逐殖民主义。我们中最深思熟虑的人准备不得已时接受这一点,但他们不禁从这种武力考验中看出完全不人道的手段,一些下等人用这手段来让人给自己一个人类证书:人家尽快发给这证书,于是他们尽量通过和平的举动来与此证书相匹配。我们的好心肠人是种族主义的。

这些好心肠人读一读法农的书会有益处的;法农充分指出这种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一场荒谬的风暴,也不是野蛮天性的死灰复燃,甚至也不是一种怨恨的结果:这是人本身的重新组成。我想我们曾经知道这个事实,而我们却把它忘了:没有任何温柔会把这些暴力的标记抹去:只有暴力能把它们摧毁。被殖民者则在用武器驱逐殖民者时治愈了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当被殖民者发怒时,重又找得自己失去的明朗性格,就在形成自己的

范围内认识自己；我们从远处把被殖民者的战争看作是野蛮行为的胜利；但战争通过它本身着手逐步解放战士，逐渐清除战争本身和战争以外的殖民的黑暗。战争一开始起就是无情的。要么一直担惊受怕，要么变成骇人的；就是说：沉湎于分崩离析的虚假生活或者获得祖国的统一。当农民们接触到枪支，古老的神话就变得苍白无力了，那些禁令被一个个地推翻：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到他脚下植物下面的国土。在这一时刻，国家离他不远：他上哪儿，在哪儿都感觉到它——再也不遥远了，国家和他的自由混合在一起了。但殖民军队在受到最初的打击后，重又行动起来：必须团结一致，或者被别人杀掉。部落的不和减少了，趋向消失：首先，这种不和使革命处于危险境地，更深入一些，因为不和除了使暴力偏向假敌人外，没有别的效用。这种不和之所以继续存在下去——如在刚果——，那是因为由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在维持着。国家在行进：每个兄弟认为国家到处有其他兄弟在战斗。他们的兄弟之爱是掩盖着对你们怀恨的一面：在这方面他们是兄弟，即他们中每个人杀人，也可能随时杀了人。法农向他的读者指出“自发性”的局限，“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危险。但不管任务多么艰巨，在每个活动的发展中，革命觉悟深化。盘根错节的复杂性烟消云散了：但愿人家来跟我们稍微谈谈民族解放军(ALN)士兵身上的“从属复杂”。由于农民从蒙住双眼的境况中解脱出来了，深知自己的需要：他们累垮农民，但农民试图不理睬他们；农民发觉他们像些无穷尽的苛求。在这种人民暴力方面——长达五年之久，如阿尔及利亚人则干了八年——，无法区别其军事、社会和政治的必要性。战争——哪怕是在提出指挥和责任的问

题时——设置了一些将是和平的初步制度的新构架。这就是直至新传统(这新传统将产生自可怕的现在)中设置的人,他因即刻将诞生的权利而合法化了,这个权利每天在战火中产生:随着最后的殖民者被杀,重又登船返回或已经同化,少数类消失,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友爱。可这还不够:这位战士兼程前进,你们以为他不冒着生命危险重新达到老牌“宗主国”人的水平啊。你们看看他的耐心:可能他有时梦想一个新的奠边府;但你们要相信他确实不这么打算:他是个战斗的乞丐,他在贫困时反对强大武装起来的富翁们。在等待决定性的胜利时——且经常什么也不等待——,他把他的对手折磨得沮丧气馁。这种事不会不遭到惨重的损失;殖民军变得凶残了:分区控制、扫荡、集中、讨伐;殖民军屠杀妇女和儿童。他知道这点:这个新人以死亡来开始他的男子汉生活;他认为自己是个潜在的死人。他会被杀害:并非仅仅因为他接受这种冒险,而是他深信这一点;这个潜在的死者失去了自己的妻儿;他见到过那么多的极度苦恼,以致他宁愿战胜而不愿苟且偷生;其他的人利用暴力;不是他:他太厌倦了。但这种心累是源于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我们发现我们的人道在死亡和绝望的这边,他发现在折磨和死亡的那边。我们曾经是风暴的播种者,他才是风暴。作为暴力的儿子,他每时每刻从暴力中汲取他的人道:我们是靠他养活的人,他变成了我们自己人中一员。一个另样的人:更加优质的人。

* * *

法农写到这里不往下写了。他曾指出过道路:作为战士们的代言人,他要求非洲大陆团结一致,反对一切不和及地方主义。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他想全面地描述非殖民化的历史事

实,那他必须谈论到我们:这当然不是他的话。但当我们合上书时,书本由不得其作者的初衷,继续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体验到正在进行革命的人民力量,且我们用武力来回击。因此有了暴力的新时刻,而这一次应该与我们重修旧好,因为当假土著通过暴力改变自己时,暴力在改变着我们。由各人随自己的便去进行思考。然而但愿他进行思考:在今天的欧洲,人家给他的打击使他完全晕头转向,在法国、比利时、英国,思想稍稍偏移就是与殖民主义同谋罪。此书毫不需要序言。尤其因它不是为我们而写,所以更不需要。然而,我却写了篇序言,为的是把论证进行到底:我们这些欧洲人也是,人家使得我们非殖民化:就是说,人家用血腥的活动铲除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移殖民。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那么看看我们自己,看看从我们那儿所发生的事。

首先应该正视这意外的景象:我们人道主义的脱衣舞。这人道主义赤裸裸的,并不美好:这只不过是种骗人的思想,对掠夺的美妙辩解;它的温柔和矫揉造作保证了我们的侵略。那些非暴力者的气色很好: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得了吧!如果你们不是受害者,那么当你们那个通过公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你们那年轻弟兄们为之服役的军队,毫不犹豫也不感到内疚地进行“种族灭绝”时,你们则必然是刽子手。如果你们选择当受害者,冒险去蹲一两天监狱,你们也只不过是选择摆脱净干系而已。你们摆脱不了:这干系必须担到底。最后,你们要明白这点:如果今晚开始暴力,如果地球上从未存在过剥削和压迫,那么可能那被炫耀的非暴力可以平息争执。但如果千年的压迫决定了全部的社会制度,乃至你们的非暴力思想,你们的消极被动只能用来把你们排在压迫者之列。

你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剥削者。你们清楚知道我们曾夺取“新大陆”的黄金和金属,然后夺取石油,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回老

宗主国。不无出色的成绩：一些宫殿、教堂、工业首都；后来在受到危机威胁时，有殖民地市场缓和或转移危机。欧洲富得流油，发誓向它所有的居民允诺人道：在我们这儿，一个人，就是一个同谋，因为我们大家利用了殖民剥削。这个肥沃而惨淡的大陆终于陷入了法农恰当地称呼的“自我陶醉”之中。科克托^①对巴黎感到恼火，“这个城市每时每刻在谈论自己”。而欧洲能干什么别的事呢？还有这个超欧洲的怪物——北美洲呢？都闲扯些什么呀：自由、平等、博爱、爱情、荣誉、祖国，谁知道呢？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讲诸如种族主义者，讨厌的黑人，讨厌的犹太人，讨厌的北非阿拉伯人这类的话。一些宽容和温和的好脾气人——总之，一些新殖民主义者——自以为对这种轻率的言行感到反感。这是错误或恶意：在我们国家，没有什么比种族主义的人道主义更为重要的了，既然欧洲人只有通过制造一些奴隶和凶恶的人才能成为人。只要有土著身分，就不揭穿这种欺骗；人们在人种中发现普遍性的一种抽象要求，用以掩盖一些更加现实主义的实际：在海那边，有一下等人种族，这种族多亏了我们，可能在一千年后终将达到我们的状况。简而言之，他们混淆了种族和精英。今天，土著揭露其真相；这下，我们那封闭得如此严实的俱乐部露出了它的弱点：这正好仅仅是个少数派。还有更糟糕的：既然别的人变成人反对我们，似乎我们是人类的敌人；精英露出他真正的本性：是个盗匪集团。我们那些宝贵道德标准失去了它的翅膀；如果仔细审视这些道德标准，只发现一个染上血的标准。如果你们一定要举个例子，那么回想一下这些巨大的字眼：法国多么宽宏大量啊。我们宽宏大量？那么塞提夫呢？还有这场使一百多万阿尔及利亚人丧生历时八年之

① Cocteau, 1889—1963, 法国作家和电影艺术家。——译注

久的残忍战争呢？你们可要明白人家并不谴责我们背叛了不知什么使命：正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使命。受到质疑的就是宽宏大量本身；高唱这个漂亮字眼只有一个含义：给予的身分。对面那些脱胎换骨和解放了的人认为，无人有权和有特权给予任何人什么东西。大家各自享有所有的权利。而我们人类，当有一天它创造出来时，它并不是以全球居民的总和来定义，而是以全体居民的互利的无穷一致性来定义的。我说到此为止；你们会无困难地结束工作；只要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注视一下我们那些贵族气派的道德：这些道德沦丧了，怎么会在产生这些道德的下等人贵族消失后继续存在呢？几年前，一位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的评论家只找到这一点来捍卫西方：“我们不是天使。但我们并不感到内疚。”真是供认不讳！从前我们的大陆上有别的浮标：帕台农神庙、夏特勒、人权、卍字。现在人们知道这些东西的用处：而人们宣称不再只通过我们基督徒的犯罪感从灾难中拯救我们自己。完了；正如你们所见：欧洲到处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十分简单，我们过去是历史的主体，现在我们是历史的客体。势力之比倒转了，非殖民化正在流行；我们的雇佣兵所能尝试的一切，就是延迟结束非殖民化。

老“宗主国”又必须为此拿出大量钱财，把他们所有的实力抵押到一场预料要失败的战争中去。这种老殖民的野蛮创造了比若^①那值得怀疑的光荣，在冒险结束时，我们觉得这种大大增长的野蛮无能为力。派遣部队到阿尔及利亚。部队在那儿维持了七年却毫无结果。暴力改变了含义；获胜的我们行使暴力，但

① Bugeaud, 1784—1849, 法国元帅。1840—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译注

它似乎没有使我们改变：它把其余的人和我们——人——变了样，我们的人道主义原封未动；宗主国人因利益而团结在一起，把他们的罪行共同体称为博爱，爱；今天，同样的共同体到处受阻，通过我们的士兵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变得内心化了，并左右着我们。退化开始了：被殖民者重新组合，而我们——极端分子、自由主义者、殖民者和“宗主国居民”——却解体了。盛怒和害怕已暴露无遗：它们在阿尔及尔的“种族主义暴力行动”中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目前，野蛮者在哪儿？野蛮在哪儿？有的是，甚至不乏达姆达姆鼓：当欧洲人指使人把穆斯林活活烧死时，那些汽车喇叭响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节奏。不太久以前，法农提起此事，在开大会时一些精神病学科医生对土著的犯罪行为感到很悲痛；他们说道：这些人互相残杀，这很不正常；阿尔及利亚人的皮层大概不发达。在中非的其他一些人认为“非洲人很少使用他的额叶”。这些学者可能今天有兴趣在欧洲继续他们的调查，尤其对法国人作调查。因为几年以来，我们也大概是患了头脑的懒病：爱国者们有点杀害他们同胞的行径；他们趁其同胞不在时，炸掉同胞的守门人和住宅。这只不过是个开头：内战预计在秋季或明春。然而我们的皮层似乎是状态良好：倒不如说是否由于没有压倒土著的能力，暴力回过头来堆积在我们深处而寻找一个出气口呢？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团结产生了法国人民的不团结；在前宗主国的整个国土上，那些部落跳着舞并准备战斗。恐怖离开了非洲而在这儿扎根：因为有些十分天真的愤怒者想要为曾经遭土著打击的羞耻而付出我们血的代价，然后，还有其他的人，所有其他的人，也是有罪的——在比塞大事件以后，在九月的私刑处死以后，谁上街去说：够了？——但更加沉着冷静：那些自由主义者，那些优柔寡断的左派死硬派者。他们也头脑发热，怒气冲天。但是多么胆小怕事啊！他们

用些神话,复杂的宗教仪式来掩饰自己的愤怒;为了拖延最后算账和真相大白的时间,他们把一个大巫师按在我们的头上,这个巫师的职能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维持在默默无闻中。一事无成;有些人宣称暴力,其他人抑制暴力,它在原地转圈:一天它在梅斯爆发,第二天则在波尔多爆发;它曾经过这儿,又将走那儿,这是在玩传环游戏。一步步地轮到我们走上引向土著身分的路。但要我们完全成为土著,则必须是我们的土地被从前的被殖民者占领,必须是我们饿死。不会这样的:不会,是丧失权利和地位的殖民主义控制着我们,它迟钝和傲慢,不久将骑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舍菲兰特,我们的别迦摩教会信徒,那就是它。你们在读法农著作的最后一章时,将深信最好在最贫困时当一个土著,不要当以前的殖民者。一个警察局的公务员被迫每天十小时地折磨人,没有什么好处: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他的神经会绷断,除非有人禁止刽子手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加班。当有人想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保护国家和军队的道德时,军队系统地使国家道德败坏是不适当的。一个国家的共和政体传统将其青年成千上万地托付给一些暴动者也是不合适的。我的同胞们,这不好,你们知道所有以我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这确实不恰当,你们对此却不向任何人吭一声,甚至由于你们害怕应对自己作出评价而也不对自己的灵魂吭一声。起初你们不知道,我愿相信这一点,然后你们怀疑,现在你们知道了,但你们始终缄口不语。八年的缄默,使人失去尊严。的确,折磨这个耀眼的太阳在天顶,照亮了整个国家;在这阳光下,再也没有正义的爽朗笑声,不再有一张脸不是涂脂抹粉以掩盖愤怒或害怕,不再有一个行为不流露我们的厌恶和同谋关系。今天,只要有两个法国人相遇,就会在他们之间有具尸体。而当我说一个……法国,从前是个国家的名称;请注意在 1961 年,这是个神经官能症的称

谓。

我们会治愈吗？会，暴力像阿基琉斯的长矛，能使长矛刺的伤口结痂。今天我们是受奴役，受屈辱，因害怕而病：处在最底层。幸亏这对于殖民主义的贵族还不够：殖民主义的贵族只有首先完成使法国人殖民化，才能完成其在阿尔及利亚牵制的使命。我们每天在殴斗面前退缩，但你们要深信我们避免不了这殴斗：杀人者需要殴斗，他们想朝我们猛扑过来并朝人堆中间乱打。因此，巫师和拜物教的神物的时代将结束：你们交战或旷日持久地战斗。这是辩证法的最后时刻：你们谴责这场战争，但又不敢宣布自己与阿尔及利亚战士团结在一起；指望殖民者和雇佣者们吧：他们会使你们下重大决心，采取断然行动的。于是，被逼到绝境的你们可能终于会卸下这重又在你们身上煽起的前科重罪——新暴力——的笼头。但正如有人所说的，这是另一部历史，是人的历史。我深信我们同创造这历史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不远了。

1961年9月

目 录

2002 年版序言(阿利斯·谢基)	1
1961 年版序言(让-保罗·萨特)	12
一 论暴力	1
论国际背景中的暴力	51
二 自发性的重要和弱点	61
三 民族觉悟的不幸遭遇	93
四 关于民族文化	137
民族文化与解放斗争的相互依据	165
五 殖民战争和精神错乱	175
系列 A	181
系列 B	195
系列 C	204
系列 D	214
从北非的犯罪冲动到民族解放战争	218

结论.....	233
2002 年版后记(穆罕默德·哈比)	239

—

论暴力

民族解放,民族复兴,重建属于人民的国家,英联邦,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标题或推荐什么样的新样板,非殖民化始终是一种暴力现象。不管人们研究非殖民化到达什么水平:个人之间的相交,体育俱乐部的新称谓,鸡尾酒会、警察局、国有或私人银行董事会的人道组合,非殖民化十分简单地是一“类”人替代另一“类”人。没有过渡,有的是全部、完整、绝对的替代。当然,人们也可能指出涌现一个新的民族,建立一个新国家,其外交关系和政治、经济的方向。但我们恰好选择谈论这种彻底清除,它从一开始就定义为完全非殖民化。其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在于,从第一天起,非殖民化就构成被殖民者的最起码的要求。说实话,成功的证明在于社会全貌彻底改变了。这种改变的非凡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们想要的、要求的、强求的。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存在于被殖民的男女意识和生活中,处于原始、冲动和强迫的状态。但这改变的可能性也在一个可怕的未来的形式下,存在于另一“类”男女——殖民者——的意识中。

大家看到,企图改变世界秩序的非殖民化是个绝对杂乱无章的纲领。但它不可能是个神奇的活动、大自然的打击或和睦谅解的结果。大家知道,非殖民化是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识别赋予它形式和内容的史实性运动时,它才能被

理解,才能找得自己的可理解性,使本身变得半透明。非殖民化是两股天生敌对势力的交战,这两股势力正是从殖民形势分泌出来并维持下来的这种最丰富内容中获得独创性。在暴力的征兆下展开了两股势力的第一次较量,并在大量的刺刀和大炮下继续了它们的共处——更确切地说,殖民者剥削被殖民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老相识了。因此,殖民者说认识“他们”是有道理的。是殖民者造就了并继续造就被殖民者。殖民者从殖民制度中获得其真理,也就是说他的利益。

非殖民化决非不受人注意,因为它针对人,它根本上改变人,它把受到非本质性的重压的观众改造成享有特权的、几乎崇高地位受历史的束棒利用的演员。它在存在中引进了一种由新人带来的恰当的节奏,一种新的语言,新的人道。非殖民化是真正地创造新人。但这种创造没有从任何超自然能力处收到它的合法性:在被殖民的“东西”解放自己的过程本身中变成了人。

因此,在非殖民化中,要求重新提交全面讨论殖民的形势。如果有人想精确地描述其定义,它可以在这十分著名的句子中得到:“后来者居上。”非殖民化核实了这句话。所以整个非殖民化在描述方面是成功的。

以白手起家出现的非殖民化通过其全身毛孔,让人猜到烧红了的炮弹、血淋淋的大刀。因为如果后来者该居上的话,那么只可能是在双方的主角决定性的和致命的对垒之后。意欲使最末者上升到排头,使他们爬上(有些人说,以飞速的节奏)那些确定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了不起的级别,这个愿望只有经过对所有手段进行比较,当然其中包括暴力,才能获胜。

如果一开始,就是说就在列出这计划时,不是决定粉碎路上会遇到的所有障碍,那么抱着这样一个计划,就不会瓦解一个社会,尽管这社会是如此原始。被殖民者决定实现这个计划,把它变成动力,随时准备使用暴力。被殖民者从其诞生起就清楚这个变得狭小的、布满禁令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只能通过绝对的暴力来进行诉讼。

殖民地世界是个分门别类的世界。在描述方面,重提存在土著城市和欧洲人城市,土著的学校和欧洲人的学校,无疑是多余的,同样重提南非的“种族隔离”也是多余的。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到这种隔离的深处,我们至少有优先权阐明它所包含的其中几条动力线。走近殖民地世界,走近这世界的安排及其地理布局,将使我们能划定据此重新组织非殖民化的社会的山脊界限。

被殖民的世界是个一分为二的世界。分界线的边境由兵营和警察局标明。在殖民地,有法律和制度效力跟被殖民者谈话的人,殖民者和压迫制度的代言人是宪兵或士兵。在资本主义型的社会里,宗教或非宗教的教育、能父传子的道德反应的培养、经过五十年的良好和忠实服务后受勋的工人们的诚实榜样、崇尚和谐和智慧、遵守既定秩序的这些美德模式,在被剥削者周围造成一个顺从和抑制的氛围,它大大地减轻了秩序的武力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大批的道德教师、顾问、“使人晕头转向者”介于被剥削者和政权之间。相反,在殖民地地区,宪兵或士兵通过他们的立即到场、直接和频繁的干预,保持同被殖民者的接触,并借助于枪托和凝固汽油叫被殖民者别动弹。人们看到,政权的中介使用一种纯粹粗暴的语言。中介并不减轻压迫,并不掩盖统治。他把压迫和统治呈现出来,心安理得地使用秩序的武力。中介把暴力带到被殖民者的家中和头脑中。

被殖民者居住的地带并不是殖民者居住地带的补充地带。这两个地带互相对立,但并不为一个上级单位服务。这些地带受纯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逻辑控制,服从互相排挤的原则:没有和解的可能,说一句话也是多余的。殖民者的城市是永久性的城市,整个是座铁石城市。这是座灯火辉煌、铺上沥青的城市,城里的垃圾箱总是塞满了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梦见过的、不知名的剩余东西。殖民者的脚,从不被人看见,可能除了在海中,但人们从不跟他们离得相当近。结实的鞋保护着脚,而城市里街道干净、光滑,没有坑洼,没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座吃饱偷懒的城市,它的肚子里经常装满好东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外国人的城市。

被殖民者的城市,或至少土著的城市、黑人的村子、伊斯兰教徒区、划给当地原居民住的保留地是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住满了声名狼藉的人。人们在那儿的不论什么地方出生,无论怎样出生的,也不论在什么地方死亡,因何而死,这是个没有间隔的世界,那儿是人挨着人,小茅屋挨着小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饥饿的城市,渴望面包、肉、鞋、煤、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蹲下的城市,一座下跪的城市,一座卧躺着的城市。这是座黑人的城市,一座阿拉伯人的城市。被殖民者投向殖民者城市的目光是淫荡的目光,嫉妒的目光。梦想占有。所有占有的方式:坐在殖民者的桌边,躺在殖民者的床上,如果可能的话同殖民者的妻子一起睡觉。被殖民者是个嫉妒的人。殖民者并非不知道此事,他撞见被殖民者那失去控制的目光,苦涩地确认,但始终保持警惕:“他们想占领我们的位置。”确实,没有一个被殖民者不至少每天一次地梦想处在殖民者的位置上。

这个被隔开的世界,这个被一分为二的世界里居住着一些

不同类别的人。殖民地背景的独特之处就是经济现实、不平等、生活方式的极大差异决不能够掩盖人类的现实。当人们直接察觉殖民地的背景时,很明显分隔这世界的首先是属于或不属于这个类别、这个种族。在殖民地,经济的下层建筑同样是上层建筑。因就是果:因为是白人而富有,因为富有而是白人。所以每当涉及殖民地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是应该稍微放松些。在这儿,没有不要求重新考虑的,甚至马克思深入研究过的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观念也如此。农奴有着与骑士不同的本质,但必须参考神权来使这规定的不同处合法。在殖民地,从别处来的外国人借助其大炮和机器使人接受。殖民者虽然成功地制伏和占有,他始终仍然是个外国人。并非工厂,也不是财产,也不是银行账户首先构成“领导阶级”的特点的。领导类首先是外来类,是不像当地人那一类,是“其他人”。

暴力负责筹备了殖民地世界,不懈地加速破坏了土著社会的形式,无保留地摧毁了经济的参照体系,外表和衣着的方式,在被殖民群众决定成为行动的历史,猛力冲入被禁止入内的城市的时候,被殖民者将要求和自觉地承受暴力。炸毁殖民地世界是今后十分清楚的活动写照,这个写照很可理解,并且构成被殖民民族的每个人都可能重新采用它。解散殖民地世界并不意味着在取消边境后,人们会整治那两个地带的通道。摧毁殖民地世界是恰好取消一个地带,把它埋在泥土的最深处或把它驱逐出领土。

被殖民者对殖民地世界提出问题并不是观点的理性较量。它不是关于一般概念的讲话,而是胡乱肯定一种假定为十全十美的创新。殖民地世界是个善恶二元论的世界。殖民者在肉体上限定被殖民者的空间,即借助警察和宪兵,这样是不够的。为

了阐明殖民剥削的极权特点,殖民者使被殖民者成为一种恶的精髓^①。被殖民的社会并不仅仅被描绘成一个无道德标准的社会。殖民者断言道德标准抛弃了被殖民者世界,或从未在那儿停留过——这样确认更好些——,这是不够的。土著被公然宣称为抵制伦理学,缺乏但也忽视道德标准。我们要敢于承认,土著是道德标准的敌人。从这意义上讲,土著是绝对的坏。腐蚀分子,破坏一切接近他的东西,歪曲分子,使一切与美学或道德有关的东西变了样,不祥势力的委托人,盲目势力的失去判断力和不能再被接纳的工具。而梅耶先生(M. Meyer)可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严肃地说不应因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进入共和国而糟蹋了共和国。的确,自从使道德标准与被殖民人民接触后,它就不可逆转地中了毒和被污染了。被殖民者的习俗、传统、神话,尤其他的神话,就是这种贫穷、这种宪法败坏的标志本身。所以必须把消灭疾病的媒介——寄生虫的DDT,同把异端邪说、本性、邪恶扼杀在摇篮里的耶稣教置于同样地位。黄热病的消退和福音布道的进步是同样的总结部分。但传教团的报捷实际上告诉大家被殖民人民内部导致精神错乱因素的重要性。我谈论基督教,谁也无权对此感到惊讶。殖民地的宗教是白人的宗教,外国人的宗教。它并不召唤被殖民的人走上帝的路,但却是走白人的路,主子的路,压迫者的路。且正如众所周知,在这一历史中,有许多的人伍者,却很少有当选者。

有时候,这善恶二元论竟达到其逻辑的极端并使被殖民者变得失去人性。确切地说,它使被殖民者兽性化。因此,殖民者在谈到被殖民者时,他的语言是一种动物学的语言。他影射黄

^① 我们在《黑皮肤,白面具》(瑟伊出版社)中描写过这个善恶二元论世界的机制。

色的爬行动作、土著城里的散发物、游牧部落、臭气、麇集、乱攒乱动、指手画脚。殖民者在想很好地描绘并找到恰当的字眼时，经常参考动物寓言集。欧洲人很少依靠“形象化的”词。但被殖民者懂得殖民者的计划和对他提出的诉讼要害，立即知道人家在想什么。这一奔驰的人口统计学、这些患歇斯底里的群众，这些不见一切人性的脸，这些胖得什么也不像的身子，这没头没尾的人群，这些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孩子，这种晒太阳的懒散，这种植物进度，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殖民地词汇的一部分。戴高乐将军谈到“黄色的人群”，而莫里斯先生讲到黑色、棕色和黄色的群众不久就要势如潮涌。被殖民者知道这一切，且每当听到另一方的话中暴露出动物的思想，就哈哈大笑。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个动物。而恰恰在此同时，他发现自己的人性，他开始做好战斗准备使自己的人性获胜。

自被殖民者开始按住捆他的绳索，使殖民者不安起，人们就把他托付给一些好心肠的人，他们在“文化素养大会”中，向他展示西方价值的特效性、丰富性。但每次涉及西方价值时，被殖民者就会产生一种僵硬、肌肉强直痉挛。在非殖民化时期里，要求被殖民者们的理智。向他们提议一些可靠的优秀人物，对他们大量解释非殖民化不该意味着倒退，应该依靠一些有经验的、牢固的、得到好评的优秀人物。然而，却有这样的事情：当一个被殖民者听到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的讲话时，他就抽出自己的大砍刀或至少保证手够得着自己的大砍刀。为显示出白人的价值至高无上而使用过的暴力，浸透着这些价值在同被殖民者的生活或思想方式的胜利较量时的侵略性，由于天地公道，这暴力和侵略使得有人在被殖民者面前提起这些价值时，被殖民者对此嗤之以鼻。在殖民的情况下，殖民者只有在被殖民者以让人听得

清楚的大嗓门承认白人的价值至高无上时才中断其压迫被殖民者的工作。在非殖民化时期里,被殖民群众对这些价值不屑一顾,蔑视之,唾弃之。

这种现象通常是被掩盖着,因为在非殖民化时期,一些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同殖民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种对话。在这期间,当地的居民被理解为模糊不清的群众。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有机会在各处认识的那几个个别土著不足以对这直接认识有影响,不能产生细微差别。相反,在解放时期,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热切地寻求同这些“杰出人物”接触。那个关于价值的臭名昭著的对话就是同这些杰出人物进行的。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不可能对殖民地国家维持统治时,决定在文化、价值、技术等阵地上进行后卫部队战斗。然而,决不应该无视绝大多数的被殖民人民是抵制这些问题的。被殖民人民认为最主要的价值首先是土地,因为这是最具体的:土地该保证面包,当然也保证尊严。但这个尊严同“人身”的尊严毫不相关。这个理想的人身,他从未听说过。被殖民者在自己土地上所见到的是人家可以抓他、打他、饿他而不受处罚;而从没有任何一个道德教师,任何一个神甫来代他受过,以及同他分享面包。被殖民者认为,当伦理学家,就是十分具体地使殖民者停止傲慢,粉碎他所卖弄的暴力,一句话,干脆把他从全球驱逐出去。要人人平等这一著名原则从被殖民者提出他和殖民者是同等的人开始起,就将在殖民地获得其声誉。再进一步,他就要为了超过殖民者而战斗。事实上,他已决定替代殖民者,占据殖民者的位置。正如人们所见,整个物质和精神世界倒塌。知识分子就自己而言在抽象世界方面曾追随过资本主义,他们将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能在在一个新世界中和平共处而进行奋斗。但他们看不到因为殖民主

义用其所有的思想方式渗入到他们身上,他一等到殖民的背景消失,就不再有兴趣待下去,共存下去。如果说,甚至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法国政府进行所有谈判之前,欧洲少数所谓“自由主义者”已经让人知道其立场:他们要求的正是双重公民资格,那么这事并非偶然。有人想局限在抽象方面谴责殖民者在未知事物中进行十分具体的冒险尝试。应该承认,殖民者完全知道任何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替代不了现实。

于是被殖民者发现他的生命、呼吸、心跳和殖民者的一样。他发现殖民者的一条命并不比土著的一条命更值钱。这一发现在世界上引起必不可少的震动,这已成了定局。被殖民者的一切新的革命的保证由此而引起。如果确实我的生命和殖民者的一样重要,那么他的目光不再使我觉得咄咄逼人,使我动弹不得,他的嗓门不再使我发愣。我面对他时不再不知所措了。实际上,我把他不放在眼里。不仅仅在他面前我不感到局促不安,而且我正在给他准备这样的陷阱,以致他不久便除了逃跑外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曾说过,殖民地背景的特点是使世界遭受二分法。非殖民化通过彻底根除世界的混杂,通过在民族的基础上,有时在种族的基础上统一,来统一这个世界。大家知道塞内加尔同胞们提起他们的总统桑戈尔(Senghor)的手腕时那句无情的话:“我们曾要求干部非洲化,而现在桑戈尔使欧洲人非洲化。”意思是说被殖民者有可能绝对直接地洞察非殖民化发生与否:最起码的要求是后来者居上。

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给这一请愿书带来了不同的版本,而事实上,他似乎有的是动机的起因: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专家。然而被殖民者把这些破格的优待诠释成为同样多的破坏手段,且到

处都能听到一个被殖民者宣称：“当时用不着成为独立者……”

在真正进行过解放斗争,流过人民的鲜血,和武装斗争阶段促使知识分子们涌回人民基地的被殖民地区,人们目睹了这些知识分子从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中汲取的上层建筑的真正根除。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其自我陶醉的独白中,通过它那些教育界人士,的确使被殖民者深信尽管有着所有那些应当归咎于人的错误,本质依然是不朽的。西方本质扩展。被殖民者接受这些思想的根据,人们可以在其脑子的一个褶子里发现一个负责保卫希腊拉丁底座的警惕的哨兵。然而,在解放斗争期间,在被殖民者重新接触其人民时,这个装模作样的哨兵销声匿迹了。所有地中海的价值,人身、光明和美好的出色成就变成没有生命和没有色彩的小摆设。所有这些讲话似乎像死的词汇堆积。这些似乎使灵魂高尚的价值显得不能使用,因为它与人民投入的具体斗争无关。

而首先是个人主义。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从其主子那儿学到个人应该显示出来。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借助捣槌把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钉入被殖民者的思想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关在自己的主观性中,财富就是思想的富有。然而在解放斗争期间,有幸隐藏在人民中的被殖民者将发现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斗争的组织形式将向他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词汇表。兄弟、姐妹、同志是些被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废除的字眼,因为他认为我的钱夹就是我的兄弟,我的手段就是我的同志。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一种类似火刑的判决仪式中,目睹烧毁了自己所有的偶像:自私、骄傲的反驳、在争论中常胜者那幼稚的愚蠢。这个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受殖民主义的文化辐射烧伤,也会发觉牢不可破的村民大会、稠密的人民委员会、超乎寻常地频繁的小区和支部会议。各人的事务今后不断地成为大家的事务,因为具体地说,大

家将都被外籍军团士兵发现,因此被杀害,或者大家将都得救。这种“摆脱困境”,这种解救的无神论形式在这个背景下是违禁的。

一些时候以来,对自我批评谈得很多:但知不知道这首先是非洲的惯例?无论是在北非的游牧部落的长老会议,还是在西非的会议中,传统的做法是一个村子里爆发的冲突当众辩论。当然共同作自我批评,然而带着幽默的气氛,因为大家很放松,因为我们大家都想终了同样的事情。算计、异常的沉默、不可告人的想法、暗中耍小聪明、保密等等,随着知识分子投入人民中把所有这一切都抛弃了。于是确实可以说团体的胜利已到达这种程度了,它散发出自己的光芒,自己固有的理智。但有时非殖民化也会在一些解放斗争没有足够动摇过的地区中发生,于是人们重又见到这些同样的机灵、狡滑、诡谲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重又发现他们在与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交往过程中捡到的举止和思想方式原封未动。他们昨日是殖民主义的宠儿,今天是民族权威的宠儿,他们组织掠夺国家资源的活动。他们冷酷无情,通过手段或合法的窃取爬上显要的位置:在今天全国性的贫困上作进出口贸易、开股份有限公司、作交易所投机买卖、享受破格的优待。他们再三要求商务国有化,即把市场和良机惟独保留在国民。在学说上,他们主张急切需要把国家的赃物国有化。在这冷漠无情的国有时期,在所谓的严峻阶段,他们掠夺成功很快引起人民的愤怒和暴力。在非洲和国际的当前情况下,这个贫困和独立的人民加快步伐通向社会的觉醒。这一点,那些小小的个人很快就会明白。

被殖民者为了掌握压迫者的文化和冒这个险,不得不提供保证。其中,他不得不把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变成自

己的。我们在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无能力交谈中看出了这一点。因为他不知道面对物或思想时使自己成为非必要的。相反,当他在人民内部战斗时,则连连惊叹。他被人民的诚心诚意和正直善良完全地解除武装。于是他经常伺机冒险去搞民众主义。他转变成一种随声附和的人,同意人民的每句话,把这话转变为格言。然而农民、失业者、挨饿者并不企求真理。他不说自己是真理,因为他在他的存在之中就是真理。

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客观地表现为一个平庸的机会主义者。事实上,他的手腕没有停止。对于人民来说,问题在于永远把他拒之门外或使他走投无路。人民要求的是一切共有。由于被殖民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一种对鸡毛蒜皮小事的古怪崇拜,他将延迟投入人民的大潮中去。并非是人民抗拒分析,而是他喜欢人家向他解释,爱明白论证的逐条陈述,喜欢看到自己进展如何。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和人民同处的初时,优先细枝末节,而竟至于忘记殖民主义——斗争目标本身——的失败。他在多种形式的斗争运动中十分急躁,倾向于地方性的任务,进行得热火朝天,但几乎总是过分隆重了。他总是看不到全局。他把秩序、专长、领域的概念输入人民革命这台混合和研碎机中。由于在明确的战线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有时会忘却运动的统一性,并在失败的情况下,会禁不住产生怀疑,甚至灰心丧气。相反,人民在一开始起就采取全球的立场。土地和面包:为了有土地和面包该怎么做?人民遇到的这一表面上局限和狭窄的观点归根结蒂是最具丰富知识、最有效的行动榜样。

真理的问题同样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人民内部,任何时候,真理只归功于国民们。没有任何绝对真理,任何一个关于襟怀坦荡的讲话不能丧失这个立场。被殖民者用同等的谎言来回答

殖民地形势的谎言。对于国民们,行动是公开的,对于殖民者则是收敛和不清楚的。真实,这就是加速殖民统治的崩溃,就是促进国家的浮现。真实,这就是保护当地人并使外国人完蛋。在殖民的背景下,没有诚实的品行。而善良只不过是一切伤害“他们”的东西。

因此,我们看到支配殖民社会的最初的善恶二元论在非殖民化时期原封不动保存下来。那是因为殖民者决不停止成为敌人、对手,十分确切地说,要打倒的人。压迫者在其地区使得统治活动、剥削活动、掠夺活动至关重要。在另外那个地区,盘根错节的被殖民东西,照搬不误,能维持就维持这些活动,毫无过渡地从领地的陡峭河岸到“宗主国”高大华丽的建筑物和码头都有这些活动。在这个停滞不动的地区,表面十分平静,棕榈树在云前摇曳,海浪击拍着卵石,原材料来来往往,证明殖民者的到来合法,而被殖民者蹲着,半死不活,永远做着始终同一个梦。殖民者谱写历史。他们生平是一部史诗,一部历险记。他是专横的开端:“是我们开垦了这片土地。”他是持续的原由:“如果我们走了,一切就完了,这片土地将回到中世纪。”面对他,一些麻木迟钝的人,内心受渴望和“祖先的习俗”困扰的人,构成一个殖民的、惟利是图的、近乎矿物的创新动力环境。

殖民者谱写历史并知道自己在这么做。而因为他经常参照他宗主国的历史,他明确指出他在这里是延续这个宗主国。因此他所写的历史不是他所掠夺的国家的历史,却是他国家在掠夺、侵犯和使人挨饿方面的历史。只有当被殖民者决定结束殖民主义的历史、掠夺的历史,并使国家的历史、非殖民化的历史存在时,才可能将被殖民者的静止不动重新提交讨论。

被分隔的世界,善恶二元论世界,静止不动的世界,塑像的世界:征服这世界的将军塑像,造桥工程师的塑像。被自己的石头压弯了的遭鞭子抽打的脊梁却对自己有信心的世界。这就是殖民地世界。土著是关进畜栏里的人,“种族隔离”只不过是殖民地世界的分类的一种方式。首要的事情是土著养成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超越界线的习惯。所以土著做的梦是肌肉的梦,战斗的梦,挑衅的梦。我梦见自己跳跃、游泳、奔跑、攀登。我梦见自己哈哈大笑,跨越江河,被车群追赶,绝对追不上我。在殖民化时期,被殖民者在晚上九点和早晨六点之间不停地解放自己。

被殖民者即将首先在反对自己人上表现出这种肌肉中沉积的好斗性。这个时期里黑人们之间打架,警察和预审法官们面对惊人的北非犯罪行为不知所措了。我们在后文谈论对这一现象应怎么看。^①面对殖民的安排,被殖民者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我们看到被殖民者始终梦想处于殖民者的位置。不是变成殖民者而是替代他。这个世界是个不友好的世界,拒人于门外的世界,但同时又是诱人的世界。这个不友好的、沉重的、挑衅的世界因为极其粗暴地排斥被殖民群众,不是表现为人们想尽快远离的地狱,而是表现为一个能触及的,但是由高大的守门犬守卫着的天堂。

被殖民者始终保持警惕,因为由于他很难辨认殖民世界那无数的记号,他从不知道自己是否跨越了界线。面对殖民主义者安排的世界,被殖民者总是被推定为有罪。被殖民者的有罪不是自觉接受的有罪,确切地说是一种倒霉,是一种达摩克利斯

^① 第五章《殖民战争和精神错乱》。

剑。因此,被殖民者在内心深处不承认任何诉讼。他是被统治,而不是被驯服。他被贬低,但并不服自己的低下。他耐心等待殖民者放松警惕以便扑向殖民者。被殖民者的肌肉始终在等待。不能说他焦虑不安,说他是害怕了。事实上,他始终准备着抛弃猎获物的角色,担任猎人的角色。被殖民者是个经常梦想变成迫害者的受迫害者。社会的象征——宪兵、兵营中吹响的军号、军人列队和高挂的旗帜——既充当抑止剂,也充当兴奋剂。这些象征丝毫不意味着:“别动”,而意味着:“好好准备你的行动”。事实上,如果说被殖民者有麻痹大意、忘却的倾向,那么殖民主义者的高傲和检验殖民制度牢固性的操心将再三提醒他,重大的较量不可能会无限期地延迟。这种替代殖民者的冲动随时保持肌肉紧张。确实,我们知道在已知的兴奋条件下,障碍的存在加剧朝着运动的倾向。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比是质量的比。殖民者以其势力来对抗数量。殖民者是个有暴露癖的人。他对安全的操心导致他高声提醒被殖民者“在这儿,我是主子”。殖民者在被殖民者心中燃烧着怒火,他在出走时才停止燃烧。被殖民者被扣在殖民主义那密致的网中。但我们见到在内部,殖民者只获得一块伪化石。被殖民者的肌肉紧张定期地在一些血腥的爆发中得到摆脱:部落的争斗,酋长的斗争,个人之间的斗争。

从各个个人的水平,有人目睹真正的丧失理性。在殖民者或警察可以整天殴打被殖民者,侮辱他、让他跪下时,被殖民者在碰到另一被殖民者略微敌视或挑衅的目光就会拔出刀来。因为被殖民者最后的一着是对付自己的同属来捍卫自己的人格。部落之争只有使得深深埋在脑海中的旧恨永远传下去。被殖民者通过大胆地把肌肉消耗在复仇中,企图以为不存在殖民主义,

以为一切如以前一样,以为历史在继续。在这一点上,我们充分理解从集体的水平,这些十足的逃避行为,犹如浸入这兄弟的血中可以使得看不见障碍,可以把这不可避免的抉择——通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的选择——往后延期。在部落之争中很实际的集体自我毁灭,这就是被殖民者的肌肉紧张得到摆脱所经由的道路之一。所有这些表现是面对危险的死亡反应、自杀向导,它使殖民者的生命和统治处于同样程度的巩固并可以借这同样机会证实这些人没有理智。被殖民者借助宗教,也成功地不考虑殖民者。通过宿命论,压迫者的一切创举都除去了,罪恶、贫困、命运的缘由归于上帝。个人就这样接受上帝决定的解体,在殖民者和命运面前俯首帖耳,并通过一种内部的再平衡,向一种石头般的平静让步。

然而,在此期间,生活在继续,是通过可怕的神话——这种神话在不发达社会里多如牛毛——,被殖民者抑制自己的挑衅性:每当有人错误地反抗,那些凶神恶煞、半人半豹、半人半蛇、六足狗、鬼魂出来干预,在被殖民者的周围,整整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小动物或巨兽在支配着一个比殖民主义世界可怕得多的禁律的世界,一个障碍的世界,一个抑制的世界。这个渗透土著社会的不可思议的上层建筑,在里比多经济的动力中担任了准确的职务。的确,不发达社会的特点之一,里比多首先是件团体、家族的事。我们知道人种学家们详细描述的这个社会特点,在这些社会里,那个梦见不是同自己的妻子,而是同另一个女子有性关系的男子,应该公开供认这个梦,并向这女子的丈夫或受伤害的家庭交付实物或以劳动日作为应尽的义务。这顺便证明所谓的史前社会赋予无意识很大的重要性。

神话和魔法的气氛使我害怕,表现得如同不容置疑的现实。它因为令我害怕,使我融入传统,融入我地区或部落的历史,但

同时它使我放心,它给了我一个地位,一张身份证。在不发达的国家中,神秘图是惟一属于魔法范围的集体图。在这张行为经常透彻地重复的、错综复杂的网中,令我迷惑的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我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的永恒。请相信我,鬼魂比殖民者更可怕。从此,问题不再是符合殖民主义的披着铁甲的世界的规定,而是在小便、吐痰或夜间出门前得三思而行。

超自然力量、魔力,显示出是些惊人地有关自我的力量。殖民者的势力无限地缩小,受到外国人身份的打击。用不着再真正地反对这势力,既然神话构造的可怕厄运也是十分重要。我们看到,一切都在幻觉方面的持久抗争中解决了。

然而,在解放斗争中,这个从前被分成一个个不真实的小圈子的人民,这个受难以描述的害怕折磨之苦,但乐于迷失在梦一般的暴风雨中的人民解体了,重新组织起来并在血和泪中诞生了十分真实和十分直接的对抗。给穆斯林战士们送吃的,布置岗哨,帮助缺吃少穿的家庭,替代被杀死或囚禁的丈夫:这就是鼓励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执行的具体任务。

在殖民的世界,被殖民者的易感性保持十分敏感,犹如裸露的伤口躲避腐蚀因素。而心理现象收缩起来,被磨灭了,在肌肉示范表演中流溢出来,这些表演告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们被殖民者是歇斯底里患者。这种勃起的易感性受看不见的、但直接同品性的核心有联系的守护神密切注意,它色情地热衷于解除危机的运动。

在另一个坡上,我们将看到被殖民者的易感性在多少有些痴迷的舞蹈中消耗殆尽。所以研究殖民的世界务必应致力于理解舞蹈和着魔的现象。被殖民者的放松疗法正是这种肌肉的狂欢,在这狂欢的过程中,最尖锐的挑衅、一触即发的暴力被疏导

了,转变了,消失了。舞蹈俱乐部是个宽容的俱乐部。它保护和准许。在固定时间、固定日期,男男女女聚在一个约定的地方,当着那严肃的部落的面,大胆地做着步伐不整齐、但实际上又是系统化的示意动作,动作中通过多种渠道:头部表示否认的动作,脊柱的弯曲,全身往后一闪,一目了然地看出一个集体为驱除恶魔、获得解放、说出意见而坦率地作出崇高的努力。在俱乐部里,一切都准许……人们站立在小山冈上,好像为了距月亮更近些,他们溜到河两岸的陡坡上,仿佛显示舞蹈、大净、洗涤、净礼的等值,这两个地方是圣地。一切都准许,因为实际上,人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让积聚的性欲和受阻的挑衅似火山爆发般地喷涌出来。象征性的处死,形象的入侵,许多想像的杀害,必须让所有这一切发泄出来。坏脾气吵吵嚷嚷地就像溶岩流般地流泻出来。

再向前一步,我们就完全着魔了。的确,组织的是着魔—去魔的会:迷信夜间有吸血鬼出现,中了神怪、鬼魂、妖魔的邪,上帝表明着伏都教的信仰。这些人格的分裂,两重性、分解,在稳定的被殖民世界中,担任极其重要的经济职务。去的时候,男男女女十分不耐烦,步履艰难,“依靠精神力量勉强撑持”。回来时,村子恢复宁静、和平、静止不动。

在解放斗争期间,人们将看到对这些宗教活动的奇怪的疏远。被殖民者背靠着墙,刀架在脖子上,或更确切地说,把电极放在生殖部位,被责令不再描述自己的经历。

经过几年的缺乏现实态度之后,经过沉溺在最惊人的幻觉中后,被殖民者终于手握冲锋枪,迎击惟一对其存在持异议的势力——殖民主义的势力。在武器和战火气氛中长大的年轻的被殖民者很可能嘲笑——他并不放弃——祖先的鬼魂、双头马、还魂的死人、利用人打哈欠时钻到体内的神怪。被殖民者发觉现

实,并在其改造运动中,在暴力的行使中,在其解放设想中改变这现实。

我们看到在殖民时期的整个期间,这种暴力尽管极度敏感,但转向无实在意义。我们看到通过舞蹈或着魔的激情奔放,暴力得到了疏导。我们看到它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殆尽。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抓住这个正在辨别方向的暴力。在它耽于神话和动脑筋寻找集体自杀的机会时,现在新的条件将使它能改变方向。

在政治和历史的策略方面,殖民地的解放向现代时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民族解放运动的局势成熟了?它的先驱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非殖民化具有许多形式,理智迟疑不决和禁止自己说这是真正的非殖民化或是假的非殖民化。我们要看到对于采取行动的人,要迫切决定手段、策略,即领导和组织的问题。除此之外,就只有带着本身具有的可怕的反动侥幸的盲目意志主义了。

在殖民时期,是什么势力向被殖民者的暴力提出新的道路,新的关心点?首先是政党和知识的或商业的杰出人物。然而某些政治组织的特点是宣布一些原则,但不发出口号。在殖民时期,这些民族政党的一切活动是选票主义型的活动,这是一系列关于人民支配自己的权利、人的尊严权和有饭吃的权利、连续不断地肯定“各抒己见”的原则的哲学-政治论文。民族主义的政党决不强调考验力量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明确地根本推翻制度。这些政治组织是和平主义的,严守法规的,实际上是新秩序的拥护者,它们向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直截了当地提出对于它们必不可少的问题:“给我们更多的权力。”那些杰出人

物对于暴力这个特殊问题是模棱两可的。当这些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干部说一件事时,他们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实际上并不以为然。

必须同时通过那些民族主义政党的干部质量及其拥护者的质量来诠释那些政党的这个特点。民族主义政党的拥护者是城市居民。这些工人、这些中小学教师、这些已经开始——当然是减价地——利用殖民局势的小手工业者和商人,有其个人利益。这些拥护者要求的是改善他们的命运,增加工资。这些政党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对话从未中断过。他们讨论治理、选举代表制、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他们讨论改良。因此,对看到大量的土著在宗主国的政治组织的分支机构中积极活动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这些土著为了一句抽象的口号“权力属于无产阶级”而争吵,却忘了在他们的地区,首先要为民族主义的口号进行战斗。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将其挑衅性投入到他那变成与殖民地世界相似的、几乎不加掩饰的意愿中去。他用自己的挑衅为本身的利益——个人利益服务。因此,一种个体解放的奴隶、获得自由的奴隶的阶级轻而易举地诞生了。知识分子要求的是增加获得自由的奴隶,组织一个名副其实的获释奴隶的阶级。相反,群众并不期待看到个人成功的机会增加。群众所要求的不是殖民者的地位,而是殖民者的交椅。绝大多数的被殖民者要殖民者的农庄。对于他们,谈不上和殖民者进行竞争。他们要自己的位置。

大部分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把农民有步骤地撇在一边。然而,在殖民地国家,十分明显只有农民是革命的。他没有什么可失掉的,却应该去赢得一切。农民,这个失去地位的人、忍饥挨饿的人、受剥削的人,最快发现只有暴力给他补偿。他认为没

有折衷,没有和解的可能。殖民化或非殖民化,这单纯是个武力的对比。被剥削者意识到自己的解放必须以所有的手段为前提,且首先是武力。1956年,在居伊·摩勒先生^①对阿尔及利亚殖民者妥协后,民族解放阵线在一著名的宣传小册子中,指出殖民主义只是放松威胁,没有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觉得这话太过火。这本宣传小册子只不过是表达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在心底最深处所感受的东西:殖民主义不是一台思想机,不是一个具有理智的物体。它是自然状态下的暴力,它只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暴力面前才可能屈服。

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直到那时一直保持缄默,在作决定性解释时进入行动。它引入这个新概念——确切地说,殖民形势的一个新花样——非暴力。在其原有的形式中,这种非暴力对于被殖民的知识和经济的杰出人物意味着,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具有和他们同样的利益,因此必然急需达成一个为求共同安全的协议。非暴力是试图在一切不可逆转的行动、一切流血、一切遗憾的行为发生之前,围着会议桌解决殖民问题。但如果群众不等会议桌周围的椅子摆好,只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并开始放火和行凶,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杰出人物”和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奔向殖民主义者并对他们说:“这非常严重!不知道这一切怎么结束,必须找个解决办法,必须寻求和解。”

这个和解的概念在非殖民化的气氛中十分重要,因为它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确实,和解同时关系到殖民制度和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殖民制度的拥护者们发现群众有可能毁坏一切。

① 1905—1975,法国政界人物,在共和阵线胜利后,成为政府首脑。——译注

破坏桥梁、摧毁庄园、镇压、战争,这一切严酷地打击经济,和解也是为了民族资产阶级,它由于认不清这台风可能产生的后果,实际上害怕被这巨大的狂风卷走,并不断地对殖民者说:“我们还是能够阻止这屠杀的,群众仍然信任我们,要是你们不想连累一切,那就赶快干吧。”再进一步,这位殖民主义政党的领导同这暴力拉开距离。他明确表明自己不愿同这些 Mau-Mau^①、这些恐怖分子、这些刽子手发生任何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退居在恐怖分子和殖民者之间的“无人之地”,并甘愿自我推荐为“谈判对象”:这意味着殖民者不能同 Mau-Mau 讨论,他十分愿意去进行谈判。因此,民族斗争的后卫部队,这一部分的人民从未停止成为斗争的另一方,处于谈判及和解的先头部队的一种智力锻炼地位——因为确切地说他们注意避免中断与殖民主义接触。

在谈判前,大部分的民族主义政党仅限于在最好的情况下作解释,为这种“野蛮”作辩解。他们不愿承担人民的斗争,而他们往往在一些与外面隔绝的圈子里,禁不住谴责被报刊公开宣布为丑恶的这样精彩的行动,和宗主国的主张。客观看事物的考虑构成这种保守主义的政策的合理缘由。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头头们的这种惯常的态度实际上并不客观。事实上,他们并不确信群众的这种不耐烦的暴力是保护他们本身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有人深信粗暴的办法是无效的。他们认为不允许任何疑惑,一切通过武力粉碎殖民压迫的尝试是绝望的行为、自杀的行为。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殖民者的坦克和战斗机占据了很大的地方。当有人对他们说必须行动

① 肯尼亚吉库尤人的秘密社团,它于 1952—1956 年进行恐怖活动,反对英国人。——译注

时,他们看到炸弹向他们的脑袋投下来,装甲车沿路向前开来,枪炮连续发射,警察……而他们坐着不动。他们开始输了。他们对于通过暴力获胜的那种无能无需证明,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和自己的行动中接受了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坚持幼稚的见解,恩格斯在其同杜林先生这位幼稚泰斗的著名论证中采用这种见解:“如同鲁宾逊能搞到一把剑一样,我们也完全能接受星期五在某个早晨手持手枪出现,于是整个‘暴力’之比颠倒了:星期五指挥而鲁宾逊被迫干个不停……因此,手枪战胜了剑,而甚至连最幼稚的公理爱好者无疑也会设想暴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愿行为,但为了实施这意愿,要求一些十分真实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一些工具,其中最完美的工具胜过不太完美的;此外,这些工具得生产出来,这也意味着较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粗略地说,武器生产者——压倒不太好的武器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基于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生产反过来建立在一般生产的基础上,因此……建立在‘经济势力’、经济的国家、受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的基础上^①。”确实,改良主义的头头们不讲别的事:“你们用什么去跟殖民者作战。用你们的刀?用你们的猎枪?”

确实,工具在暴力领域内十分重要,因为归根结蒂,一切建立在这些工具的分配上。但在这个领域内,存在着殖民地领土的解放带来一种新的观点。例如,人们见到在西班牙战役这一真正的殖民战争中,尽管拿破仑在1810年春季进攻期间,兵力达四十万人之巨,但还是被迫撤退了。然而,法国军队因其武器、士兵的勇猛、其统帅们的军事天才而使整个欧洲颤抖。面对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部分,第三章,《暴力的理论》,社会出版社,199页。

拿破仑军队那了不起的本领,西班牙人受不可动摇的民族信念的鼓励,发现了二十五年前美国民兵曾用来反对英国军队的那种游击战。但被殖民者的游击战如果不是托拉斯和宗主国之间的竞争的全部过程中的一个因素,那么它就如同暴力工具反对别的暴力工具那样,没有任何意义。

在殖民化开始时,一支特遣队能占领几大片国土:刚果、尼日利亚、象牙海岸,等等。但今天被殖民者的民族斗争处于崭新的形势。资本主义在其跃进时期,看到殖民地是原料的源头,这些原料经过加工后可以在欧洲市场倾销。经过一个资本积累阶段后,它今天达到了改变其对一件事赢利的观念。殖民地变成了市场。殖民地居民是买东西的顾客。从此,如果驻地应永远加强,如果商业速度减慢,即如果手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不再能出口,则证明应该撇开军事解决办法。一种奴隶主义型的盲目统治对于宗主国并没有经济的赢利。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垄断分支机构并不支持一个仅以执剑政策为其政策的政府。宗主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们对他们政府所期待的,不是造成部落大量死亡,而是要它借助经济协议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

因此,存在一种资本主义与殖民地领土上爆发的暴力势力客观上的共谋。此外,被殖民者在对付压迫者时并非孤立。当然,有进步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援助。但尤其有各金融集团进行的竞争和无情的战争。一次柏林大会可以把非洲瓜分为三个或四个国籍。现今,重要的不是某个非洲地区是法国还是比利时的统治地:重要的是经济地带受保护。猛烈的炮击,燃烧土地的政策给经济束缚让路了。今天,不再为对付某个造反的苏丹进行镇压战争了。人们比较文雅些,不太残暴了,人们决定和平解决卡斯特罗的社会制度,人们试图扼杀几内亚或消

灭莫萨达克^①。因此,如果害怕暴力的民族领袖想像殖民主义要“把我们都杀死”,那就错了。当然,军人们继续玩征服时期的人像靶,但金融界很快把他们带回到现实中来。

所以需要有理智的民族主义政党尽可能明确地阐述他们的要求,并同殖民主义的搭档一起,心平气和地、不带偏见地,寻找一个尊重双方利益的解决办法。我们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改良主义经常表现为一种工会运动的漫画,如果它决定行动,就通过公开和平的道路进行:在那几个安置在城市内的工业部门中罢工,为一致欢呼推选领袖而游行,联合抵制公共汽车或进口食品。所有这些活动既用以对殖民主义施加压力,又用以使人民能够卖力。实行这种冬眠疗法,这种人民的睡眠疗法,有时能够获得成功。于是,从会议桌上的讨论出现政治的升级,使加蓬共和国总统姆巴(M'ba)先生能够在到巴黎作官方访问时十分庄重地说道:“加蓬是独立的,但在加蓬和法国之间,什么也没改变,一切继续如以前那样。”事实上,惟一的改变,是姆巴先生当了加蓬共和国的总统和他受到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接见。

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其安抚被殖民者的工作中受到不可避免的宗教的帮助。所有甘愿受侮辱、宽宥冒犯、不动声色地接受别人的唾沫和辱骂的圣徒都被当作范例,得到阐明。被殖民国家的杰出人物,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当他们成了运动的头头,必然以生产一个战斗的代用品而告终。他们利用“他们弟兄的奴隶状态”来使拥护奴隶制的人感到羞愧,或向与他们的压迫者们竞争的金融集团提供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道主义思想内容。事

① Mossadegh 或 Musaddag, 1881—1967, 伊朗政治家, 曾创建民族阵线。——译注

实际上,他们决不真正地号召奴隶们,决不具体地动员奴隶们。恰恰相反,在实话实说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谎的时候,他们挥舞起“动员群众”这面威胁旗帜当作决定性武器,这武器可能会神奇般地导致“殖民制度的结束”。在这些政党内部,干部中间,显然有些革命者断然对这民族独立的闹剧不予理睬。但他们的干预、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发怒动作迅速使这个政党机器感到不快。这些分子逐渐孤立了,然后干脆把他们甩开了。同时,如同有辩证法的关联性似的,殖民主义的警察正好冲着他们这些人去找碴了。在城市里没有安全,战士们对他们避而远之,政党的权威人士抛弃他们,这些带有煽动性目光的不受欢迎的人将在农村中失败。正是在这时他们带着某种晕头转向,察觉农民群众一知半解地听懂他们的话,且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了那个他们毫无准备答复的问题:“什么时候?”

来自城市的革命者和乡下人的这一会面将在以后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应回到政党,指出他们那还算是进步的活动之特点。那些政治领袖在他们的讲话中“说出民族这个名称”。被殖民者的要求就这样得到一个形式。没有内容,没有政治和社会纲领。有一个泛泛的,然而是民族的形式,一个我们称之为最低要求的框架。发言的人,在民族主义报纸上写文章的人,让人民怀着梦想。他们避免颠覆,但事实上在听众或读者的意识中输入了可怕的颠覆因素。人们经常使用民族或部落的语言。在这点上再次维持了梦想,使人能想像跳出殖民的秩序。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还说道:“我们黑人,我们阿拉伯人”,殖民时期这种沉重的双重性称呼得到一种类似神圣化的感觉。民族主义的政治人物在玩火。因为正如一个非洲领导人最近向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吐露的:“好好考虑后再跟群众谈话,他们很快就会激动。”

因而有个捏造的计谋,它可怕地要弄了殖民地。

当政治领导人邀请人民参加集会时,可以说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然而,这位领导人往往是特别考虑要“显示”他们的武力……为的是不要去使用它。但是这样持续的、混乱嘈杂的活动——去,来,听讲话,会见聚在一起的人民,周围围着警察,军事示威演习,逮捕,放逐领袖们——,这一切忙乱给人民一种印象:他们认为是干些什么的时候了。在这些不稳定的时刻,那些政党频频呼吁左派要镇静,而对他们的右派,他们则探测其思想活动的境界,企图辨识殖民主义的宽容意图。

人民同样利用这时刻来保持良好状态,维持其革命能力,集体生活的某些插曲。例如:当着追踪自己的宪兵们的面在大白天守住农村的盗匪,在一次一对一的格斗中,撂倒了四五个警察后支持不住的盗匪,为了不“招供”同谋而自杀的盗匪,人民认为这些人是灯塔,是行为的模式,是“英雄”。显然,说这样的英雄是小偷、坏蛋或道德败坏者毫无用处。如果这个人为此而被殖民主义当局追捕的行动是个专门针对某个殖民的人身和财产的行为,那么界线十分清楚明显。自然而然会辨别出来。

也必须指出民族抵抗征服的历史在这成熟过程现象中所起的作用。被殖民的人民的伟大人物始终是那些领导民族抵抗入侵的人物。贝昂赞(Béhanzin)、松迪亚塔(Soundiata)、萨莫里(Samory)、阿布代尔·卡德(Abd el-Kader)特别强烈地在行动之前的时期复活。这证明人民准备重新发展,中断殖民主义引进的停滞时期,谱写历史。

新民族的涌现,殖民结构的摧毁,这是独立的人民暴力斗争的结果,或者是约束殖民制度的活动——周边别的一些被殖民人民所承担的暴力——的结果。

被殖民的人民并非孤立。尽管殖民主义作出努力,但其界限还是容易受到新闻和反响的影响。殖民主义发现暴力成了一种气候,到处爆发,且到处席卷殖民制度。这种成功的暴力对被殖民的人民具有提供情报的作用,而且还有操作的作用。越南人民在奠边府的伟大胜利,严格地说,不再仅仅是越南的胜利了。从1954年7月起,被殖民的人民向自己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为了实现一个奠边府,该怎么干?怎么着手?”任何一个被殖民者不能再怀疑这个奠边府的可能性了。成为问题的是如何安排武力、他们的组织、他们投入行动的日期。这种周围的暴力不单单改变了被殖民者,也改变了殖民主义者,他们意识到有许多的奠边府。所以一个真正有序的恐慌控制着那些殖民主义的政府。他们的意图是先下手,把解放运动向右扭转,解除人民的武装:我们赶快使之非殖民化。我们在刚果转变成阿尔及利亚之前使它非殖民化。我们为非洲投票表决法律总则,创建共同体,改革这个共同体,但我请求你们,进行非殖民化,进行非殖民化……人们以这样快速度进行非殖民化,以致将独立强加给胡夫埃特-布瓦尼^①。殖民主义者根据国家的权威来配备干部,以此战略回应被殖民者确定的奠边府战略。

但我们回到这个暴力气氛,这个极度的暴力的话题。我们见到在其成熟过程中,许多传送带载着这暴力并把它带到出口处。尽管殖民制度在部落或地方主义的斗争中迫使暴力改变形式,但它仍然逐步前进,被殖民者认清了他的敌人,想起了自己所有的不幸,并把自己的仇恨和愤怒的全部冲天力量投入这新的道路。但我们如何从暴力气氛过渡到暴力行动?什么事

① 象牙海岸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译注

情使这重磅炸弹爆炸？事实是，首先，这个发展不让殖民者的福乐未受损坏。“认识”土著的殖民者从好多迹象上察觉有些东西正在改变。善良的土著变得少了，压迫者走近时听到一片寂静。有时候他们的目光变得凶狠了，态度和谈话直截了当地挑衅了。那些民族主义的政党骚动不安，频频集会，同时，警力增加，援军抵达。殖民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人，被孤立在自己的农庄里，首先惊慌不安。他们要求采取有力的措施。

果然，当局采取了轰轰烈烈的措施，他们逮捕了一两个领袖，组织军人列队游行，进行演习，空中飞行，那些示威演习、作战操练、空气中现在布满的火药味，并未使人民退却。这些刺刀和连续炮轰加强了人民的挑衅。一种凝重的气氛造成了，在这气氛下每人想证明自己一切准备就绪。子弹是在这种情况下独自打出的，因为神经脆弱，担惊受怕，人们易受扳机的影响。一个平常的偶然事故而开始机枪扫射了：这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摩洛哥的中央露天采矿场，马达加斯加的穆拉曼加。

镇压非但不能消除冲动，却加强民族觉悟的进展。在殖民地，从觉悟初步进展的某个阶段起，大屠杀加强了这种觉悟，因为它显示出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一切通过武力解决。这里必须指出政党并未发出武装暴动的口号，并未准备这种暴动。所有这些镇压，所有这些由害怕引起的行动并非领导们所愿。事件给他们来了个措手不及。所以殖民主义能决定逮捕民族主义的领袖们。但今天殖民主义国家的政府完全知道除掉群众的领袖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那时人民不再任人摆布了，他们投入农民起义、反叛和“屠杀牲畜”。群众控制不住自己的“浴血的本能”并迫使殖民主义释放一些领袖，重新带来平静的艰巨任务则属于这些领袖了。被殖民的人民自发地把他们的暴力投入摧毁

殖民制度的巨大任务中,不久就重又同那无活力的、不出成果的口号“释放 X 或 Y^①”搅在一起了。于是,殖民主义释放这些人并同他们讨价还价。民间舞会的时候开始了。

在另一种情况下,政党的机器可以保持原封不动。但由于殖民主义的镇压和人民的自发反应,政党无法应付自己的战士们。群众的暴力激烈地抵抗占领者的军事力量,形势恶化,变得十分糟糕。于是自由的领导们站在局外。他们与他们的行政机构权力和合理的纲领,突然变得一无用处,人们见他们远离事件,尝试“以不许发表意见的民族的名义讲话”这个高度骗局。按一般惯例,殖民主义热切地扑向这个意外的好处,把这些无用之人改变为谈判对象,马上给他们任务,独立自主地恢复秩序。

因此我们明白人人意识到这种暴力,而问题是并非总是用一种更大的暴力去应对这暴力,但确切地说是看如何去平息暴力的发作。

那么这种暴力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被殖民的群众有这个意图:他们的解放应该发生,而不能通过武力产生。这些无技术的、饥饿和衰弱的、对组织方法不熟悉的人,是由于什么样的精神反常,竟至于面对占领者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势力,相信只有暴力能解放他们?他们怎么能希望获胜?

因为暴力作为方法,可以成为一个政党的口号。这是丑事。一些干部可能号召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必须对暴力的这个或然判断进行深思。德国的军国主义决定通过武力解决边境问题,我们对此一点也不大惊小怪,但安哥拉人民决定拿起武器,阿尔及利亚人民摒弃一切不使用暴力的方法,证明发生了或正在发

① 有时可能那位领袖真正表达被殖民群众的心声。在这种情况下,殖民主义会利用其被拘禁而试图抛出一些新领袖。

生一些什么事。被殖民的人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不耐烦了。他们知道只有这荒唐事能使他们摆脱殖民压迫。世界上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不发达的人民折断他们的锁链,且非凡响的是他们成功了。人们可以宣称在人造卫星时代,饿死人是滑稽可笑的,但被殖民的群众认为,阐述并非脱离现实。事实是今天没有一个殖民主义的国家能采取惟一的斗争方式有幸成功的:延长大量占领军的驻扎。

在国内,殖民主义国家面对一些矛盾,工人们的请愿,请愿需要使用国家的警力。加之,在现今的国际形势下,这些国家需要其军队保护它们的制度。最后,人们认识到由莫斯科领导的解放运动的秘密。在有关制度那使人吓破胆的论证中,这意味着:“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共产党员要利用这些混乱渗透到这些地区中去。”

被殖民者失去了耐心,他们挥舞起暴力威胁的旗帜,这个事实证明他们意识到现代形势异乎寻常的特点,以及他们打算利用它。而且在直接经验方面,被殖民者有机会看到现代社会,深入到荒漠地区的最偏僻的角落中去,尖锐地注意到被殖民者不拥有的东西。群众出自一种天真的推理,深信所有这些东西是被偷走了。所以在某些不发达国家中,群众走得很快,并在独立两三年后,懂得自己曾受剥夺,如果这不该真正改变的话那就“不值得”战斗了。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地位最低的农民曾基本上利用这种骚乱。但去验证和谈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不发达国家中95%的居民来说,独立并不带来即时的变化,这就显得十分平庸了。富有经验的观察家体会到存在一种潜在的不满,犹如一场火灾熄灭后这些未烧完的火炭,始终预示着火的危险。

于是人们说被殖民者走得太快了。然而,我们决不要忘记不久以前,有人断言他们迟钝、懒惰、宿命论。人们已察觉走上十分准确的道路的暴力,在解放斗争时,经过带有民族色彩的仪式后,神奇地并不渐渐衰退。它尤其因为民族结构继续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竞争的范围内而不消失。

这种竞争使那些最局部化要求几乎成为全世界的了。每个集会,每个镇压行动在国际舞台得到反响。沙佩维尔的杀人事件震撼了舆论几个月。在报上、无线电广播中、私人谈话中,沙佩维尔成了一个象征。是透过沙佩维尔一些男女开始讨论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人们不能断言只有那蛊惑人心的宣传说明大国突然对不发达地区的小事感兴趣。每次农民起义,每一次第三世界的骚乱都属于冷战范围内。在索尔兹伯里,两个男子挨棍棒敲打,而现在一个集团总体开始行动了,谈论这两个人,并借这打人事件的机会引发罗德西亚的特殊问题——把它和整个非洲和全部被殖民的男子联系起来。但另一个集团进行同等规模活动,估计其体系的局部弱点。被殖民的人民意识到任何一个小集团都跟地方上的事端不无关系。他们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地区境域,明白了他们是处于全世界动荡的氛围中。

当每三个月,得知第六或第七舰队驶向某个海岸时,当赫鲁晓夫威胁要发射火箭来搭救卡斯特罗时,当肯尼迪提及老挝,决定考虑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时,被殖民者或新独立者有此印象:不管愿意不愿意,自己被拖着狂奔疾走。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行进。我们举最近解放的国家政府的情况为例。当权者把他们的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监视四周围,防止危险威胁他们,而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则用以替国家工作。同时,他们给自己寻找靠山。由于听从同样的论证,民族反对派随着蔑视议会道路而改变方

向。他们寻找答应支持他们粗暴的骚乱举动的同盟者。暴力的气氛在浸透了殖民阶段后,继续统治着民族的生活。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第三世界并未被除外。恰恰相反,它处在风暴的中心。所以,不发达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们在其讲话中无限期地保持着挑衅和夸张的口吻,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口吻本应消失了。人们也理解新领导们如此经常示意的不礼貌。但人们较少看到的是同样这些领导跟兄弟或同志们接触时那种过分的礼貌。不礼貌首先是对待其他人,对待前来观察和调查的从前的殖民主义者的一个行为。以前的被殖民者经常有这些调查的结果已撰写好的印象。新闻记者的出差是个证明。文章中加插的照片证明他知道谈论什么,他到过那里。调查旨在验证这个事实:自从我们不再在那儿起,那儿一切都很糟糕。记者们经常埋怨未受到好好接待,工作条件不好,遭到冷淡或仇视的阻挡。这一切很正常。民族主义的领导们知道国际舆论仅仅是由西方新闻界制造的。然而,当一个西方记者向我们提问时,很少是为了帮助我们。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最自由主义的法国记者们不断地使用模棱两可的形容语来描绘我们斗争的特点。当有人为此责备他们时,他们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客观的。被殖民者认为客观的矛头始终指向反对他们。人们也明白 1960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上完全占据国际外交的新口吻。殖民国家的代表们是挑衅的、粗暴的、过激的,但殖民的人民却不觉得他们过分。非洲代言人们的激进主义引起祸患成熟,使得人们能更看清楚大国的否决权和对话难以接近的性质,以及尤其是那第三世界的微不足道的作用。

新独立的人民开创的那种外交,不再是谈吐有分寸、暗示、诱导。那是因为这些代言人受他们的人民之托,要同时捍卫民族团结、发展群众福利及人民的自由权和有饭吃的权利。

因此一个在行动的、风风火火的外交，同殖民化的停滞不动、僵化的世界形成奇特的对照。当赫鲁晓夫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上挥舞自己的皮鞋并拿它捶桌子时，没有一个被殖民者，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发笑。因为赫鲁晓夫向瞧着他的被殖民国家显示出他这个帝俄时代的庄稼汉这么对待这些资本主义可怜虫是他们活该，何况他还拥有火箭。同样，身穿军装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卡斯特罗并不引起不发达国家的议论纷纷。卡斯特罗显示的是他意识到暴力持续制度的存在。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带着冲锋枪进入联合国组织；但可能曾有人反对这样？农民起义，绝望的行动，用大刀或斧子武装起来的团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反对的无法平息斗争中发现了他们的民族特点。

1945 年，在塞提夫死去的 45,000 人可能不被人看见；1947 年，在马达加斯加死亡的 90,000 人可能在报纸上只以一简短的小报道略过；1952 年在肯尼亚 200,000 的镇压牺牲者可能遭到相对的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国际矛盾不够明显。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尤其是布达佩斯和苏伊士运河构成了这种对抗的关键时刻。

被殖民者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无条件的支援，随带他们所有的武器冲向殖民主义那不可攻克的堡垒。如果说这个堡垒用大刀和赤手空拳是攻不破的，那么当有人决定考虑冷战的情况下，它就不再是坚不可摧的了。

在此新情况下，美国人十分认真对待国际资本主义的老板角色。最初，他们建议欧洲人为讨好而实行非殖民化。后来，他们毫不迟疑地声明：先是尊重，然后是支持非洲属于非洲人的原则。今天美国不怕正式地说他们是捍卫人民享有自己支配自己

的权利的卫士。门南-威廉斯先生^① 最近的旅行只是表明美国人意识到第三世界不应廉价出售。从此人们明白为什么被殖民者的暴力只有在把它抽象地同压迫者的军事机器比较时才是毫无希望的。相反,如果把这暴力置于国际动力之中,人们就发现它对压迫者构成一个可怕的威胁。农民起义和 Mau-Mau 骚乱的持久不息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失去平衡,但并不危及宗主国,在帝国主义看来比较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宣传可能渗入群众中,并感染他们。在冷战时期这已是个严重的危险了;但在热战情况下,这个被致命的游击战毁坏的殖民地会变成什么样呢?

于是资本主义体会到它的军事战略会把一切输在民族战争的发展中。因此在和平共处的范围内,呼吁所有的殖民地消失,并更有过之,呼吁资本主义要遵守中立主义。首先应避免的是战略上的不安全,群众向敌对的学说打开大门,一千来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被殖民的人民完全清楚知道这些控制国际政治生活的迫切需要。所以即使那些愤怒申斥暴力的人,也始终作出对这全球的暴力有利的决定,并为之行动。今天,两大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在殖民地国家中保持和挑起暴力。明天,我们可能会看到在殖民地领土全部解放后,这个暴力区域将迁移。它们中有一些已经毫不犹豫地鼓吹一些粗暴的方法用以解决它们的问题,且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在美国一些极端主义的黑人组成民兵并因而把自己武装起来,这并非偶然。如果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有保护苏联犹太少数民族的委员会,如果戴高乐将军在他的一个讲话中对受共产主义专政压迫的几百万穆斯林洒下几

^① 杰哈德·门南-威廉斯(1911—1988),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曾经密歇根州州长,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

滴眼泪,这也并非偶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深信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纯粹是“外部”酝酿的、遥控的扰乱。因此它们决定使用这种有效的战术:自由的欧洲广播,受统治的少数派援助委员会……它们搞反殖民主义,就像法国直属兵种司令指挥的各团在阿尔及利亚用 SAS(特种空中勤务)或心理上的帮助搞颠覆战。他们“利用人民反人民”。我们知道这产生什么后果。

这种暴力和威胁的气氛,这些挥舞着的火箭吓不倒被殖民者,也不能使他们迷失方向。我们已看到他们整个最近的经历促使他们“了解”这个形势。在当代世界沉浸其中的殖民的暴力及和平的暴力之间,有一种同谋的一致性,半斤八两。被殖民者适应了这种氛围。他们总算有一次跟上了时代。有时,人们对被殖民者不愿送给自己的妻子一件连衣裙却宁愿买个半导体收音机感到惊讶。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被殖民者深信他们现在时来运转了。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末端环境中,他们认为什么也不该逃过他们。所以他们很了解富马(Phouma)和富米(Phoumi),卢蒙巴(Lumumba)和宗贝(Tschombé),阿伊乔(Ahidjo)和穆米埃(Moumié),凯尼亚塔(Kenyatta)和那些被人家定期推到前面当代替的人。他们十分理解这些人,因为他们揭露他们背后的势力。被殖民者,不发达的人类,今天是政治动物,这是就这个词的最全球的意义上说的。

当然,独立给被殖民的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弥补并认可了他们的尊严。但他们还来不及设置一个社会,建立和肯定一些社会准则。公民和人类在愈来愈宽广的领域内发展和富裕的炽热中心还不存在。由于这些人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地位,他们相当轻易地认为在别处一切都即将同时为大家得到解决。至于领

导们,面对这种形势,他们迟疑不决并选择中立主义。

关于中立主义本来有许多话要说。有些人把它等同于一种左右逢源的令人厌恶的惟利是图。然而,中立主义这个冷战的造物,如果说可以使不发达国家得到双方的经济援助,那么事实上却不能使这双方的每一方各自恰当地来帮助那些不发达地区。投入军事研究的这些完全是天文数字的一笔笔钱,变成核战技师的这些工程师,可能在十五年之内,提高 60% 的不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明白不发达国家十分关心的不在于延长和加剧这个冷战。但有时候人家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在有可能时解除约束。但他们能真正这样做吗?例如,现在法国在非洲试验它的原子弹。如果把那些提议、集会和引起轰动的外交中断排除在外,那么不能说非洲人民在这个确切的领域中对法国的态度有影响。

中立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公民身上产生一种精神姿态,这种姿态通过一种非常像挑战的无畏和庄严的自豪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来。这种明确拒绝妥协,这种不受束缚的十分倔强意愿令人联想到这些高傲而朴实的青少年,他们总是准备着为一句话而去牺牲。所有这一切使得西方的观察家们哑口无言。因为严格地说,在这些人声称存在的东西和他们背后所有的东西之间有件丢脸的事。这个没有电车、没有军队、没有钱的国家并不解释他们那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虚张声势。不用再怀疑,这是欺骗。第三世界经常给人以悲喜交集和必须每周一次定期服药防止发作的印象。这些空无所有的国家领袖夸夸其谈,令人恼火。真想让他们闭上嘴。然而,有人却奉承他们。给他们献花。邀请他们。应该承认,人家在争夺他们。这就是中立主义。他们

98%是没有文学知识的,然而却存在一个庞大的关于他们的文学。他们大量旅行。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们,不发达国家的大学生们是航空公司的黄金顾客。非洲和亚洲的负责人有可能在同一个月里到莫斯科聆听有关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教导和到伦敦或哥伦比亚大学聆听关于自由经济的好处和教诲。非洲的工会干部就他们自己这方面来说,则加速进步。他们刚刚登上领导机构的岗位,就决定使自己成为自主的中心。他们没有这五十年在工业国范围中过去的工会实践活动,但他们已经知道不问政治的工会运动是个荒谬的活动。他们没有迎击资产阶级的机器,他们没有发展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但可能这不是必需的。可能,我们将看到这个综合的意愿以漫画的手法描绘成概括,是不发达国家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但我们回到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一对一的格斗上来。我们看到,这涉及不折不扣的武装斗争。历史上的例子是: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当然,还有北非。但不应忽视的是,这武装斗争可能会在随便哪儿爆发,在几内亚和索马里,而且今天它可能哪儿殖民主义还在延续,哪儿就有爆发,例如在安哥拉。存在着人民决定只相信暴力手段和真正的武装斗争。人们从未停止过对人民说他只懂得武力的语言,这个人民决定通过武力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事实上,殖民者始终告知人民如果想解放,得走殖民者那条道路。被殖民者选择的论证,通过殖民者和讽刺性的事物轮回,向他指出了,现在是被殖民者断言殖民者只懂得武力。殖民制度从武力中获得它的合法性,且任何时候也不尝试同事物的这个性质施诡计。每座雕像,费德尔布(Faidherbe)的或利奥泰(Lyautey)的,比若(Bugeaud)的或布朗当(Blandan)中土的,所有这些矗立在殖民地土地上的征服者不断地表示惟一和同一件事:“我们是通过刺刀的威力到这儿的……”大家轻易

地把这意思补充完善。在造反阶段,每个殖民者以精确的算术为出发点进行说理。这个逻辑对于其他殖民主义者来说不足为奇,但重要的是说被殖民者对这也不以为怪。首先,肯定这原则:“是他们或是我们”并不是个悖论,既然我们看到殖民主义正是组织一个善恶二元论的世界,一个分类的世界。而当殖民者主张干净利落的办法,要求每个压制人的少数代表干掉三十或一百个或者二百个土著时,他发觉没有一个人是不尽责的,而且问题至多只不过是知道他们一下子还是分阶段办这件事^①。

这个算术上预测被殖民的人民的消失的推理并不使被殖民者因精神上愤怒而慌乱。他始终知道他跟殖民者会在决斗场上展开决斗。因此,被殖民者不把时间浪费在唉声叹气上,并且他几乎决不企图人家承认他在殖民范围中的正当权利。事实上,殖民者的论证之所以发现被殖民者是不可动摇的,那是因为被殖民者实际上用同样的字眼提出了他的解放问题:“我们把自己组成二百人或五百人的团体,且每个团体管一个殖民者。”每个唱主角的人就是在这种相互的思想支配下开始斗争的。

被殖民者认为,这种暴力代表绝对的实践。活动分子也是在工作的人。组织向活动分子提出的那些问题带有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你在哪儿工作过?跟谁一起工作?你干过什么?”团体要求每个个人完成一个不可逆转的活动。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几乎全部号召人民进行民族斗争的男子被判死刑或遭法国警察

^① 很明显,这种扫荡一空毁坏了想要拯救的东西。这正是萨特在说“总之,通过重复这些(涉及种族主义思想)的事实本身,人们揭示所有的人同时团结起来反对土著是无法实现的,它只是循环旋转,况且这种团结只能是为了屠杀被殖民者才积极地聚结在一起,这是殖民者的永恒和荒谬的欲望,况且如果这种团结真能实现的话,它会最终一下子消灭殖民主义。”(《辩证理性批判》,第346页)时所指出的。

追捕，在那儿，信心和每个事件毫无希望的特点成正比。一个新战士对不再会回到殖民制度确信无疑。这种机制似乎在肯尼亚的 Mau-Mau 们身上存在过，他们要求团体的每个成员拷打受害者。故每个人就自身来说都对受害者之死负责。所谓工作，也就是为了使殖民者死亡而工作。接受暴力既使走入歧途者，也使被团体摈弃在外者能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重新找到他们的位置，重新返回。暴力就这样被理解为庄严的调停。被殖民的人类在暴力中和通过暴力解放自己。这种惯例启迪了官员，因为它给他们指出了手段和目的。塞泽尔的诗在暴力的明确前景中具有一种预言的含义。有必要回忆他的悲剧中在那最关键的几页里那位造反者(啊!)表达思想的一页：

造反者(倔强地)

我的姓：受伤害者；我的名：受屈辱者；我的状况：造反者；我的年龄：石头的年龄。

母亲

我的种族：人种。我的宗教信仰：博爱……

造反者

我的种族：被废黜的种族。我的宗教信仰……

但不是您在用您的解除武装作安排……

是我用我的造反和我那可怜的紧握着的拳头及我那乱蓬蓬的头。

(十分平静。)

我记得 11 月的一天；他不到六个月大，主人走进像橙红色月亮般的烟熏的茅屋，主人摸摸他结实的小胳膊小腿，这是个非常好的主人，他用他那粗粗的手指抚摸孩子那张长满小窝的小脸。他的蓝眼睛露出笑意，嘴里说着甜言蜜语

逗着孩子：这将是块好料，他看着我说，主人说着别的一些可爱的事，应该很早就做起来，培养成一个好基督徒和好奴隶，十分忠诚的好人，一个眼光敏锐和有权威的好看守人指挥，二十年不太多。这个人把我儿子的摇篮想像成一个看守人的摇篮。

我们手握大刀匍匐前进……

母亲

唉，你会死的。

造反者

杀死了……我亲手把他杀死了……

对：大量的死亡……

在夜里，我们在甘蔗间匍匐前进。

大刀在星星下欢笑，但我们不在乎星星。

甘蔗那小溪般的绿色叶片划伤我们的脸。

母亲

我曾梦想有个儿子来合上他母亲的眼。

造反者

我选择了朝另一个太阳打开我儿子的眼。

母亲

……噢我的儿子……死得不祥和危险。

造反者

母亲，死得轻快和奢华。

母亲

因为太仇恨了。

造反者

因为太爱了。

母亲

照顾照顾我吧,我因你的镣铐而窒息,我因你的伤口而流血。

造反者

可世界并不照顾我……世界上没有一个受虐待的可怜家伙,一个受拷打的可怜人,我不为他感到极端厌烦和受屈辱。

母亲

老天爷,放了他吧。

造反者

我的心你不要把我从我的记忆中解脱出来……

这是11月的一个晚上……

突然,叫喊声划破了寂静,

我们这些奴隶,我们这些渣滓;我们这些忍气吞声的牛马,我们曾经蹦跳过。

我们像疯子般地奔跑;开枪了……我们打人。汗和血使我们凉快。我们在叫喊声中打人,而叫喊声变得更加刺耳,一阵大声喧哗向东面升起,这是附属建筑物在燃烧,火焰温暖地迎向我们的脸颊。

这时,袭击了主人的房屋。

有人拉开窗户。

我们强行进入房屋。

主人的房门大开着。主人的房屋灯火通明,主人在房内十分镇静……而我们的人停步不前……这是主人呀……我进去了。是你啊,他对我说道,十分镇静……我对他说,是我,正是我,那个好奴隶,那个忠心耿耿的奴隶,突然他的眼睛是雨天里两只受惊的动物……我打他,鲜血飞溅:这是我今

天记得的惟一洗礼。^①

人们明白在这种氛围里,日常性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人们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是小土地所有者,靠妓女生活的人或酒鬼了。殖民制度的暴力和被殖民者的反暴力在非凡的相互一致中互相平衡和互相呼应。这种暴力统治因宗主国的大量移民将尤为可怕。在被殖民的人民内部暴力的发展将是与有争议的殖民统治施行的暴力成正比,在这造反时期的第一阶段里,宗主国的政府是殖民者的奴隶。这些殖民者同时威胁被殖民者和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反对被殖民者和自己的政府。埃维昂的市长的被暗杀同阿里·布芒杰尔(Ali Boumendjel)的被谋杀,其机制和动机是相一致的。殖民者认为不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之间轮换,而是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和殖民的阿尔及利亚之间交替。余下的一切都是空话或企图背叛。殖民者的逻辑是不可改变的,人们只有在没有事先把殖民者的思想机制公开于世的情况下,才被在被殖民者的举止中辨别出来的反逻辑搞得无言以对。自从被殖民者选择了反暴力以来,警察的报复行为机械地要求国家的武力来进行。然而却没有相等的结果,因为飞机和机枪扫射或舰队的炮轰的可怕程度和规模之大是被殖民者望尘莫及的,无法应战。这种恐怖的往复运动最终使最精神错乱的被殖民者认清真相。的确,他们实地发现所有成堆的有关人人平等的报告不掩盖这个平庸的思想:即要那七个在萨卡莫迪山口被杀或受伤的法国人引起有教养者良心的愤怒,而对盖尔古尔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乡镇的洗劫,对那些直接导致这次埋伏的居民的屠杀等事件则

^① 埃梅·塞泽尔,《神奇的武器(狗不吠叫)》,加利玛出版社,第133至137页。

“不算数”。恐怖、反恐怖，暴力、反暴力……这就是观察家们在描述阿尔及利亚那如此明显和如此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恶性循环时苦涩地记录下来的事。

在武装斗争中，有着人们可以称之为无还点的东西。这几乎总是囊括被殖民人民的所有领域的骇人听闻的镇压实施这种无还点的。1955年在阿尔及利亚遭遇到这种无还点：在菲利普维尔死伤12,000人，以及于1956年拉科斯特(Lacoste)布置了城市和农村的民兵部队^①。于是大家认为，甚至连殖民者也认

① 必须回到这个时期来衡量这个决定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权力的重要性。因此，在1957年3月28日的第4期《阿尔及利亚的抵抗》中，人们可以读到：“在应对联合国大会的意愿时，法国政府决定到阿尔及利亚来创建城市民兵部队。联合国组织曾经说，血流得够多的了，拉科斯特回答：让我们来组织些民兵部队。联合国组织建议停火。拉科斯特叫嚣：我们要把平民武装起来。联合国组织建议敦促对峙的双方开始接触以商量一个民主和平的解决办法，拉科斯特宣布从今往后一切欧洲人都武装起来并应向任何一个觉得可疑的人开枪。于是，大家认为官方应制止那种野蛮的、极不公平的、近乎种族灭绝的镇压。拉科斯特回答：我们要使镇压系统化，要组织捕捉阿尔及利亚人。且他象征性地把老百姓的权力交给军人，把军权交给老百姓。范围给圈死了。圈子中心是阿尔及利亚人，被解除武装，忍饥挨饿，遭追捕，被人推搡，挨打，不久因可疑而被杀。今天，在阿尔及利亚，没有一个法国人不被准许，不被劝说使用他的武器。在联合国组织呼吁平静之后一个月，没有一个法国人没有寻找、挑动和追捕一些可疑分子的许可和义务。

“对联合国大会的最终提案投票后一个月，在阿尔及利亚，没有一个欧洲人对现代最骇人听闻的斩草除根之举一无所知的。民主解决？拉科斯特让步道，同意，我们从消除阿尔及利亚人开始。为此，我们武装老百姓并任凭他们去干。巴黎新闻界总的来说，有保留地接受创建这些武装团体。有人说，这是法西斯保安队。说得对。但在个人和人的权利范围内，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传统殖民主义国家内部的殖民主义，那又是什么呢？有人提出过系统的合法的、受嘱托的暗杀。但一百三十年来，阿尔及利亚人的皮肉不是带着愈来愈公开，愈来愈众多，愈来愈根本的创伤吗？人民共和运动(MRP)军事谈判代表，凯纳-维涅(Kenne-Vignes)先生提出建议，当心，在创建这些民兵部队的同时，不是有很快在那两个阿尔及利亚团体之间挖下深渊的危险吗？对。但殖民的法规不就是有组织地奴化整个人民吗？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正

为“这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重新开始了”。然而,被殖民人民不管账。他像登记某种既必需又讨厌的东西那样登录他队伍中造成的大空缺。既然他决定以暴力来应对,他也就接受因此而造成的所有后果。只是他要求人家也不要要求他去给其他人管账。对于“所有土著都一样”这惯用语,被殖民者回答:“所有殖

好是对这种奴化和这个深渊明显的不满。阿尔及利亚革命对占领国讲话并对它说:‘拔掉你们留在阿尔及利亚人伤痕累累的皮肉上的那些獠牙!给阿尔及利亚人民发言权!’

“有人说,创立这些民兵部队可使军队的任务减轻。这将解放一些负有保卫突尼斯和摩洛哥边境任务的部队。一支具有六十万兵力的部队。几乎是海军和空军的总数。一支庞大的、简便的、上了使人目瞪口呆的光荣榜的、吸收了那些曾拷打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的前施刑者的警察。具有十万兵力的本土保卫军。必须减轻军队的负担。我们要组织城市的民兵部队。确实,拉科斯特那歇斯底里的罪恶的狂热蒙蔽了那么多的人,甚至连那些有远见的法国人也上当受骗。事实真相是民兵的创建在其证明理由中具有其本身的矛盾。法国军队的任务是无穷尽的。既然人家给法国军队定下的目标是封住阿尔及利亚的嘴,开向未来的大门就始终关上了。尤其是禁止分析、理解、估计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深度和密度;区长,小岛头头,街道主任,高大的楼长,每一层的头头……今天,在面上的分区控制上增加了高度上的分区控制。”

“四十八小时内登记了两千个候选人资格。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立刻响应拉科斯特的鼓动杀人。从今往后,每个欧洲人应该清查他部门中幸存的阿尔及利亚人。情报,‘快速响应’恐怖活动,侦查可疑分子,清除‘逃兵’,加强警察局部部门。当然,必须减轻军队的任务。对面上的梳篦式搜查增加高度上的梳篦式搜查。今天在手工业式的杀人基础上增加有计划的杀人。联合国组织曾劝告,停止流血。拉科斯特反驳,要达到这点最好的办法是不再有血可洒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被交给了马絮(Massu)帮之后,又被托付给城市民兵的悉心照顾。拉科斯特通过决定创建这些民兵部队,明显地表示他不会让人碰他的战争。他证明存在无限的恶化。当然,现在他成了阶下囚,但使大家跟他一起完蛋是多大的快乐啊。”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每个这些决定之后,增加了自己的肌肉挛缩和对斗争的强烈程度。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每次这种唆使和组织的屠杀之后,更加强他的觉悟和巩固他的抵抗。对,法国军队的任务是无穷尽的。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团结一致是多么的无止境啊!!”

民者都一样^①。”被殖民者,如果人家拷打他,如果人家杀害他的妻子或强奸她,不会向任何人告状。压迫人的政府完全可以每天任命一些调查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在被殖民者看来,这些委员会不存在。而且,事实上,在阿尔及利亚犯下的罪行不久就要达七年了,却没有一个法国人因杀害阿尔及利亚人而被送交法庭的。在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在那些殖民地,土著们始终知道对另一边没有什么可期待的。殖民者的工作是使被殖民者不可能有自由,直到做梦的自由。被殖民者的工作是想像消灭殖民者的所有可能的办法。在论证方面,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产生了被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对于“土著绝对邪恶”的理论则以“殖民者绝对邪恶”的理论来回击。

殖民者的出现综合地表示了当地社会的死亡、文化的麻木和个体的僵化。被殖民者认为生命只能从殖民者正在腐烂的尸体中才出现。这就是这两个论证的这种逐字逐句的对应。

但被殖民者认为存在这种暴力,因为暴力是他惟一的工作,具有积极的和锻炼人的特点。这种暴力的习惯是综合的,因为每个人变成巨大的暴力机构这根链子上的环节,这机构是对殖民主义最初的暴力作出反应而出现的。团体之间互相承认,未来的国家已经是共有的了。武装斗争动员了人民,即斗争把人民投进惟一的方向,单行道。

在解放战争之际实行群众动员时,这种动员把共同事业的

① 所以在战争状态的最初,没有俘虏。只是由于干部们的政治化领导才得以让群众接受:1)来自宗主国的人不总是自愿的,且有时甚至厌恶这战争;2)斗争的当前利益需要这运动在其进行过程中表现出遵守某些国际公约;3)一支俘虏人的部队是支军队,不再被看作是一群拦路盗匪;4)在任何情况下,抓获俘虏是为了保护我们那些被敌人拘押的战士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施压手段。

概念,国家命运的概念,集体经历的概念输入到每个人的意识中。因此,第二阶段——建立国家阶段——由于存在这种在鲜血和愤怒中加过工的研钵而有了方便。因此人们更加明白不发达国家所使用的词汇表的独创性。在殖民时期,人们鼓动人民为反对压迫而斗争。民族解放后,人们鼓励人民为反对贫困、文盲、不发达而斗争。人们断言斗争在继续。人民证实生活就是无休止的战斗。

我们曾经说过,被殖民者的暴力统一了人民。的确,殖民主义者从其组织上来说,是分立主义的和地方主义的。殖民主义者并不满足于确认部落的存在,它支援那些部落,分化它们。殖民制度维持酋长的管辖区并使老的伊斯兰教隐士社团恢复活动。暴力在其实施中是综合的,全国性的。由此,暴力在私下包含着清除地方主义和部族制。因此那些民族主义的政党对本地籍司法行政长官和通常的头头们表现出特别的无情。清除那些本地籍司法行政长官和头头是人民统一的一个先决条件。

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暴力是清除毒素。它使被殖民者摆脱其自卑感,观望或灰心丧气的态度。它使被殖民者变得无畏,使他亲眼看到自己重获尊重。即使这武装斗争是象征性的,即使人民由于迅速非殖民化而复员,他还来得及说服自己解放是大家和每个人的事,领导没有特殊的功劳。暴力把人民提高到领导的水平。由此,一些年轻的政府对于那礼节性玩意儿,赶快安排这类挑衅性的缄默。在群众以暴力参加了民族解放时,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表现为“救星”。他们表现出十分珍惜自己的行动结果,并提防把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以及祖国的命运交给一个活上帝。他们昨天完全不须承担责任,今天想懂得一切和决定一切。人民的觉悟受到暴力的启发,反对一切绥靖。那些蛊惑人

心的政客、机会和巫师们从今往后任务艰巨。群众投入无望的肉搏战的习惯使他特别爱好具体事物。实际上不可能再长时期进行愚弄哄骗了。

论国际背景中的暴力

在前面的文中我们曾多次指出，在不发达地区，政治的负责人始终在号召他的人民进行战斗。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为反对贫困和不发达而斗争，为反对使人贫困的传统而斗争。在其号召中所使用的词汇是一个参谋长的词汇：“动员群众”，“农业战线”，“文盲战线”，“遭到失败”，“获得胜利”。年轻的独立国家最初几年中在战场的氛围中发展。因为一个不发达国家的领导心惊胆战地测量他国家该跨越的宽阔道路。他求助于人民并对他们说：“我们鼓足力量并工作吧。”国家受一种创造性的狂热顽固地强烈感染，付出巨大的和不成比例的努力。规划不仅是要摆脱困境，而且要自立更生地赶上其他国家。他们认为欧洲人民之所以达到这个发展阶段，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那么让我们向世界并向我们自己来证明我们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我们觉得用这种方式来提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理智的。

欧洲国家是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手中集中了大部分财富的时候进行它们的国家统一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银行家在全国范围内垄断了金融、商业和科学。资产阶级代表最生

气勃勃,最繁荣昌盛的阶级。它获得政权可以使它进行一些决定性的行动计划:工业化、发展交通和立即寻求“海外”销售市场。

在欧洲,除了一些细微差别(例如英国曾稍领先),各个不同的国家在实现其国家统一的时候经历着一个差不多同样的经济状况。没有一个国家由于它发展和变化的特点,真正地无视其他国家。

今天,不发达地区的国家独立和国家形成具有崭新的面貌。在这些地区,除惊人的成果外,不同的国家表现出同样地没有基础。群众为反对同样的贫困而斗争,以同样的姿态进行挣扎并用他们缩小的胃描绘可以称为饥饿的地理的东西。不发达世界,贫困世界和非人的世界。但也是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没有管理人员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欧洲国家却躺卧在最炫耀的富足中。欧洲的这种富有是十足可耻的,因为这富有是建立在奴隶的背脊基础上,是吸奴隶的血,它直接来自这个不发达国家的土地和地下。欧洲的福利和进步是用黑人的、阿拉伯人的、印第安人的和黄种人的汗水和尸体建立起来的。这事,我们决心不再忘记它。当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因一个殖民地要求独立感到尴尬,针对民族主义领导们的意愿宣布“如果你们要独立,你们就把独立拿去并回到中世纪去”时,新独立的人民倾向于同意并重新挑战。人们确实看到殖民主义抽走它的资本和技术人员并在年轻国家的周围安排了经济压力设置^①。无上荣光的独立

① 在现今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不实行经济封锁来反对仅有的那几个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美国以反卡斯特罗行动,在美洲半球开创了人类艰难的解放史的一个新篇章。由一些在联合国组织占有席位并铸造货币的国家形成的拉丁美洲对于

转变成倒霉的独立。殖民势力通过骇人听闻的强制手段迫使年轻的国家倒退。殖民势力明确地说：“既然你们要独立，拿去吧并等死吧。”于是民族主义的领导们除了转向他们的人民并要求他们作伟大的努力外没有别的对策。人们要求这些饥饿的人遵循一个严格的制度，要这些萎缩的肌肉承担不相称的劳作。制定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制度，每个国家用其所掌握的少得可怜的资财力图应付全国的大饥荒和国家的贫困。人们目击一个人人面对吃饱和蔑视的欧洲而感到疲惫不堪和精疲力竭的民族的动员。

另外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拒绝这种艰难困苦，并接受通过过去的受托国的条件来渡过这难关。这些国家利用他们的战略位置，在集团斗争中给予它们特殊利益的位置，签订了一些条约，受条约约束。从前受统治的国家变成经济独立的国家。前殖民国家保持了完整无损，有时加强了殖民主义类型的商业流通，同意挤牙膏式地给独立国家提供预算。故我们明白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使世界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被殖民国家的民

非洲应是个教训。这些旧殖民地从它们解放以来在恐惧和匮乏下忍受西方资本主义的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的反动理论)。

非洲的解放，人的觉悟成长使拉美人民能和那些接踵而至、换汤不换药的独裁制度的老一套决裂。卡斯特罗夺取了古巴的政权并把这权力给予人民。美国佬感受到这个异端如同大祸临头，美国组织一些反革命军队，炮制一个临时政府，烧毁收获的甘蔗，最后决定无情地扼杀古巴人民。但这谈何容易。古巴人民受了苦但胜利了。巴西总统雅诺斯·夸德罗斯(Janos Quadros)在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声明中刚断言他的国家将千方百计地捍卫古巴的革命。美国自己也可能在各国人民的意志面前退却。到那一天，我们会兴高采烈，因为这将是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关键的一天。总之，只是由分布在全球——在中东的油井中，秘鲁或刚果的矿中，“联合水果”种植园里或法雷斯特(Firestone)种植园里的奴隶们才确保的美元于是将停止强有力地控制这些奴隶，他们创造了美元并继续头脑空空如也和腹中空空地以自己的养分维持着美元。

族解放揭示了他们的真实状况并使这状况更加难以忍受。根本的较量似乎是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较量,甚至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但已失去其重要性了。今天重要的——阻挡前途的问题——是必须重新分配财富。人类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要因此而受到震撼。

通常人们会认为对于世界,特别对于第三世界,是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了。不发达国家已经利用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的残酷竞争保证了自己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然而它们应该逃避处于这种竞争之中。第三世界不该满足于通过与领先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相反,不发达国家应该努力把一些适合自己的社会准则、方法、自己特定的风格公布于世。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作选择,就如各大陆的人和各不同时期确定的选择那样。当然,我们知道作为生活方式,资本主义不能使我们完成我们国家的和全世界的任务。资本主义剥削、托拉斯和垄断是不发达国家的敌人。相反,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完全转向全体人民的制度,建立在人是最宝贵的财富的基础上的制度,使我们能进行得更快、更协调,因此使得有些人掌握全部经济和政治权而不顾国家整体的这幅社会讽刺画变为不可能。

但为了这个制度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为了我们能随时遵守我们所借鉴的原则,除了人力的投资外,我们还需别的东西。某些不发达国家朝这个方向展开巨大的努力。男女老少积极地投入真正的强迫劳动并声明自己是国家的奴隶。自我牺牲、蔑视一切非集体的操心使得存在一种鼓舞人的民族精神,它重又给人对于世界命运的信心并解除最有所保留的观察家们的武装。

然而我们相信这样的努力不可能以这样可怕的速度持续很久。这些年轻的国家在前殖民国家无条件地撤出后接受恢复挑战。国家重又处于一个新班子手中,但事实上必须重新掌握一切,重新思考一切。果然,殖民制度对某些财富、某些资源感兴趣,确切地说对供应它工业的资源感兴趣。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对土地或地下的资源作过任何认真的总结。因此年轻的独立国家不得不继续那些殖民制度所安排的经济流通。当然它可以向别的国家、别的货币区域出口,但它的出口基础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殖民制度凝聚了一些流通,人们被迫保持这些流通,否则就要遭灾难。可能应该重新开始一切,改换出口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改变出口的目的地,重新察看土地、地下、河流,为什么不也察看太阳呢。然而为了这么做,必须有除了人力的投资外的另外的东西。必须有资本、技术人员、工程师、机械师等等。应该承认,我们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因其领导促使而所作的巨大努力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如果劳动条件不改变,要使这个被帝国主义武力变成动物的世界更加文明,必须几个世纪^①。

事实是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应该断然拒绝西方国家想强迫我们所处的境况。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把它们的旗帜和警力从我们的领土上撤走时并未还清欠我们的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者在不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如同真正的战犯。资本主义为了增加它黄金和钻石贮藏,它的财富,为了建立它的权势,使用的主要手段是流放、屠杀、劳役、奴役。不久以前,纳

^① 某些受惠于大量欧洲移民的国家随同一些城市和大道通向独立,趋向忘却贫穷和饥饿的落后国家。命运的嘲弄,通过一种同谋的缄默,这些国家做得仿佛它们的城市和独立是同时崛起。

粹主义把整个欧洲变成了真正的殖民地。欧洲各国政府要求补偿和以金钱和实物归还从它们那里抢走的财富：文化作品、画、雕刻、彩绘玻璃物归原主了。1945年后欧洲人嘴里惟一的一句话是：“德国要偿还。”在阿登纳先生(M. Adenauer)这一方面，他在艾希曼案件开始审理时，代表德国人民再次向犹太人民道歉。阿登纳先生重新开始承诺他的国家继续付给以色列国家巨款权作对纳粹罪行的补偿^①。

同样地，我们说帝国主义国家犯下严重的错误和言语无法形容的不公平，如果它们局限于把军队、行政和军需处部门从我们的土地上撤走，这些部门的职能是发现财富，开采财富并把这些财富送往宗主国。民族独立的精神弥补并不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也不养活我们。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富也是我们的财富。在一般概念方面，人们猜想到这个断言绝对不想表示我们感到西方的技术或艺术创造涉及我们自己。十分具体，欧洲过分地囊括殖民地国家的黄金和原料：拉丁美洲、中国、非洲。几百年来，钻石和石油，丝绸和棉花，木材和外来的产物从这些大陆源源流向欧洲，今天这同一个欧洲在这些大陆对面树起富有之塔。欧洲完全是第三世界创建的。压得它透不过气来的财富是它从不

① 但德国没有全部补偿战争罪行，这是真的。没有向战败国索要全部赔款，因为那些受害国把德国包括在反共产主义的防御体系内。正是这一考虑促使殖民主义国家试图获得它们从前的殖民地，因为军事基地和奴隶没有被包括在西方制度内。它们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和自由世界的名义一致同意忘却它们的索要。人们看到德国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元和机器。重新站起来的、强大的德国对于西方阵营是必不可少的。所谓自由欧洲包含的利益要求一个重新组建成的、繁荣的、并能充当第一道抵御赤色帮的防护壁垒的德国。德国完美地利用欧洲危机。因此，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面对这个德国感觉到一种合情合理的苦涩，这个昨天跪的德国今天在经济市场上与他们无情地竞争。

发达国家人民那儿掠夺来的。荷兰的港口,利物浦,波尔多和利物浦专门贩卖黑人的码头由于押送几百万的奴隶而名声在外。因而当我们听到一个欧洲国家首脑扪心声称他应该来帮助不幸的不发达国家人民时,我们并不感恩戴德。相反,我们思忖“这正是要对我们所作的赔偿”。因此,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对不发达国家的帮助是个“慈善嬷嬷”的计划。这种帮助应该是一种对双重觉醒的认可,被殖民者意识到这是“该他们的”,而资本主义则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应该偿还”^①。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聪明——我们且不说忘恩负义——而拒绝偿还,那么它们自己的制度,那无法改变的辩证法将负责使它们窒息。这是个事实,年轻的国家很少吸引私人资本。许多理由为宗主国的这种保留作辩护和解释。从资本家们一开始知道,而且很明显他们是最先知道,他们的政府准备非殖民化起,他们赶忙从殖民地抽走他们的全部资本。资本的耸人听闻的逃离是非殖民化的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私营公司为了在独立国家投资,要求一些根据经验难以接受或无法实现的条件。资本家们坚守那条立即赢利的原则,这条原则从他们一到“海外”起就成为他们自己的了,他们对一切长期投资表现出迟疑不决。他们反抗并有时仇恨新当权班子的所谓计划化纲领。在万不得已时,他们会自愿借钱给年轻的国家,但条件是这钱用作购买制成品、机器,因此是用作使宗主国

^① “将欧洲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好像我们跟第三世界只有外在性联系似的)彻底加以区别,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不发达国家的解放先一步整治殖民遗产,这是想在帝国掠夺的成果上建立一个奢侈的社会主义——如同在盗匪集团内部多少有点公平地分赃,哪怕是以做好事的形式分一点给穷人,忘了这是从这些穷人那儿掠夺来的财物。”马塞尔·佩儒(Marcel Péju),《为戴高乐而死?》,《现代》,第175—176期,1960年10月—11月。

的工厂运转。

事实上,西方的金融集团以操心自己不担任何风险表达了他们的不信任。因此他们要求政治稳定和明朗的社会气候,如果考虑到刚独立后全体居民的可悲局面,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得到的。于是,为了寻求这种保证,他们要求保持某些驻军或年轻国家进入一些经济或军事条约,从前的殖民地是不能履行这种保证的。私人公司向他们自己的政府施压,为了至少在这些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并随带着保护他们的利益的任务。最后,这些公司要求他们的政府给他们决定在这个或那个不发达地区的投资作担保。

只有少数国家达成托拉斯和垄断集团要求的条件。因此,由于资本失去可靠的出口,冻结在欧洲并固定不动。尤其因为资本家拒绝在他们本土投资,这资本更加固定不动。在这种情况下,赢利确实是不值一提,而税收监督使最大胆的人灰心丧气。

形势是长期的灾难性的。资本不再流通或流通大量减缩。瑞士银行拒绝资本,欧洲喘不过气来。国际资本主义尽管把大笔大笔的钱耗尽在军事支出里,但还是陷入绝境。

但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威胁着国际资本主义。的确,由于西方国家的自私和不道德,第三世界被抛弃和被迫倒退,不管怎么说,被迫停滞不前,因此,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将决定发展成集体的自给自足。西方工业将很快失去它们的海外出口。机器将堆积在仓库里,而在欧洲市场上将展开一场金融集团和托拉斯之间的严酷斗争。工厂关门、解雇和失业将导致欧洲无产阶级发动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开斗争。于是垄断集团会意识到他们所包含的利益是帮助,大量帮助,无太多条件地帮助不发达国家。因而大家明白第三世界的年轻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强颜

欢笑是错误的。我们有充分理由是强大的,我们的立场是公正的。相反,我们应该告诉资本主义国家并向他们说明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不是他们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战争。应该结束这场在任何地方都不进行的冷战,停止世界核能源化准备,慷慨地向不发达地区投资并在技术上予以帮助。世界的命运有赖于对这一将被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而面对饥饿的有色人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试图使社会主义制度对“欧洲的命运”感兴趣。尽管戴高乐将军对加加林的功勋并非不快,但它不是一个“为欧洲争光”的成就。近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首脑们、文化界人士,对苏联抱有情绪矛盾的态度。他们为了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而使他们所有的势力联合后,现在明白必须对这个制度予以重视。于是他们变得和蔼可亲,增加诱惑手腕并经常提醒苏联人民他们“属于欧洲”。

通过像潮水般地冲击第三世界——这股潮水快要吞没整个欧洲了,人们并不能达到分裂那些打算把人类引向幸福的进步力量。第三世界并不想组织一个庞大的饥饿运动反对整个欧洲。第三世界对那些几百年来维持了奴役制的人们所期待的是:他们帮助第三世界,使人重获尊重,使人一劳永逸地到处扬眉吐气。

但很清楚,我们不会天真到以为通过欧洲政府的合作和诚心诚意会产生这种事。这件再把人类、全人类引荐到世界的巨大工作,将在欧洲群众的决定性帮助之下进行,他们必须承认这个工作,他们在殖民问题上,经常由反对转为赞成我们那共同主人的立场。为此,首先必须欧洲群众决定醒来,动动自己的脑子并停止玩那不负责任的睡美人游戏了。

—

自发性的重要和弱点

对暴力的思考导致我们意识到在民族主义政党的干部们和群众之间存在一种差距和不同的节奏。在一切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里,群众和干部之间照例存在一道鸿沟,群众要求立即和全面改善他们的境况,而干部则权衡资方可能制造的种种困难,限制和压缩他们的请愿。因此人们经常看到群众对干部们难以释怀地不满。经过一整天的请愿后,当干部们庆祝胜利时,群众则完全有被背叛的印象。请愿示威游行增多了,工会的冲突增多了,这将引起这些群众带上政治色彩。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工会干部是个知道地方冲突不是自己和资方之间的决定性原因的人。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们研究他们各自的宗主国里政党派的作用,安排相似的培训,以便发动群众和向殖民政府部门施压。被殖民国家里的民族主义政党是同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组织同时诞生的。精英们对这样的组织十分重视,且对组织的盲目崇拜经常走到对殖民地社会理性研究的前面。政党的概念是从宗主国进口来的一个概念。这一现代斗争的工具原封不动地用在千变万化的、不平衡的现实上,而在这现实中奴隶制、奴役、以货易货、手工业和交易所活动同时共存。

政党派的弱点不仅仅在于机械地利用一个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指挥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在组织类型的

有限性方面,本应产生出一些创新和适应。根据通常的纲领,不发达地区内的大多数政治党派首先找最有觉悟的成员谈话:城市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公务员,即代表几乎不过百分之一的极小部分的居民,这是个大错误,是这些党派先天性的缺陷。

然而,虽然这个无产阶级了解党的宣传和读党的文学作品,但它并未充分准备响应为民族解放而无情斗争可能发出的口号。人们曾多次指出:在殖民地的领土内,无产阶级是最受殖民制度爱惜的被殖民人民的核心。城市里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相对地受到优惠。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什么也不会失去,他可能是将赢得一切的人。在殖民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有可能丧失一切。他确实代表了为殖民机器正常运转而必不可少和无法替代的一部分被殖民人民:电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矿工、码头工人、翻译、护士,等等。这些成员是构成民族主义政党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由于在殖民制度中所占据的优越地位,构成被殖民人民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明白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首先是城市里的:基层生产管理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和主要居住在城里的商人。他们的思想类型在许多点上已带有技术界的烙印,并相对自如地在这种思想类型中发展。这里“现代主义”是王。就是这些同样的各界人士,要为反对蒙昧主义的传统而斗争,要改良习俗,因而与构成民族底子的陈旧基石进行公开斗争。

民族主义政党大部分对农村群众非常不信任。的确,这些群众给他们的印象是陷于迟钝和无所作为的境地。很快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竟至于对农村怀有和殖民者同样的含有贬意的评价。但如果人们力图了解政治党派对农村群众这样蔑视的理由,那么必须考虑这个事实:殖民主义经常

通过组织使农村僵化来加强或巩固它的统治。由于周围尽是隐士、巫师和习俗的领头人们,农村群众仍然生活在封建阶段,生活在由殖民主义的行政人员或军人维持的这个中世纪结构的完全统治下。

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业资产阶级要同众多部门中的这些封建老爷进行竞争:隐士和巫师阻拦病人去瞧大夫,长老会议审判,使律师变得无用,本地籍司法行政长官利用他们的政治和行政势力开办一宗买卖或一条运输线,习俗的领头人以宗教和传统的名义反对引进贸易和新产品。

被殖民的年轻商贩和贸易商这类人为了发展,需要这些禁令和阻拦消失。代表封建主禁猎地和多少禁止买新产品的当地支持者于是构成了一个大家争夺的市场。

封建的结构形成西方化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和群众之间的一个屏障。每当精英们向农村群众作努力时,部落酋长们、行会的会长们和传统的权威人士就加强监视、威胁和逐出教会。这些被占领国认可的权威人士很不高兴地看到精英们企图渗入农村。他们知道那些会被这些来自城市的分子们引进的思想对封建制度的持久性原则本身提出异议。因此,他们的敌人并不是占领国,总之,他们跟占领国还是和睦相处的,而是这些具有现代思考者,这些人打算使当地社会脱节并甚至由此从他们嘴里夺取面包。

西方化分子对于农民群众,体验到一些使人联想起在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内部发现的感情。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表明了农民群众经常成为革命的束缚。工业化国家里的农民群众通常是最不觉悟、最无组织和最无政府主义的分子。他们体现了全部特点:个人主义、无纪律、爱利、能大发其怒和灰心丧气,这一切注定了一种客观上反动的行为表现。

我们看到民族主义政党模仿西方政党的方法和学说，因此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不把自己的宣传引向这些群众。实际上，对被殖民社会的合理分析——如果进行了分析的话——会对他们指出被殖民的农民生活在一个结构依旧完整的传统环境，而在工业化国家中，由于工业化的进步这种传统环境产生了裂缝。在萌芽的无产阶级内部，人们在殖民地发现一些个人主义的行为。由于抛弃那人口统计学提出难以解决的问题的乡村，没有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涌向城市，聚集在贫民窟中，并力图渗入因殖民统治而诞生的港口和城市。农民群众继续生活在一个一成不变的，而多余的人口除了向城市移居外没有另外的办法。待在原地的农民顽固地守住自己的传统，在被殖民社会，其社会结构依旧是团体的那些农民代表守纪律分子。确实，这种一成不变的、在一些僵硬的方面令人厌恶的生活，可以穿插引起一些主要是宗教狂热成分的运动、一些部落之间的战争。但农村群众本能地是守纪律和利他主义者。在团体面前个人消失了。

农民们对城里人不信任。城里人穿得像欧洲人，讲欧洲人的话，跟欧洲人一起工作，有时居住在欧洲人的住宅区里，农民把城里人看作是个抛弃了一切构成民族遗产之东西的叛徒。城里人是“叛徒、被收买者”，他们似乎同占领者和睦相处并在殖民制度的环境下努力争取成功。所以人们经常听到农民们说城里人没有品德。这里我们并不面临农村和城市通常的对立。这是被排除在殖民主义的利益之外的被殖民者和设法从殖民剥削中获利的人之间的对抗。

殖民主义者还在其反对民族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利用这种对抗。他们发动山里人、乡下人反对城里人。他们挑动内地反对

沿海,他们使部落重新活跃,因此见到卡隆吉(Kalondji)加冕当卡扎伊^①的国王不必大惊小怪,犹如几年前看到加纳首脑会议顶撞恩克鲁玛时不用大惊小怪那样。

政治党派未能在农村建立它们的组织。这些政党不利用现存的结构来给予农村民族主义或进步的内容,却打算在殖民制度的框架中推翻传统的现实。它们想像自己在殖民制度的锚链环还沉重时能使国家这条船起航。它们不去迎接群众。它们不把自己的技术知识为人民服务,但却企图根据先验的方案把群众框起来。因此,它们要从首都到农村中突然安插一些陌生的或太年轻的领导,这些由中央权力机关授权的领导打算像指挥企业的基层单位那样来领导村镇或村子。传统的头头们是不为人所知的,有时候受到刁难。未来国家的历史在应该和谐地把村子的历史,把民族和部落的传统冲突的历史写进号召人民决定性行动中时,却奇怪地随便践踏地方小传记,即惟一的民族现实性。在传统社会中受众人尊敬和无可置疑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当众受到奚落。占领者的各部门不放过利用这些积恨的机会,并随时了解这个可笑的权力机关通过的点滴决定。因建立在精确的情报基础上面而经验丰富的政治镇压受到挫折。突然安插的领导和新议会的重要成员被逮捕。

遭到的失败证实民族主义政党的“理论分析”。企图吸收农民群众参加的糟糕经验加强了它们的不信任并凝聚了它们对这部分人民的挑衅性。民族解放斗争胜利之后,又重蹈覆辙,保持地方分权和自治论的倾向。殖民阶段的部族制让位于民族阶段的地方主义,用制度的表达法就是:联邦制。

① 扎伊尔的两个省的省名。——译注

但乡下的群众虽然受到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不多,他们或是在民族觉悟的成熟过程中,或是为了给民族主义政党的活动换班,或更少见地为了完完全全地取代这些党派的无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些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总是在农民群众内部得到反响。在农村,对反殖民阶段永记不忘。妇女们依旧在孩子们耳畔哼唱着曾伴随战士们抵抗征服的歌。村童们在十二三岁时,知道那些曾参加最后那次反抗的老人的名字,他们在村镇或村子里的梦并不是城里孩子所做的奢华或考试成功的梦,而是梦见自己成为这个或那个战士,这些战士英勇牺牲的故事今天依然催人泪下。

在民族主义政党试图把城里初步形成的工人组织起来时,在农村人们目击了一些表面上看来绝对不可理解的爆发。例如1947年在马达加斯加那著名的起义。殖民主义的服役是表面的:这是场农民起义。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事情总是要复杂得多。在二次大战期间,那些殖民的大公司扩展它们的势力并夺取全部尚空闲的地。始终是在这同一时期,人们谈论犹太难民、卡比利亚人、安的列斯人可能定居在岛上。也纷纷谣传下一步南非的白人和殖民者同谋要侵占这岛。因此战后,民族主义名单上的候选人胜利地当选了。此后,立即组织镇压MDRM(马达加斯加革新民主运动党)的各支部。殖民主义为了达到其目的,使用最传统的手段:大批逮捕,部落之间的种族主义宣传和以流氓无产阶级的未组织分子创建了一个党。这个所谓马达加斯加的贫苦人(PADESM)的党由于其决定性的煽动,给殖民当局带来维持秩序的合法保证。然而,这种事先准备好的清除一

个党派的小人行径在这儿占很大比例。农村群众三四年采取消极守势，突然感到自己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决定狠狠地反抗殖民主义的武力。人民手持标枪，且更经常是石块和棍子，投入为民族解放的普遍起义。大家知道其后果。

这些武装起义仅仅代表了农村群众为介入民族斗争而使用的手段之一。有时候，农民替换城市的扰乱，因为城市里的民族主义政党受到警察的镇压。消息传到广袤的农村，过分广阔的农村：领袖被捕，扫射增多，黑人的血流遍城里，小殖民者大肆屠杀阿拉伯人。于是仇上加仇，激化的仇恨爆发了。邻近的警察局被包围了，警察被撕扯，教员遭杀害，医生因未在而得以逃命，等等。急派一些平定暴乱的殖民者到现场，飞机出动轰炸。于是造反的旗帜展开了，战争的老传统又出现了，妇女们鼓掌，男人们组织起来并在山里占领阵地，游击战开始了。农民们自发地制造普遍的不安全，殖民主义害怕了，处于战争或谈判的境地。

对于农村群众在民族斗争中的这种关键性闯入，那些民族主义政党作何反应？我们看到大部分民族主义政党没有把武装行动的必要性记载在它们的宣传里。它们并不反对持久起义，但它们只局限于相信乡下人的自发性。大体上，它们对这一新因素表现得犹如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样，向命运祈祷继续这样下去。它们利用这天赐食物但并不试图组织起义。它们并不派干部到农村去使群众政治化，去启发觉悟，提高战斗水平。它们希望这些群众的行动由于其运动的席卷不要放慢速度。城市运动没有感染农村运动。各自根据自己特有的辩证法进展。

民族主义政党并不试图向农村群众灌输一些口号，因为此

时此刻这些群众完全不受约束。它们不向农村群众提出目标，它们只希望这运动无限期地永远持续下去和轰炸不要战胜这运动。因此人们明白民族主义政党即使在这种机会下，也不利用提供给它们的这个可能性：把农村群众归并进来，使他们政治化，提高他们的斗争水平。它们对农村保持不信任的罪恶立场。

政治干部躲在城里，让殖民主义明白他们同造反者没有关系，或者他们动身去国外。很少发生他们去山里会见人民。例如在肯尼亚，在 Mau-Mau 造反期间，没有一个知名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归属这个运动或试图保护这些人。

在国家的不同阶层之间，没有充分的解释理由，没有较量。因此，当独立在农村群众受镇压后突然到来及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之间谅解时，我们又觉得这种不理解加剧了。农村居民对政府提议的结构改革以及甚至客观上进步的社会革新持保留态度，因为确切地说，制度的负责人在殖民时期并未向全体人民说明政党的目标、国家的方针、国际问题等等。

继殖民期间农村居民和封建主保持对民族主义政党不信任之后，则是民族时期这些人对这些政党的仇恨。殖民主义的秘密部门并未在独立后解除武装，这些部门保持不满，而且还给年轻的政府制造重重困难。总之，政府只是在为自己解放时期的懒惰和经常轻视农村居民付出代价。国家可能有一颗理智的、甚至进步的头脑，但庞大的身体依旧是衰弱的、脾气犟的、不合作的。

于是，试图通过集中管理和紧紧控制住人民来摧毁这个身体。这就是人们常听说在不发达国家里必须一定量的专政的理由之一。领导们不信任农村群众。例如，某些政府在民族解放很久以后，把内地看作是个不安定地区，那儿的国家首脑，部长

们只是在国家军队活动之时才冒险。这个内地实际上已无异于陌生地。反常的是，民族政府对待农村群众的举止态度中的某些行为使人联想到殖民政权。“我们不太知道这些群众要如何起作用，”年轻的领导们毫不迟疑地说道，“如果要走出这个中世纪的国家，必须用棍子。”可是我们看到那些政治党派在殖民阶段对待农村群众的随便无礼只能有损于民族团结，有损于国家的加速起动。

有时候殖民主义意欲使民族主义的推进起变化，崩溃。当地的领导机构不唆使酋长和头头们反对城里的“革命者”们，而是把部落和行会组成党派。面对开始“体现民族意愿”并对殖民制度有危险的城市党派，一些小集团产生了，一些基于伦理学或地方主义的倾向、党派出现了。部落完整地变成由殖民主义者面授机宜的政治党派。圆桌会议可以开始了。统一的党派将淹没在许多的倾向中。部落的党派反对中央集权，反对统一，并揭露统一党派的专制。

后来，这个策略被民族反对派所利用。占领者在进行解放斗争的两三个民族主义政党中作了选择。这种选择的方式是传统的：当一个党派达成民族一致并成为占领者的非他莫属的谈判对象时，占领者增加手腕并最大程度地推迟谈判。这种推迟用来分散这个党派的要求，或从领导处获得准许把某些“极端主义”分子撇在一边。

相反，如果没有一个党派真正是非他莫属，那么占领者只有优先照顾那个他觉得是最“理智的”党派。没有参加谈判的民族主义党派们于是揭露另外那个党派和占领者之间商谈的协议。从占领者那儿获得政权的党派意识到竞争对手党派那纯属蛊惑

人心和混乱的观点所构成的危险性,企图摧毁这个对手,并判决它为非法的。受迫害的党除了躲到市郊和农村中去没有别的办法。它试图煽动农村群众反对那些“海边被收买者和首都腐败分子”。于是利用了种种借口:宗教的理由,新的国家当局所采取的创新的、并与传统一刀两断的措施。有人利用农村群众的蒙昧主义倾向。那所谓革命的学说事实上是建立在农村的落后、激情和自发的特点的基础上。人们到处窃窃私议说山里骚动,农村不满。有人肯定地说在某某角落,警察局向农民开了火,派去了援兵,政体快要垮了。反对党没有明确的纲领,除了替代领导小组外没有别的目的,重又把它们的命运交到自发的和模糊不清的农民群众的手中。

相反地,有时候反对派不再依靠农村群众,但依靠进步分子,年轻国家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号召群众抵制劳动者的要求,这些要求被宣称是反传统主义的冒险者们的手段。我们曾有机会在政治党派的水平上所提的看法,作了必要的更改,重又处于工会的水平。起初,在殖民地领土上的工会经常成为宗主国工会的地方分支,且口号是宗主国的口号的回声。

解放斗争的关键阶段确定时,一些当地工会决定要创立全国工会。从宗主国进口的旧组织形式将被当地人大量地抛弃。这一工会的创立是城市居民对殖民主义施加压力的一个新因素。我们曾说过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是处于萌芽状态并代表一部分最受惠的人民。在斗争中诞生的全国性工会在城里安排自己的活动,而且它们的纲领首先是个政治纲领,一个民族主义的纲领。但这个在独立斗争的关键阶段诞生的全国性工会实际上是有觉悟的和活跃的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合法组织。

农村群众受到政治党派的蔑视,继续被撇在一边。当然,会

有个农业劳动者的工会,但创立这工会只是适应“向殖民主义展示一个统一战线”的表面需要。在宗主国的工会培养环境中工作过的工会负责人不懂得组织城市群众。他们失去了同农民的一切接触,且首先关心吸收水手、码头工人、煤气和电力的职员等人加入。

在殖民阶段,民族主义工会的成长构成一股惊人的打击力量。在城市,工会在随便什么时候可以使殖民主义经济无法活动,无论如何能够控制这经济。由于欧洲移民经常被安置在城市里,示威运动对这些移民的心理影响很大:没有电,没有煤气,不清除垃圾,商品烂在码头上。

这些构成了殖民环境中的城市的宗主国小岛深深地感受到工会的活动。以首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堡垒难以忍受这些猛击。但“内地”(农村群众)依然是与这种较量无关。

人们看到,就这样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在工会的影响和国家其余的人之间,不成比例。独立以后,被吸收入工会的工人们有空转的印象。他们确定的有限目标就在达到的当时,鉴于国家建设任务之巨大,显得十分不可靠。面对跟权力机构经常关系密切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会领导们发现他们不再能局限于工运中心主义的扰乱了。由于工会天生脱离农村群众,不能在市郊以外传播口号,采取愈来愈政治的立场。事实上,工会是权力机构的候选人。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使资产阶级走投无路:反对在国家领土上保持外国基地,揭露商业协议,采取反对国家政府的对外政策。现在“独立”的工人们在空转。刚刚独立后,工会发觉那些社会要求如果表达出来的话,会得罪国家的其余的人。工人们的确从制度中得到实惠。他们代表人民中最宽裕的一部分人。打算为工人和码头工人争得改善生活条件的风潮不仅会不得人心,而且还有引起农村贫困群众仇恨的危险。由于不许

工会进行一切工会活动，工会在原地踏步。

这个苦恼表示了客观需要一个最终关系到国家整体的社会纲领。工会突然发现内地也应该受到启发和组织起来。但因为它们任何时候也不关心在它们和农民群众之间安排传送带，而恰恰是这些群众构成国家的惟一的革命自发势力，工会将体会到它们的无效，并发现它们的纲领不符合时代的特点。

工会领导们沉浸在政治-工运中心主义的风潮中，竟至于机械地准备搞政变。但是，在这方面，内地还是被排斥在外。这是个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会的工运中心主义之间狭隘的解释。民族资产阶级重新捡起殖民主义的旧传统，显示其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而工会则组织集会，动员几万个工会会员。农民们面对这民族阶级和这些不管怎么说是吃饱肚子的工人，耸肩观望。农民之所以耸肩膀，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双方都把他们看作是帮助力量。工会、党派或政府不道德地、不择手段地把农民群众当作迟钝和盲目的阴谋势力来利用。当作野蛮的武力。

相反，在某种情况下，农民群众准备同时介入民族解放斗争和未来的国家给自己选择的前景。这种现象对于那些不发达国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该详细地研究这一点。

我们看到在民族主义政党中摧毁殖民主义的意愿同另一意愿和睦相处：同殖民主义客客气气地合作。在这些政党内部，有时会产生两个过程。首先，一些知识分子在对殖民现实和国际形势进行了持久的分析后，会开始批评民族政党思想上的空虚及其战术和战略上的贫乏。他们着手向领导们坚持不懈地提些关键性的问题：“民族主义是什么？你们在这个词的背后设置了什么？这个词包含了什么？独立为了什么？而首先你们想如何达到独立？”同时要求对这些有条不紊的问题开始热烈讨论。他们准备提出在选票主义的方法上增添“另外的方法”。在初步的

小争论中,领导们很快地摆脱这种他们通常形容为青年的激昂。但是因为这些要求既不是激昂的表示,也不是青春的标志,捍卫这些立场的革命分子很快就会孤立。披着自己经验外衣的领导们准备无情地甩掉这些“冒险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

政党机器表现出反抗一切革新。面对一个一想到自己可能被卷入一种风暴中就害怕和焦虑不安的领导,革命的少数派又处于孤单地位,这个领导甚至想像不到这风暴的面貌、力量或方向。第二个过程与领导干部或下级干部有关,这些干部由于他们的活动,曾经成为殖民主义警察迫害的目标。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工作,牺牲精神和模范的爱国主义,达到了党的领导地位。这些人来自基层,经常是些普通工、季节工和甚至有时是真正的失业者。对于他们,在一个民族的党派中起作用,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为了选择从动物状态过渡到人的状态的惟一办法。这些人受到党派的极端的条文主义的妨碍,将在托付给他们的活动范围中显示出首创精神、勇气和斗争的主张,这些表现几乎机械地把他们指向殖民主义的镇压武力。他们被逮捕、被判刑、受拷打、受大赦,他们利用监禁时期来比较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在绝食斗争中,在监狱那公共坟墓里的团结一致中,他们当作将给予他们一次发动武装斗争的机会那样来体验解放。但与此同时,在监狱外,开始到处遭到突然袭击的殖民主义主动接近温和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由于被城市所抛弃,起初在四周的市郊组织起来。但警察网把他们逐出那儿并迫使他们最终离开城市,逃避政治斗争的地方。他们重新投向农村,投向山里,投向农民群众。初时,群众把他们藏在自己家里,使他们躲避警察的追捕。民族主义的战士决定不跟警察在城市住宅区里玩藏猫游戏,而是把自

己的命运交到农民群众手里,他们决不吃亏。农民的外衣把他们温暖和严实地包裹起来,不露一点蛛丝马迹。这些人真正成为内地的流放者,与城市环境隔绝,他们曾在城内确定过国家政治和斗争的概念,而事实上他们变成了游击队员。他们不得不随时挪地方以逃避警察,为了不引起注意而在夜里行军,他们将有机会走遍和熟悉自己的家乡。他们忘却了咖啡馆,忘却了对下几届选举的讨论,对某个警察的不满。他们的耳朵听到国家真正的声音,他们看事情从大处着眼,看到人民无限贫困。他们意识到时间宝贵,这时间曾白白地浪费在评论殖民制度上。他们终于懂得要改变而不是改良,不是改善。他们在一种不断晕头转向中懂得城市的政治风潮将始终不能改变和震撼殖民制度。

这些人养成跟农民谈话的习惯。他们发现农村群众从未停止用激烈的词句提出他们解放的问题,从外国人手中拿回土地的问题,“民族斗争”的问题,武装起义的问题。一切都很简单。这些人发现一个紧密结合的人民,这个人民在一种静止不动中代代相传,但保持其道德标准和对国家的依恋完整无损。他发现一个慷慨大方的人民,准备作出牺牲,急切和勇敢地希望效忠献身。我们明白这些被警察围捕的战士和这些跺脚者及本能的造反者的会合能产生一种不寻常的威力爆鸣混合气体。从城里来的人向人民学习并同时为人民开设政治和军事课。人民作好战斗准备。事实上,课未持续太久,因为群众又磨拳擦掌了,导致领导们加快行事。武装斗争爆发了。

起义使那些政党不知所措。的确,它们的学说始终断言一切武力尝试都是无效的,而且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断谴责一切造反。某些政党私下分享殖民者的乐观并庆幸自己处于这件

荒唐事之外,有人说这件蠢事将受到血腥的镇压。但点燃的火犹如迅猛发展的流行病般遍及全国。装甲车和飞机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面对损失之广,殖民主义开始思考。甚至在压抑的人民内部听到一些意见,引起对形势严重性的注意。

至于人民,在其茅屋和睡梦中开始同国家的新节奏沟通。他们在心中低声地对光荣的战士们无休止地唱着赞歌。起义已蔓延及国家。现在轮到那些政党孤立了。

然而,起义的领袖们意识到有朝一日必须把起义扩展到城市。这种意识并非偶然。它接受那支配民族解放武装斗争的辩证法。尽管农村代表无穷无尽的人民力量预备队,尽管武装突击队在那儿使得不安全蔓延,殖民主义并不真正怀疑它制度的牢固。它根本不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中。于是起义的领袖决定把战争针对敌人,即送进安静而浮华的城市里。

起义安扎在城里给领导提出了难题。我们看到大部分出生在城市或在城市长大的领导逃避了他们原来的环境,因为受到殖民主义的警察的追捕并通常不为政党内谨慎和理智的干部们所理解。他们隐居在农村既是逃避镇压,又是不信任旧政治培养。这些领导在城市中的自然触角是政党内部有名的民族主义者。但确切地说,我们看到他们新近的经历从侧面发生在这些胆小怕事、紧皱着眉头不断思考殖民主义的罪行的领导那边。

此外,那些游击队里的人对他们的老朋友们——那些他们认为是最左的人——的初步试探将进一步肯定他们的理解并甚至将打消他们重见老熟人的愿望。事实上,从农村出发的起义就要由堵在城市周围的那部分农民深入到城里,这部分农民不再能在殖民制度下找到一根骨头可啃了。殖民的征用导致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离乡背井,人们不倦地围绕各个不同的城市转悠,希望有朝一日人们允许他们进城。就是在这些群众中,在这贫

民窟的人民中,在游民无产阶级的内部,起义将找得其城市的长矛。游民无产阶级构成被殖民人民的最自发和最彻底的革命力量。

在肯尼亚,在 Mau-Mau 造反之前那些年,英国殖民当局增加恫吓游民无产阶级的措施。1950—1951 年,警察和传教士的势力努力协调,以恰当地应付来自农村和森林的肯尼亚青年的大量涌入城市,他们由于未获得市场安置,偷窃、沉湎于放荡、酗酒,等等。被殖民国家的少年犯罪是游民无产阶级存在的直接产物。同时,从 1957 年起在刚果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为的是把那些扰乱既定秩序的“年轻二流子”驱逐到农村中。开办了一些再就业的营地并被委托给新教的传教团,当然是在比利时军队的保护下。游民无产阶级的组成是顺应一种特有的逻辑的现象,不是传教士们的大量活动和中央机构的法令能阻止这种现象发展的。这个游民无产阶级好像一群老鼠,不管脚踩,不管石头砸,继续啃啮树根。

贫民窟认可被殖民者的生物学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侵占敌人的城堡,必要的话,通过最秘密的渠道。有组织的和竭力使人感到城市“不安全”的游民无产阶级意味着不可逆转的腐败及在殖民统治中心的腐败原由。于是支持者、二流子、失业者、一般的右派、受煽动者,像一些坚定的劳动者那样投入解放斗争。这些闲散的人,这些失去社会地位的人,通过军事和关键性活动的渠道去重新找得国家的道路。面对殖民地社会或统治者的道德,他们并未重获尊重。完全相反,他们除了通过手榴弹和手枪的力量外是没有资格进城的。这些失业者和这些下等人面对他们自己和面对历史重新得到尊重。娼妓们也一样,年薪两千法郎的女佣们、绝望的妇女们,所有那些在疯狂和自杀之间变化的

男女将重新开始前进并坚决地参加觉醒起来的国家的伟大行列。

那些民族主义的党派不理解这加速它们瓦解的新现象。闯入城市的起义改变了斗争的面貌。当时全部转向农村的殖民主义部队现在又匆忙向城市撤回,为了保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镇压的力量分散了,到处出现危险。这是民族的土地,整个殖民地进入恐惧不安。农民武装队参加分散军事包围。城市的起义是只出乎意外的氧气球。

起义的领袖们看到积极热情的人民给予殖民主义机器决定性的打击,加强了他们对传统政治的不信任。每次获得的成功证明他们反对今后他们称作漱口剂、咬文嚼字、“吹牛学”、没有成果的扰乱的东西是有理的。他们对“政治”、对蛊惑人心的宣传感到痛恨。所以在起初我们目睹了一个真正的自发性宗教信仰的胜利。

农村中发生频繁的农民起义表明哪儿爆发起义哪儿就普遍存在国家的影响,且通常十分浓厚。每个武装起来的被殖民者是今后那生气勃勃的国家的一部分。这些农民起义使殖民制度处于危险之中,分散殖民制度的兵力,时刻威胁扼杀之,牵着它的鼻子走。农民起义遵循一个简单的看法:使得国家生存。没有纲领,没有演说,没有决议,没有倾向。问题十分清楚:必须外国人离开。组成一个反压迫者的共同阵线并通过武装斗争加强这阵线。

只要殖民主义的不安持续下去,民族事业就发展,并成为每个人的事。解放的事业具体化并已关系到整个国家。在这个时期里,自发性是首要的。主动性是局部的。在每个山顶上,组成一个小型政府担当起权力机构。在山谷和森林中,在丛林和村子里,到处遇见一个国家机关。每个人以自己的行动使国家

存在并保证使国家地方性地胜利。我们在与一个全部彻底的直接性战略打交道。每个自发组成的小组的目的和纲领是解放当地。如果说到处是国家，那么国家就在这儿。再进一步则只有这儿是国家。战术和战略混淆在一起。政治艺术十分简单地变成军事艺术。政治活动分子就是战士。打仗和搞政治是惟一的并且是同一件事。

这不幸的人民习惯于生活在斗争和敌对的狭隘圈子里，即将在庄严的气氛下，进行梳洗打扮和净化国家的地方面貌。在真正的集体狂喜下，一些敌对的家庭决定抹去一切，忘记一切。增加了和解。重新勾起根深蒂固的怨恨是为了更可靠地消除它。国家的得道使得觉悟进步。国家的团结首先是小组的团结，是宿怨、纠纷的消失和最终打消迟疑。同时，净化包括那几个当地人，这些人因其活动及其跟占领者的同谋，损坏了国家的名声。相反，叛徒们和被收买者们将受到审判和惩罚。人民在这继续进行制定法律的步骤中，发现自己和想要当家作主。从殖民的沉睡中这样觉醒过来的每一点在无法忍受的气温下生存。村子里盛行吐露真情，惊人的慷慨大方，使人没法生气的善良，永远坚定不移为“事业”而死的意志。所有这一切使人同时联想到社团、教堂、神秘主义。任何一个当地人不可能对这带动国家的新节奏无动于衷。一些密使被急派至附近的部族。他们组成起义的最初联络体系并带动尚无动静的地区活动和进展。一些十分闻名的顽固敌对部族兴高采烈地和流着热泪地放下武器，并发誓自己给予帮助和支持。人们兄弟般亲密地在武装斗争中同他们昨日之敌重新相聚。国家的范围扩大了，这是迎接新部族上场的新陷阱。每个村子发现自己是专制的官员和替班。部族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一致，国家的团结一致首先在

增加打击敌人中看出来了。每个组成的突击小队，每次爆发的新齐射表明每个人在围捕敌人，每个人在迎头痛击敌人。

这种团结一致在以敌人发动进攻为特点的第二时期中表现得更为清楚。爆发后，殖民的兵力重新集结和组织并开始用适合起义性质的战斗方法。这种进攻重又认为第一时期那种令人惬意的、极乐世界的现象有问题。敌人发动进攻并把重要兵力集中在一些精确点上。地方突击小队很快被包抄。尤其因为突击小分队开始时倾向同意正面作战就更易被包抄。第一时期盛行的乐观主义使得突击小分队不屈不挠，甚至失去判断力。突击小队深信他们的山顶是国家，不接受撤退，不容忍边撤边打。屡遭失败且脑中疑虑重重。突击小队最终的考验是遭到地方上的袭击。小队表现得完全如同国家的命运在这里和现在玩游戏一般。

但人们懂得这种打算在殖民制度中立即解决自己命运的唯意志的急躁，作为即时主义的学说，被否认了。最日常的，最实际的现实主义给昨天的感情吐露让出一个位子并替代了无止境的梦想。事实的教训、被机枪扫射的尸体引起对事件的全部重新诠释。简单的生存本能支配着一种更加游移不定、多变的态度。这种战术的改变是安哥拉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初几个月的特点。我们记得 1961 年 3 月 15 日。安哥拉农民以两三千人的突击队冲向葡萄牙人阵地。男男女女和孩子们，武装的或非武装的，勇敢亢奋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地冲向殖民者、士兵和葡萄牙国旗统治的地区。一些村子、机场被包围并遭到无数次的袭击，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遭殖民主义者的机枪扫射。安哥拉起义领袖们不须很久就懂得如果他们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国家，就该找另外的办法。因此，几个月来，安哥拉领

导奥尔登·罗贝尔托(Holden Roberto)由于考虑到不同的解放战争和利用游击战术,重新组织了安哥拉民族军。

果然,在游击战中,不再是人待在那儿斗争,而是到处出击。每个战士在光着的脚趾间把祖国卷入战争。民族解放军不是跟敌人一劳永逸地作战的军队,但这支军队走村串乡,撤退到森林中,当瞥见敌方纵队在山谷中掀起一片尘土时乐得直跺脚。部落开始活动,人群搬家,更换地方。北方人向西活动,平原地带的人登上山上。没有一个战略阵地优先。敌人自以为在追击我们,但我们总是安排自己在它的后方,就在它认为我们被歼灭的时候打它。从此,是我们在追击它。敌人用尽其一切战术和火力,给人的印象是不知所措和陷入困境。我们欢歌,我们歌颂。

然而在此期间,起义的领袖们懂得必须启发开导各战斗队,教育他们,向他们灌输思想,创建一支军队,集中权力机关。表现出武装起来的国家的这种分散状况要求被纠正和超越。曾经逃避城市那徒劳无益的政治气氛的领袖们重又发现政治,不是作为麻痹和蒙骗的方法,而是作为加强斗争和使人民对国家的清晰方向有思想准备的惟一办法。起义领袖们意识到农民起义,甚至伟大崇高的农民起义需要加以监督和指引。领导们最终否定作为农民起义的运动,因而把运动改变成革命战争。他们发现斗争的成功必须以目标明确,方法论清楚和尤其群众认识他们努力的暂时的力量为前题。人们坚持三天,必要时三个月,如果利用群众中怀有的不满程度,在民族战争中不能获胜,不能使敌人那可怕的机器垮台,如果忘记提高战士的觉悟就不能改造人。勇敢顽强和漂亮的口号是不够的。

此外,解放战争的发展注定会给予领导们的信念以关键的打击。果然,敌人改变了他的战术。他及时地把粗暴的镇压政策和惊人的放松姿态、分裂阴谋、“心理的活动”结合起来。他到

处并成功地尝试利用那些煽动者,进行人们称为反颠覆的活动,使部族斗争死灰复燃。殖民主义为了实现它的目标,雇用两类当地人。首先是传统的合作者、头头们、本地籍司法行政长官、巫师。我们看到,农民群众规规矩矩地沉浸在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继续尊敬宗教首领、世家的后裔。部族像单独一个人那样,走传统的首领给他指定的道路。殖民主义借助于教士的职位,以极高的代价,让这些心腹为自己服务。

殖民主义也会在游民无产阶级中找到一大群劳力。因此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最大程度地注意这游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始终响应起义的号召,但如果认为无视游民无产阶级,起义就能发展,那么这群饥饿者和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会投入武装斗争,这一次会站在压迫者这一边参加冲突。压迫者决不失去时机使黑人之间吵架,极为高兴地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毛病:头脑不清和无知。如果起义不把这支预备队立即组织起来,它将重又站在殖民主义部队一边当雇佣军。在阿尔及利亚,提供保安队官兵和梅萨利主义者^①的是游民无产阶级;在安哥拉,是游民无产阶级提供这些今天走在葡萄牙军纵队前的隧道者的;在刚果,在加扎伊和加丹加的地方主义示威运动中又发现游民无产阶级,而在利奥波德维尔,游民无产阶级则受刚果的敌人们利用组织一些反卢蒙巴者的“自发性”集会。

对手分析起义的实力,愈来愈仔细地研究由被殖民者构成的全部敌人,意识到居民的某些阶层的思想弱点和精神不稳定性。对手发现在一个严格的和组织十分严密的起义先锋队的旁

^① 指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中组织起来的支持梅萨(Messali Hadj)者,反对民族解放阵线。——译注

边,有一群人由于太习惯于营养缺乏、谦卑、不负责任,故他们的参加战斗很可能经常被认为有问题。对手利用这群人,哪怕代价高昂。他用刺刀刺或惩一儆百来创造自发性。美元和比利时法郎流入刚果,而在马达加斯加则增加敲诈勒索,在阿尔及利亚,征募一些新兵——名副其实的人质——充当法国兵力。起义首领丝毫不差地看到国家倾覆。一些部落全部组成保安队,且配备了现代武器,出发作战并侵犯划为民族主义环境的敌对部落。起义最初时刻那如此有成效和如此伟大的一致性变质了。民族团结分裂了,起义处于关键的转折点。于是群众的政治化被公认为历史的需要。

这种打算一下子把被殖民人民领到绝对权力的耸人听闻的唯意志论,这种以同样速度和在同样的观点下,随身搬走国家所有的瓶瓶罐罐的态度,这种建立希望的力量,暴露出在经验上是个很大的弱点。只要被殖民者想像自己能够不经过渡从被殖民状态到一个独立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公民状态,只要他开始幻想自己直接赤膊上阵,他在认识道路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他的觉悟停留在初开茅塞。被殖民者狂热地参加斗争,这一点我们看到了,尤其如果这场斗争是武装斗争。农民们尤其因为不断地厌烦几乎反殖民的生活方式而更加积极地参加起义。从来,由于各式各样的计谋和令人联想到魔术师那些丰功伟绩的重新平衡,农民们曾相对地保存殖民强制的主观性。他们竟至于认为殖民主义不是真正的战胜者。农民的骄傲,他那种对进城、接触外国人建设的世界持保留意见,他那在殖民行政管理代表走近时始终后退的动作,这一切都不断表示他以自己的二分法对抗殖民者的二分法。

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作为被殖民者对殖民压迫的回答

的那种捍卫自己肤色的意志,明显地表现出参加斗争的充分理由。但人们不支持战争,不受高度镇压,不为了复仇或种族主义获胜而眼看自己家破人亡。种族主义、仇恨、怨恨、“复仇的合法愿望”不能维持解放战争。意识中的这些闪现把身子抛向乱哄哄的道路,把身子投入几乎病理的梦样谵妄中,在这谵妄中另一人的脸使我晕头晕脑,我的血需要另外那人的血,我那简单呆滞的死亡需要另外那人的死亡,如果这种初时的狂热打算吸取自己本身的养分,那么它就冷却消失。千真万确,殖民主义军队那无休无止的敲诈勒索把激情因素再引入斗争中,给予战士仇恨的新原因,出发寻求“要打倒的殖民者”的新理由。但首领一日日地意识到仇恨不能构成纲领。如果不是由于反常,不能信任对手,他显然总是设法应付,为了增加罪行,加深“鸿沟”,就这样把全部人民推回到起义方面。在任何情况下,对手力图赢得某些居民团体的、某些地区的、某些首领的同情,我们曾指出过这一点。在斗争过程中,向殖民者和警力下达一些命令。表现略有差别,“变得通人情”。甚至达到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引进诸如先生或太太之类的短语。增加了礼貌和殷勤。具体地说,被殖民者有种起了变化的印象。

被殖民者并不仅仅因为饿得要死和眼看他的社会瓦解而拿起武器准备战斗,但他因为殖民者把他看作是牲畜,像对待牲口那样对待他,他对这些措施十分敏感。仇恨由于这些心理上的新发现而平息下去了。工艺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指出了殖民主义的伎俩并对“情结”增加研究:侵占的情结、好战的情结、可殖民化的情结。殖民者提升当地人,试图通过心理学以及理所当然地花几个小钱来解除当地人的武装。这些卑鄙的措施,这些表面的、而且灵巧掌握一定程度的弥补得以获取一定的成功。

被殖民者是如此地渴望,他渴望随便什么使他能具有人性——甚至是减价地具有人性——的东西,达到这种抑制不住的程度,以致这些施舍得以局部地动摇他。他的觉悟是这样不稳定,这样不透明,因此一点点火花就会骚动。最初对未分化的光明的强烈渴望随时受到愚弄的威胁。破天荒的强烈和全面要求撤回和收敛了。他如同一只想吞掉一切的急躁的狼,那阵想实行名副其实的革命的狂风,有变得叫人认不出来的危险,如果斗争持续下去的话,而且它在继续。被殖民者随时有可能因随便什么样的让步而被解除武装。

起义首领恐惧地发现被殖民者的这种不稳定性。他们首先不知所措,通过这新的迂回办法,懂得必须解释和进行把意识从困境中根本解脱出来的工作。因为战争在持续,敌人组织起来,变得强大,猜测被殖民者的战略。民族解放斗争不在于以惟一的步伐跨越空间。史诗天天如此,步履维艰,而人们忍受的痛苦超过殖民时期的所有痛苦。在下面,似乎城里的殖民者变了。我们的人较高兴。“人家尊重他们”。日复一日地过去了,投入斗争的被殖民者及应该继续给予支持的人民不应当摇摆。他们不应该想像目的已达到。当人家给他们明确斗争的真正目标时,他们不应想像这不可能。必须再次说明,人民应当了解他去向何方,怎么到那儿。战争不是一次战役,而是一系列的局部战斗,老实说,其中任何一次战斗都不是决战。

因此,有必要节省兵力,不要把他们一下子都投入权衡之中。殖民主义的后备军比被殖民者的更充足和数量更大。战争在继续。对手在自卫。不是为了今天,也不是为了明天而作充分说明的。事实上,从第一天起就说明了,而且这说明不会因不再会有对手而终止,但仅仅因为这对手由于种种原因,意识到他结束这斗争和承认被殖民人民的自主权的好处。斗争的目标不

应该停留在初时那种不加区别。如果不防止这一点,就有可能随时碰到人民在敌人稍作让步之时,就思考延长战争的理由。人们习惯了占领者的蔑视,习惯了占领者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压迫的坚强意志,这种习惯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一切主动宽宏大量行为,一切显示出来的好稟性都使人又惊又喜。于是被殖民者想要歌功颂德,必须说明并让战士懂得对手的让步不应蒙住他的双眼。这些让步不是别的什么,不就是些让步吗,它并不针对殖民者前景的主要部分,可以肯定如果让步不触及殖民制度的本质的东西,那它就不针对主要部分。

确切地说,占领者那粗暴的干预形式可以完全消失。事实上,这种惊人的消失显示出是占领者的开支减轻和反对兵力分散的有效措施。但这消失将以高价来兑现。十分确切地说,以国家命运被更强制地框住为代价。举一些历史上的例子,将帮助人民能够深信让步这骗人的把戏及不惜一切代价实行让步政策,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是以更慎重、更全面地奴化而告终。人民、全体战士应该认识到这个历史法则,它规定某些让步实际上是枷锁。如果没有做澄清工作,就会对某些政党的领导容易同从前的殖民者达成莫名其妙的和解感到惊讶。被殖民者应该相信殖民主义没有对他有任何馈赠。被殖民者通过政治斗争或武装斗争所获得的不是殖民者的真心诚意或好心的结果,而是说明他不可能推迟让步。被殖民者更应知道这些让步不是殖民主义所为,而是他自己作让步。当英国政府决定在肯尼亚议会上赐给非洲居民多几个席位时,声称这是英国政府作了让步的人必定是非常厚颜无耻或头脑十分不清。难道看不到这是肯尼亚人民在作让步吗?被殖民者、被掠夺的人民必须去掉直到现在为止成为他们特点的那种精神状态。万不得已时,被殖民者可能接受同殖民主义调和,但决不接受妥协。

所有这些说明,这些连续的启发觉悟,这种走认识社会历史的道路,只有在人民的组织和框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在起义初始,利用来自城市的革命分子和随着革命的发展重返农村的革命分子建立起这个组织。是这个核心构成起义的政治机关雏形。但在农民这方面,他们在经验中积累自己的知识,显示出有能力领导人民的斗争。在处于临战状态的国家及其领导们之间,有一种指点和相互充实丰富的趋势。传统的机构加强了、深入了并有时完全改造了。权限裁定法院、长老会议和村民会议改造成革命法庭、政治军事委员会。在每个战斗队,每个村子里涌现出一些政委。开始碰到一些不理解地方的人民由这些政委加以指点开导。就这样这些政委不会害怕那些如果不加以阐明会使人民迷失方向的问题了。许多当地人继续在城市生活,仿佛山中发生的事与他们无关,仿佛他们不知道最重要的运动开始了,战士看到这种情景的确十分生气。城市一片宁静,继续每天的常规,给予农民那种苦涩的印象:国家的整个一个区域只满足于判断胜负。这些看法引起农民的反感并加强了他们趋向蔑视和谴责全部城市居民。政委们应该引导他们通过觉悟来使这种立场有细微差别:某些部分的居民具有不总是对应国家利益的特别兴趣。于是人民明白民族独立产生各种各样的现实,这些现实有时是有分歧和对立的。正好在这斗争的时候,阐明是关键,因为它使人民从一揽子毫无区分的民族主义过渡到社会和经济的意识。人民的斗争开始时采纳了殖民者的原始的善恶二元论: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们在斗争进展过程中发现有时有些黑人比白人还要白,发现树立国旗的可能性和民族独立的可能性并不自动地导致居民中某些阶层放弃他们的特权或利益。人民发现像他们那样的当地人并未不知所措,恰

恰相反,他们似乎利用战争加强他们的物质环境和新生的权势。当地人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并发真正的战争财,他们不顾那始终无条件自我牺牲和把鲜血洒在国家土地上的人民。用简陋的方法对付殖民主义战争机器的战士意识到自己在推翻殖民压迫的同时从侧面协助建造另一个剥削机器。这一发现是令人不愉快、痛苦和愤慨的。然而一切很简单,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涣散觉悟的昏暗替代了起初的田园诗般和不真实的光明。人民发现极不公平的剥削现象可以显出一种黑人或阿拉伯人的表象。他大声责骂背叛,但必须纠正这骂声。这不是民族背叛,这是个社会背叛,必须教会人民大声责骂暴利的商人。人民在其辛苦地走向理性认识中,同样应该抛弃他对统治者看法的特点——过于简单化。在他眼前,人类分成一块块。他在其周围观察到某些殖民者并不参加犯罪的歇斯底里,他们不同于殖民者一类。他们被不加区别地投入外国介人的铁板一块的整体中,这些人谴责殖民战争。当这类人的典范到另一边去,变为黑人或阿拉伯人并接受痛苦、折磨、死亡时,真正爆发愤慨。

这些例子平息了被殖民者所感到的对外国移民的普遍仇恨。被殖民者热情亲切地接近这几个人,并通过一种富有感情的竞相许诺,趋向于绝对地相信他们。在被视为无情和残暴的后母的宗主国里,许多舆论和有时是很著名的舆论提出意见。毫无保留地谴责他们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建议最终要考虑被殖民人民的民族意愿。一些士兵离开殖民主义的队伍,另一些明确地拒绝为反对人民的自由而战,为这人民的独立和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而进监狱、受苦。

殖民者不再单纯是应被打倒的人。殖民主义主体的成员比民族的某些子孙显出更加靠近,无限地更加靠近民族主义斗争。

激进的和种族主义的水平在这两个方面是过时了。人们不再对凡是黑人或穆斯林都发给身份证。在不管哪个殖民者走近时不再找枪或大砍刀了。觉悟费力地通向部分的、局限的、不稳定的实际情况。所有这一切，人们料想得到是十分困难的。使人民成熟的任务将同时因组织的严密和其领导的思想水平而变得容易了。思想水平的威力根据斗争的展开、对手的伎俩、胜利和败北而转化和加强。领导方面通过揭发错误，通过利用每次觉悟的倒退来吸取教训，保证新的进步条件，显示出它的力量和权威。每次局部的起伏用来在所有村子，所有的网状系统范围内重复这问题。每当起义从使人民觉悟进步的情况出发时，它就证明自己合理，表示自己成熟。领导不顾其周围亲近的人——这些人有时倾向于认为细微的差异构成危险并把缺点带到人民集团里——对于在民族斗争中和人类为自由而进行的普遍斗争中得出的原则，依然坚定不动摇。存在着粗暴和对敏锐的轻视，这是典型的革命者的个人的情况，但也存在和前面这种粗暴惊人地相似的另一种粗暴，这是典型的反革命的、喜欢冒险的、无政府主义的粗暴。这种纯粹的、完全的粗暴如果不立即克服，必然导致运动在几个星期后失败。

逃避城市的民族主义战士，被领导们那蛊惑人心的和改良主义的勾当严重刺伤，对“政治”大失所望，在具体实践中发现一种与旧政治毫不相似的新政治。这个政治是写进历史的负责人、领导们的政治，这些人以其肌肉和大脑肩负解放斗争的领导。这个政治是民族的、革命的、社会的。被殖民者现在将认识的这个新现实只有通过行动才存在。斗争在使殖民地的旧现实发作时，揭示一些未知方面，是这个斗争使得产生一些新的含义并指出这个现实掩盖的那些矛盾。人民进行斗争，人民依靠斗

争安排这个新现实和认识这个新现实,他向前进,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事先对所有的蒙蔽企图,对所有颂扬国家的赞歌抱有成见。只有人民所运用的暴力,领导层组织和启发的暴力,能使群众辨别社会现实,解答这现实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斗争,没有在实践中这种认识,那么只剩下狂欢和喧闹了。最低程度的再适应,首脑们的一些改良,一面旗帜,以及完全处于下层,继续其无休止的运动,始终是“中世纪式的”,未分的大众。

三

民族觉悟的不幸遭遇

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一上来就被列入民族主义的前景,这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长期以来,被殖民者朝消灭极不公正方面作努力:强迫劳动、体罚、工资的不平等、政治权利的限制,等等。这一为了民主、反对压迫人的斗争逐渐地走出世界性的新自由主义的混乱,而通向——有时是十分艰苦地——民族的要求。然而精英们的无准备,他们和群众之间缺乏联系,他们的懒惰,以及应该承认,在斗争关键时刻的软弱,将是悲惨的不幸遭遇的开始。

民族意识不是全体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憧憬的协调一致的结晶,不是人民动员的最明显的直接产物,不管怎么说,只不过是个无内容的、脆弱的、粗糙的形式。人们在其中所发现的缺陷充分说明年轻的独立国家十分容易从民族过渡到种族,从国家过渡到部落。是这些裂缝让人了解倒退是如此地有损于国家的突飞猛进和民族的团结,使之如此地艰难。我们将看到这些缺点及其包含的严重危险是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使民众实践合理化——即从中提取理由——的历史结果。

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意识的传统的、几乎是先天性的缺点不仅仅是被殖民的人类受殖民制度损害的结果。它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懒惰的结果,是其贫困的结果,是其思想深受各国影响而

成长的结果。

在殖民制度结束时获取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个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它几乎毫无经济实力,无论如何,没有那种同它想替代的宗主国资产阶级的等量齐观的经济实力。民族资产阶级沉浸在唯意志论的自我陶醉中,十分容易深信自己能很方便地代替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但独立把它完全逼得走投无路,在它身上引起灾难性的反应,迫使它向过去的宗主国方面发出极端不安的呼吁。大学和商业方面的干部们是新成立的国家的最经验丰富的那部分人,他们的特点是数量少、资金集中,他们活动的类型为大宗买卖、农业开发、自由职业。在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既没有工业家,也没有金融家。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倾向于生产、创新、建设、工作。它全部被引向中介型的活动。它极大的爱好似乎就是在流通中,在要手段中。民族资产阶级有一种生意人的、非工业巨头的心理。确实,殖民者的贪得无厌和殖民主义设置的禁运制度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太有选择。

在殖民制度中资产阶级积累资本是不可能的。然而,确切地说,似乎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中,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否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否认自己是资本的工具和完全成为人民构成的革命资本的奴隶。

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担任那不可推卸的职责:抛弃它打算从事的职业,向人民学习,即由人民来支配它在殖民大学的过程中所夺取的知识和技术资本。我们将不幸地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经常离开这条英勇和积极,有成果和正确的道路,心安理得地走入那条因反民族而可怕的道路,一条传统的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道路,一条卑躬屈膝、愚蠢、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的道路。

我们已知道,从某个时期起,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目标是纯属民族的。它们在独立的口号下动员人民,而剩下的则拖延到将来再说。当有人问这些政党有关它们要求的经济纲领,有关它们打算建立的制度时,它们显出不能回答,因为确切地说,它们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完全一无所知。

这个经济始终在它们之外发展。它们对于自己国家的地上和地下的现有和潜在的资源只有一种大概的书本知识。因此它们只能在抽象的、笼统的方面谈论这经济。独立以后,这个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在数目上减少了,没有资本,拒绝革命,将悲惨地停滞不前。它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它过去可以略微轻率地说它的天才受殖民统治的阻碍。它的方法不可靠和干部少使它有几年走入手工业型经济的绝境。在其不可避免地十分局限的眼光中,民族经济是个建立在人们所说的地方产品基础上的经济。资产阶级在不可能替国家和自己安排一些更赚钱的工厂的情况下,它就对于工业加以沙文主义的偏爱,这种偏爱朝着新的民族尊严的方向走,此外,它还给资产阶级获取大量的利益。这种崇拜地方产品,这种不可能想出新的方向,也在殖民时期特有的农业生产中由于民族资产阶级陷入困境而显示出来。

独立时期的民族经济并未重新定向。始终是花生、可可、橄榄的收成。同样,在处理基础产品中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国内未建立任何工业。人们继续出口原材料,继续成为欧洲的小农,天然产品的专家。

然而,民族资产阶级不断要求经济和商业部门国有化。因为它认为国有化并不意味着使全部经济为国家服务,决定满足国家的所有需要。它认为国有化并不意味着按照人们决定使之

便于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来安排国家,对于它,国有化完完全全意味着把殖民时期承袭下来的破格优待转移给当地人。

由于资产阶级既没有物质的手段,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手段(工程师、技术员),它把自己的要求局限于重新占有从前被殖民者占领的办公室和商店。民族资产阶级占据从前的欧洲移民的交椅:医生、律师、商人、代理人、一般的公务人员、货物过境或转口代理人。它认为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捍卫自己,应该占领所有这些岗位。此后,它随即要求外国的大公司想在国内维持下去也罢,有意图进入国内也罢,都由它经手。民族资产阶级暴露出充当居间商的历史使命。正如人们所见,不是改造国家的使命,而是乏味地充当一个伪装的、走投无路的资本主义的传送带,今天这个资本主义戴上了新殖民主义的面具。民族资产阶级不怕难为情地、十分称职地对这西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角色感到很得意。这个有利可图的角色、这个收入低微的职位、这种短浅的目光、这种缺乏雄心壮志象征着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它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这里可悲地缺乏那种在一切民族资产阶级身上见得到的生气勃勃和开拓的面貌,世界开创者和发掘者的面貌。在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享乐思想占主要地位。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所有的教育的影响,在心理方面与西方资产阶级同化了。它追随西方资产阶级的负面和颓废的方面,没有跨越开发和创新的最初阶段,而这最初阶段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个成果。在其初始时,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结尾同化。不应认为它超过了各阶段。事实上它是由结尾开始。它尚未经历青少年时期的活跃、无畏、唯意志论的时候就已经衰老了。

民族资产阶级在其没落方面,受到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大

量帮助,他们以爱好异国情调、打猎、娱乐场的旅游者的身份出现。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意图,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一些休养娱乐的中心。这个活动采用旅游的名义并因地制宜将其与民族工业相似对待。如果想要证明前被殖民的资产阶级分子向西方资产阶级“聚会”的组织者的改造,值得回顾一下在拉美发生的事。哈瓦那、墨西哥城的俱乐部,里约海滨,巴西少女,墨西哥少女,十三岁的混血女孩,阿卡普尔科,科帕卡巴纳,这些都是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堕落行为的耻辱标记。民族资产阶级因为没有主意,它自己把门关死,与人民隔离,由于它先天性地没有能力按照国家的全局去思考全部问题而被削弱,它就担任西方企业的代理人角色并实际上将把它的国家组织成欧洲的妓院。

应该在眼前再一次出现某些拉美共和国的悲惨景象。美国的生意人、大银行家、技术官僚一振翅膀降落到“热带地区”并在八至十天中,沉溺于他们的“保留地”给他们提供的堕落行为里。

民族地主的行为实际上与城市的资产阶级相似。从宣布独立起,大农业经营者就要求农业经营国有化。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得以拿走从前殖民者拥有的农场,因而就这样加强了他们在当地的影响。但他们并不试图重振农业,加强农业或把农业归并到真正的国民经济中去。

其实,地主们要求当局为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以前在外国殖民者处享受到的方便和破格优待增加百倍。农业工人的开垦要加强并合法化。这些新殖民者通过玩弄两三个口号,要求农业工人大量劳动,当然是以为国家而作努力的名义。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发展计划,没有革新,因为革新,即使牵涉到最小风险,也会使这些阶层惊慌失措并使占有土地的、犹豫不决的、谨慎小心的资产阶级垮台,它越来越陷于殖民主义设置的流通

困境。在这些地区,首创精神是政府的事,是政府来确定首创精神,加以鼓励,提供资金。农业资产阶级拒绝冒一点点风险。它反对打赌、冒险。它不打算白费力气。它要求牢靠、迅速。它装进口袋的大量利润,考虑到国民收入,不是用来再投资。节约积蓄下来的钱支配着这些地主的心理,有时候,尤其在刚独立后那几年中,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把它从国土上赚取的利润托付给一些外国银行。相反地,把巨款用于豪华消费、车子、别墅等种种被经济学家描述为不发达资产阶级特点的东西。

我们说过开始掌权的被殖民资产阶级把它的阶级好斗性用于独占过去被外国人掌握的岗位。刚独立后,它确实和殖民主义的那些同伙冲突:律师、商人、地主、医生、高级官员。它要同这些“侮辱国家尊严”的人无情地斗争。它使劲地挥舞着干部民族化和干部非洲化的概念。事实上,它的活动愈来愈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它粗暴地向政府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我们必需这些岗位。而只是当它完全占据了这些岗位时它才会压下火气。

至于城市无产阶级、失业群众、小手工业者、那些习惯被称作小手艺人,站在这种民族主义态度的一边,但我们要给予他们这个正确的评价:他们只是就他们资产阶级的态度亮明自己的态度。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同欧洲人进行竞争,小手工业者和小手艺人则是发动反对非本民族的非洲人的斗争。在象牙海岸,确切地是反达荷美和反上沃尔特的种族主义骚乱。在小交易中占据重要领域的达荷美人和上沃尔特人在独立之后受到象牙海岸人的敌意表示。我们从民族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人们要求这些外国人离开,烧他们的商店,拆毁他们的棚铺,把他们私刑处死,的确,象牙海岸政府勒令他们

离开,这样因而满足了国民。在塞内加尔表现为反苏丹示威运动,这些运动使得马马杜·迪亚(Mamadou Dia)先生说道:“确实,塞内加尔人民只是因爱慕其领袖才采纳马里的神秘主义。他们加入马里除了对这些领袖的政治新的信仰行动外没有别的价值。塞内加尔的领土并不因此而不充满活力,尤其因为苏丹人到达喀尔去显得太冒失,使人难以忘记。这件事说明联盟的分裂非但不引起遗憾,反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松了口气,并说明任何地方未表现出为维持联盟而作任何支援^①。”

当塞内加尔人民的某些阶层一下子抓住他们自己的领导提供给他们摆脱苏丹人——这些苏丹人或在商业领域,或在行政管理领域,妨碍了他们——机会时,刚果人不相信地旁观成批的比利时人离开,决定对住在利奥波德维尔和伊丽莎白维尔的塞内加尔人施加压力并决定让他们离开。

正如人们所见,机械主义在两类现象中是相同的。如果欧洲人模仿年轻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做生意的资产阶级的贪婪,那么对于城市和人民群众来说,竞争主要由一个不同国家的非洲人表现出来。在象牙海岸是那些达荷美人,在加纳是尼日利亚人,在塞内加尔则是苏丹人。

当资产阶级推举的干部要求黑人化或阿拉伯化不是来自真正的民族化举动,而仅仅是出于把直到那时由外国掌握的权力交给资产阶级的考虑时,群众在他们的水平上提出同样的要求,但限于在黑人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在那些热情洋溢的关于大陆团结的断言和这一由干部向群众授意的行为之间,可以描述各种各样的态度。人们看到在渐趋消失的非洲统一和最可憎、最令人恼火的沙文主义的令人失望的回归之间有一种经

① 马马杜·迪亚,《非洲国家和世界团结》,PUF,1960年,140页。

常的往复。

“在塞内加尔方面,那些领导人曾经是主张统一非洲的主要理论家,并多次为了这一思想而牺牲了他们的地方政治组织和他们个人的地位,确实,他们是诚心诚意的,不能否认地负责。他们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是借口为反对巴尔干化^①而斗争,没有注意到领土主义这个前殖民事实。我们的错误是在我们的分析中没有足够注意这个现象:它是殖民主义的果实,但也是一个不论多么可嘉或讨人喜欢的关于统一的理论所不能取消的社会学事实。我们任由最令人满意的思想建设的幻影所迷惑并把我们的理想当作现实,以为只要谴责领土主义及其自然产物——微型民族主义——就足以制伏它们并保证我们那幻想的事业成功。^②”

从塞内加尔的沙文主义到沃洛夫人的部落主义,距离不会很大。事实上,哪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气量狭小和学说观点不明确而不能启发全体人民,不能提出首先是依照人民的问题,哪里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显示出不能足够扩大其世界观,人们就会目击向部落主义立场回潮;人们愤怒地目击种族的极端胜利。既然资产阶级的唯一口号是:让我们代替外国人,既然它急于在所有的领域中给予自己正确的评价和占据位置,那些小国民——出租车司机、卖糕点者、擦皮鞋的——也要求达荷美人回到他们自己的老家去,或更加极端,要求富尔贝人和珀尔人^③回到他们的荆棘丛林或山中去。

① 指帝国主义把某一地区分裂成若干对立的小地区,以便从中取利。——译注

② 马马杜·迪亚,同前书。

③ 指西非居民总体(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喀麦隆等),大概是史前撒哈拉沙漠牧民的后代。——译注

应该以这种观点来诠释联邦主义在年轻的独立国家中到处获胜。大家知道，殖民统治优待某些地区。殖民地的经济没有纳入国家和整体。它总是被安排在同各个不同的宗主国的补充性关系中。殖民主义几乎决不开发国家的全部。它满足于发掘天然资源，开采这些资源并向宗主国的工业出口，因而可以使得相对的领域富裕而殖民地的其余部分继续，或至少加深它的不发达和贫困。

独立后不久，住在繁荣地区的国民们意识到他们的运气，并出于内心深处粗浅的反应，拒绝养活其他的国民。盛产花生、可可、钻石的地区，面对国家其余部分所构成的空荡荡的全貌崭露头角。这些地区的国民仇视其他的人，他们发现这些人的妒忌、欲望、杀人的冲动。前殖民的老敌对情绪，种族之间的旧恨重又挑起。巴卢巴人拒绝养活卢卢阿人。卡唐加^①建成国家，阿尔贝·卡隆迪(Albert Kalondji)则给自己加冕为南卡扎伊王。

非洲统一是个含糊的口号，但非洲男女却热烈地维系于这个口号，而这口号的价值运用在于对殖民主义施加可怕的压力，揭示其真正面目并在同一个民族现实内部粉碎成地方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它蜷缩在自己的眼前利益上，因为它目光短浅，显露出没有能力实现单纯的民族统一，没有能力把国家建设在牢固和有成果的基础上。曾经打退殖民主义的民族阵线解散和日趋衰败。

种族和部落进行的这场无情的斗争，这种企图占领那些由于外国人离开而腾空的岗位的好斗性操心，同样使得产生一些

^① Katanga，自1997年5月称为Shaba，在扎伊尔的东南的一个地区。——译注

宗教上的竞争。在农村和荆棘丛林处,那些小社团、地方宗教、伊斯兰教隐士的祭礼重新活跃并重新采用逐出教会的周期。在大城市里,人们看到在行政管理干部的层面上,两大启示宗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互相较量。

面对非洲统一的诞生而震撼了它的基础的殖民主义,重新估量自己,并企图现在利用运动的所有缺点来粉碎这个意愿。殖民主义通过向非洲人民揭露存在“宗教的”敌对来动员他们。在塞内加尔,《新非洲》日报每星期散发出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仇恨。在西海岸拥有大部分的小商业的黎巴嫩人被交付国家制裁。传教士们及时向群众提醒一些大的黑人帝国早在欧洲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就被阿拉伯人的侵略摧毁了。人们毫不迟疑地说是阿拉伯人的占领给欧洲殖民主义铺的床;人们谈论阿拉伯帝国主义并揭发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穆斯林们通常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在另外一些地区则产生相反的现象,是信奉基督教的当地人被看作是民族独立的客观上和意识上的敌人。

殖民主义恬不知耻地使用诡计,非常高兴地挑动昨天曾联合起来反对它的非洲人相互之间反对。圣-巴泰勒米^①在某些人的思想中具体化了,殖民主义听到关于非洲统一的崇高宣言时则微微地冷笑。在同一个民族的内部,宗教把人民分成一伙一伙并挑动宗教社团之间互相反对,这些宗教社团由殖民主义及被其当工具使的人维持和加强。到处爆发意外的现象。在一些天主教或基督教具有优势的国家,人们看到穆斯林少数民族

^① 指1572年8月24日即圣-巴泰勒米日夜间受查理九世之命在巴黎犯下的屠杀新教徒的罪行。——译注

投身于罕见的笃信宗教。伊斯兰教的节日重新活跃了,穆斯林的宗教步步为营,抵制着天主教的强烈专制制度。人们听到一些部长会对某些个人说,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只要上开罗去就行了。有时候美国的耶稣教徒把他们反天主教的偏见搬到非洲土地上并通过宗教维持部落的敌对。

在大陆的范围,这种宗教的紧张可具有最平常的种族主义面貌,非洲被分成白人部分和黑人部分。这是替代的称呼:撒哈拉沙漠的南部或北部的非洲终于不掩盖这潜在的种族主义。这里,人们肯定白人非洲有千年的文化传统,它是地中海性质的,它延长了欧洲,它具有希腊拉丁文化的性质。人们把黑人非洲看作是个无生气的、野蛮的、没有开化的……荒芜的地区。那儿,人们听到整天厌烦地思考女人的面纱、多妻制、阿拉伯人对女性的歧视。所有这些思考因其挑衅性而使人联想到人们经常描述的殖民者的思考。这两大地区的各自的民族资产阶级吸取了殖民主义的思想,直至最腐朽的根部,他们替换了欧洲人并在大陆树立起一种对非洲的未来十分有害的种族主义哲学。由于他们的懒惰和依样画葫芦,他们支持植入和加强成为殖民时代特点的种族主义。因此在一个自称是非洲的国家里,听到只是种族主义的考虑,看到家长作风的行为存在,并不令人奇怪,这种家长作风给人留下身处巴黎、布鲁塞尔或伦敦的苦涩印象。

在某些非洲地区,关于黑人的一切进行喋喋的议论的家长作风、从西方文化中吸取的认为黑人根本无法理解逻辑和科学的诲淫思想,赤裸裸地盛行着。有时候人们甚至有机会看到黑人少数民族近乎是半奴隶状态,这种状态证明黑人非洲国家对待白人非洲国家的这种小心谨慎,甚至不相信,是合理的。一个

黑人非洲国家的公民漫步在一个白人非洲国家的大城市里,听到孩子们说他是“黑鬼”或看到一些官员用蹩脚法语跟他说话,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不,很不幸这并非空穴来风,一些在撒哈拉沙漠北部入中学的黑人非洲学生听到他们的同学问他们在自己家乡是否有房屋,他们是否知道电,在他们家里吃不吃人肉。不,很不幸这并非无稽之谈,在某些撒哈拉沙漠北部地区,一些来自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人遇见一些国民,请求这些来自南方的人把他们带到“随便哪儿但和黑人在一起”。同样,在某些年轻的黑人非洲国家,一些议员,甚至一些部长严肃地断言危险丝毫不不是他们的国家再被殖民主义占领,而是“从北方来的阿拉伯人”可能的人侵。

正如我们所见,资产阶级的无能并不仅仅显示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凭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掌了权,尽管有一些形式十分漂亮但内容却完全空洞无物的宣言,由于完全不负责任地玩弄直接出自欧洲的道德或政治哲学条文的词句,最终还是证明它不能使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宣传占上风。资产阶级,当它强大时,当它按照自己的势力安排世界时,毫不迟疑地肯定普遍要求的民主思想。对于这个经济上牢固的资产阶级,必须有一些特殊的条件来迫使它不尊重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尽管它是彻底的种族主义者,最经常地得以通过玩弄各种细微差别的变通办法来掩盖这种种族主义,这使它能够保存自己那关于人类至高尊严的宣言的完整。

西方资产阶级充分布置了路障和栏杆,可以不用真正担心它所剥削和蔑视的那些人的竞争。西方资产阶级对于黑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是一种蔑视种族主义;这是种贬低人的种族

主义。但宣称人与人之间实质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保持合乎逻辑,在劝诱那些低下的人透过这思想所体现的西方人道典型,变得通人情时,自己却来了个金蝉脱壳。

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一种基于害怕的民族主义。它与通常的部落主义,甚至与宗教社团之间的敌对没有主要的区别。人们理解那些敏锐的国际观察家不太认真对待关于非洲统一使大劲的问题。因为看得见的裂缝那么多所以人们急忙充分启发在这统一到来之前,首先应该解决所有这些矛盾。

最近非洲人民暴露思想并决定以大陆的名义,根本地对殖民制度施加影响。然而民族资产阶级赶忙一个个地区地敛财并安排一个国家的剥削制度,给实现这个“乌托邦”增加障碍。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目标完全心里有数,决心阻拦这种统一,这一为了同时战胜愚蠢、饥饿和不人道,两亿五千万人的努力协调。因此我们必须知道非洲统一只有在人民的推动和领导下,即不顾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时,才能形成。

在国内方面和制度的范围中,民族资产阶级也证明其无能。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中,议会这一招根本是假的。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无能,不能把协调的社会关系公布于世,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它作为一个阶级所操纵的原则基础上,它选择了自己觉得最容易的解决办法:独一无二的政党这个办法。它还不具备那只有经济强大和掌握国家制度能给予它的这种问心无愧和这种心平气和。它不创造一个使公民放心的国家,而是创造一个使公民不安的国家。

国家本应该因其坚强和其领导的使人信任,使人变温和,使人镇定,使人敬服;但却惊人地相反,它炫耀自己,使人陷于混

乱,粗暴地对待人,这样地告知公民他们经常处于危险中。这唯一的党是个毫不掩饰的、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现代形式。

这个专政没有十分远大的前程,这是个事实。它不断地冒出它自身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没有保证其操纵和给国家全体分一杯羹的经济手段,此外,由于它忙于尽快地但也最乏味地把自己的腰包装满,国家更加陷入不景气。而为了掩盖这种不景气,为了遮掩这种倒退,为了稳固和给自己提供骄傲的借口,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首都加高宏伟的建筑,只有作人们所称的声誉的消费。

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理睬国内,国家荒芜的现实,并向过去的宗主国、向确信其服务的外国资本家们看齐。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不跟人民分享利益,也绝对不允许人民利用外国大公司付给的报酬,它发现需要一个人民的领袖,这个领袖扮演稳固制度和使资产阶级统治永久延续的双重角色。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从一个领导人那儿汲取其生存的稳固性。人们知道,在发达国家中,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经济强大的产物。相反,在不发达国家里,领导人代表精神的威力,年轻国家的虚弱和拮据的资产阶级决定在这精神威力的庇护下使自己富有。

一些年来,人民见过或听说过这精神威力,他们远远地、梦幻般地随着领导人同殖民势力的纠纷走,本能地信任这位爱国者。独立以前,这领袖一般体现人民的愿望:独立、政治自由、民族尊严。但独立后不久,领袖非但不具体地体现人民的需要,不成为人民的真正尊严——通过面包、土地和国家重返人民神圣手中的尊严——的带头人,却暴露出他私下的职能: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所构成的、急于享乐的唯利是图者社会的总统。

尽管他频频表现正直和他那些真诚的宣言,领袖在客观上拼命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前殖民者公司那今天结合在一起的利

益。况且,他那纯粹良心支配的正直逐渐地风化了。领导人同群众的接触是那样地不真实,因此他竟至于深信人家怨恨他的权威和怀疑他为祖国服务。领导人冷酷无情地认为群众忘恩负义并日益坚决地把自己列入剥削者的阵营中。于是他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转变成为腐化和享乐的年轻资产阶级的同谋。

年轻国家的经济流通不可逆转地陷入新殖民主义结构的泥潭。国民经济从前是被保护,今天完全是被领导。通过借贷和赠送来提供预算。每个季度,国家领导本人或政府代表团到从前的宗主国或别处去筹集资金。

从前的殖民势力增加要求,积累让步和保证,越来越不小心谨慎地掩饰它对于民族政权的束缚。人民在无法忍受的贫困中可悲地变得了无生气并慢慢地意识到他们的领导们那无法形容的背叛。这种意识尤其因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组成阶级而更为尖锐。资产阶级组织的财富分配并不按各种各样的部门区分,不是层层排列,并不以稍许的差别分成等级。尤其因为绝大部分——十分之九——的人民继续饿得要死,这个新的社会等级更是侮辱人和令人反感。这个等级可耻、快速、无情的发财引起人民决定性地觉醒,意识到大有希望的暴力后果。资产者这个等级,这个把国家的全部财富并吞到它自己的利益中的民族部分,以一种逻辑,况且是意料之外的逻辑,把贬意的评价安在黑人或阿拉伯人的身上,这些评价以种种理由使人联想到殖民势力从前的代表们的种族主义学说。一方面是人民的贫困,同时另一方面则是有产者等级那无节制的发财,它对国家其余的人显示出来的蔑视,这种状况令人深深思考并使人们态度坚决。

但破壳而出的威胁导致当局变得更加稳固和专政的出现。具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者生活背景的领导人在人民和贪婪的资

产阶级之间构成一个屏障,因为他替这个等级的企业作担保并对这些有产者的蛮横无礼、平庸和固有的伤风败俗闭上眼。他协助阻止人民的觉醒。他援助这个社会等级,对人民隐藏他的计谋,就这样领袖变成蒙蔽和麻痹群众工作的最热忱的工匠。每当他与人民谈话,他就提起自己那经常是十分英勇的人生,他代表人民所进行的战斗,他代表自己所获得的胜利,这样他告知群众他们应该继续对他信任。有很多非洲的爱国者,他们在其先行者们那小心谨慎的政治斗争中引入民族主义性质的决定性风格。这些人来自偏僻荒漠地区并代表黑人说话。这些人歌颂过种族,承受了全部过去、退化和吃人肉,唉!今天他们又是一帮人的领导,这帮人不理睬偏僻荒漠地区并宣称其人民的使命是跟从、再跟从和始终跟从。

领导人使人民平静下来。独立后的几年中,不能劝说人民着手具体工作,不能给人民真正地开辟未来,使人民走上国家的建设道路,走上人民自己的建设道路,领导人一再重复独立的历史,重提解放斗争的神圣团结。因为领导人拒绝粉碎民族资产阶级,他要求人民退回到过去并陶醉于引向独立的史诗。领导人在客观上阻止人民,拼命地或是把人民从历史中除名,或是阻止他们在历史中站稳脚跟。在解放斗争期间,领导人唤醒人民并答应他们英勇和彻底地进行斗争。今天他加倍努力来麻痹他们并每年三四次要求他们回忆殖民时期并度量已走过的漫长道路。

然而,必须说明,群众表现出完全不能欣赏已走过的道路。农民继续耙土,失业者没完没了地失业,尽管他们有那些节日,那些崭新的旗帜,还是不能深信自己生活中有些东西真正地改变了。掌权的资产阶级白白地增加论证,群众还是不能欺骗自己。群众饿肚子,而今天的非洲警察局长们并不过分令群众放

心。群众开始赌气,扭过头去,对这个不给他们任何出路的国家不感兴趣。

然而,领导人不时地发动自己,在电台上讲话,巡视一圈以安抚、平息、蒙蔽群众。尤其因为没有政党就更加需要领导。在独立斗争时,确实存在一个曾由现今的领袖领导的政党。可是独立后这个政党可悲地解散了。只有形式上的政党、名称、党徽和口号继续存在。政党本该是为了使从群众的真正需要出发而制定的想法自由传播而组织起来的,却转变成一个个人利益的工会。从独立以来,政党不再帮助人民提出要求,帮助他们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更加巩固他们的政权。今天政党的任务是把来自领导层的指示传达到人民处。再也没有这种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往返,它奠定和保证党内的民主。相反,政党构成了群众和领导层之间的屏障。再也没有党的生活。在殖民时期设置的支部今天处于完全停滞状态。

战士强压住怒火。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某些战士在解放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其实,在战斗时刻,好些战士曾要求领导机构制定一个学说,明确目标,提出一个纲领。可是领导们借口捍卫民族团结,断然拒绝了开始从事这个任务。他们反复说学说就是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民族大团结。他们做事说话时有上升为学说的激进口号作挡箭牌,一切思想活动限于有关人民有权支配自己的一系列不同说法,关于历史的趋势必将卷走殖民主义的一系列不同说法。当战士们要求略微更好地分析一下历史趋势时,领导们就用希望、非殖民化的必要和不可避免性等等来对付他们。

独立后,政党陷于惊人的麻木迟钝。它只是在所谓的示威活动、国际会议、独立的节日之际才动员战士。党的地方干部被

指派在负责行政的岗位,党变成政府,战士们重新成为平民并空有公民身分。

既然他们完成了把资产阶级扶上台的历史任务,他们被坚决劝说隐退以便资产阶级可以平静地完成它自己的任务。然而,我们看到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完成随便一个什么任务。几年以后,政党的瓦解变得十分明显,而观察家,甚至肤浅的观察家能意识到过去的党今天变成一个空架子,只是用来使人民保持安静。在战斗时,党曾把国家全体人员吸引到它那儿,现在解散了。在独立的前夕曾归附党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现在的行为证明这种归附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参加分配独立的蛋糕。党成为一种个人成功的手段。

然而,在新制度内部存在一种富有和独占方面的不平等。有些人吃几个槽里的料并显示出是出色的机会主义专家。破格优待增多了,腐败占上风,道德堕落。鉴于国家财富贫乏,今天乌鸦太多太贪婪了。资产阶级手中权力的真正工具——党,加强国家机器并确定人民的框框——令他固定不动。党帮助权力机构掌握人民。它越来越是强制权的和显然反民主的工具。党在客观上,有时在主观上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同谋。同样,民族资产阶级跳过其建设阶段而投入享乐,同时在制度方面,它跳过议会阶段并选择民族主义类型的专政。今天我们知道半个世纪中在拉丁美洲得逞的这个无远见的法西斯主义是独立时期的半殖民国家的辩证结果。

在这些贫穷、不发达的国家里——那儿按理最富有的和最贫困的并驾齐驱——,军队和警察构成制度的支柱。一支军队和一个警察仍然是必须记住的标准,这是由一些外国专家出的

主意。这个警察的力量,这支军队的力量,同国家的其余处于萎靡不振状态成正比。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公开地把自己出卖给外国的大公司。外国借助于报酬,获取了特许权,丑闻增多,部长们发了财,他们的妻子转变成轻佻的女人,众议员们设法应付,且直至警察、海关关员没有人不加入这支腐化队伍的。

对抗变得更加挑衅性了,人民不用细说就领会其宣传。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从此明显。似乎得了早衰病的年轻的资产阶级不考虑给它提出的大量建议,并显得不能明白掩盖、即使是稍稍地掩盖他的剥削,对自己是有利的。

布拉柴维尔的十分基督教倾向的《非洲周报》针对这种政体的君主们写道:“有地位的男人们,及你们这些男子的妻子们,今天你们具有自己的舒适、可能是自己所受的教育、自己那漂亮的住宅、自己的关系、授予你们并给你们打开新的眼界的种种任务。但你们的一切财富给你们包上了一层外壳,使你们看不见你们周围的贫苦。当心。”人们料想《非洲周报》上的这篇让尤卢先生^①的走狗们提防的文章没有什么革命的东西。《非洲周报》想告知那些使刚果人民挨饿的人,上帝会处罚他们的行为:“如果你们心中没有为处于你们下面地位的人着想的地方,那么教堂里将没有你们的位子。”

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不怎么为这些指责而不安,资产阶级攀附于欧洲,仍然坚决要利用这种状况。资产阶级通过剥削人民而获取的巨大利润被输出到国外。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往往比外国的大公司还更不相信它自己建立的制度。它拒绝在国家土地上投资并对保护它和养育它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忘恩负

^① 1960年为刚果的总统,1963年被推翻。——译注

义,应该指出这种忘恩负义。它在欧洲金融界购得外国股票并在巴黎或汉堡度周末。某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行为使人联想到盗匪集团的成员们在每次持械抢劫后,对同伙们隐藏他们抢劫的那一份并谨慎小心地准备撤离。这种行为暴露出民族资产阶级多少是有意识地长期扮演输家。它猜想这种状况不是无限地持续下去,但它打算最大程度地利用之。然而,对国家如此程度的剥削和不信任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在这些条件下制度变得冷酷了。于是军队成为系统化镇压的必不可少的支持者。由于没有最高法院,军队成了仲裁人。但军队迟早会发现自己的重要性并使政府有那种始终有发动军事政变危险的重负之感。

正如大家所见,某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书本中什么也没学到。如果它好好地看看那些拉丁美洲国家,它就会毫无疑问地识别那些正等着它的危险了。于是大家能得出结论,这个如此轰动的小型资产阶级被判定停滞不前。在不发达国家里,不可能有资产阶级阶段。当然会有警察的专政、牟取非法之利者的等级,但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案显出注定要失败。装饰打扮起来的牟取非法之利者的团体在一个贫穷国家的土地上抢夺钞票,早晚会是受外国专家们灵活操纵的军队手中的一根稻草。就这样,从前的宗主国同时通过它扶植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军队实施间接统治,这支军队配备了它的专家们当干部,且这支军队注视着人民,使他们无法行动、使他们害怕。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所能提出的几点意见使我们得出一个不该令人惊讶的结论。在不发达国家中,资产阶级不可能找得其生存和兴旺的条件。换句话说,编入一个党内的群众及高度自觉和以革命原则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必然阻挡

这个无用和缺乏经验的资产阶级的道路。

五十年左右以来,当人们在涉及不发达国家的历史时,提出的那个理论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阶段能不能跳过,应该在革命活动方面而不是通过推理来解决。在不发达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阶段只有当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足够强大,能够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创造条件发展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使农业工业化,最后使真正的民族文化成为可能时,方可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一个如同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能够在加强自己势力的同时制定一种思想。这个有活力的、有文化的、世俗的资产阶级完全办成了它积累资本的事业并给国家带来小小的繁荣。在不发达国家里,我们看到不存在真正的资产阶级,但却看到一种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小社会等级,这个等级受收入低微者思想支配,并凑合着花从前殖民势力保障供他的股息。这个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显示出不具备伟大理想和创造性。它记住它在西方课本里读到的东西并不自觉地转变成不再是欧洲的复制品,而成为欧洲的讽刺漫画。

反对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远不是个理论观点。这并不是通过历史的评判来解读对它的谴责。不应该因为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阻止国家全面和协调地发展的危险而反对它。应该因为它地地道道毫无用处而坚决反对它。这个资产阶级获取蝇头小利,成就不大,思想平庸,企图通过树立个人威信,通过美国汽车的光亮外表、在里维埃拉度假、在霓虹灯闪烁的夜总会中度周末,来掩盖它的这种平庸。

这个资产阶级越来越不理睬全体人民,甚至未能从西方争得惊人的让步:对国家经济有益的投资,某些工业的设置。相反,装配工业倍增,因而接受新殖民主义的类型,民族经济在这种类型中挣扎。不应说民族资产阶级延迟了国家的进展,说它使国家丧失了时间或它很可能导致国家走上绝路。事实上,资产阶级阶段在不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是个无用的阶段。当这个等级消灭时,当它被自身的矛盾吞灭时,人们会发现自独立以来,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发现必须一切重新开始,必须从零重新开始。资产阶级在执政时期设置的机构没有进行转产,这个等级除了毫无改变地继承殖民者的经济、思想和制度外,没干别的什么事。

我们看到这个资产阶级尤其因为在数字上、知识上、经济上很弱,就更易使它不起作用。在被殖民的领土上,有产者等级在独立后主要从和老殖民势力过去的协定中汲取其力量。尤其因为人们给民族资产阶级留下空闲同前殖民势力单独待在一起,使它有更多的机会接替殖民主义压迫者。可是一些深刻的矛盾使这个资产阶级的队伍动荡不安,这给予认真的观察家一种不稳定的印象。还没有等级的清一色。例如,许多知识分子谴责这种建立在几个人统治的基础上的制度。在不发达的国家里,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务员、可靠的杰出人物感到必须经济计划化,剥夺牟取非法利益者的法律权利,严格禁止欺骗。此外,这些人在某种范围内,为了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公共事务而斗争。

在通向独立的不发达国家中,几乎总是存在少数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本能地不信任独立不久的被

殖民国家中这种症状性的追名逐利。这些人的特殊地位(人口众多的家庭的赡养者)或他们的历史(困难的经历,宗教的道德培养)为这种对于有办法的人和唯利是图的人如此明显的轻视作了解释。应当善于在为了国家的神圣方向而打算进行的决定性斗争中利用这些人。阻挡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摒弃独立后不久的严重的节外生枝,摒弃民族统一的不幸遭遇,摒弃世风日下,摒弃国家所受的腐败包围,摒弃经济衰退,摒弃一个建立在武力的恐吓基础上的反民主制度。也就是选择惟一的前进方法。

资产阶级那表面上的牢固拖延决定并使年轻国家中最民主和进步的分子优柔寡断。在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中,全部的干部聚集在殖民主义建立的城市内。缺乏对总人口的分析促使观察家们认为存在着一个强大和组织得十分完好的资产阶级。我们今天知道,事实上在不发达国家中不存在资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的不是意愿、爱好或方式,甚至不是希望。资产阶级首先是确切的经济现实的直接产物。

然而,在殖民地,经济现实是外国资产阶级的现实。宗主国的资产阶级通过其代表来到殖民地的城市里。独立前,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西方资产阶级,是宗主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真正的分公司,它从这个宗主国资产阶级那儿获取其合法性、实力、稳固性。在独立前的动荡阶段期间,这个进口的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当地的商人企图与这个资产阶级合为一体。在知识分子和当地的商人身上存在着与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代表同一化的永恒意愿。

这个资产阶级毫无保留地和热情地接受宗主国特有的思想机制,巧妙地丧失它自己的思想并把它的意识建立在典型的外国基础上,它将饥渴地发现它所缺少的使它成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是金钱。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是个想像中的资产阶级。并

不是它的强大经济、它干部们的活力、它那设想的智力范围保证其资产阶级质量。因此它在起初并长时期地是个公务员的资产阶级。是那些它所占据的新国家政府部门中的岗位给予它从容和稳固。如果政权给它这方面的时间和可能,这个资产阶级最终能够给自己积蓄一小笔钱加强它的统治。但它始终显示出不能产生一个带有所有经济和工业结果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

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起就倾向中间型的活动。它的能力在于它那商业和小买卖的观念,在于拿光佣金的才干。不是它的钱,而是它的生意经在牟利。它不投资,它不能实现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诞生和繁荣所必需的资金积累。如果以这种速度,它需要几个世纪来建立工业化的雏形。不管怎样,它遭到从前的宗主国的无情的反对,它在新殖民主义协定的框架内,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

如果政权想让国家走出停滞不前状态并带领国家大步地走向发展和进步,它首先必须使第三产业部门国有化。资产阶级想让利润和享乐的思想,它蔑视群众的态度和赢利——应该说盗窃——的丑恶面貌获胜,的确在这个部门大量地投资。从前由殖民者控制的第三产业领域将由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侵占。在殖民经济中,第三产业部门早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想往前发展,就该在最初决定使这个部门国有化。但十分清楚,这个国有化不应显出严格的国家控制的样子。不是安插非政治培养的公民领导行政部门。每当这个程序被采纳时,人们发现这个政权实际上帮助了由从前的宗主国培养成的公务员专政获胜,这些公务员很快暴露出不能想到国家整体。他们很快开始破坏国家经济、解散机构,而腐败、渎职、侵吞储备、黑市等却猖獗起来。使第三产业部门国有化,就是民主组织购销合作社;就是通过使群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而分散地布局这些合作社。我们看到,

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使人民具有政治性时才能成功。此前,人们意识到必须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个主要问题。今天,果然,在不发达国家里普遍牢记使群众具有政治性的方针。但似乎人们并非真正地研究这个首要任务。人们在肯定使人民具有政治性的必要时,决定同时表示要人民支持他们着手进行的活动。一个表明要使人民具有政治性的政府表示它意欲和人民一起管理并为人民而管理。这不应该是一句用来掩饰资产阶级领导的用语。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好久以来超越了这个政权的幼稚阶段。他们冷静地借助他们的法律、经济实力和警察来管理。既然他们的政权牢固地建立了,他们不是非要把时间花在蛊惑人心的姿态上不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管理,且对自己的政权有热忱。他们创造了合法性并理所当然地是强者。

新独立的有产者等级还没有老牌资产阶级的厚颜无耻,和建立在强大势力基础上的那种从容。因此,这个等级有某种操心:掩盖它深远的信念,进行改变,总之表现出得人心。使群众具有政治性并不是每年动员三四次几万个或几十万个男女。这些集会,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会与独立前的老战术性质相同,那时人们展示自己的力量,为了向自己和别人证明自己有人民同他们在一起。使群众具有政治性意在使群众成熟而不是使他们变得幼稚。

这导致我们考虑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中政党的作用。在前面那几页中我们看到一些看问题经常过于简单化的人——况且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断重复说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由一个强权领导国家事务,甚至一种专政,是必要的。在这种观点下,人们给党委以监视群众的使命。党充当政府部门和警察局

的替角，并监督群众，不是为了核实群众真正参加国家事务，而是为了经常提醒他们权力机构期待他们服从和遵守秩序。这个专政自以为被历史记载在册，自认为在独立后不久是必不可少的，它实际上象征着有产者阶级起初在人民的支持下、但不久即反人民地领导这个不发达国家的决心。党逐渐地转变成一个情报处，这迹象表明权力机构越来越保持防守。未定型的一大群人民被看作是一股盲目的力量，应该经常或是通过欺骗，或是通过警察的武力使他们感到害怕来牢牢地控制他们。党充当晴雨表、情报处。人们把战士改造成告密者。人们交给战士对农村的惩罚任务。反对党一露头就以棍子和石块被清除。政治增加了挑衅。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党是惟一的，且 99.99% 的选票归于政府的候选人。我们应该说一下在非洲有些政府根据这个典范行事。所有的反对党，而且一般是进步的——故它们为了在管理公共事务中具有更大的群众影响而努力，它们希望轻蔑的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守规矩——，被警棍和监狱迫使缄默不语，然后被迫转入地下。

在许多今天独立的非洲地区，政党经受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党员在场时，人民就不说话，变得温顺并对政府和领导大加赞扬。但在街上，晚上在远离村子的地方，在咖啡馆或河面上，该听到人民这种苦涩的失望、这种绝望但也是这种抑制的愤怒。党不是有助于人民表达苦情，不是以使人民的思想自由地通向领导方面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形成屏障和加以禁止。党的领导们的所作所为像一些平庸的、吹毛求疵的长官，他们经常提醒人民应当“在队伍中肃静”。这个党表明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宣称为人民的充分成长而努力，但自民政政权把国家一交给它起，就赶忙把人民赶回其洞内。在民族统一方面，党也是错误

百出。就这样所谓的民族党以种族党的姿态出现。这是一个真正的构成党的部落。这个宣称自己甘心情愿地是民族的,保证代表全民说话的党,秘密地并有时公开地组织一个货真价实的种族专政。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个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个部落的专政。部长、办公室主任、大使、省长是在领导人的部落里选择,有时直接从他家族中选择。这些家族式制度似乎重又实行族内婚的法律,人们面对这种愚蠢、这种冒名顶替、这种智力和精神的贫乏感到羞愧,而不是愤怒。这些政府领导人是非洲的真正叛徒,因为他们把非洲出卖给最可怕的敌人:愚蠢。人们预料这种政权部落化导致地方主义的思想和分立主义。地方分权的倾向冒头并获胜,民族解体、分割。叫嚷“民族统一”和想到他小家庭的领导人有朝一日同五个部落一起醒悟过来了,这五个部落也想有他们自己的大使和部长;这位领导人始终不负责任、不自觉、卑鄙可耻,他揭发“背叛”。我们曾多次指出领导人那经常有害的作用。那是因为在某些地区党组织成盗匪集团似的,其中最强硬的人担任领导。人们往往谈论这个领导人的高升,他的力量,且毫不迟疑地以同谋的、略微欣赏的口吻说他使得最亲近的合作者发抖。为了避免这种种危险,必须顽强地斗争以便党决不变成领导人手中的顺从工具。领导人(Leader)来自英语动词,意思是带领、引导。人民的领导者,现在不再存在了。人民不再是羊群了,不需要被人带领。如果领导人带领我,我要他知道与此同时我在带领他。国家不应该是件由一个大人物领导的事。因此,人们理解每当这些领导人中有人病倒时领导阶层的这种恐慌。因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是接班问题。如果领导人去世国家会怎么样呢?那些曾在领导人面前认输的、不负责任、不自觉的领导阶层,那些主要操心他们所过的好日子、公费旅游和要手腕获利的领导阶层,不时地发现国家的核心精神空虚。

一个国家真正想回答历史向它提出的问题,想发展其城市和居民们的头脑,它应该拥有一个真实的党。党不是政府手中的工具。恰恰相反,党是人民手中的工具。是党决定政策,由政府来执行。党不是,绝对不该是,所有政府成员和政体的达官贵人们十分随便出没的惟一的政治局。唉,太遗憾了,这个政治局构成整个党而其成员常驻首都。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党的领导成员应该像逃避瘟疫那样地逃离首都。他们应该除了几个人以外都住在农村地区。应该避免把一切集中在大城市里。任何一个管理范畴的托辞也不能使一个首都的沸腾合法化,这个首都与十分之九的领土相比较是人满为患和过分发达。党应该极端正地分散布局。这是促进那些死气沉沉的地区,那些还未感悟生活的地区的惟一办法。

实际上在每个地区至少有一个政治局的成员,并避免任命他当地区首领。他手中没有管理权限。地方政治局的成员不必占据地方管理机器的最高行列。他不一定要同权力机构相结合。对于人民,党不是权力机关,而是一个作为人民通过它来行使其权力和意愿的机构。混乱越少,权力的二重性越少,党就越加起到它的指导作用,它对于人民越加成为决定性的保证。如果党和权力机关混淆,那么成为党的斗士,就是走最快的捷径达到自私的目的,在政府机关有个岗位,加衔,改变级别,事业有成。

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对生气勃勃的地方领导的安排阻止城市畸形扩大的过程和农村群众纷纷涌向城市现象。自独立后最初起,安排那些在一地区内有能力恢复该地区活力、使它生存、加快公民的觉醒的地方领导,对于一个要前进的国家是个不

能遗漏的必要条件。否则,在领导周围就聚集了党的负责人和政体的达官贵人们。那些政府机关膨胀,不是因为它们发展和区分,而是因为新的亲朋好友和新战士等待一个位置并希望渗入国家机构。一切公民都梦想到达首都,有他的一份闲差事。村庄被抛弃,没有编制、未受教育和无助的农村群众离开种得糟糕的土地,走向周围的市镇,使游民无产阶级的队伍过分膨胀。

民族的新危机为时不远了。相反我们认为国内和内地应该优先照顾。况且说得极端些,政府设在别处而不是设在首都,这不会有任何妨害。应该使首都非神圣化并向受穷的群众说明是为了他们决定工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巴西政府想用巴西利亚来干的事。里约热内卢的自大对于巴西人民是个侮辱。但很不幸,巴西利亚仍然是个同里约热内卢一样的畸形怪物般的新首都。这个成果的惟一好处是今天有了一条穿过偏僻荒漠地区的公路。不,任何充分理由也不能反对选择另一个首都,反对把整个政府搬往最缺乏必需品供应的地区之一。不发达国家的首都是一个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商业概念。但在不发达国家里,我们应该同农村群众增加接触。我们应当制订一个国家的政策方针,即首先是个为群众的政策。我们决不应该失去同人民的接触,他们为了自己的独立和具体地改善生活而进行了斗争。

当地的公务员和技术员应当深入到人民当中,而不是沉溺于略图和统计表。他们不应再在每当涉及搬往“内地”时而生气、反对。不应再看到这些不发达国家的少妇们以离婚来威胁自己的丈夫,如果他们不设法避免被分派到某个农村岗位。所以党的政治局应该对缺乏必需品供应的地区给予优惠,而首都

的生活,矫揉造作的、表面的、如同一个异物被紧贴在国家现实上的生活,应该在国家生活中占尽可能少的地位,国家是根本和神圣的。

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党组织应该不光满足于和群众有联系。党应该是直接表达群众的心声。党不是一个负责转达政府命令的行政部门。它是群众有力的代言人和廉洁的捍卫者。要达到这个党的观念,必须首先摆脱那种非常西方的、非常资产阶级的、因此十分蔑视群众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的思想。事实上,经验证明群众完全明白最复杂的问题。阿尔及利亚革命给阿尔及利亚的知识分子帮的最大忙之一就是使他们和人民接触,使他们能看到人民的极端和难以形容的贫困,同时也目睹人民的智慧的显露和觉悟的进步。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个挨饿和目不识丁的群众,这几个世纪以来被抛在使人惊慌失措的黑暗中的男男女女顽强地抵抗了坦克和飞机,顶住了凝固汽油和心理服务,但尤其抵制了腐蚀和洗脑,抵制了叛徒和贝卢尼(Bellounis)将军的“民族”军。尽管有那些弱者、犹豫不决者和学徒独裁者,这个人民站住了。这个人民站稳脚跟了,因为在七年里,它的斗争给它开辟了一些领域,此前它猜想不到有这些领域。今天一些兵工厂在山地的地下好几米深处运作,今天,人民的法庭在所有各级工作,地方计划化委员会组织分配大产业,设计明天的阿尔及利亚。一个孤立的人可以表现出反对理解某个问题,但一个群体、一个村子以一种令人困惑的迅速理解了。这是真的,如果有人谨慎地使用只有法律或经济学学士能听懂的语言,那就轻易地证明群众应该受引导。但如果人们讲实在的语言,如果人们不是受那居心叵测地意欲把事情弄乱、意欲摆脱人民的念头所困扰,那么人们会发现群众懂得所有的细微差别,所有的诀窍。求助于某种技术用语意味着人们决心把

群众看作是些门外汉。这种语言不能掩盖那些讲演人想欺骗人民,想把人民拒之门外的用心。使语言变得难理解的举动是个伪装,在这伪装的背后,显示出更加广泛的剥夺举动。人们要同时夺走人民的财产和主权。然而只要人们真正希望人民懂得他们,他们是能够向人民说明一切的。而且,如果人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人民,认为相反人民很可能妨碍种种以使人民更加贫困为目的的私有公司和有限公司顺利进行,那么问题迎刃而解了。

如果人们认为他们能圆满地领导一个国家不用人民从中顾问,如果他们认为只要有人民在场就会把事情搅乱,或是推迟,或是由于其天生的无意识而破坏之,那么不容任何迟疑:必须把人民撇开。但有时,当人们要人民领导国家时,人民并不是推迟进展,恰恰是加速进展。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在这场战争中有机会,有幸接触某些事情。在某些农村地区,革命的政治军事负责人的确同一些要求根本解决的局面较量过。我们来开始讨论其中几个局面。

在 1956—1957 年期间,法国殖民主义者禁止某些地带,在这些地区人们交通受到严格管理。因此农民不再可能自由进城和更换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这一时期,食品杂货商大发其财。茶、咖啡、糖、烟草、盐价格暴涨。黑市肆无忌惮地占上风。不能现金支付的农民们以自己的收成、甚至以自己的土地作抵押,或一块地一块地地割让家产,而在第二阶段,他们替杂货商耕作。政治特派员们刚意识到这种危险,就立即作出反应。就这样建立起合理的供应制度:到城里去的杂货商必须在国营的批发商那儿进货,这些批发商给他开具一张发票,上面写明商品的价格。零售商在进村时,首先必须向政治特派员报到,政治特派员

检验发票,规定利润额并定下销售价。限制的价格张贴在店内,村里一个类似监督员的村民在场通知农民商品的应售价。可是零售商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诀窍,三四天以后,他宣布库存已罄。私底下他又开始其非法买卖并继续黑市销售。政治军事当局作出根本的反应。决定严加惩罚,收到的罚款缴村里经费或公款保管处,或用作社会慈善机构,或用作集体利益的工程。有时候,决定把商店关闭一段时间。然后,如果重犯,商店的营业资产立即被查封,并选举出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经营,以每月给旧业主支付一笔钱为代价。

从这些经验出发,人们以一些具体情况为基础,向人民解释经济大法规的作用。资本积累不再是个理论,而是成为一个十分实际和当务之急的行为。人民懂得了有人如何从一个商店出发,能够变富,商店变得越来越大。这时,农民们才诉说这家杂货商高利借钱给他们;另外一些人回忆他如何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撵走的,以及他们如何从业主变成工人的。人民越明白事理越加警惕,越加意识到一切最终取决于他们,而他们的得救在于他们的团结一致,在于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和识别他们的敌人。人民明白了发财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有组织有庇护的偷盗结果。富人不再是负责人了,他们只不过是些躺在人民鲜血中打滚的贪婪残忍的野兽,豺狼成性的人和乌鸦。在另一种情况下,政治特派员决定谁也不再为私人劳动。土地属于耕地者。这是个原则,这个原则通过讲解成为阿尔及利亚革命内部的基本法。雇用农业工人的农民被迫把一部分土地交给他们过去的雇员。

于是,发现每公顷的产量增了三倍,且尽管法国人的屡次袭击,飞机轰炸和肥料供应困难,产量依旧如此增长。农民们在收割时能估价和过秤获得的产品,他们想弄明白这个现象。他们

很容易地发现劳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奴役制不允许劳动,劳动意味着自由、责任心和觉悟。

在这些地区我们能顺利地进行这些可资借鉴的试验。我们目睹了革命组织对人的建设,农民们十分清楚地领会了这个原则是想要人们因更加清醒地开始努力而更爱好劳动。人们能使群众明白劳动不是付出力气或运用某些肌肉,而是在运用肌肉和汗水的同时,人们更多地用脑和心去劳动。同样,在这些被解放,但同时被排斥在旧商业流通之外的地区里,人们只得改变从前那单一面向城市和出口的生产。人们为人民和民族解放军部队安排了消费生产。小扁豆的生产增了四倍,并组织烧制木炭。绿色蔬菜和煤炭由北方地区翻过山运往南方,而南方地区则向北方运送肉类。这是民族解放阵线(FLN)决定这种调配的,它设置了交通体系。我们没有技术员,没有来自西方大学校的计划工作者。但在这些被解放地区,每天的定量达到直至当时未有过的数字——3,200 卡路里。人民并不满足于战胜这个考验。他们给自己提出一些理论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地区在解放战争前从不见橘子,却每年向外国出口几千吨的橘子?为什么许多阿尔及利亚人不识葡萄,而几百万串葡萄却饱了欧洲人的口腹?今天人民对属于他们的东西有了十分清楚的概念。阿尔及利亚人民今天知道他们是自己国家的土地和地下资源的专属主。如果有些人不懂得 FLN 激烈地不容对这所有权的任何践踏,不懂得它粗暴地拒绝对那些原则的一切调和,那么必须所有的人记住阿尔及利亚人民今天是个成年的、负责的、自觉的人民。总之,阿尔及利亚人民是个握有产权的人民。

我们之所以举阿尔及利亚为例来阐明我们的意图,丝毫不

是为了赞美我们的人民,完全只是为了指出人民在觉醒中所进行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很明显其他人民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结果。今天人们更加知道在阿尔及利亚,武力的考验不可避免,但其他地区通过政治斗争和党进行的澄清工作,引导其人民达到同样的结果。在阿尔及利亚,我们了解群众能够解决他们碰到的问题。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经验证明重要的不是三百个人的设想和决定,但却是全体人民明白和决定,尽管用了双倍和三倍的时间。事实上,用来作解释的时间,用来使劳动者为人们所理解而“损失”的时间将在实行中得到弥补。人们应该知道他们上哪儿和为什么他们去那儿。政治家不应该不知道只要人民的觉悟是初始的、肤浅的、朦胧的,前途将依旧堵塞。我们——非洲的政治家们,应该对我们人民的状况有清楚的看法。但这种明了应该完全是辩证的。全体人民的觉醒不是一下子就变成的,他们在国家的建设事业中的理性参加将成线状,首先因为交通道路和传送手段不发达,然后因为时间性必然不再是瞬间的,或是下次收成的时间性,而是变成世界的时间性,最后因为被殖民统治深深扎在脑中的气馁总是浮现出来。但我们不应不知对于较弱的反抗症结——国家物质和精神控制的继承——的胜利是任何一个政府也不能躲过的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我们来举殖民制度下劳动的例子。殖民者不断地断言当地人迟钝缓慢。今天,在某些独立的国家里,人们听到一些干部又重弹这个老调。实际上,殖民者要奴隶热情干活。殖民者想通过一种最崇高的奴役的骗局使奴隶们相信他们所耕的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为之损害健康的矿是他们自己的产业。殖民者奇怪地忘记他靠奴隶的死去活来而发的财。实际上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说:“累垮吧,但让我发财。”今天,我们应该行事不一样。我们不应对人民说:“累垮吧,但让国家富起来。”如果我们

想增加国家收入,减少某些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产品进口,增加农业生产并反对文盲,我们必须作解释工作。必须让农民明白下这赌注的重要性。公共的事情应该是公众的事情。因此必须增加基层支部。的确,人们经常满足于设立一些领导层国家机构,且总是设在首都:妇女联盟、青年联盟、工会,等等。但如果人们想起要设在首都的办公室后面寻找,如果人们经过该放档案的后厅,则被空无一人、子虚乌有、虚张声势吓一跳。必须有个基层,有些确切提供内容和活力的支部。群众应该能聚会、讨论、提建议、接受教育。公民们应该有说话、表达自己、创新的可能。支部会、委员会会议是个礼拜仪式的行为。这是个给人听取和发言的机会。每次会上,脑子增加了它联想渠道,眼睛发现了越来越开化的全貌。

在不发达国家里,占很大比例的青年向政府提出一些特殊的问题,开始讨论明白这些问题十分重要。无所事事的且经常是目不识丁的城市青年尝试各种各样的腐化堕落。对于不发达国家的青年经常提供工业化国家的娱乐。的确,通常一个社会的成员的精神和物质水平同该社会给自己的娱乐消遣之间有同质性。然而,在不发达国家里,青年拥有为资本主义国家青年所设想的娱乐:侦探小说、吃角子机(老虎机)、淫秽照片、描写色情的文学、十六岁以下禁看的影片,以及尤其是酒……在西方,家境、就学、劳动群众相对高的生活水平,充当这些娱乐流毒的相对防御物。但在一个非洲国家里,精神上的发展是不平等的,两个世界激烈碰撞大大动摇了老传统并使得认识世界崩溃了,非洲青年的感情现象和敏感性受西方文化中包含的各种不同对神经的刺激所支配。他们的家庭经常表现出没有能力以稳固和一致去对抗这些强暴行为。

在这个领域中,政府应该充当过滤器和稳定剂。不发达国家的青年工作委员们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以发达国家的青年工作委员们的方式来设想自己的作用。他们谈论增强内心世界,身体茁壮成长,便于显示体育运动的优点。我们认为他们应该避免这种观念。一个不发达国家的青年经常是游手好闲的。必须首先使他们有事干。所以青年工作委员应当在制度上附属于劳动部。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劳动部是必要的,它和不发达国家的另一必要部门——规划部——紧密合作地发挥作用。非洲青年不应被引向体育场,而是被引向田间和学校。体育场不是设在城里的这种展示场所,而是人们开垦、耕作和为国家作贡献的大地内某个空间。资本主义的体育观念与不发达国家该有的体育观念有天壤之别。非洲政治家不应操心于培养运动员,而应操心于培养有觉悟的人,即使他们是体育运动员。如果体育没有归并在国家生活中,即国家的建设中,如果人们树立国家运动员而不是有觉悟的人,那么很快就会眼看着体育被职业性和商业化腐蚀。体育不应是城市资产阶级给自己提供的一种娱乐和消遣。最大的任务是每时每刻了解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应对特殊的事物感兴趣,寻找英雄——领袖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应当激发人民,开阔人民的脑子,充实他们,对他们加以区别,使他们有人情味。

我们再谈谈这个萦绕脑际的念头,我们想看到全体非洲政治家分担这个顽念,即必须使人民的努力熠熠生辉,使劳动光彩夺目,使它从其历史的昏暗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不发达国家的负责人,就是知道归根结蒂一切取决于教育群众,取决于提高思想,取决于人们太快地称为政治化的东西。

的确,人们经常以一种罪恶的轻率认为使群众政治化,就是不时地给他们举行一次大的政治演说。人们以为首领或一个领导只需以教训人的口吻讲讲现实的大事就足以尽到了使群众政治化的不可推卸的职责。然而,使人政治化是开放思想、启发思想、产生才智。就是如塞泽尔所说的“创造精神”。使群众政治化,不是,不可能是做一个政治演讲。而是狂热地发奋使群众懂得一切取决于他们;如果我们停滞,那是他们的错,如果我们前进,那也是他们的错,没有造物主,没有负责一切的杰出人物,而造物主就是人民,魔法般的手归根结蒂就是人民的双手。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了实现这些事,为了使这些事真正地具体化,必须极端地分散布局。从上到下和自下到上的循环应该是个严格的原则,不是出于形式主义的考虑,完全只是因为遵守这个原则是解放的保证。使最高领导层干劲十足并辩证地使它能实现新的跃进的那些力量是从基层上来的。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再一次很快地懂得了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一个最高领导层的成员有可能利用随便哪个解放的使命。在阿尔及利亚是基层在斗争,且这个基层不是不知道如果没有它每天英勇和艰巨的斗争,最高领导层是坚持不了的。同样,基层知道如果没有一个上层和领导,那么基层就会支离破碎和处于无政府状态。上层只有在人民进行斗争时才获得它的重要性和稳固性。严格地说,是人民自由地给自己提供一个最高领导层,而不是领导层容忍人民。

群众应该知道政府和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一个自尊的——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人民是一个决不忘这些明显的事情的人民。在殖民占领时期,人们对人民说他们必须为尊严的胜利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非洲人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的尊严并非只有占领者否认。非洲人民很快明白了在尊严和主权之

间绝对相等。事实上,一个自尊和自由的人民是个当家作主的人民。一个自尊的人民是个负责的人民。想要指出非洲人民是幼稚和软弱的,这毫无用处。一个政府和一个党有其应有的人民。而在事情必将发生的日子,人民有其应有的政府。

某些地区的具体经验证实了这些观点。在开会的时候,有时会有一些战士显示出以这种惯用语“只有将……”来解决困难问题。在这一唯意志论的节略中,自发性、简单化的诸说混合、非理智的设想危险地达到顶点,它经常获得胜利。每当遇到一位战士这样放弃责任时,光对他说他错了是不够的。必须让他负起责任来,要求他把道理说到底并让他触及“只有将”这句话的性质,这种性质经常是难以接受的、不通人情的,归根结蒂是毫无效果的。领导和战士,谁也不掌握真理。在一些地方的处境中追求真理是件集体的事。有些人经验较丰富,较快地确立他们的思想,能在过去中建立较多的精神联系。但他们应该避免脱离人民,因为被采纳的决定成功与否取决于全体人民的协调和自觉的参与。谁也不能及时脱身。大家都会被推倒或受折磨,而且在国家不独立的背景下,大家都会挨饿和分担萧条。集体战斗必须以基层的集体责任和最高领导层集体施行的责任为条件。对,必须把大家都牵连到为共同解放而战斗中去。没有不染指者,没有无辜者,没有旁观者。我们大家都正在我们土地的沼泽中和我们那可怕的空空如也的头脑中弄脏双手。一切旁观者都是胆小鬼或叛徒。

一个领导的责任是有群众和他在一起。然而这种附着力必须以对要完成的使命的觉悟、理解;总之甚至是初步的理智化为条件。不应迷惑人民,把人民溶在激动和模糊不清之中。只有

那些由人民中涌现出的革命杰出人物领导的不发达国家,今天能使群众得以走上历史舞台。但是再一次,我们必须强烈和明确地反对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和享有特权的等级。使群众具有政治性,就是把现在的全国还给每一个公民。就是把国家的经验变成每个公民的经验。正如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总统在其非洲作家第二次大会的咨文中如此恰到好处地联想到的那样:“在思想领域内,人可以自以为是世界的大脑,但在一切干预影响肉体和精神存在的具体生活方面,世界始终是人的大脑,因为能力和能思维的单位的总计、发展和改进的积极力量就是处于这个水平上,能量的融合和人的智力价值的最终总和就是在这个水平上。”个人的经验因为是国家的,是国家存在的一个环节,而不再是个人的、局限的、狭窄的,而是能通达国家和世界的实际情况。正如在斗争阶段,每个战士把国家命运握在手中,在国家建设阶段,每个公民应该在其每天的具体活动中继续参与国家的协调一致,继续体现国家那总是辩证的真理,继续希望整个人类在此时此地获胜。如果筑桥不一定丰富那些筑桥人的认识,那就不必建桥,公民继续游泳或乘渡过河。桥不该是从天而降,不该是由一个意外出现的救星规定在社会全景图上的,相反它应该是出自公民们的肌肉和脑子。当然,可能必须有工程师和建筑师,有时候他们完全是外国人,但党的地方负责人应该到场,为的是让技术钻进公民那空白一片的脑中,为的是修改、设计和承担桥的细节和整体。必须让公民把桥归于自己。只有到那时才一切都可能做到。

一个宣称自己是民族的政府应该承担国家的协调一致,而在不发达国家中,青年代表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必须提高青年的觉悟,启发他们。我们在国家军队中重又见到的将是这些青年。如果解释工作做到青年能明白,如果青年民族联盟完成其

把青年归并到国家中的任务,那么,那些把拉美共和国的前途作抵押,甚至加以损害的错误就可能避免。军队决不是一个战争学校,而是个公民责任感学校、政治学校。一个成年国家的士兵不是雇工,而是以武器为手段保卫国家的公民。所以,重要的是士兵知道自己是为国家服务而不是替一个不管多么有魅力的军官当差。应当利用平民和军人为国家服务来提高民族觉悟的水平,使国家非部族化、使之统一。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尽可能快地努力调动起男男女女。不发达国家应该防止使那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永久延续下去。妇女们不是在宪法的条款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工厂、学校、集会中将得到与男子同样的地位。如果说西方国家让军人们居住在兵营里,这并不意味着始终是最好的方式。并非必须使新兵们军事化。服役可以是非军人的或军人的,但无论如何最好每个强健的公民能够随时归入一个战斗单位并保卫国家和社会的财产。

集体利益的大工程应该能由新兵们来执行。这是个活跃滞后地区,使最多的公民知道国家现实状况的极妙办法。必须避免把军队变成一个自治的部队,它早晚会由于游手好闲和没有任务而开始“搞政治”和威胁政权。那些沙龙将军,仗着出入权力机构的候见厅,梦想军事政变。惟一避免这种事的办法是使军队政治化,也就是使军队民族化。增加民兵同样地迫在眉睫。在战争情况下,是全国进行战斗或工作。不应有职业兵,而职业军官的数字应削减到最小。首先因为军官们经常是从大学范围内选择的,他们在别处可能更加有用得多:对于国家一个工程师比一个军官尤为经常必不可少。其次因为必须避免等级思想的形成。我们在前面所述中看到民族主义这一美妙的歌声激起群众反对压迫者,它在独立后不久就土崩瓦解了。民族主义不是

个政治学说,不是个纲领。如果真正想国家避免倒退,避免这些停顿、这些缺点,那么应该迅速从民族觉醒过渡到政治和社会觉悟。民族只存在于一个由革命领导起草和由群众清楚和热情地修改的纲领中。应该经常把民族的努力置于不发达国家的总范围中。在男男女女的头脑和肌肉中应该存在饥饿和黑暗的战线、贫困和初步觉醒的战线。群众工作和战胜灾难的希望应该与所有不发达国家的相通,这些灾难几个世纪来把群众排除在人类思想史之外。第三世界人民感兴趣的新闻不是关于博杜安(Baudouin)国王结婚或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丑闻这类新闻。我们想知道的是阿根廷人或缅甸人在扫盲斗争方面的经验或领导们的专政趋势。这是加强我们,教育我们和使我们的效果倍增的因素。正如人们所见,一个真正想在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解放人民的政府,必须有个纲领。事实上,必须有一个对人的观念,一个对人类前途的观念。这就是说任何蛊惑人心的那一套,任何与从前占领者的合谋,都代替不了纲领。人民起初头脑不清,不久就越来越清醒,竭力要求这个纲领。非洲人民,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同人们惯常认为的相反,很快树立起政治觉悟和社会觉悟。可能严重的是他们往往在民族阶段之前达到了这种社会觉悟。因此,可以发现在不发达国家里,对社会公正的强烈要求恰恰同经常是原始的部族制结合在一起。不发达的人民有挨饿者的举止行为。这意味着在非洲吃喝玩乐的人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们想说他们的权力不能无限地延续。一个给予群众惟一的民族主义食粮的资产阶级不履行它的使命并必然陷入一系列的不幸遭遇。如果不对民族主义加以阐明、丰富和深入,如果它不很快地转变成政治觉悟和社会觉悟,转变成人道主义,则会引向一条死胡同。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把民族的觉悟禁锢在使之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中。只有男男女女大量参加一些有

教养和有成果的任务，才赋予觉悟以内容和密度。那时旗帜和政府大厅不再是民族的象征。民族离开这些灯火辉煌和矫揉造作的地方，逃到农村去，在那儿获得生命和动力。表示民族生气勃勃的就是全体人民自觉行动起来。就是男女协调一致的和高明的训练。集体构造一个命运，就是假定一种适应于历史的责任。不然的话，就是无政府状态、镇压、突然出现部落化的党派、联邦制，等等。民族政府如果想是民族的，则应该由人民来管理和为了人民而管理，为贫苦人而管理和由贫苦人来管理。任何一个领导人，不管他有什么才能，不能替代人民的意愿，而民族的政府应该在操心国际威信之前，把尊严归还给每个公民，充实头脑，使眼里充满有人情味的事，显示出一个人道的全貌，因为构成这一面貌的是些有觉悟的和独立自主的人。

四

关于民族文化

要参加非洲革命，谱写一首革命歌曲是不够的，必须同人民一起进行这场革命。和人民在一起，歌曲就会独自动地来。

要有一个真正的行动，必须自己是非洲及其思想的一个活跃分子，是为了非洲的解放、进步和幸福而完全被动员起来的这个人民力量的一分子。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在这场惟一的战斗中，他们是自己应募和完全受动员同人民一起加入非洲和受苦人类的伟大斗争的。

塞古·杜尔^①

每一代人该在相对的不透明中发现自己的使命，完成它或背叛它。在不发达国家中，前辈人曾既抵制殖民主义不断进行的腐蚀，又为当前斗争的成熟作准备。既然我们现在是处于战斗中心，我们必须改掉那模仿我们父辈们的行动的习惯，或对他们的默不作声或消极佯装不理解的习惯。他们曾用他们当时所具备的武器尽可能地战斗，尽管他们的斗争没有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反响。应当从根本不同的国际形势来理解个中原因，而不

^① 《作为一种文化的代表的政治领袖》，黑人作家和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罗马，1959年。

要从缺乏英雄气概的方面去领会。必须不止一个被殖民者说“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必须不止一个部落造反，必须不止一个农民被制伏，不止一个示威活动被镇压，我们今天才能怀着这种对胜利的坚信。

我们决定毁掉殖民主义的前途，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安排所有的造反、所有不顾一切的行动、所有失败的或浴血的企图。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分析这个我们认为是根本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合法要求。应该承认调动人民的政党不太关心这个合法性问题。那些政党从实际的现实出发，并且是以这个现实为名，是以这个压在他们鼓励行动的男女目前和未来头上的现实为名。政党完全可以用激动人心的词句谈论民族，但它所注意的是，听它讲话的人民懂得如果他们仅仅渴望生存必须参加战斗。

今天人们知道在民族斗争的第一个阶段，殖民主义试图通过搞经济主义来平息民族要求。从一开始要求起，殖民主义假装理解，装模作样虚心地承认领地严重不发达，需要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努力。

其实，有时采取某些惊人措施，到处有一些停工的工地开工，这使民族觉悟的凝聚延迟若干年。但早晚殖民主义发现它不可能实现一个满足被殖民群众的渴望的经济社会的改革计划。甚至在填饱肚子方面，殖民主义证明其天生的无能。殖民主义国家很快发觉想在纯属经济的领域中解除民族政党的武装等于在殖民地干它不愿在自己的领土上所干的事。而如果说

今天到处盛行卡蒂埃^①的学说,这并非偶然。

法国坚持博得一些它该养活的人的好感,而那么多的法国人却生活窘困,卡蒂埃面对这种状况苦涩地不抱幻想,这说明殖民主义是不可能变成大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的规划的。所以再一次不应把时间浪费在重复宁可挨饿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上。相反应该深信殖民主义不能给被殖民人民找得可以使它自己忘却操心尊严的物质条件。一旦殖民主义懂得了它的社会改革策略将把自己带向何方时,它就恢复自己的旧反应,加强警察编制力量,急派部队并建立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利益和自己心理的恐怖制度。

在政治党派内部,往往是在政党的侧面,出现一些被殖民的文化人。这些人认为要求民族的文化和确认这个文化的存在代表了一个享有特殊利益的战场。在政治家们把他们的活动记载在现实中时,文化人却处于历史当中。面对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决定挑衅地应对有关前殖民时代野蛮性的殖民主义理论,殖民主义很少作出反应。尤其因为被殖民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展的思想受宗主国的专家们广泛地公开主张,殖民主义对此更少地作出反应。的确,看到好几十年来许多欧洲的探求者在总体上使非洲文明、墨西哥或秘鲁文明重获尊重,这很平凡。人们可能对于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痴迷地捍卫民族文化的存在感到惊讶。但那些谴责这种极端热情的人奇怪地忘记他们的心理现象和自我舒适地隐藏在法国或德国文化背后,这个文化经受了考验且无人加以否认。

① Cartier, 1814—1873, 加拿大政治家, 他为建立联邦而努力, 1867 年宣布联邦成立。——译注

我承认在生活方面,存在过一种阿兹特克人的文化,这件事对于今天墨西哥农民的饮食制度并不改变多少。我承认所有的证明可能是存在奇妙的桑海人文明的资料,这并不改变今天的桑海人营养不良、目不识丁、不着天地、头脑空空、两眼一抹黑的事实。但人们一再说对于殖民时代以内的民族文化的这种热情探索,使得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合理合法地共同担忧与西方文化相比,民族文化在衰退,他们很可能陷入西方文化的泥潭。这些人胸中盛怒,头脑发狂,发奋重又和他们人民那最古老、最前殖民的活力取得联系,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正不知所措,因此他们的人民认为他们完蛋了。

我们更进一步说,可能维持或至少倾向于这种热衷和疯狂是因为私下希望在这现今的贫困、瞧不起自己、这种放弃和否认之外,发现一个十分美好和非常辉煌的时代,这个时代使我们既面对我们自己也面对他人恢复我们的声誉。我说我决定进一步说。可能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爱上他们被压迫人民的现在经历,不能赞叹他们现今的野蛮史,他们无意识地走得更远了,更往下走下坡路,而且他们毫不怀疑,特别兴高采烈地发现过去毫不羞愧,而是自尊的、光荣和庄严的。追还过去的民族文化不仅仅是使未来的民族文化重获尊重,使它合法。在心理情感方面,这种追还引起被殖民者的根本的重大转变。人们可能没有充分指出殖民主义并不满足于把它的法律强加于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殖民主义不满足于把人民紧裹在网中,清除被殖民者脑中的一切形式和内容。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种逻辑的倒错,趋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歪曲它、毁坏它、消灭它。这一贬低殖民化前历史的举动今天具有其辩证的意义。

当人们思考那些为实现殖民时代的如此有特点的文化异化而展开的努力时,人们明白一切都不是偶然为之,殖民统治追求的全部结果就是劝服殖民主义要从无知中拉出来的土著们。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结果是把殖民者的离开对于土著们意味着回到野蛮、堕落、兽性化这一思想插入土著们的头脑里。在无意识方面,殖民主义则并不力图让土著感觉到它是个保护孩子防备周围敌意的温柔和蔼的母亲,而是扮成一个不断阻止一个罪大恶极的孩子自杀成功,阻止他发泄凶恶本能的母亲。殖民母亲保护孩子防备他自己,防备他的自我,防备他的生理学、他的生物学、他那本体论的不幸。

在这种形势下,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并不是个奢侈,而是严密纲领的要求。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将其战斗放在合法性方面,他想带来证明,甘于为了更好地展示其身体的历史而赤身露体,他被迫投入他人民的腹中。

这种投入不是特定地民族的。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决定向殖民主义的谎言开战,将在全洲范围内开战。过去被更加看重。为了光辉灿烂地发扬而从过去挖掘出来的文化不是他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义并未对自己的努力有细微差别,不停地断言黑人是未开化的人,他认为黑人既不是安哥拉人,也不是尼日利亚人。它谈论黑人。对于殖民主义,这片广袤的大陆是个野蛮人的巢穴,是个爱迷信和狂热崇拜骚扰的地区,这地方注定受到蔑视,充满上帝的诅咒,是个吃人肉的地区,黑人地区。殖民主义谴责整个洲。殖民主义断言前殖民时期所特有的人类的无知涉及整个非洲大陆。被殖民者为重获尊重和避免殖民者的中伤而所作的努力逻辑上处于同殖民主义一样的前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方面走得太远了,他们开始带头宣布一种文化

的存在决不使他们代表安哥拉或达荷美。被确认的文化是非洲的文化。黑人只是在他们受白人统治之后才这样黑的，当他们决定显示文化，为文化做事时，他们发觉历史给他们强制性地规定一个明确的地盘，历史给他们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他们必须显示出一种黑色的文化。

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思想种族主义化，或至少思想方法种族主义化的大负责人是欧洲人，并继续是欧洲人，他们不停地用白人文化来对比其他的缺乏文化。殖民主义并未认为应该浪费时间去逐个地否认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此被殖民者的反应一上来就是全洲的。在非洲，最近二十年来被殖民者的文化不是民族文化，而是黑人文化。例如黑种人的气质或性格概念是这种白人侮辱人类的对照，这对照即使不合逻辑，也是十分动人的。这种激烈反抗白人蔑视的黑人性格在某些领域显示出只有它能够取消禁令和咒骂。因为几内亚或肯尼亚的知识分子首先处于同全面排斥，同统治者的诸说混合的蔑视对照状态，他们的反应是自我欣赏和自我歌颂。在无条件地肯定欧洲文化之后，是无条件地肯定非洲文化。大体上，黑人性格的颂扬者们把旧欧洲同年轻的非洲相对比，以令人厌倦的说理跟诗歌相对照，用压迫人的逻辑和跺脚的本性相比照，一方面是呆板、客套、礼仪、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朴、活跃、自由。虽然不是华丽的。可也是不负责任的。

黑人性格的颂扬者们毫不迟疑地超越洲的界限。从美洲，一些黑人的嗓门重又唱起这种赞歌，范围越来越扩大。“黑人世界”将诞生，加纳的布西亚，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苏丹的昂帕泰·巴，芝加哥的圣克莱尔·德雷克将毫不犹豫地确认存在

着共同的联系，同一力量战线。

这里同样可以提出阿拉伯世界的例子。我们知道大部分的阿拉伯领土曾遭到殖民统治。殖民主义曾在这些地区使劲地在土著的头脑中扎下这种思想：他们殖民化前的历史是野蛮统治的历史。民族解放斗争引起代表伊斯兰觉醒的文化现象。现代阿拉伯作家热衷于使他们的人民想起阿拉伯历史的伟大篇章，这是对占领者谎言的回答。阿拉伯文学中那些有名人物的姓氏被编成目录，阿拉伯文明的往事这面旗帜同非洲文明的往昔一样，曾被狂热地挥舞过。

今天，在政治方面，阿拉伯联盟落实这个再采用往日的遗产和使之处于最高峰的意愿。今天，一些阿拉伯医生和诗人穿越边境地互相招呼询问，力求推出一个新的阿拉伯文化，一个新的阿拉伯文明。这些人是以阿拉伯主义的名义聚在一起的，是以阿拉伯主义的名义来努力思考的。然而，在阿拉伯世界里，即使在殖民统治下，民族感情保存了一种在非洲不再见到的生气。因此，人们在阿拉伯联盟里察觉不到这种每个人跟大家自发地相通和一致。相反，每个人反常地试图歌颂自己民族的成就。由于文化现象摆脱了构成非洲世界里文化特点的那种不加区别，阿拉伯人不总是能够对目的让步。文化的实际经验不是民族的，而是阿拉伯的。问题还不是保证一个民族文化，还不是利用民族运动，而是面对统治者给予的全盘否定，接受一种阿拉伯或非洲文化。在非洲方面，如同在阿拉伯方面一样，被殖民地区的文化人的要求是诸说混合的、全洲性的，在阿拉伯人的情况下则是全世界的。

非洲文化人所处的这种历史职责——必须使他们的要求种

族化,更多地谈论非洲文化,少谈民族文化——将把他们引向一条死胡同。让我们举非洲文化协会的情况为例。这个协会是由一些非洲知识分子创办的,他们希望互相认识,交流他们的经验和他们各自的研究。那么这个协会的目的是肯定非洲文化的存在,在确定的民族范围内清查这个文化,显示每个民族文化的内部活力。但同时,这个协会符合另一个要求:站在欧洲文化协会的一边,而欧洲文化协会预示有转变成全球文化协会的危险。因此这个决定的实质是想要带着其所有的武器,带着一个就是从非洲大陆母腹中涌现出的文化出席全球会晤。然而,这个协会很快会显示出它不能承担这些不同任务并局限于一些有暴露癖的表现:向欧洲人指出存在一种非洲文化,反对爱炫耀和自我陶醉的欧洲人,这个协会成员的惯常态度将会是这样的。我们曾指出这种态度是正常的并会从西方文化人宣传的谎言中得到其合法性。但随着黑人性格概念的设想,这个协会和目的之降级变得深化了。非洲协会将变成黑人世界的文化协会并被引向包括散居在异国的黑人,即那一千多万散居在美洲的黑人。

在美国、中美洲或拉丁美洲的黑人的确需要与一个文化样板挂钩。对于他们,美洲的白人的行事并不同那些统治非洲人的白人有所区别。我们见到白人们习惯于对所有的黑人不分好歹地混为一谈。在 1956 年于巴黎召开的非洲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美国黑人本能地想到了与他们的非洲同种人同样方面的问题。非洲文化人在谈到非洲文明时给予从前的奴隶一个合理的身分。但渐渐地,美国黑人意识到他们存在的问题与非洲黑人所较量的问题不相吻合。芝加哥的黑人只是在这一确切范围内才跟尼日利亚黑人和坦桑尼亚黑人相似:与白人相比,他们的特点都是黑人。但初步对比过后,主观性一平静下来,美国黑人察觉客观的问题根本不相似。美国黑人和白人试

图使种族歧视后退的自由之车只在他们的原则和目的中才与安哥拉人民反对可恶的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保持很少的关系。因此在非洲文化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美国黑人决定创立一个美国黑人文化人的协会。

因此黑种人性格在分析人的史实性化的现象中遇到其第一个局限。黑人文化，非洲黑人文化被分成块，因为打算体现这文化的人们意识到一切文化首先是民族的，使理查德·赖德(Richard Wright)或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保持警惕的问题与莱奥波德·桑戈尔或乔莫·肯尼亚塔可能面对的问题迥然不同。同样，某些曾经唱起恢复阿拉伯那支动人歌曲的阿拉伯国家该觉察它们的地理位置；它们地区的经济独立比想重温的往日更强。因此，今天我们觉得阿拉伯国家有机地与地中海的文化团体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国家屈从于现代的压力和一些新的商业来往，而在阿拉伯辉煌期间的统治网消失了。但尤其有这样的事实：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达到这种互相不一致和陌生的程度，以至于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本身显得毫无意义。

因此在被殖民国家里有时提出的文化问题有可能是非常模棱两可。殖民主义所宣布的黑人的无文化，阿拉伯人那与生俱来的野蛮，必然合乎逻辑地导向赞扬那些不再是民族的，而是全洲的和特别种族化的文化现象。在非洲，文化人的活动是一种非洲黑人的或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活动。它不是特定的民族活动。文化越来越脱离现实。它以激情昂扬地白炽化作庇护并艰难地给自己开辟了一些具体的道路，可是只有这些道路能使它获得丰富、一致和稠密的特性。

如果说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从事的事情从历史观点受到限制,那么无论如何它在很大范围内对支持政治家的活动并使之合法化作出贡献。并且千真万确,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活动有时具有宗教信仰的观点。但如果我们想要好好地分析这个态度,就发现这种态度表达了被殖民者意识到他冒着割断维系人民的最后那几根绳索的危险。这种宣称存在民族文化的信仰实际上是急切而毫无希望地向随便什么东西倒退。被殖民者为了保证自己的解放,为了躲过白人文化的霸权,感到必须回到不知道的根,必须无论如何,消失在这个野蛮的人民中。因为被殖民者觉得自己变得神经错乱了,就是说处于充满可能无法克服的矛盾的境地,所以他从有可能陷进去的泥沼中自拔出来,并不顾一切地接受这处境,他决定承担这种处境,他认可这处境。被殖民者发现自己应该对一切和对大家负责。他不仅仅变成保卫者,他同意与其他人在一起,并且从今往后他能允许自己嘲笑他过去的懦弱。

然而,这种艰难而痛苦的自拔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会有极其严重的心灵感情残缺。这是些没有海岸、没有边界、没有肤色的人,一些无国籍的人,无根之人,一些天使。同样,不足为怪地听到某些被殖民者声明:“作为塞内加尔人和法国人……作为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我讲话。”阿拉伯和法国知识分子,尼日利亚和英国知识分子如果真想接受两个国籍,两个决定,在遇到必要时,他选择否定其中一个决定。由于人民经常不想或不能选择,这些知识分子收罗所有影响过他们的历史决定,并彻底地站在一个“普遍的观点”上。

因为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渴望投入西方文化。被殖民的知识

分子像那些被收养的孩子,只是在他们的精神中凝结成一个使人安心的最小核心时才停止探究他们的家庭环境,他试图把欧洲文化变成他的文化。他并不满足于知道拉伯雷或狄德罗,莎士比亚或埃德加·波,他将全神贯注直至这些人物最极端地共谋。

“夫人并不孤单
 她有个丈夫
 一个很得体的丈夫
 他列举拉辛和高乃伊
 伏尔泰和卢梭
 雨果老头和青年缪塞
 纪德和瓦莱里
 还有那么多的他人^①。”

但在民族主义的党派以民族独立的名义动员人民时,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有时可能一脚踢掉这些获得的东西,他突然觉得这些东西束缚人。然而,宣布抛弃比真正抛弃更方便容易。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文化这借以传达感情的东西,渗入西方文明,达到同欧洲文明相结合,就是说达到换体,他就会发觉自己由于想别出心裁而接受的文化模子几乎不能给他提供能与占领者的文明那众多有魅力的杰出人物形象相比的形象。当然,历史可能插曲般地使非洲过去的某些时期被看重,况且这历史是由西方人并为西方人写的。但知识分子站在他国家现在的面前,清醒地、“客观地”观察那他想使之成为自己的大陆的现实,他被那空

^① 勒内·德佩斯特尔(René Depestre),《面对黑夜》。

白、粗野、野蛮吓坏了。然而,他觉得自己必须走出这个白人文化,必须去别处,去随便什么地方寻找,而由于找不到一个与统治者所展示的辉煌的全景图相称的文化食粮,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经常要退回到激情的观点并发挥一个由敏感、神经质、特殊的敏感性所控制的心理。这个撤退行动首先来自他内部的机制和他面貌中的预期理由,它尤其使人想起一种反应、一种肌肉收缩。

这样,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风格足以说明缘由,他们决定表达意识正在解放的这一阶段。这是受抵触的、非常形象化的风格,因为形象是能使无意识的能量分布到周围草原的吊桥。这是刚劲有力的文笔,因调和而生气勃勃,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喷发着生命。这风格也是多彩的、黝黑的、充满阳光和强烈的。这种风格在它那时代使西方人大为惊讶,它丝毫不像人们想说的那样种族特点,但首先表达了短兵相接,显示出这个人受伤害、真正地鲜血淋淋、要从他那已含有腐败萌芽的存在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这是一场痛苦和快速的斗争,在这斗争中肌肉必然地代替观念。

如果说在诗歌方面这一活动达到不平常的高度,那么在生存方面,知识分子经常走向死胡同。当知识分子同其人民一起达到水乳交融极点时,不管这人民过去是怎样和现在是什么样,他决定重新找得日常性的道路,他从其冒险中只带回极其贫乏的用语。他优先那些习俗、传统、显露的方式,而他那被迫的苦苦寻觅,只是展现一种对异国情调的追求。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歌唱着对当地概貌的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确定。非洲黑人穿的长袍神圣化了,巴黎或意大利皮鞋为了伊斯兰国家的人穿的拖鞋

的利益而被抛弃了。统治者的语言突然说不利落了。重新获得其人民,就是在这个时期有时想成为黑人,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的黑人,而是一个真正的黑人,一条黑人的狗,这就是白人所想要的。重获其人民,就是成为阿拉伯人,尽可能地变成当地人,最认不出来的人,就是割断曾任其长大的翅膀。

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决定清点在殖民世界汲取的坏方式并赶紧回忆起人民——这个人们决定占有其一切真理的人民——的好方式。安顿在领土上的殖民主义者行列中引发的丑事,加强了被殖民者的决心。当那些曾品味战胜这些已同化者的殖民主义者意识到这些认为被解救的人开始在黑人群群中溶解,整个制度动摇了。每个被争取过来的被殖民者,每个效忠的被殖民者,当他决定消失时,不仅对于殖民行动是个失败,而且还意味着完成的工作无效和缺乏深度。每个被殖民者重新越界是对方法和制度的根本谴责,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其引起的丑事中找得辞职的理由和鼓励坚持下去。

如果我们想透过被殖民作家们的作品重新找得构成这一发展特点的不同阶段,我们会看到眼前显示出分成三个时期的全貌。在第一个阶段,被殖民的知识分子证明他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的作品一点一点地符合宗主国中相对应的人的作品。受的影响是欧洲的,且能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作品归属于宗主国文学的一个确定的流派。这是全部吸收的时期。在这被殖民的文化中,会发现一些巴那斯派者、象征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

在第二个时期,被殖民者动摇了并决定回忆。这个时期的创作大致上符合我们刚描述的重新投入。但由于被殖民者并不加入其人民中,由于他同其人民保持外部联系,他只限于回忆。

一些童年时代的旧插曲重又从他的记忆深处勾起,一些古老传说参照一种借来的美学和在他无意下发现的世界观加以重新诠释。有时候这种预先战斗文学受幽默和寓意控制。这是个焦虑不安和苦恼的时期,是一段死气沉沉的经历,也是段恶心的经历。人们互相唾弃,但已经开始暗笑。

最后在第三阶段,所谓战斗时期,被殖民者在试图消失于人民中,同人民一起消失之后,相反地即将震撼人民。他不是促使人民更加迟钝,而是转变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文学、革命文学、民族文学。在这个阶段,此前从未想到搞文学作品的大批的男人和女人,现在既然处于特殊的环境,在监狱里,在游击队里,或是即将被处决,他们感到需要说说自己的民族,组成表达人民的句子,成为一个新的行动事实的代言人。

然而,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早晚会发觉不是从文化出发来证明其民族,而是在人民为反对占领军而进行的战斗中显示民族。任何殖民主义都不从其统治的领土所存在的文化中获取其合法性。人们靠在殖民主义眼前展开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化瑰宝永远也不会使殖民主义感到羞愧。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关心搞文化作品的时候,意识不到他正在使用从占领者那儿借来的技术和语言。他满足于给这些工具盖上一个印记硬说自己是民族的,但却奇怪地使人联想到异国情调。被殖民的知识分子通过文化作品回到其人民中来,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像一个外国人。有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运用方言,为了显示他尽可能地接近人民的意愿,但他所表达的思想,他的定见,同他国家里的男女所认识的具体形势是不一致的。知识分子所感兴趣的的文化常常不过是一个地方主义的仓库。由于他希望符合人民,他符合看得见的保护层。然而这保护层只是对一种连续不断更新的隐蔽生活的

一个反映。这一客观态度近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并似乎成为人民的特点，它事实上只是无生气的结果，它已经不为各式各样的不总是结构严密的改写所采纳，它正在更新。文化人不开始追求这种内容，而是听凭自己被这些僵化的片段所迷住，这些片段四平八稳，相反地意味着否定、超越、虚构能力。文化决无习惯的半透明。文化完美地避开一切简单化。它本质上是和习惯相反的，习惯始终是文化的一个损害。希望符合传统或使被丢弃的传统再现，这不仅是反历史的，而且是反人民的。当一个人民支持反对无情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至政治斗争时，传统改变了意义。在这个时期，消极抵抗战术的东西可能受到根本的谴责。在一个处于斗争阶段的不发达国家里，传统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和离心的潮流留下的印痕。所以知识分子经常很有可能不合时宜。进行斗争的人民越来越排斥蛊惑人心的宣传，且如果过于想跟随人民，则显出他只不过是个中庸的机会主义者，甚至是个落后者。

例如在造型艺术方面，不惜一切代价要搞民族作品的被殖民创造者只限于一成不变地复制细部。这些艺术家曾钻研过现代技术并参加了绘画或当代建筑的大流派，他们转过身去，否认外国文化并开始追求民族的真实，重视他们认为是民族艺术的常数的东西。但这些创作者忘记思想形式、精神食粮的供给、现代信息技术、现代语言技巧和现代服装技术辩证地重新组织了人民的头脑，忘记那些在殖民时期如同栅栏一般的常数正遭到彻底更换。

这位想描写民族的真实的创作者一反常态地转向往昔，转向不现实。在其深奥的意向性中所瞄准的是思想的渣滓、外表、死人、被决定性地固定了的知识。然而，想要创造出真正作品的

被殖民知识分子应该知道民族的真实首先就是民族的现实。他必须一直走到知识有预兆沸腾的地方。

在独立以前,被殖民的画家对民族的概貌无动于衷。因此他们优先非形象艺术派,或更经常地专攻静物画。独立后,他关心赶上人民,使他只限于一点一点地表现民族的现实。这涉及一种没有节奏的、安详的、静止的描绘,它展现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有教养的人士面对这十分逼真的真实心醉神迷,但人们有权思忖这个真实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过时了、被否认了、由史诗重新提出来讨论,通过这史诗人民开辟一条朝向历史的道路。

在诗歌方面,我们可以作同样的评价。在掌握押韵诗的阶段之后,爆发出诗情般的达姆达姆鼓的节奏。这是造反的诗歌,但也是分析性的、描述性的诗歌。然而诗人应该懂得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站在武装起来的人民一边理性地不可逆转地投入战斗。我们再一次援引德佩斯特尔的诗:

“夫人并不孤单
她有个丈夫
一个知道一切的丈夫
但坦率地说他什么都不知
因为文化不会是没有特许
特许他的血和肉
把他自己特许他人
一种特许相当于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和一切塞满我们头脑的东西。”

被殖民的诗人一心想搞民族作品,坚持描写他的人民,他未击中目的,因为他在说之前不能作德佩斯特谈到的这种彻底的特许。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十分理解德佩斯特,他提醒“诗浮现主观的强制和客观的选择。诗是决定性的独创才能活动的聚合,是同这种环境首先造就的某人的当代联系的聚合”。^①

对,被殖民诗人的第一职责是明确地确定他创作的人民主题。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的特许才能坚决地前进。我们向另一方获取一切。然而如果这另一方不通过许多迂回曲折使我们顺从他的领导,不通过成千上万的巧计和花招来吸引我们、引诱我们、毒害我们,那他什么也不会给我们的。在许多方面,获得也就是受骗上当。因此试图通过堆积那些声明和否认来摆脱是不够的。重新将人民与这个过去联系起来是不够的,人民不再生活在这个过去,而是要在人民刚刚开始的运动中加入它,从这个运动开始,一切都将被重新考虑。人民停留在一种深奥莫测的不平衡场合,我们就是必须投向这个场合,因为不用怀疑,就是在那儿人民的心灵受到创伤,他的感悟和希望受到启迪。

今天的几内亚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凯塔·福德巴(Keita Fodeba)在他当非洲芭蕾舞团团长时并未用几内亚人民提供给他的事实施计谋。他以革命的前景重新诠释了他国家的所有节奏形象。但他做的更多。在其不太著名的诗作中,人们发现不断注意于明确指出斗争的历史时刻,界定活动展开的场地,规定凝聚人民意愿的思想范围。这就是凯塔·福德巴的一首诗,真正地劝说思考、认清真相、战斗的诗篇。

^① 勒内·夏尔(René Char),《明确的分割》。

非洲的黎明

(吉他乐)

黎明时分。在达姆达姆鼓声中跳了整整半夜的舞的小村庄渐渐地苏醒了。破衣烂衫的牧人们吹着笛子领着牲口群进入山谷。姑娘们头上插着金丝雀羽毛,鱼贯走在去泉水的曲曲弯弯的小路上。在圆锥形草房的院子里,一群孩子齐声哼唱着古兰经的一些诗句。

(吉他乐)

黎明时分。日夜的战斗。但夜里筋疲力尽的战斗无能为力,并慢慢地消亡。但预示白天胜利的几缕成为吉兆的阳光依然姗姗来到天际,腼腆而苍白,最后的星星悄悄地移到云堆下,像盛开的金凤花。

(吉他乐)

黎明时分。在那儿,广袤的平原深处,紫红的边缘处,一个弯着腰的男人影子在开垦:耕者纳芒的影子。他的锄头每锄一下,受惊的鸟儿飞了起来,并振翅飞到平静的尼日尔大河的河岸。他的灰布裤被露水打湿,拍打着边上的草。他汗流浃背,不知疲倦地,始终弯着腰,灵巧地摆弄他的工具;因为必须在下一次下雨之前把他的种子埋下。

(科拉^①乐)

黎明时分。始终是黎明时。小飞虫们在树叶间飞舞,表明白天开始。在平原潮湿的小道上,一个孩子斜背着箭袋,气喘吁吁地朝纳芒跑去。他远远地招呼道:“纳芒哥,村长找你到树下谈话。”

(科拉乐)

耕种者对这么一大早的召集通知感到意外,他放下手中工具,朝乡镇走去,小镇现在沐浴在初升的太阳微光中。老前辈们空旷地庄重,已经就座。在他们旁边,一个身着制服的男人,一个行政管辖区的守卫,面无表情,平静地抽他的烟斗。

(科拉乐)

纳芒坐在一张羊皮上。身兼巫师、乐师和诗人的头领站起身来向会议转达老前辈们的意愿:“白人派了一个行政管辖区的守卫来要一个村里的男子到他们的国家去打仗。要人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指派我们种族最有代表性的青年,以便他在白人的战役中证明始终构成我们曼丁哥人特点的那种勇敢。”

(吉他乐)

纳芒被上级指定。每天晚上姑娘们用和谐的歌声赞扬他威武的

① Cora,非洲的一种乐器。——译注

身材和明显发达的肌肉。他年轻的妻子,温柔的卡迪亚听到这消息惊慌不安,突然停止舂粮食,把臼收拾在谷仓下,一句话也不说,把自己关在小屋内抽噎地哭泣自己的不幸。死神夺去了她第一个丈夫,她不能设想自人们从她那儿抢走纳芒,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

(吉他乐)

第二天,纳芒流泪和埋怨,庄重的达姆达姆战鼓声还是伴随他到村子的小码头,他在那儿上了一条平底驳船,驶往管辖区的首府。夜晚,姑娘们不像平时那样在公共广场上跳舞,而是到纳芒的前厅守夜,她们在那儿围着木柴火堆说话,一直说到早晨。

(吉他乐)

好几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纳芒的消息到达村镇。小卡迪亚为此很不安,于是她求助于邻村的高超拜物教祭司。长老们亲自就这个问题举行了一次简短的秘密交谈,但什么也没戳穿。

(科拉乐)

终于有一天一封纳芒写给卡迪亚的信寄到村里。卡迪亚担心她丈夫的境遇,连夜艰难地步行了几个小时到管辖区的首府,那儿一个译者读了来信。

纳芒在北非,身体健康,他打听收割、水塘的节日、跳舞,闲谈地方的那棵树、村子……等消息。

(巴拉丰琴^①)

这天夜晚,大姐大嫂们对年轻的卡迪亚开恩,让她在她们年龄最长者的院子里列席她们惯常的晚上闲谈。村长因有了消息而高兴,给四周所有的乞丐大吃一顿。

(巴拉丰琴)

又过了好几个月,大家又变得焦虑不安,因为纳芒一再渺无音讯。在卡迪亚打算再去询问拜物教祭司时她收到了第二封信,纳芒去过科西嘉和意大利之后,现在在德国并庆幸自己已获得勋章。

(巴拉丰琴)

有一次是一张简单的明信片,告诉说纳芒被德国人俘虏,这个消息沉重地压在村里人头上。长老们举行会议并决定从今往后准许纳芒跳杜加舞,任何人没作出光辉业绩是不跳这种神圣的秃鹫舞的,这种马林凯人皇帝们的舞蹈,其每一舞步是马里历史的一个阶段。卡迪亚看到她丈夫高升到国家英雄的崇高头衔,这对她是个安慰。

(吉他乐)

时光流逝……两年过去了……纳芒始终在德国。他不再写

① 西非和中非的一种木琴。——译注

信了。

(吉他乐)

忽然有一天,村长收到寄自达喀尔的短信,通知纳芒即将到达。立即响起咚咚的达姆达姆鼓声。大家跳舞唱歌直至黎明。姑娘们作新曲来欢迎他,因为献给他的老歌曲只字未提杜加,这曼丁哥人的著名舞蹈。

(达姆达姆鼓)

但是,一个月后,纳芒的一个好朋友穆萨下士寄给卡迪亚这封悲剧性的信:“黎明时分,我们在滨海佳罗伊。在我们同达喀尔的白人长官大吵时,一颗子弹射中了纳芒。他长眠于塞内加尔的土地下。”

(吉他乐)

的确,这是黎明时分。清晨的阳光刚刚照射海面,把大海翻滚的细浪镀成金黄。在习习微风下,棕榈树仿佛因这场晨战而沮丧,树干略微倾向海洋。乌鸦成群结队地呱呱叫,用这叫声来到周围宣告那血染滨海佳罗伊的黎明的悲剧……在映红的天空中,正好在纳芒的尸体的上面,一只巨鹰在笨拙地翱翔。它似乎在对他说:“纳芒! 你不能跳这个用我的名字称谓的舞蹈。会有别的人来跳的。”

(科拉乐)

我之所以选用这首长诗,那是由于它那不容置疑的教育学的价值。这里,事情十分明白,这是个明确、进步的叙述。理解诗并不仅仅是个知识的步骤,而是个政治的步骤。理解这首诗就是理解人们要演的角色,识别其活动,做好战斗准备。没有一个被殖民者不在这诗中得到包含的信息。纳芒是欧洲战场的英雄,纳芒不断为宗主国确保强大和持久,纳芒在他重又接触国土时,被警察部队枪杀了,这是1945年在塞提夫、法兰西堡、西贡、达喀尔、拉各斯。所有这些为保卫法国的自由或英国文明而战的黑人和阿拉伯人在凯塔·福德巴的这首诗中重新出现。

但凯塔·福德巴看得更远。在被殖民的国家里,殖民主义在战场上利用土著后,利用他们作为老战士来破坏独立运动。在殖民地,老战士协会是最反对民族主义的力量之一。诗人凯塔·福德巴使几内亚共和国的内务部部长作好准备挫败法国殖民主义组织的阴谋。果然,在老战士们的帮助下,法国特务机关打算摧毁几内亚获得不久的独立。

为其人民而写的被殖民者在利用往事时,应该这么做是旨在开辟未来,促使行动和树立希望。但为了保证这希望,使它有密度,必须参加行动,全心全意地投入斗争中去。人们可以谈论一切,但在决定谈论到一个人生活中惟一的一件事情——打开眼界,认清自己、使自己和其人民站起来——时,那就必须紧密协作。

被殖民的文化人的责任不是面对民族文化的责任,而是一种对于全民族的全部责任,总之,其中文化只是一个方面。被殖民的文化人不应该操心选择其战斗的水平和他决定投入战斗的

领域。为民族文化而斗争首先是为民族解放而战，这是个具体的模板，从这模板出发文化变得可能存在。没有一个文化斗争是在人民斗争的旁边发展的。例如，所有这些在阿尔及利亚赤手空拳地同法国殖民主义作战的男女并非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文化不相干。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文化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在监狱里，在断头台面前，在被围困和摧毁的法国军队哨所里——具体化了和顽强了。

因此不应满足于专心于人民的往事，为了面对殖民主义的篡改歪曲贬义的举动，在往事中找得一些一致的因素。应该工作，以和人民同样的节奏进行斗争，以便明确未来，准备幼苗已茁壮成长的土地。民族文化不是那抽象的民众主义认为从中发现了人民的真理的民俗学。它不是沉积下来的一堆纯行为，即越来越同人民的现实没有联系的行为。民族文化是在思想方面描述、论证和歌颂那些人民通过它而组织起来和维持下去的活动。因此在不发达国家里，民族文化应该就属于这些国家进行的解放斗争的中心。那些还在以非洲黑人文化的名义作战，以这个文化的名义反复召开大会的非洲文化人，今天应该觉察到他们的活动其实只是核对一些文件或比较一些石棺。

没有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民族文化的命运共同体，而是有着受到法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文化的共同命运。如果要塞内加尔的民族文化像几内亚的民族文化，两国人民的领导人决定用相似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解放的问题、工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还是不够的。甚至这里不可能有绝对的相同，因为人民的节奏和领导们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有严格相同的文化，想像搞黑人文化，是奇怪地忘记

黑奴正在消失,那些造成黑奴的人正在目睹自己的经济和文化霸权在崩溃^①。不会有黑人文化,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家也不自以为有志去产生黑人共和国。问题是知道这些人打算给他们的人民保留的位置,他们决定建立的社会关系,他们对人类的未来设想。这个才是重要的。其余的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话和故弄玄虚。

1959年,在罗马聚会的非洲文化人不断地谈论统一。但这种文化统一的最伟大颂扬者之一雅克·拉布马纳尼亚拉(Jacques Rabemananjara)今天是马达加斯加政府的部长,并以这个身份同其政府一起在联合国大会上采取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立场。如果拉布忠于自己,本该向这个政府辞职,揭露那些声称体现马达加斯加人民意愿的人。九万个死去的马达加斯加人并没胡委派拉布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愿望。

非洲黑人文化是围绕着人民的斗争增加稠密度的,而不是围绕颂歌、诗歌或民间传说;桑戈尔也是非洲文化协会成员并和我们一起围绕这个非洲文化的问题工作,他没有害怕,也没有命令他的代表团支持法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论文。加入到非洲黑人文化和非洲的文化统一中首先必须无条件支持人民的解放斗争。如果不具体协助这个文化的条件的存在,即非洲大陆的解放,那就不能想要非洲文化灿烂。

① 在达喀尔最近一次的颁奖会上,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莱奥波德·桑戈尔决定在纲领中记下研究黑种人性格的概念。如果说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所表达的关心是历史的范畴,那不能同意。如果相反,这涉及杜撰黑人的意识,这就是无视记载着大部分黑奴的消失的历史。

我认为任何演说、任何关于文化的宣言不会使我们放弃我们的根本任务：解放民族的领土，随时为反对新形势的殖民主义而斗争，坚持拒绝我们之间互相极端赞叹。

民族文化和解放斗争的相互依据

殖民主义的统治因为是全面和简单化的,所以很早就使得被屈服的人民的文化生存惊人地分崩离析。否认民族的现实,占领势力引进的新法律关系,土著们及其习俗被殖民社会拒之于周围,剥夺所有权,系统化地奴化男男女女,这一切使这种文化磨灭有可能发生。

三年前在我们的第一次大会上,我曾经指出,在殖民的形势下,活力被丰富的表态所代替。于是文化空地被一些栅栏、路标划定界限。这都是最基础形的保卫机制,在许多方面与普通的保管本能相似。这个时期受人注意的是压迫者竟至于不再满足于被压迫的民族和文化的客观不存在。为使被殖民者承认他那已变为本能举止的文化是低级的,承认他的民族不现实,且更为甚者,承认他自己的生物结构的无组织能力和不完善的特点,人们尽了一切努力。

面对这种局面,被殖民者的反应不一。在群众保持那最不同于殖民形势的传统完整无缺时,在手工业特色越来越在一成不变的形式主义中凝固时,知识分子疯狂地投入对占领者的文化的狂热获取,同时注意作为贬意描绘其民族文化的特点,或满足于详情地、有系统地、富有激情地但很快又枯燥无味地列举这个文化。

这两种企图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通向难以容忍的矛盾。被殖民者不管是变节者或是实体论者，都是无效力的，因为确切地说，未对殖民的处境进行严格分析。殖民的处境几乎完全中断了民族文化。在殖民统治的范围里没有，不可能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命、文化创新或民族文化的转变。到处，有时候冒出一些大胆的企图：重新开始文化的活力，为主题、形式、调子重新定向。直接地、具体可见地、明显地关心这种双管齐下是无效的。但通过跟踪其后果直至其极限，我们发觉民族意识将变得透明，压迫问题将受到审视，解放斗争将要开始。

在殖民统治下，民族文化是个被否认的文化，且继续受到系统的摧毁。这是个很快被迫转入地下的文化。这个地下的概念直接在占领者的反应中被领会到，占领者把对传统的好意诠释为忠于民族精神、拒绝顺从。这种坚持殖民社会所禁止的文化形式已经是一种民族表示。但这种表示转移到无活力的惯例。没有进攻，没有重新确定关系。有的是对一个越来越狭隘、越来越无生气、越来越空洞的核心感到厌烦。

在一个或两个世纪的剥削之后，产生了民族文化全貌的真正极度消瘦。民族文化变成一种原动习惯、衣着传统、分成块的制度的储备。从中发觉很少的变动。没有真正的创造性，没有激情。人民的贫困、民族压迫和禁止文化是惟一的和同样的事情。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人们发现一个极度僵化的、被沉积的、矿化的文化。民族现实的衰败和民族文化的垂危导致相互依赖关系。所以在解放斗争时注意这关系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否认文化，轻视原动的或激情的民族表示，置一切组织专长于法律保护之外，这些有助于在被殖民者身上产生挑衅行为。

但这些是属于反射型的、识别差的、无政府主义的、无效的行为。殖民剥削、贫困、经常施虐的饥饿越来越把被殖民者逼上公开和有组织的斗争的绝路。渐渐地和不知不觉地，决定性的对抗的必要性变得意味深长，且大部分的人民感到这必要性。此前不存在的紧张在增加。国际上的大事、殖民帝国坍塌了整个一角、殖民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导致并加强了战斗性，促进了民族意识并给它以力量。

存在于殖民现实的所有各阶层的这些新紧张在文化方面引起反响。例如在文学中有相对的生产过剩。虽然当地的作品是统治者的次要复制品，但它有所区别并形成与众不同的意愿。在压迫时期是主要消费者的知识分子变成了生产者。这种文学首先往往局限于诗和悲剧类。后来涉及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杂文。似乎存在一种内部组织，一种表达规则，它那要求富有诗意的表现，随着解放斗争的目标和方法明确而变得罕见。主题彻底地更新了。因此，人们发现这些苦涩和极端的指责，这些充分发展和夸夸其谈的暴力越来越少了，总之，这使占领者放心了。殖民主义者在前一个时期里，曾鼓励这些企图，使之便于存在。的确，占领者把尖锐的揭露、暴露出来的贫困、表示出来的激情看得与导泻作用相似。方便这些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避免夸大，缓和气氛。

但这种局面只能是过渡的。确实，人民中民族意识的发展改变了并明确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文学表现。人民的继续团结一致要求知识分子超越呼声。以抱怨对付指责，然后应付号召。在下一个时期出现口号。凝聚起来的民族意识要同时推翻文学体裁和主题，又全部地创造一个新的读者大众。起初在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为了排除压迫者而创作时，或者是为了迷惑压

迫者,或者是为了通过一些种族或主观主义的范畴揭露压迫者,他渐渐地采用向其人民讨教的习惯。

只有从这个时候起才能谈民族文学。在文学创作方面,恢复和澄清一些典型的民族主义主题。这是就本义而言的战斗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号召全体人民为民族生存而斗争。因为战斗文学告知民族意识,所以它赋予民族意识形式和轮廓,并为民族意识开辟了新的和无限的前景。因为它担负责任,因为它是等待时机的意愿,所以它是战斗文学。

在另一方面,口头文学、故事、叙述、以前被编成目录和冻结的民歌开始转变。讲述一些无生气的插曲的那些人使这些插曲生动活泼起来并加进一些越来越彻底的修改。企图使冲突现实化,使提及的斗争形式、英雄的名字、武器的类型现代化。影射的方法变得越来越常用了。人们对“很久以前”这一用语代之以更加模棱两可的用语:“要报道的事情曾发生在某处,但很可能今天或明天就发生在这里。”在这一点上,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从1952至1953年起,那些讲故事一成不变和使人听得厌烦的讲述者完全搅乱了他们讲述的方法和他们故事的内容。听众们从前稀稀拉拉,现在变得密密麻麻了。史诗随着其类别的典型化,重又出现了。这是个真正重新提高文化价值的景象。殖民主义对这点并未搞错,从1955年起着手系统地逮捕这些讲故事者。

人民接触新的行动引起新的呼吸节奏和被忘却的肌肉紧张,并展开想像。每当讲故事者对他的听众讲述一个插曲,大家就参加了一次真正的祈祷。向听众启示了一种新型的人的存在。当前事物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四分五裂的。讲故事者

重又让自己的想像自由驰骋,革新,作创造发明。甚至这种蜕变中有时会发生一些安排得不好的形象——拦路抢劫的盗匪或丐帮——是重新采用和改造的。在一个被殖民的国家里,必须一步步地注意在民歌和民间史诗般的故事中萌发的想像和创造。讲故事者以接连不断的近似来符合人民的期盼,并表面上孤军奋战,但实际上因受到听众支持而在追求新典型、民族典型的道路上行走。喜剧和闹剧消失了或者失去了它们的吸引力。至于戏剧化,它不再处于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的水平。由于失去其失望和反抗的特点,它变成人民共同的份额,它变成正在酝酿或已在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

在手工艺方面,一成不变的式样犹如受到惊吓,逐渐地紧张起来。例如木雕活儿,从前成千上万地复制某些脸部表情或姿势有所不同了。缺乏表情或难以忍受的面具生动起来了,手臂倾向于脱离身子和稍微可活动了。两个、三个、五个人物的组合出现了。由于涌现出一大批的业余爱好者或不同意见者,这就要求传统的流派进行创新。文化生活的这一领域中的这种新的活力经常不为人察觉。然而它对民族斗争的贡献是最重要的。艺术家通过使面部表情和身体生动,通过以固定在同一底座上的群像作为主题,鼓励组织运动。

如果研究陶器或瓷器制造领域中民族意识觉醒的反响,可以指出同样的意见。创作抛开了形式主义。罐子、双耳坛、盘子更改了,首先是作极细微的修改,后来大刀阔斧地改变。着色法,从前颜色种类数量很少,并服从传统的和谐规则,现在则颜色繁多并受革命冲动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的文化场地内部一向被禁止的某些赭石色、蓝色肆无忌惮地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同

样,人脸的非形象,根据完美地划定的地区的社会学者们的见解,是有特点的,它突然变成完全是相对的。宗主国的专家、人种学者很快洞察这些变化。大致上,所有这些变化是以成体系的艺术风格的名义,以殖民地位内部发展的文化生活的名义,受到谴责。殖民主义专家们不承认这种形式并赶来援助当地社会的传统。倒是殖民主义者成为当地风格的保护者了。大家记忆犹新,这个例子具有某种重要性,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像爵士音乐那样的一些新风格稳定地形成时,不完全涉及殖民的现实和白人爵士乐专家们的反应。因为爵士乐大概只是一个黑人老头在五杯威士忌下肚之后的那种支离破碎和绝望的怀旧、他自己的厄运和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既然黑人理解自己和有区别地理解世界,就产生希望和迫使种族主义世界后退,很明显,他的喇叭趋向通畅,他的嗓音趋向恢复。关于爵士乐的新风格,不仅仅出自经济竞争。应该从中毫无疑问地看到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拥护南部同盟者天下的失败的后果,这后果尽管来得迟缓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假设在五十来年后,一个该死的黑人可怜虫那抽抽搭搭的爵士乐喊叫声,将只由那些对具有一种转述风格和一种黑种人性格形式的停滞印象忠心耿耿的白人来保护,这并不是空想。

我们也可以在舞蹈、富有旋律性的歌唱、宗教仪式、传统的典礼方面寻求和发现同样的推进,察觉同样的变更、同样的焦急。早在民族斗争的政治或武装阶段之前,一个专心的读者可以感到和看到表现出新的活力、即将到来的战斗。表达形式非同寻常,主题从未见过或听到过,并具有一种不再是祈祷的影响,而是一种召唤“为了”和聚集的力量。这一切都促使唤起被殖民者的敏感,促使观望态度成为不现实、难以接受或遭失败。因为被殖民者更新了手工艺、舞蹈和音乐、文学的口头史诗的目

的和动力,他调整了自己的认识。世界失去其可诅咒的性质。不可避免地进行较量的条件汇集起来了。

我们目击了文化表现中的运动出现。我们看到这个运动,这些新形式是同民族意识的成熟过程结合在一起的。然而这个运动越来越趋向于具体化、制度化。从运动中看到无论如何需要民族的生存。

错误——况且这错误难以站得住脚——之一是试图文化创新,在殖民统治范围内重新评价当地的文化。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反常状态的结果:在一个被殖民的国家里,最初级的、最粗暴的、最未区分的民族主义是捍卫民族文化的最虔诚和最有效的形式。文化首先是表达一个民族,表达该民族的爱好、禁止和典型。其他一些禁止、道德准则、典型是在全社会的所有阶层构成的。民族文化是这些评价的总和,是全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内外紧张的几种因素凑合的结果。在殖民的环境中,被剥夺了民族和国家的双重支持的文化日趋衰败和苟延残喘。因此文化生存的条件是民族解放,是国家的新生。

民族不仅仅是文化及其沸腾、不断更新、深入研究的条件。民族也是一种要求。首先是要求为民族生存而战斗,民族生存对文化开禁,给文化打开创造的大门。以后则是民族保证给文化提供条件,表达范围。民族为了文化聚集各种不同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且只有这些要素能给予文化可靠性、有效性、活力、创造性。文化的民族特性也使其易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并使它能影响和渗透到其他文化。不存在的东西不大能对现实起作用,甚至不能影响这个现实。首先必须民族的重建赋予民族文化生

命,从最生物的词义上来讲的生命。

因此我们理解了旧的文化沉积那越来越必不可少的爆裂声,并在为民族解放而决战的前夕,懂得了更新表达法,起动想像力。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斗争、冲突——政治冲突或武装冲突——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冲突时,文化有无中止?民族斗争是不是一种文化表现?最后,是否应该说解放战斗尽管后天地丰富文化,它本身是否定文化的?解放斗争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认为被殖民的人民为重建民族主权而从事的有组织的、自觉的斗争是最充分的文化表现。不仅仅是斗争成功以后赋予文化有效性和活力,在战斗时,没有让文化冬眠。斗争本身在其进展中,在其内部进程中,发展文化的不同方向,并勾出文化的一些新轮廓。解放斗争并不恢复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旧轮廓。这个为求彻底重新分配人际关系的斗争,不能让这人民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原封不动。斗争后,不仅仅殖民主义消失了,而且被殖民者也消失了。

这个新人类对自己和对其他人不能不确定一个新的人文主义。这个新人文主义在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中已有预示。一个动员人民的所有阶层的斗争,一个表达人民的意愿和焦急,并且不怕几乎专一地依靠这个人民的斗争,是必胜无疑的。这种类型斗争的价值是它实现发展和创新文化的最高条件。在从这些条件下获得的民族解放后,没有像在某些新独立国家中见到的这种如此艰难的文化上的优柔寡断。因为民族在其来到世界的形

式和其生存方式方面根本上影响到文化。一个从经过人民商讨过的活动中诞生的民族,一个体现人民真正的愿望,改革国家的民族,只有在异常丰富的文化形式下才能生存。

如果被殖民者关心自己国家的文化并想使其具有世界重要性,那么他们不应该只相信那不可避免的独立的原则,却不记下人民完成这个任务的觉悟。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是一回事,斗争的方法和孚众望的内容是另一回事。我们觉得文化的未来、民族文化财富同样和解放斗争中经常体现的那些价值有关。

现在揭露某些人假仁假义的时候来到了。有人到处说民族的要求是个人道主义过时阶段。时间属于全体大众的,那些民族主义的落后分子应该相应地纠正自己的错误。相反,我们认为错误有着严重后果,它错在想跳过民族阶段。如果文化是民族意识的表现,处于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民族意识是文化的最精心设计好的形式。

自我意识并非对沟通关闭。相反哲学的思考教导我们它是沟通的保证。民族意识不是民族主义,惟独它赋予我们国际的重要性。这个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问题在非洲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非洲,民族意识的产生同非洲意识保持最起码同时代性的关系。非洲面对其文化的责任也是面对非洲黑人文化的责任。这个共同一致的责任并不是件形而上学的原理之事,而是对一条平凡的规律的信仰,意欲在一个殖民主义始终紧抓不放的非洲,即一个被包围的、脆弱的、经常处于危险的民族,整个民族得到独立。

如果说知识分子所造就的是人,那么我们说今天对于非洲知识分子迫在眉睫的事是创建其民族,如果是真正的创建,即如果这创建表达人民明显的志愿,如果它急切地显示出非洲人民,

那么这民族创建必定伴随着发现和普遍重要性的升级。因此民族解放不是脱离其他的民族，而是使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国际意识是在民族意识的中心升起和具有活力的。归根结蒂，这种双重性的显露只是整个文化的焦点。

黑人作家和艺术家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学术报告，
罗马，1959年。

五

殖民战争和精神错乱

但是战争在继续。我们还要再包扎几年因殖民主义的涌进而造成各种伤口，且有时这些伤口是去不掉的。

帝国主义今天为反对人们真正的解放而战，它到处抛下腐败的萌芽，我们应当无情地查获这些萌芽，并把它们从我们的土地和头脑中连根拔除。

我们在这里讨论因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产生的精神错乱问题。

人们可能会觉得把这些精神病学注释奇怪地搬到这样一本书中不甚恰当。我们是纯属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场精神病学现象的战争中，行为和思想的混乱在“绥靖”的作者身上，或在“被安抚”的居民内部具有重要性，并不取决于我们。事实是殖民化在其实质中已表现为精神病医院的一个大供应者。我们在不同的科学工作中，自 1954 年以来，曾把法国和国际的精神病科医生的注意力引到正确“治愈”一个被殖民者——就是说使他贯穿地和一个殖民类型的社会环境相一致——的困难上来。

因为殖民主义系统化地否定另一方，疯狂地决定不承认另一方的一切人类品质，它把被统治的人民逼得经常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实际上是谁？”

从被殖民者和殖民制度的这种暴力对抗中产生的防卫姿态

形成一个结构,它于是显示出被殖民的人格。要理解这种“神经质”,只要研究和判断在殖民制度内部过去的一天中,对一个被殖民者造成伤害的数量和深度就够了。无论如何必须记住一个被殖民的人民不仅仅是被统治的人民。过去在德国的占领下,法国人依旧是人。现在在法国的占领下,德国人依旧是人。在阿尔及利亚,不仅仅有统治,还有就字面而说的总之只占领一块领土的决心。阿尔及利亚人,包着裹毯的妇女们、棕榈林和骆驼形成了全景图,法国人道影响的“天然”背景。

在殖民地,偏僻荒漠地区,蚊子、土著和热病确实体现了仇恨、倔强、彻底造反的本性。当整个这种不顺从的本性终于被制伏,殖民化成功了。穿过偏僻荒漠地区的铁路、沼泽地的干涸、土著身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存在,这些实际上是一回事。

在未受武装斗争对抗的殖民化时期,当缺乏经验的冲动的总和超过某种界限,被殖民者的防卫态度垮了,于是这些被殖民者又大量地在精神病院里。因此在这殖民化成功的平静时期里,有一种由压迫直接产生的正规和重要的精神病理学。

今天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七年的民族解放战争,因它完全在人民中间,变成了一块有利于精神错乱诞生的土壤^①。这里我们提几个由我们医治和我们觉得特别说明问题的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病人的病例。我们并不是提交一桩科学工作,说这个是

① 在《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的最初两版中未发表的引言中,我们已指出整个一代的阿尔及利亚人沉浸在无理由和集体的杀人之中,和这引起的心理情感的后果一起,会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人道遗产。那些谴责在阿尔及利亚那种拷打折磨的人总是采纳一种地道的法国观点。这不是责备,是个看法:他们想保护现时的和潜在的施刑者的意识,并试图避免对法国青年精神污染。至于我们,我们只能同意这种思想方法。这里集中的某些病历,主要是A系列的4号和5号病例,说明并可悲地证实法国民主主义者们的这一块心病。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意图是指出遭受的折磨深深地使受折磨者的性格崩溃,有人可能对此持怀疑态度。

多余的。我们避免一切征候学的、疾病分类学的或治疗的讨论。这里使用的几个技术词汇仅仅是充当标记。然而我们必须强调两点。

按一般规定,临床精神病学把我们的病人所表现的不同错乱归在“反应精神病”项目。在这么做的同时,对引发病的事由给以优先,尽管到处提及体质(医疗对象的心理学史、情感史和生物史)和环境的作用。我们觉得在这里提出的病例中,发病事由主要是无情的血腥现象,不人道做法的普及,人们目睹一件真正的可怕事情所留下的顽固印象。

A 系列的第 2 号病例是个典型的反应精神病,但 B 系列的 1,2,4,5 号病例姑且认为是个远远更加弥漫性的因果关系,而不能真正谈得上是个特别的发病事由。这里,就是指战争,这场常常变成真正的种族灭绝的战争,最终这场战争推翻和粉碎世界,它是发病的事由。如果人们想要使用已确定的标签,在使用反应精神病这个标签时,要特别优先考虑这场具有殖民战争的全面性与特殊性的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应召作战的军人们和遭大批逃难或轰炸之难的老百姓的精神病理学的刊物并不缺少。这里提到的某些精神病学图画中未见过的面部表情,证实——如果还需要证实的话——这场殖民战争甚至在它冒出的病理学中是独创的。

另一个牢固确立的概念在我们看来值得稍微灵活:涉及这些反应错乱相对轻微。当然,可能已描述过,一些继发性的患精神病,即性格整体最终崩溃的一些病例。相反,我们觉得在这里,规律是病理学过程中常见的恶性。错乱持续几个月,大量地袭击自我,几乎总是留下简单而易见的虚弱这一后遗症。十分明显,这些病人的未来是身体很坏。一个例子将说明我们的观点。

在一个独立了好几年的非洲国家里,我们有机会接收了一个爱国者——从前的抵抗运动成员。这位三十来岁的男子来向我们咨询和要求缓解病痛,因为将近每年的某个日期,处于失眠,伴随着焦虑不安和自毁的固定观念。危险的日期是那么一天,他在组织的命令下,在某个地方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次行凶时死了十个人^①。

这位战士任何时刻也不打算否认自己过去的行为,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本人为民族独立该付出的代价。这些有限的病例提出了革命范围中责任的问题。

我们这里列举的病历覆盖了 1954—1959 年这个时期。某些病人是在阿尔及利亚见到的,或是在医疗中心,或是门诊,其余的是在民族解放军的卫生队里治疗。

① 出现这些错乱的情况以种种理由引人关心。在他国家独立后好几个月,他结识了一些过去占领国的侨民。他觉得他们很可亲。这些男女欢呼获得独立并毫无保留地对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爱国者们的英勇表示敬意。于是这位战士感到某种昏乱。他不安地思忖是否在那些被炸死的人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同跟他说话的那些人类似。当然,那家成为目标的咖啡馆是公认的种族主义者的老窝,但丝毫不禁止随便一个过客进去和消费。从这个人第一次感到昏乱起,他尝试着避免去想以前的事。然而,异乎寻常地在那个危急日期的前几天,最初的错乱出现了。从此,这错乱非常有规律地重复出现。

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决不停止追随我们。它们的准备、它们的安排、它们的动机完全可能由果溯因地大加修改。这不是历史给我们布下的一个最小的陷阱和它的各种决定。但我们能躲过那昏乱吗?谁敢扬言整个一生不常有昏了头的时候?

系列 A

这里收集了五个病例。涉及阿尔及利亚人或欧洲人,在一些十分确切的事实之后,他们表现出反应型的精神错乱。

1号病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因他妻子被强奸而患阳痿症

B是个26岁的男子。他经民族解放阵线的卫生部门指引来找我们治顽固的偏头痛和失眠症。他过去是个出租车司机,18岁起在民族主义党派内积极活动。自1955年起,成为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支部成员。好几次他利用自己的出租车运送传单和一些政治负责人。面对镇压的加剧,民族解放阵线决定在城市中心斗争,于是便要B把突击队运送到攻击点的附近,并经常要等他们。

然而有一天,在欧洲人的市中心,在一次相对重要的活动之后,一次非常严重的封锁迫使他抛弃自己的出租车,而突击队则四分五裂。B得以逃脱敌人的部署,躲在一个朋友家,几天以后,在他负责人的指令下,他没有回家就抵达最近的游击队。

好几个月里,他没有妻子和二十个月大的小女儿的消息。相反,他得知警察局在城里找了他整整几个星期。在游击队里逗留了两年后,他收到他妻子的一封信,信中她要他忘了她。她

受了污辱。他不该再打算和她一起重新共同生活。他十分不安,请求他的指挥官准许他秘密地回家。这件事被拒绝了。相反,采取措施让一个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去跟 B 的妻子及父母联系。

两个星期后,一份详细的汇报抵达 B 的部队指挥官那里。

在发现他丢弃的出租车后(两个冲锋枪弹夹在那儿被找到),法国土兵立即由警察陪伴着到他家去。发现他不在,他们就把他妻子带走了,他们把她留下了一个多星期。

她受到审讯,审问她丈夫来往的人,并两天里受到粗暴的掌掴。但第三天,一个法国军人——她不能确定是不是一个军官——叫其余的人出去并强奸了她。一阵子以后,第二个人,这一次当着其他人的面,强奸了她,同时对她说:“如果有一天你再见到你那个下流的丈夫时,尤其别忘了告诉他人家对你干的事。”她又待了一个星期,没有受到新的审讯。此后,人家把她送回家。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母亲后,她母亲说服她把一切告诉 B。因此,她一开始和她丈夫接上联系时,就向他坦白自己的受辱。

第一次精神刺激过去了,由于不时参加行动,B 恢复过来。好几个月中,他听到阿尔及利亚妇女被强奸或受折磨的各种叙述;他有机会看到一些妻子遭强暴的丈夫,而他个人的不幸和受嘲弄丈夫的尊严处于次要地位了。

1958 年,他负责一个外出的任务。在回他部队时,一种不常见的心不在焉和失眠使他的同志们和上级十分不安。他推迟了出发,决定去瞧医生。我们是在这个时候见到他的。直接接触良好。他脸部有表情,可能过分了些。微笑稍微有些夸张。表面上露出欣快现象:“行了……行了……我现在觉得好些了。给我一些补药,维他命,让我恢复体力。”背地里他流露出一种深

沉的忧虑。他立即住院了。

第二天起,乐观主义屏幕倒塌了,我们面前见到的是个消沉虚弱、若有所思、不吃不喝、卧床不起的病人。他逃避政治讨论并对一切关于民族斗争的事表现出显著的不感兴趣。他避免听与解放战争有关的消息。接触他的症结非常费劲,但几天以后,我们能重新把他的经历串连起来。

他在部队外面期间,碰运气过次性生活,但失败了。他想这是由于疲劳,在经过强行军和营养不良时期之后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两个星期以后,他又开始尝试。又一次失败。他把这事跟一个同志谈起,这个同志建议他服维他命B12。他服了B12药片。开始新的尝试,新的失败。加之,在行动前那会儿,他克制不住想撕掉一张他小女儿的相片。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联系可以使人们联想到存在无意识的乱伦的冲动。然而好几次谈话和一个梦(病人梦见一只小猫很快腐烂并散发出难闻的臭气)把我们往另一个方向引。一天他对我们说:“这个女孩(指他的小女儿)身上有些东西在腐烂。”从这个时期起,失眠症变得十分痛苦,尽管安定药剂量相当大,一种焦虑的兴奋状态在发展,这使我们科室非常不安。于是他第一次笑着和我们谈到他的妻子,他对我们说:“她尝过法国人的味道。”这时候我们才重新恢复他整个经历。事情的来龙去脉阐明了。他告诉我们他在每次尝试性生活之前想到了他妻子。我们觉得所有他的隐情都利害攸关,是根本所在。

“我跟这姑娘结了婚而当时我所爱的却是我的表妹。但我表妹的父母给他们女儿跟另外一个人安排了婚事。于是我接受了我父母向我提议的第一个女人。她温柔体贴,但我不爱她。我总是对自己说:你还年轻……等一等,当你找到一个好女人时,你就离婚并组织一个好家庭。因此,我很少依恋我的妻子。

随着事变，我更加远离她。最后，我到家吃饭和睡觉几乎不跟她说话。

“在游击队，当我得知她被几个法国人强奸了，我首先感到对这些恶棍大为愤怒。后来我说：‘噢，事情并不严重；她没有被杀。她可以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好几个星期以后，我意识到她是‘因为人家搜查我’才遭强奸的。事实上，是为了惩罚她不开口她才被强奸的。她本来完全可以至少说出一个战士的名字，从这战士打开缺口，他们可以找到、摧毁这个组织，并甚至可能逮捕我。那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强奸，由于闲着无聊或由于性虐待狂，仿佛我在乡里见到过的那样，这是强奸一个固执的女子，她接受一切却不出卖自己的丈夫。而这个丈夫就是‘我’。这个女子救了我的命，并保护了组织。那是因为我的缘故她才受辱的。然而她却并不对我说：‘这就是为了你而遭受的罪。’相反她对我说：‘忘掉我，重新过你的生活，我被玷污了。’

“从这个时候起我对自己作出决定，战后跟我的妻子言归于好，因为必须告诉你我看到一些农民替自己那曾当着他们的面被强奸的妻子擦眼泪。这使我震撼。而且就该向你承认起初我不理解他们的态度。但我们越来越多地不得不介入这些故事，给老百姓作解释工作。我看到一些老百姓自愿娶一个被法国军人强奸并怀了孕的姑娘。所有这一切引导我重新思考我妻子的问题。

“我决定跟她和好，但我还不知道在看到她时怎么做。而且经常在看我女儿的相片时，我想到她也受辱了。似乎来自我妻子的一切都是腐烂的。要是他们拷打了她，要是他们把她所有的牙齿都敲碎了，打断了她的一条胳膊，这将对我无关紧要。但是这件事，能忘得掉吗？而且她是否被迫让我知道所有这一切？”

于是他问我他的“性无能”据我看是不是由他的烦恼引起的。

答：“这不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坐在床上：

“如果你碰到这事你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会再要你的妻子吗？”

“我想我要……”

“啊，你瞧……你不完全有把握……”

他双手捧着脑袋，过了一会儿离开了房间。

从这一天起，他渐渐地听取政治讨论，同时偏头痛和厌食症大为减退。

两个星期后，他在回部队时对我说：

“到独立时我要再去找我的妻子。如果这事不行，我会再到阿尔及尔来看你的。”

2号病例——在一次集体消灭时幸免于难者身上那不加区分的杀人冲动

S,37岁，农民。住在康士坦丁的一个村镇。从不关心政治。从战争开初起，他的地区是阿尔及利亚部队和法国军队之间激烈战斗的地方。S就这样见到了死人和伤员。但他继续保持旁观。不时地，他村里的农民像全体人民那样来帮助路过的阿尔及利亚战士。但有一天，在1958年初，离村镇不远处发生了一次致命的埋伏。敌方部队策划一次作战行动并包围了村子，况且村子里没有士兵。所有的村民被集中在一起并受询。

无人回答。几个小时后，一个法国军官乘直升飞机到达并说道：“这个村子太引人议论了；毁了它！”士兵们开始放火烧房子，同时那些试图捡几件衣服或救出某些储备物的妇女遭到枪托的殴打。某些农民趁一片混乱之际逃跑了。军官下令集中留下的农民并将他们领到一条河附近，在那儿开始大屠杀。用枪口顶着杀死了 27 个男人。S 被两颗子弹打伤，枪弹分别穿过他的右大腿和左臂，这左臂的伤造成他的肱骨粉碎。

S 晕了过去，苏醒过来时已在一队民族解放阵线战士中。他受到卫生部门的治疗并在能够走动时被疏散了。在路上，他的举止越来越不正常，不断使得护送队不安。他索要一支枪，而他却是个老百姓和残疾人，并拒绝走在不管是谁的前面。他不要任何人在他后面。一天夜里，他夺取一位战士的武器并笨拙地向睡着的士兵开枪。他被相当粗暴地缴下了武器。从此，他的双手被捆，他是这样到达中心的。

他开头对我们说他没有死，他跟他人开了个玩笑。渐渐地，我们得以恢复他未被杀死的故事。S…并不是惶惶不安，而是过分激动，伴随着激烈的烦躁不安带吼叫的阶段。他很少使人厌烦，但他那无休止的唠叨使大家疲劳，科室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因他断言意欲“杀死大家”。在他住院期间，他要用有幸得到的武器进攻将近 8 个病人。护士和医生未被免除。人们甚至思忖是不是面对潜伏的癫痫形式之一，它的特点则是几乎总是全面性的挑衅。

进行一种睡眠疗法。从第三天起，一场每天的谈话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病理过程的动力。智力障碍渐渐淡薄。下面是几段病人的声言：“上帝和我在一起……那么，他不跟死去的人在一起……我运气好……生活中，要不被杀就得杀人……当我想到我对他们的经历一无所知时……一些法国人来到我们中间。

他们乔装成阿拉伯人。应该把他们都杀死。给我一支冲锋枪。所有这些所谓的阿尔及利亚人是法国人……他们不让我安静。我刚要入睡，他们就走进我房间。但现在，我认识他们了。大家都想杀我。可我会自卫。我要把他们无一例外地全杀掉。我要把他们一批批地掐死，你也和他们一起被掐死。你们想把我击毙，但必须换另外的方式干。干掉你们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小孩、大人、女人、儿童、狗、鸟、驴子……大家都会轮到……之后，我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

所有这些话都是断断续续地讲的，态度始终是敌对、傲慢、轻蔑的。

三个星期后，冲动消失了，但缄默不语，某种孤独的倾向使我们担心病情变得更加严重。然而，一个月之后，他要求出院学习一种适合于他的残疾状况的职业。于是把他交给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服务部门。六个月后复查，身体好了。

3号病例——在狂怒杀害一个女人后人格解体型的严重焦虑不安的精神病

Dj过去是大学生，19岁成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在到中心时，他的病已犯了好几个月。他的表现很有特点：十分虚弱，嘴唇干燥，双手经常潮湿。不断地鼓胸叹气。顽固地失眠。从开始错乱起，曾两次企图自杀。谈话时采取幻听的态度。有时候目光盯在空间某一个点上，停留一些时候，而脸部却显得兴奋，给观察者的印象是他在看一出戏。思想模糊。一些心理学中叫作障碍的现象：准备的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毫无明显理由地突然中断。但有一个因素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病人谈到他的血从动脉和心脏流出来，他的动脉血流空了，他的心脏坏了。他

请求我们止住出血，不再容人径直来医院“吸他的血”。不时地，他不能再说话并要一支铅笔。他写道：“我发不出声了，我整个一生要结束了。”这种实际的人格解体使我们想到病情发展严重。

好几次在我们谈话时，病人跟我们谈到一个女人，她在夜幕降临时前来纠缠他。在此之前我得知他母亲去世了，他十分爱他的母亲，什么也不能安慰他这一痛失（这时他的声音大大地减低，并出现几滴眼泪），我把调查朝向母亲的形象。当我要他描绘一下这个纠缠不休的、甚至迫害人的女人时，他申言她不是个陌生人，他十分熟悉她，既然是他杀了她。于是提出这么个问题：搞清楚我们是否面对一个在其母亲去世后无意识地犯罪的例子，正如弗洛伊德在《哀伤和忧郁》中所描写的那样。既然他很熟悉这个女人，既然也是他杀死这个女人，我们要求病人更详细地给我们讲讲。就这样我们重新编成下面的故事。

“我从念大学的城市上山打游击。好几个月以后，我得到家里的消息。我得知我的母亲被一个法国士兵用枪口顶着杀死了，并把我的两个姐妹带到军人处。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我母亲的去世极度地震撼了我。我父亲已去世了好几年，我是家里惟一的男子，而我惟一的志向始终是有所成功，以便改善我母亲和两个姐妹的生活。一天，我们到一个殖民者的花园住宅去，那儿的管家是个殖民主义积极分子，他已杀害了两个阿尔及利亚平民。我们是在夜里到他家的。可他不在家。家里只有他的妻子。她看到我们时，开始求我们别杀她：‘我知道你们是来找我丈夫的，但他不在家……我对他说了多少次别参与政治。’我们决定等她的丈夫。但我看着这个女人就想到我的母亲。她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似乎心不在焉。我心想为什么我

们不杀了她。一时，她发现我在看她。她就扑向我高声说道：‘我请求你们……别杀我……我有孩子。’一会儿以后，她死了，我用刀把她杀死了。头头卸了我的武器并下令出发。几天以后我受到分区首长的审讯。我以为我要被杀，但我不在乎^①。接着我开始饭后呕吐，并睡不好觉。再后来，这个女人每晚来向我讨还血债。那我母亲的血债呢，又上哪儿去要还？”

夜幕来临时，病人一躺下，“房间里就挤满了女人”，都是同一个样。这是单独一个女人的各种版本的再版。她们在肚子上都有一个开口的洞。她们失血、苍白和极其消瘦。这些女人骚扰这个年轻病人并要他还给她们流出的血。这时，一阵流水的声音布满房间，声音越来越强，使人想起瀑布的轰鸣声，同时这个年轻病人看到房间的地板上浸透了血，是他的血，而那些女人变得越来越红润，且她们的伤口开始愈合了。病人浑身冒汗和极其恐慌，醒了过来并辗转不安地直到黎明。

年轻病人治疗了好几个星期，他的梦魔现象几乎消失了。然而，他的人格中继续存有一个大缺陷。他一想念他母亲时，便惊愕地重叠出现这个开了膛的女人。尽管这似乎不那么科学，我们还是认为只有时间能使这位青年的人格解体可能有所改善。

4号病例——一名消沉的欧洲警察局门卫在医院治疗的环境下遇见他的一个受害者，一个患木僵的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

A,28岁，已婚，无子女。我们得知他和他的妻子想要孩子

^① 经法医鉴定证实了行为的病理学性质，民族解放阵线参谋部决定的法律起诉停止了。

看了好几年的病,不幸得很,没有成效。他是经他的上级指点来找我们治疗行为障碍的。

直接接触显得相当顺利。病人自动地对我们谈他的困难;他跟他的妻子和岳父母令人满意地融洽。和他的工作伙伴们关系很好;此外,他的上级对他很器重。使他烦恼的是夜里他听到一些叫声妨碍他睡觉。而事实上,他告诉我们好几个星期以来,他在睡前关上百页窗和堵塞窗户的缝隙(现在正是夏季),他的妻子热得透不过气来,对此感到十分痛心。加之,他用棉花堵住耳朵,以便减轻叫声的强度。甚至有时候在深夜他打开收音机,或者放音乐,为了不听到这些夜间噪声。从此,A对我们详尽地讲述他的悲剧:

好几个月以来,他被编入一个反民族解放阵线的班。起初,他负责监视几座大楼或咖啡馆。可是几个星期以后,他几乎经常在警察所工作。于是他有机会进行审讯工作,这种工作进行起来决不是没有“推推搡搡”。“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想承认。”

“有几次,”他解释说,“我真想对他们说如果他们稍微对我们有点同情心,他们就开口而不要迫使我们花几个小时来逐字逐句地从他们口中掏取情况。可是你去要他们说明一些事情,对所有的问题都答‘我不知道’。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如果问他们住在哪儿,他们说‘我不知道’。于是当然……我们不得不走这一着棋。但他们过分地大叫大骂。最初,这令我好笑。但后来,这开始使我心绪不宁。今天,只要听到有人叫喊,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处境如何,审讯进行到什么阶段。那个小伙子挨了两拳和耳朵后面一警棍,就以某种方式说话、叫喊,说他是无辜的。在把两只手腕系着吊了两个小时后,他的嗓门变了。泼了水以后,又是另一个嗓门。就这样继续下去。但尤

其在过电后就变得禁不住了。好像随时随地那家伙要死去。显然有那些不叫喊的人：这是硬汉子。但他们想像人家会马上杀了他们。我们对杀他们并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情况。那些人，我们首先设法让他们叫喊，早晚他们会说的。这已经是个胜利了。以后再继续。注意我们喜欢避免这样干。但他们不配合我们轻易完成任务。现在我竟至于甚至在家里也听到这些叫喊声。尤其是几个死在警察所里的人的叫喊声。大夫，我对这个活儿感到厌烦了。如果你们把我治好了，我要求调动到法国去。要是他们拒绝，那我就辞职。”

面对这种景象，我开了一个病假条。由于病人拒绝住院，我以私人名义给他治疗。一天，在治疗时间稍早之前，我被召急诊。在我到家时，我妻子请 A 等我，但他宁肯到医院走一遭，就这样他离开我家去迎我。几分钟后，我回家时在路上碰见了他。他靠在一棵树上，显然精疲力竭的样子，浑身颤抖，冒着汗，不胜恐慌。我让他上了我的车把他带到我家。他一旦在长沙发上坐下，就给我讲述他在医院里曾碰到我的一个病人，这病人在警察局场所受过审讯（这是个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他是为了“木僵型后震荡障碍”受治疗。于是我得知这个警察实际上参与了对这病人进行严刑拷打。我给他服了几片镇静药缓和他的惶惶不安……他走后，我到那个爱国者的住院部去。那里的医务人员什么也没察觉。然而病人却找不到了。最后，终于在一个洗手间里找到了他，他企图在那儿自杀（那个病人也认出了那个警察并认为这警察来找他把他重新带到警察局去）。

以后，A 来看我好几次，且经过十分明显的好转后，得以以身体健康为理由重返祖国。至于那个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医务人员长时间地拼命说服他这是一个幻觉，警察们不能到医院

来,他疲劳了,他到这儿来是治病的云云。

5号病例——一个欧洲便衣警察拷打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R,30岁,自动来找我们看病。他是个便衣警察,几个星期以来他确认“出了毛病”。他已婚,有三个孩子。他抽烟抽得很凶:每天五包香烟。他胃口不好并经常睡觉时做噩梦。这些噩梦没有专有的特点。折磨他的是他自己称为“疯狂发作”的表现。首先,他不喜欢受到挫折:“大夫,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我一遇到反对,就很想揍人。甚至在工作之外,我也想揍那阻碍我的家伙。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喏,譬如我去报亭找报纸。有许多人。不得不等候。我伸出手去拿我要的报纸(报亭卖报的是我的哥儿们)。排队的人里有个人带着稍微挑衅的神气对我说:“等轮到您时。”于是,我想揍他,我心中默念道:“小老头,你别落在我手里,几个小时后,你会为了引人注意而装小丑的。”他不喜欢响声。在家里,他想揍所有的人,随时想揍人。而实际上他打他的孩子,甚至连只有二十个月的最小的孩子也揍,而且少有的粗暴。

但使他害怕的是有天晚上,他的妻子特别批评他打孩子太过分(她甚至对他说:“我发誓,你疯了……”)他就扑向她,打了她并把她绑在一张椅子上对她说:“我要一劳永逸地让你知道在这间破房子里我是主人。”

幸亏,他的孩子们开始哭喊起来。于是他明白自己的举止的严重性,给他妻子松了绑,并于第二天决定去向一位“专门治神经”的医生求医。他明确指出“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他很少体罚他的孩子们,且无论如何决不同他的妻子争吵。从“那些事故”起,现在的这些现象出现了。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干步兵的

活儿。譬如上个星期，我们像部队那样地作战。这些政府里的大人说在阿尔及利亚没有战争，而维持秩序的力量，就是说警察局应该重建平静。可是在阿尔及利亚有战争，而当他们察觉到这一点，已太晚了。最使我受不了的是严刑拷打。您对此毫无兴趣吗，您？……有几次我连续拷打十小时……”

“拷打对您有什么用？”

“但这很累人……确实大家互相轮流，但问题是知道在什么时候给伙伴交班。每个人想自己快要得到情况了，并提防着别把自己煮熟的鸭子让给另一个人，他自然从中获取荣誉。于是，人们罢休……或是不罢休……”

“甚至有时会有人向那受审的家伙提出给他钱，为了促使他开口我们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钱。的确，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就是：你是否能够使这家伙开口？这涉及个人成就的问题；大家在竞争，什么……最后大家打人打得精疲力竭。于是，使用那些‘塞内加尔人’。但他们或者打得太厉害并在半小时内把那家伙打坏了，或者打得太轻而没有效用。事实上，这项工作要成功必须得聪明。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抓紧和什么时候放松。这是个嗅觉灵敏的问题。当那小伙子到火候了，就用不着继续拷打。所以必须自己动手干这活儿：更好地注意进展。我是反对那些人让别人教训那小伙子而自己却每小时来看看进度如何。尤其必须不要使那家伙有他不会从你们手里活着出去的印象。这样他就会寻思为什么说呢？既然这大概不能救他的命。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没有任何运气知道什么了。应当让他抱有希望：是希望使他开口说话。”

“最使我烦恼的是我妻子的事。肯定其中该有些东西出了毛病。大夫，必须给我调停一下这事。”

他的政府部门不准他休息，况且，病人不愿要精神病科医生

开具证明,于是“完全在职”进行治疗。我们轻而易举地猜到这样的办法的弱点所在。他完全知道自己所有的紊乱直接由那种在审讯室展开活动引起,尽管他试图把责任全部推到“事故”头上。由于他不考虑(这是件荒谬的事)停止拷打(要么必须辞职),他直言不讳地要我帮他问心无愧地、行为不慌乱地、客观公正地拷问那些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①。

① 他带着这种病历面对一个不留一点完整东西的严密体系。刽子手喜欢鸟语花香或宁静地享受交响乐或奏鸣曲,这仅仅是一个阶段。稍后,千真万确地过起一种处于彻头彻尾虐待狂中的生活。

系列 B

这里我们收集了几个或几组病例,病例中的引发事件首先是在阿尔及利亚蔓延的全面战争的现象。

1号病例——两个13岁和14岁的阿尔及利亚青少年杀害他们的欧洲玩耍伙伴

这是份法医鉴定。两个13岁和14岁的阿尔及利亚青少年,一所小学的学生,被控杀害了他们的一个欧洲同学。他们承认了犯罪活动。人们看见一个孩子抓住那个被害者而另一个孩子则用一把刀砍这被害者。那两个被控告的小孩并不改变他们的供述。我们在这里转载他们那些具有特点的话。

a)13岁的那个。

“我们没有跟他闹翻。每个星期四我们一同用弹弓打小山头上的、村子上空的鸟。他是我们的要好伙伴。他不再上学了,因为他想像他父亲那样当一个泥瓦工。一天我们决定杀了他,因为那些欧洲人要杀死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我们不能够杀死那些‘大人’。但由于他跟我们一般年龄,我们能够杀了他。我们不知道怎么杀他。我们想把他扔到一个沟里,但他可能只受点伤。于是我们在家拿了把刀并把他杀了。”

“但为什么选上他呢?”
“因为他跟我们一起玩。别人不会跟我们一起上那小山头。”
“为什么选一个伙伴?”
“那为什么他们也要杀我们呢?他的父亲,他是个民兵,他说必须把我们掐死。”
“但他对你没有说什么吧?”
“他?没有。”
“你知道现在他死了?”
“知道。”
“死亡意味着什么?”
“就是当生命结束时,人就上天了。”
“是你把他杀死的?”
“对。”
“杀死一个人是不是引起你什么?”
“不,既然他们要杀我们,那么……”
“你厌烦蹲监狱吗?”
“不。”

b)14岁的那个。

这个被控青少年同他的同学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已几乎是个男子汉了,从肌肉控制、面部表情、口吻和回答内容上都表现出是个成人了。他也不否认杀了人。为什么他杀人?他不回答问题,却问我是否见过一个欧洲人蹲监狱的。有没有一个欧洲人在杀害阿尔及利亚人后被抓进监狱的?我回答他确实我未见过欧洲人蹲监狱。

“然而,每天却有些阿尔及利亚人被杀害,是不是?”

“对。”

“那么,为什么在监狱里见不到欧洲人呢?您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不,可你为什么杀死这个男孩,他是你的伙伴?”

“我来给您解释……您听说过里韦事件吗^①?”

“听说过。”

“那天我的两个亲戚在那儿被杀了。我们这儿的人说法国人曾发誓要一批接一批地把我们杀绝。有没有一个法国人因杀了所有这些阿尔及利亚人而被捕的?”

“我不知道。”

“好吧,没有任何人被捕。我啊,我想上山,但我太小了。于是跟 X 说必须杀死一个欧洲人。”

“为什么?”

“按我们这样该怎么干呢?”

“我不知道。但你是个孩子,而这是发生在大人中的事。”

“可他们也杀孩子……”

“但这不是杀你伙伴的理由。”

“好吧,我杀了他。现在,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是不是这个小伙伴惹了你?”

“没有,他没惹我什么。”

“那么?……”

“就是这样……”

2号病例——一名 22 岁的阿尔及利亚青年的控告妄想和

^① 里韦是个村子,从 1956 年某一天起,它在阿尔及尔人地区出了名。一天晚上,法国民兵侵入这村子,他们把四十名男子从床上揪起来,把这些人屠杀了。

伪装成“恐怖活动”的自杀行为

这名病人是由法国司法当局指点来找医院的。这项治疗措施是由一些法国精神病医生在阿尔及利亚实施法医鉴定后而采取的。

这名男子身体消瘦,处于完全精神错乱的状态。身上布满瘀斑,而上下颌骨的骨折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吃东西。因此,两个星期中,借助各种注射液给病人提供营养。

两个星期以后,思想空白缓解了;可以建立起联系,我们得以把这年轻人的悲惨经历重新串连起来。

在他青少年时,他罕见地热心从事童子军运动。他成为穆斯林童子军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在 19 岁时,他完全忽视童子军运动,而只关心自己的职业。身为计算机操作人员,他顽强地学习并梦想成为自己那一行中的一大专家。1954 年 11 月 1 日,他全神贯注在纯属职业性的问题上,对于民族斗争没有任何反应。他已不再跟他的老同学来往。他给自己下定义:这个时期好像是“被动员钻研自己的技能”。

然而,将近 1955 年中期,在一次晚上家庭聊天中,他突然觉得他父母把他看作是个叛徒。几天以后,这个暗自的印象淡漠了,但他仍然有某种不安,某种他莫名其妙的苦恼。

于是他决定很快吃完饭,逃离家庭环境并关在自己房内不出去,避免所有的接触联系。灾难是在这些条件下突然出现的。一天,在大街正中间,12 点半左右,他清清楚楚听见一个说他是懦夫的声音。他转过头去,但没见到任何人。他加快脚步并决定不再去工作。他待在自己房里,不吃饭。夜里危象爆发了。三个小时中,他听见各种各样的骂声,他的头脑里和夜空中回荡着一些声音:“叛徒……懦夫……你所有的弟兄都死了……叛

徒……叛徒……”

他感到一种无法描绘的惶恐不安：“18个小时中我的心跳为每分钟130下。我以为我就要死了。”

从此，病人什么也不能吃了。他眼看着消瘦了，把自己关闭在一片漆黑之中，拒绝给他父母开门。将近第三天，他跪下祈祷。他告诉我，他每天保持17—18个小时的跪姿。第四天，他一时冲动地，“像个疯子”，“胡子拉碴，这也足以使人把他当作是个疯子”，不穿上衣也不系领带，出门去城里。一旦到了街上，他不知上哪儿去；但他走着走着，一段时间后，他又到了欧洲城。他当时的体型（他像个欧洲人）似乎保护了他免受法国巡逻们的招呼询问和检查。

相反，在他旁边，一些阿尔及利亚男女却遭阻拦、推搡、谩骂、搜身……然而，异乎寻常，他没有任何证件。敌方巡逻们对他的这种自发的和气使他更坚信自己的妄想：“大家都知道我和法国人在一起。士兵们得到命令：他们让他安安静静。”

加之，被拦住的阿尔及利亚人双手放在颈后，等着搜身，他感到他们的目光满含蔑视。受抑制不住的烦躁不安所折磨，他大步离开了。他是在这个时候到达法国参谋部大楼前。在栅栏前，好几个军人用冲锋枪对着他。他朝前走向士兵们，扑向其中一人并试图夺他的冲锋枪，一面高声道：“我是个阿尔及利亚人。”

他很快被制伏，被带到警察局，局里坚持让他招供他头头们的姓名和他所属网络的各个成员的姓名。几天以后，警察和军人们发现他们是在跟一个病人打交道。决定做鉴定，结论是存在精神错乱并开方住院。他对我们说：“我想要的是死。即使在警察局，我以为并希望拷打后他们会把我杀死。我很高兴挨打，因为这向我证明他们也把我看作是他们的敌人。我再也不能听

到这些指责而不反抗了。我不是个懦夫。我不是个妇女。我不是叛徒^①。”

3号病例——一个法国姑娘神经官能症的态度，她的父亲是个高级官员，在一次埋伏中被杀

这位21岁的姑娘是个大学生，来找我看焦躁型的轻微现象，这些现象在学习中和在社会关系中妨碍她。手心老是潮湿，有些时期真正地令人不安，在这些时期中水“从她手中流出”。胸部压迫感伴随着夜间的偏头痛。她啃指甲。但引起她注意的是尤其容易显然过分快地跟人接触，而私底下却感到十分苦恼。病人那么轻描淡写地提到她父亲的死亡，然而她父亲在新近刚去世呀，因此我们很快把探究指向她与她父亲的关系上。她对我们陈述得很明白，绝对地一清二楚，清楚得近乎无动于衷，恰恰因她这种理性主义显示了这个姑娘的错乱，她冲突的性质和起因。

“我的父亲是个高级官员。他负责管辖一大片农村地区。从事件一发生起，他就投入疯狂追捕阿尔及利亚人。他达到完全不吃不睡的程度，这都激励他镇压造反。我眼看着我父亲慢慢地变化却毫无办法。最后，我决定不再去看望父亲，待在城里。其实，每当我在家里的时候，我通宵不眠，因为叫声从下面直到我的睡处不断地折磨我：在地窖和改变用途的屋子里，有人在拷打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以便获取情况。你们不能想像这样整

① 1955年期间，这种类型的病例在阿尔及利亚特别多。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病人都有运气到医院去。

夜听见叫喊声有多可怕。有几次,我寻思一个人怎么能忍受——我不谈拷打,但只是说听到痛苦的叫声。而这种情况继续着。最后,我不回家了。我父亲来城里看我那少有的几次中,我做不到正面看他时而不非常局促和害怕。我变得越来越难以拥抱他了。

“因为我在农村住了很久。我认识几乎所有的人家。那些和我同龄的阿尔及利亚青年在我们小时候曾跟我一起玩耍过。每次我回家时我父亲告诉我逮捕了一些新的人。最后,我都不敢再在街上行走了,我肯定会到处碰到仇恨。在我自己的心底里,我认为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有理。如果我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会加入游击队。”

然而,有一天她收到一份电报,告诉她她的父亲受了重伤。她到医院去,发现她父亲处于昏迷状态。不久他死了。她父亲是在和一队军人一起执行侦察任务时受的伤:巡逻队中了阿尔及利亚民族军设下的埋伏。

“葬礼引起我反感,”她说道,“所有这些来给我那‘高贵道德品质征服了当地居民’的父亲吊丧的军官,使我感到厌恶。大家知道这是假的。谁也不是不知道我父亲指挥整个地区的那些审讯中心。他们知道严刑拷打致死者的数字达到每天 10 人,而他们则刚刚就忠诚、忘我、爱国等等谎话连篇。我应该说现在对于我那些话不再有价值了,无论如何没有许多价值了。我立即回到城里并躲避所有当局。他们提出给我补助金,但我拒绝了。我不要他们的钱。这是我父亲流出的血的代价。我不要。我将工作。”

4号病例——10岁以下的阿尔及利亚少年们的行为错乱

这涉及一些难民。他们是些战士或被法国人杀害的老百姓的儿子。他们分布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不同的中心里。这些孩子上学了。组织一些游戏和集体外出。孩子们按期接受一些医生的跟踪调查。由于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见到其中一些孩子。

- a)在这些不同孩子身上,存在对父母的形象十分明显的爱。执著地寻求一切像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的东西并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
- b)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对响声的厌恶。这些孩子在人家一斥责他们时就非常不自然。他们十分渴望平静和爱。
- c)在许多孩子身上发现带有梦游症的失眠。
- d)周期的遗尿。
- e)虐待狂的倾向:一种常玩的游戏:在一张绷紧的纸上狂怒地戳上许多的窟窿。咬铅笔,讨厌地始终啃指甲。他们之间虽然心底里十分友爱但却经常争吵。

5号病例——女难民的产期精神病

妇女们在生育之际突然出现精神错乱叫作产期精神病。这些错乱可能在产前或产后的几个星期立即出现。这些病的决定论非常复杂,但估计两个主要原因是内分泌腺功能紊乱和存在“情感打击”。后面这一项虽然很含糊,却包括公众称为“强烈的

激动”的东西。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边境上,自从法国政府决定在几百公里土地上实行开阔地带和焦土政策以来,有将近三十万的难民。大家知道他们生活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中。一些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多次到那儿去,并在证实极度贫困和生活条件不稳定后,叮嘱国际组织加强援助这些难民。因此可以预见,由于在这些难民营里营养不良,那些怀孕的妇女表现出特别易于出现产期精神病。

法国部队运用“连续和追踪法”经常进行侵袭,空袭,扫射——大家知道法国军队轰炸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领土不算什么了,而萨基埃·西迪·尤瑟夫,突尼斯的受害的村子是其中最血淋淋的例子——,家庭支离破碎的状况,成群移居的条件的后果,这一切给难民们带来持久不安全的气氛。不得不承认产后的阿尔及利亚难民不表现出精神错乱的不多。

这些错乱具有好几种形式。或是烦躁不安,它有时可能发展成狂怒,或是一成不变的严重抑郁并带有各种自杀的企图,最后,或是随带哭泣、哀叹、呼天喊地的焦虑状态等等。同时,谵妄性的内容是各种各样的。发现或是一种模糊的迫害谵妄,它对随便哪个个人都感兴趣,或是好斗性谵妄,反对那些来杀害要出生的孩子或新生儿,或是一种死亡临近的印象,于是病人哀求看不见的刽子手饶了她们的孩子……

这里,还必须指出那些主要内容并未由于病人的错乱镇静和减退而一扫而光。治愈的病人的环境维持和助长这些病理学的症结。

系列 C

酷刑后情感-智力的改变和精神错乱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集中了多少有一点比较严重的病人,他们在酷刑之后或在受酷刑时立即出现错乱。我们将描述几个小组,因为我们察觉一些有特点的疾病类型,不管伤害人格的严重性和深度,符合每种酷刑的方法。

1号小组——在所谓的预防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酷刑之后

这里我们影射粗暴的方法,它涉及让人开口说话而不是严刑拷打。原则是要超过某种极限,痛苦变得难以忍受,在这里这个原则特别的重要。目的是尽可能快地达到这个极限。不讲究精心从事。有的是大量和多种方式的攻击:好几个警察同时拷打;四个警察站在那里,围着囚犯并以拳击玩弄他,而一个警察则用一支香烟烫他的胸部,另一个警察用棍子敲他的脚掌……我们在参照受刑者吐露的隐情时,始终觉得在阿尔及利亚使用的有些酷刑方法特别残忍。

a)由嘴灌进水附带用肥皂水强压灌肠^①。

b)把一个瓶子塞进肛门里。

两种所谓“固定的”酷刑形式：

c)囚犯跪着，手臂平行伸在地上，手心翻过来朝天，上身和脑袋笔直。不准动一下。一个警察坐在囚犯后面的一张椅子上，用警棍迫使他一动不动。

d)囚犯站着，脸靠着墙，高举双臂，手紧贴墙。这里同样地，稍微动一下，稍微开始放松，就一阵毒打。

现在我们来明确一下，有两类受刑者：

1)知道一些事情的人。

2)什么也不知道的人。

1)知道一些事情的人在卫生组织里很少见到。当然，我们不是不知道某某爱国者在法国监狱里受过刑，但并未见他以病人的身分来这儿^②。

2)相反，那些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却经常上我们这儿来看病。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在扫荡或封锁时挨打的人。那些人也没作为病人上我们这儿来。我们专门谈这些没有组织起来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被捕，被带到警察所或审讯处，在那儿受审。

遇到的精神病景象

① 这类酷刑引起大量死亡。在这些高压灌肠后，肠黏膜受到各种损伤，引起肠穿孔。于是气性栓塞和腹膜炎屡见不鲜。

② 显然，我们讲的是一些知情而在酷刑下没有招供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大家十分清楚一个招供的阿尔及利亚人事后马上被杀。

a) 烦躁型的抑郁症: 4 例

这是些忧愁而没有实际焦虑的、抑郁的病人, 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他们逃避接触人, 且突然发展成非常强烈的激动, 始终难以理解这种激动的含义。

b) 神经性厌食: 5 例

这些病人有许多严重问题, 因为这种神经性厌食伴随着一种厌恶同他人的一切身体接触的恐怖症。例如护士走近病人试图碰他, 拉他的手, 他立即严厉地拒绝。不可能实施人工进食或给他服药^①。

c) 运动的不稳定: 11 例

这里我们同一些坐立不安的病人打交道。由于他们经常地离群索居, 他们难以接受和医生一起关起门来在诊室里。

在这第一部分的受刑者身上, 我们经常感到两种观念:

首先是“不公平的观念”。这些人几天几夜地无故受折磨后似乎身上打破了一些东西。这些受害者中的一个曾有特别痛苦的经历: 经过好几天徒劳的施刑后, 警察们深信他们在跟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打交道, 他完全与民族解放阵线网的任何人不相干。尽管他们这样的相信, 一个便衣警察还是说: “别这么放松他, 把他再收紧一些。这样他出去后会依然安分守己^②。”

① 医务人员得日夜轮班看护病人作解释工作。大家懂得“稍微粗暴对待病人”的办法在这里不能正当地使用。

② 这种预防的酷刑在某些地区变成“预防的镇压”。因此在里韦, 当时一片平静, 而殖民者们因不想遭意外袭击(邻近地区开始扰动), 决定完完全全地消灭可能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单单在一天之内就杀了四十多个阿尔及利亚人。

然后,“对一切道德论据漠不关心”。这些病人认为没有正当的理由。受刑者的理由是弱者的理由。因此首先应该关心增加自己的力量,而不要提一件诉讼的法律依据问题。只有力量说了算。

2号小组——上电刑之后

在这小组中我们列入了主要受电刑的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的确,以前电是酷刑方法总体的一部分,但从1956年起,某些审讯专一使用电刑。

遇到的精神病景象

a)局部化或普遍化的体觉违和:3例

病人感到浑身发麻,有别人在拉他的手、脑袋爆裂、别人咬掉他舌头的印象。

b)无情、意志缺失、冷淡:7例

这是些无生气的病人,没有主意,萎靡不振,过一天算一天。

c)对电具有恐怖症似的害怕

害怕触及开关,害怕开收音机,害怕电话。医生绝对不可能仅仅提及电击疗法的可行性。

3号小组——在“真理血清”之后

我们知道这种疗法的原则。面对一个似乎遭受谈话所不能

表达的内部无意识冲突折磨的病人，我们借助化学检查的方法。静脉注射戊硫巴比妥是最通常使用的物质，目的在于使病人摆脱那似乎超越他可能接受的冲突。医生采取治疗措施是为了把病人从这“异物”中解放出来^①。然而，我们发觉要控制渐渐解除物理要求有困难。并不少见惊人的恶化或出现绝对无法解释的新景象。因此，我们一般地多少放弃这种方法。

在阿尔及利亚，军医们和精神病医生们在警察所有很大可能进行实验。如果说在神经官能症中，戊硫巴比妥扫除那些对抗产生内部冲突的障碍，那么它也应该能够粉碎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的政治障碍并便于获得囚犯的招供而不需要借助电（医学表达是要免除痛苦）。这是“破坏性战争”的医疗形式。

概要如下。首先：“我是个医生，我不是个警察。我这儿是在帮助你。”这么做着，几天以后，我们获得囚犯的信任^②。

然后：“我来给你打针，因为你异乎寻常地有点神经失常。”好几天中，我们着手进行随便怎样治疗：维他命、强心药、血清、甜味。第四或第五天，戊硫巴比妥静脉注射。审讯开始。

遇到的精神病景象

a) 口头刻板症

病人连续不断地重复这种类型的句子：“我什么也没说，必

① 事实上，冲突一点也不是外来的。它只是人格积极发展的结果，里边不会有“异物”。倒不如说这是个合成的病体。

② 我们同样引用鼓励“法国人参与”小组的精神病科医生的情况，他们因被指派鉴定囚犯，一开始接触就习惯于宣称他们跟辩护律师交情深厚并表明他们两人（律师和他）将把囚犯从那儿解救出去。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受鉴定的囚犯被处决了。这些精神病科医生在我们面前吹嘘这种战胜“抵抗”的漂亮办法。

须相信我,我没说话。”这种刻板症伴有永久的焦虑。实际上,病人经常不知道是否人家从他那儿挖得情报。对于被保卫的事业和可能说出他们姓名和地址的弟兄们的那种负罪感,悲剧性地沉重压在心里。在这种意识极差的情况下,任何的肯定都不能使他重趋平静。

b)不透明的智力或感官知觉

病人不能确认某个觉察到的事物的存在。掌握了一种推理,但不加区别。根本分不清真假。一切都是真的但同时一切又都是假的。

c)害怕一切单独谈话的恐惧症

这种害怕来自对可能随时重新受审的敏感。

d)抑制

病人存有戒备:他逐字逐句记下被提出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字地起草如何对答。从中感到几乎是抑制,带有心理上的减弱,中断句子,回顾过去,等等。

一目了然,这些病人固执地拒绝一切静脉注射。

4号小组——洗脑以后

最近在阿尔及利亚对“心理活动”谈得很多。我们不想对这些方法进行危象的研究。我们这里局限于提及这些方法的心理上后果。在阿尔及利亚有两种通过洗脑的行刑中心。

I —— 对知识分子

这里的原则是引导囚犯起某种作用。我们看到这反映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学流派^①。

a) 进行合作活动

知识分子受劝诱合作,一面设想这合作的理由。于是他不得不过一种具有两重性的生活: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爱国者,就像是个从活动中预先退出的人一样。从事的活动目的是从内部打击那些构成民族良心的分子。他不仅应该合作,而且人们命令他“自由地”同反对派或持保留意见者们辩论并说服他们。这就是引导知识分子把注意力放到爱国者们的身上,因而导致他充当告密者的一个漂亮方法。如果偶尔他肯定找不到反对派,人家就给他指明那些反对派,或要他好像是反对派那样地干。

b) 作有关法国事业和殖民化的法律依据的报告

为了搞好这项任务,人们周围广泛地配备了“政治顾问”:本地事务的官员们,或还要好的顾问:心理学家、社会生活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

c) 获取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论据并一一驳倒

阿尔及利亚不是个民族,从来不是个民族,永远不是个民族。

① 人们知道在美国发展了社会心理学的潮流。这一流派的支持者们认为当代个人的悲剧是他不再起作用,社会机制逼得他只是个齿轮了。由此提出使人能在真正游戏活动中起作用的治疗学。人们起随便什么样的作用,甚至在同一天内变换作用,人们能象征性地处于随便是谁的地位。美国的工厂精神病科医生似乎大量地对工人群体进行精神治疗。果然使他们能把自己视为与英雄等同。劳资关系的紧张因而大大缓和。

没有“阿尔及利亚人民”。

阿尔及利亚的爱国主义是个荒谬。

“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部队”是野心勃勃者、犯罪者、上当受骗的可怜虫。

每个知识分子应该轮流地作一个有关这些主题的报告，且报告应是说服人的。每个月底给打分和总计分(臭名昭著的“奖赏”)。这些分用作是否决定开释该知识分子的评估因素。

d) 过极其不正常的集体生活

独来独往是种造反行为。始终跟某个人在一起也是如此。沉默也是违禁的。必须大声说出想法。

证明

这儿说的是一个被拘禁和接受了几个月洗脑的大学教员。一天，集中营的负责人们祝贺他取得了进步，并对他宣布他即将被释放。

他知道敌人的阴谋诡计，防止把这消息当真。实际上，方法是向囚犯宣布出狱并在确定释放的日子前几天组织一次集体批评会。在批评会结束时，于是经常作出决定延迟释放，因为囚犯似乎并未表现出所有的最终治愈迹象。出席批评会的心理学家们说这会突出了民族主义毒害的顽固性。

然而这一次，不是要花招。这个囚犯是彻底被释放了。一出监狱，这个前犯人在城里和自己家里对自己曾如此好地起到作用感到满意。他很高兴能在民族斗争中重又就位，并已试图同他的负责人们建立联系。这时刻一个烦扰和可怕的念头闪过头脑。他可能没欺骗谁吧，没骗监狱看守，也没骗同监人，尤其

是也没欺骗自己吧。

结局该是如何？

还是这么回事，必须消除犯罪的假设。

遇到的精神病景象

a)厌恶一切集体讨论。一有三四人的会面，抑制就重新出现，并施以特别严密的不信任、缄默不言。

b)不能作解释和捍卫所持的立场。通过对比的一对对地展开思想。一切被肯定的事物可以于同时以同样的力度被否认。这当然是我们在这一类中遇到的最痛苦的一伙。强迫性的人格是为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服务的“精神病学作用”的成果。

II 一对于非知识分子

在如贝鲁瓦吉耶的那些中心里，不能再从主观出发来改变个人的态度。相反，依靠摧残肉体希望民族觉悟瓦解。这是真正的修正。以不施刑或可能给予进食来表示奖赏。

a)必须承认自己不是民族解放阵线。必须成群结队地大声地说。必须重复几个小时。

b)然后，必须承认自己曾经是民族解放阵线，但明白这不好。于是：打倒民族解放阵线。

这个阶段之后，到另一个阶段：阿尔及利亚的未来是法国的，只能是法国的。

没有法国，阿尔及利亚回到中世纪。

最后，我们是法国人。法兰西万岁。

这里遇到的错乱不严重。是身体不适和痛苦，需要休息和
平静。

系列 D

心身紊乱

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增加了精神错乱和有利于特异疾病气氛的出现。除了酷刑病理学、受刑者病理学和阿尔及利亚的许许多多施刑者的病理学外，一种气氛病理学，它通常使开业医生当着他们理解不了的病人的面说：“所有这一切将会随着这场圣战结束。”

我们提议把阿尔及利亚人遇到的病例在这第四系列中，其中有些人被关进了集中营。这些病的特点是属于心身型的。

人们把全部器质性紊乱^①——冲突的环境促使这种紊乱出现——叫作心身病理学。心身的，因为决定论的由来是心理的。这种病理学被看作作出反应的机制的一种方式，就是说适应他碰到的冲突的机制，错乱既是症状，又是思想上的毛病的消除。更确切地说，大家一致认为机制（再次涉及内脏皮层的统一性，古人的身心的统一性）通过糟糕的、但总之是省钱的道路超越了冲突。机制选择了最小的痛苦来避免了大灾难。

总的来说，这种病理学今天非常著名，尽管我们认为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放松疗法、催眠暗示）是十分偶然的，完全

^① 这一表达理想主义观点的称谓越来越被废弃了。实际上从苏联的工作成果——尤其是巴甫洛夫——处承袭的内脏皮层的术语至少有利于把大脑放回原处，即把大脑看作是心理现象转化的模具。

是碰运气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遭轰炸时和在苏联居民被包围时,尤其在斯大林格勒,出现错乱的描述增加了。现今,人们完全知道不需要被枪弹打伤,就能在身体和精神上备受战争生活之苦了。和一切战争一样,阿尔及利亚战争创造了它那份内脏皮层的疾病。如果把下面 g 组除外,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所有错乱是在“常规”战争之际描述的。我们觉得小组 g 是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特有的。这种病理学特别形式(普遍肌肉挛缩)在革命爆发之前已引起注意。可是描述这病理学形式的医生们把它变成土著天生的伤痕,他神经系统的古怪之处(?),有人肯定在这神经系统中找到被殖民者的外锥体系统占优势的证明^①。这种挛缩实际上只不过是姿势的附带物——在被殖民者的肌肉中存在着他那僵硬、缄默寡言、违拗殖民当局的态度。

遇到的精神病景象

a) 胃溃疡

为数众多。主要在夜间疼痛,伴有大量呕吐,消瘦、忧愁和闷闷不乐,个别的则易怒,应该指出这些病人大部分是青年:18—25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决不建议外科手术。进行过两次胃切除术。这两个病例中准是在同一年进行手术治疗的。

b) 肾绞痛

这里我们发现夜间疼痛到极点。显然几乎决没估计到。这肾绞

① 越是在神经学方面有教养,就越不是外锥体的,如同大家所见,一切似乎协调一致。

痛可能突然出现,在 14—16 岁的一些人身上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c) 妇女月经紊乱

这种病理学众所周知,所以我们不在这上面多说。妇女们或是三四个月不来月经,或是月经来时剧烈痛经引起性格和行为上的反应。

d) 由于特发的颤抖而嗜眠

这是些年轻的成年人,由于全身的细微颤抖而不准一切休息,这种颤抖使人联想一种彻底的帕金森氏病。而且还有一些“科学头脑”可能会使人想起外锥体定论。

e) 少白头

从审讯中心里死里逃生的人,他们的头发突然小块小块地、大片大片地或全部变白。这些紊乱经常引起十分虚弱无力以及性冷淡和性无能。

f) 阵发性的心动过速

心律骤然加快:每分钟 120、130、140。心动过速引起恐慌、濒临死亡的印象,发作末了表现为大量出汗。

g) 全身挛缩,肌肉僵直

这涉及到男病人,他们逐渐地(有两例是突然出现)感到难以做某些动作:上楼梯、快走、跑步。这种困难在于特殊的僵硬,它使人不可抵抗地想到脑子的某些区域受到损伤(中央基底神经

节)。这是在扩展的僵硬,且进行的步伐很小。下肢的虚性屈曲几乎不可能。得不到任何的放松。挛缩到顶点时不能作丝毫的有意识放松,病人似乎是一块东西。脸部毫无表情,但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定向力障碍。

病人似乎不能“使自己的神经不紧张”。他永久地紧张,在生死之间等待。如同他们中有一人对我们说道:“你们看,我已经僵硬得像个死人了^①。”

^① 多余地补充一句,这里不涉及歇斯底里的挛缩。

从北非的犯罪冲动到民族解放战争

不应只是为了自己人民的自由而斗争。也应在整个斗争时期中重新学习这个人民，并首先学习自己人的重要。应该回顾历史的道路、使人类受难的历程，并促使其人民和别人会合，使之成为可能。

实际上，参加武装斗争、民族斗争的战士意欲一天天地估计殖民压迫使人类丢失的尊严。战士有时有种使人精疲力竭的印象：他必须使其全体人民恢复，把他们从井里、从洞穴中拉上来。战士经常发觉他不仅应该追击敌人武装，而且还得追踪被殖民者体内凝聚的绝望核心。压迫时期是痛苦的，可是战斗却在使被压迫的人重新获得新生的同时，发展着一个极有成果和决定性的回复权利的过程。一个人民的胜利战斗不仅仅奉献其权利的获胜。它为这稠密的人民谋得协调和一致。因为殖民主义只是使被殖民者失去个性。这种失去个性在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集体方面同样也十分突出。于是被殖民的人民降为一个只是受殖民者左右的个人总体。

一个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根据情况导致他或是抛弃那些殖民民政管理部门、军事占领、经济剥削在其意识中扎下的所谓真理，或是使这“真理”大规模地突然发展。而只有战斗能真正地驱除这些谎言，它贬低和完全歪曲我们中最有

觉悟者。

在巴黎或埃克斯,在阿尔及尔或巴斯特尔,我们曾经有多少次见到一些殖民者强烈抗议所谓的黑人、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偷懒。然而,在殖民制度里,一个农民工作积极,一个黑人拒绝休息可能仅仅是些不正常的个性,这难道丝毫不是真的。被殖民者的懒惰是对殖民机器的有意识的破坏;在生物学方面,这是出色的自我保护体系,不管怎么说这是给占领者控制全国带来某种拖延。

森林和沼泽的抵抗外国深入是被殖民者的天然同盟。必须理解这点并停止去论证和肯定黑人是勤劳的劳动者,阿拉伯人是特殊的开垦者。在殖民制度里,阿拉伯人的真理,黑人的真理,就是袖手旁观,不帮助压迫者更沉溺于掠获物。还未使自己的政治觉悟成熟和决定不接受压迫的被殖民者的责任是完全使自己夺取最小的军功。这才是不合作的十分具体的表现,无论如何,是合作减到最少的表现。

这些适合被殖民者和劳动之间关系的意见同样可以适合被殖民者遵守压迫者的法律,按时纳捐税,被殖民者和殖民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制度里,感谢、真诚、荣誉是些空话。最近几年里,我有机会证实一个十分传统的资料:荣誉、尊严、信守诺言只是在民族和国际的一致性范围内才能表现出来。既然你们和与你们同样的人像狗一样地被清除,你们只有用尽办法来恢复你们的人的重要。因此你们应该尽可能地重压在你们的施刑者身上,使他那某些地方失去的理智最终重又找得它普遍的空间。在最近几年里,我有幸看到在战斗的阿尔及利亚,荣誉、献身、热爱生活、蔑视死亡,这一切都能具有非同寻常的形式。不,问题不是在于歌颂战士们。这里涉及殖民主义者中最狂热的分子没错过去作平庸的观察:阿尔及利亚战士有不习惯战斗和死亡的

样子,而当关系到保护人民或掩护弟兄们时,任何对伊斯兰或升天堂的参考都不能解释这种他本身的勇敢。这种使人束手无策的缄默不言——当然身体叫喊——,这种不开口,压垮了行刑者。我们说这里我们重又发现那十分旧时的法规:当民族开始行走,当人类要求并同时肯定自己无限的人道时,禁止随便哪个生存的成员袖手旁观。

在殖民主义证实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那些特点中,他那可怕的犯罪吸引住我们。1954年前,法官、警察、律师、记者、法医一致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成为问题。他们肯定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犯人。制定了一种理论,带来一些科学证据。这个理论是二十多年的大学教学的对象。一些学医的大学生逐渐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教学,那些精英在将就了殖民主义后,将就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天生毛病。天生的懒鬼、天生的说谎者、天生的小偷、天生的罪犯。

我们打算在这里陈述这一正式的理论,提醒它的具体基础和科学论证。接着我们重说事实并力图诠释这些事实。

“阿尔及利亚人经常杀人。”这是个事实,法官们会对你们说五分之四的预审过的案件与打人和受伤有关。他们确认在阿尔及利亚犯罪率是最重大之一,世界最高者之一。没有轻罪犯人。当阿尔及利亚人——这适合所有的北非人——被剥夺法律权利时,始终是最大限度的。

“阿尔及利亚人野蛮杀人。”首先,喜欢的武器是刀。“熟悉这国家”的法官们就这问题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哲学。例如卡比尔人喜欢手枪和步枪。平原的阿拉伯人偏爱刀。某些法官寻思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是否不要求见血。他们会对你们说,阿尔及利亚人需要感觉血的热乎劲,需要沐浴在受害者的鲜血中。

这些法官、警察、医生认真地论述穆斯林的灵魂和血的关系^①。有些法官竟至于说阿尔及利亚人杀一个人首先和特别割他的喉咙。阿尔及利亚人的野蛮尤其表现在许多伤口上,其中有些伤口是死后带上的,毫无用处。尸体剖检无可辩驳地确立了这件事:凶手通过给予同样严重的伤,给人印象他要杀数不清多少倍数量的人。

“阿尔及利亚人无缘无故地杀人。”法官和警察面对凶杀的理由经常是目瞪口呆:一个动作、一个影射、一句暧昧的话、围绕共有的一棵橄榄树的一次争吵、一只在八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上瞎逛的牲口……面对这种凶杀,有时候面对这双重或三重的凶杀,所追究的原因,为这些凶杀辩护并作为依据的理由是令人失望地平庸。经常从中得出社会团体掩盖了真正的凶杀动机的印象。

最后,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进行的偷盗总是成为伴随或不伴随着谋杀的破坏窃盗,以及一切对业主的袭击案情。

所有这些围绕阿尔及利亚人犯罪的成堆因素似乎足以说明一种系统化的未遂罪的成立。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曾作过类似的、但比较不太含蓄的评论,越来越涉及北非的犯罪问题了。30多年中,在阿尔及尔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波罗教授的长期领导下,好几个小组明确指出这种犯罪的表达方式并对此提出一种社会学的、功能的、解剖学的解释。

我们这里运用阿尔及尔学院的精神病学学派对这问题所作出的主要成果。我们要注意,20多年来所进行的研究的结论是

^① 我们的确知道伊斯兰教徒必须在没有核实那动物血流空之前就不吃其肉。所以动物是割喉宰杀的。

精神病学讲台上的授课内容。

就这样阿尔及尔学院毕业的阿尔及利亚医生得明白和记住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罪犯。而且,我想起我们中间某个人十分认真地陈述这些学到的理论,并补充道:“这难以相信但这是科学地确定的理论。”

北非人是个罪犯,他的捕食性本能是众所周知的,他大量的袭击是有目共睹的。北非人喜欢过激的人,因此决不能完全信任他。今天是最要好的朋友,明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没有分寸,对笛卡尔主义根本一窍不通,平衡、冷静沉着、权衡,这些观念与他最内在的禀性相抵触。北非人是个粗暴的人,遗传下来的粗暴。他不可能使自己遵守纪律,疏导自己的冲动。是啊,阿尔及利亚人是与生俱来的易冲动的人。

但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冲动是非常好斗的且通常是杀人性质的。这样人们得以解释忧郁的阿尔及利亚人的非正统行为。在阿尔及利亚,法国精神病学科医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习惯于有患忧郁症的病人在场时害怕他自杀。然而,患忧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却是杀人。这种始终伴有自我谴责和自我毁灭倾向的心理意识病在阿尔及利亚人身上具有异端毁灭形式。患忧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自杀。他杀人。这就是波罗教授充分研究过的、他学生蒙塞拉的论文中所述的杀人的忧郁症。

阿尔及利亚学派如何分析这种不正常呢?阿尔及尔学院说,首先,自杀是改变自己,是考虑自己,是在实行内省。然而,阿尔及利亚人抗拒内心生活。北非人没有内心生活。相反,北非人通过扑向接近他的人们来摆脱自己的心事。他不作分析。既然忧郁症确定是一种心理意识的病,那么十分清楚,阿尔及利亚人只能产生假忧郁症,因为他意识不稳定和道德观念薄弱也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援引法国作家所提出的两类因果关系,就

完全理解阿尔及利亚人这种对分析形势和组织精神全貌的无能。

首先关于智能。阿尔及利亚人是个头号低能者。如果想理解这个资料,首先应提醒阿尔及尔学派建立征候学。其中说到土著表现出下面那些特点:

- 没有或几乎没有感触性;
- 轻信和易感受过激暗示;
- 难以根除的固执;
- 心理上的幼稚状态,不如西方孩子的好奇心;
- 容易偶发症状和癔病反应^①。

阿尔及利亚人不感知整体。他给自己提的问题总是关于细枝末节并排除一切综合。点画法的,紧紧抓住物体,陷入细节中,对思想无动于衷,抗拒概念。言语表达降到最少。动作总是冲动和挑衅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能从整体出发诠释细节,把个别因素绝对化并把部分当作整体。因此他面对小部分的煽动,面对诸如一棵无花果树、一个手势、一只绵羊在他的土地上这类微不足道小事会有全面反应。天生的好斗给自己寻找途径,只消最小的借口。这是一种纯粹状况的好斗^②。

阿尔及利亚学派放弃描述阶段,开始从事说明方面。波罗教授该是于1935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讲法语的精神病医生和神经科医生代表大会上,确定他理论的科学基础的。在讨论巴

① A. 波罗教授《心理医学史》,1918年。

② 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庭的审判长嘴里,这种阿尔及利亚人的好斗性通过爱好“阿拉伯骑兵的骑术表演”表现出来。他于1955年说道:“认为整个这种反抗是政治性的,那是错误的。这种反抗应该不时地转变成他们所拥有的这种对战斗的爱好!”人种学家认为建立一系列易于疏导土著的全面好斗本能的测试和投射游戏可能会在1955—1956年停止在奥雷山的革命。

鲁克关于癔病的报告时,他指出“北非的土著的高级皮层活动发展不大,是原始人,他那主要呆板单调和本能的生活受其间脑控制”。

为了更好估价波罗教授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必须提醒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比较时,它是皮层化的。间脑是大脑最原始部分之一,人首先是皮层控制的脊椎动物。

波罗教授认为北非土著的生活是由间脑的本能控制的。这等于说北非土著是没有皮层的。波罗教授并不回避这个矛盾,并于1939年在《南方医学和外科》中,他同他的学生,现为阿尔及利亚心理学教授絮泰合作明确指出“原始状态并不是缺乏成熟,并非在智力的心理现象发展中显著地停止。它是一种发展完毕的社会条件。它逻辑地适合有别于我们生活的一种生活”。最后,教授们涉及学说的基础本身:“这个原始状态不仅仅是由一特殊教育而产生的方式,它有更深的基础,我们甚至想它该在形状结构的,至少神经中枢的动力分级的特别安排中有其基础。”正如人们所见,阿尔及利亚人的冲动、他杀人的特点和频繁,他恒常趋向衰退,他的原始状态并不是个偶然。我们面对一个协调一致的行为,一个可科学地解释清楚的、协调一致的生活。皮层的作用——如果存在皮层作用的话——是十分脆弱的,实际上并不融合在生存的动力中。因此既无神秘之处也无反常现象。殖民主义者犹豫委托土著担任职务,不是因为种族主义或家长作风,而仅仅是科学地评价被殖民者的生物学方面有限的可能性。

让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卡罗泰尔博士请教对非洲所作的结论以结束这一回顾。这位国际专家在一本1954年出版

的书中^① 集中了他评论的要点。

卡罗泰尔博士在中非和东非行医,可是他的结论印证北非学派的结论。的确,这位国际专家认为“非洲人很少运用他的额叶。非洲的精神病学的所有特点可以与额头迟钝联系起来^②”。

为了使别人明白他的结论,卡罗泰尔博士作个十分生动的比较。他于是提出正常的非洲人是个“动了脑叶切开术的欧洲人”。我们知道盎格鲁撒克逊学派曾认为对一大部分的大脑实施排外术是医治某些精神病严重形式的根本疗法。被确认的人格严重解体使得从此放弃了这种方法。根据卡罗泰尔博士的看法,存在于正常的非洲土著和动了脑叶切开术的欧洲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明显。

卡罗泰尔博士在研究了在非洲行医的一些不同作者的成果之后,向我们提出一个结论,这结论奠定了非洲人的统一观念。他写道:“那些病例资料不涉及欧洲人类别。它们是在东非、西非、南非的不同地区收集到的,且总体上,那些作者中各人只很少知道或不知道其他人的成果。因此这些成果的主要相同处完全引人注目^③。”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指出卡罗泰尔博士把 Mau-Mau 的造反确定为无意识失望征候群的表达,通过一些惊人的心理适应可能科学地避免这种征候群的再现。

因此一种少有的表现——阿尔及利亚人犯罪的经常性,犯罪动机不值一谈,杀人的性格和总是公开带血腥味的相骂打架——给观察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提出的解释成了教材,它似

^① 卡罗泰尔,《非洲人的正常的病理学心理状态》,“人种精神病学研究”,马松(Masson)出版社。

^② 同书 176 页。

^③ 同书 178 页。

乎归结为下面的解释：北非人大脑结构的布局同时阐述了土著的迟钝，他智力上和社会性的无能以及他几乎是动物般的冲动。北非人的犯罪冲动是神经系统的某个布局的行为范畴中的标注。这是一种神经学上易理解的，属于事物本质中——生物学地组成的事物——的反应。额叶在大脑活力中的不融合说明了迟钝、犯罪、偷窃、强奸、撒谎。而这个结论是一位副省长——今天是省长——给我的，他说：“必须用一些要求严格和铁面无私的干部反对这些盲目听从自己本性规律的自然状态的人。必须驯服本性，而不是征服本性。”使之守纪律、训练、制伏和今天的安抚，是殖民主义者在被占领的领土上使用得最多的词汇。

我们之所以长时间地重复殖民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提出的理论，倒不是为了指出他们的平庸无聊和荒谬，更多的是为了开始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其实，在对革命提出的那些问题中，在可能会引起那些跟政治说明和使人认清真相同样水平的辩论问题中，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问题只代表一个防御分区。但恰恰是围绕这个主题所举行的谈话达到这种有效果的程度：使我们能深入并更好地勾勒出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概念。当在革命实践中人们在干部和战士们面前开始讨论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问题时，如果人们陈述革命以前时期的罪行、不法行为、偷盗的平均数字，如果人们解释一个罪行的面貌、不法行为的频繁是存在于男女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且每个人明白这作用；如果人们目睹出于意愿的犯罪型阿尔及利亚人或北非人这个概念的解体——这个概念也钉入阿尔及利亚人的意识中，因为毕竟“我们容易发怒、爱打架、坏……就像这样……”，那么，这就对了，可以说革命进步了。

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必须随时随地阐明、揭穿、追踪自己身上

的人的侮辱。不应等待产生新人的概念。不应期待在不断地革命变革中,人不知不觉地转变。这两个过程有关系是千真万确的,但必须帮助觉悟。革命实践如果想全部解放和特有效果,则要求不继续存在任何异常的东西。人们特别感到必须把事情一揽子包在自己身上,解决一切,负责一切。于是意识并不厌恶走回头路,必须的话停步不前。所以在一个战斗部队的阵地的进展中,结束埋伏并不意味着休息,而正是更进一步注意的时候,因为一切均应同时并进。

对,阿尔及利亚人自发地认为法官和警察有理^①。因此必须把阿尔及利亚人在自我陶醉方面感到的实际犯罪性质当作真正的男子气概的表现,并把这问题建立在殖民史建立的基础上。例如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犯罪根本不同于直接在殖民剥削下的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

第二件事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实际上是进行犯罪。阿尔及利亚人互相偷盗、互相撕打、互相杀人。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很少攻击法国人并避免同法国人骂架。相反,在法国,移民制造社会间、集团间的犯罪。

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减少了。犯罪尤其针对法国人,犯罪动机根本是新的。一种反常现象大大地帮助我们认清战士们的真相:自 1954 年以来,我们注意到普通法的罪几乎消失。不再有争吵,不再有因一些毫无意义的芝麻绿豆小事而导致死人事件。不再因我妻子额头或左肩被旁边的人觉察而火冒

^① 况且十分清楚对于这种由欧洲人制造的形象的鉴别是十分矛盾的。的确,欧洲人似乎说明——同样情绪矛盾地——阿尔及利亚人粗暴、激动、野蛮、妒忌、自豪、骄傲,他为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为一句话而拿生命作赌博,等等。让我们顺便指出,同法国的法国人相对照,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越来越倾向于与阿尔及利亚人的这个形象同化,与法国人相反。

三丈。民族斗争似乎疏导了所有的怒火,把所有的情感或激情的活动都民族化了。法国审判员或律师已经发现这一点了,但必须战士意识到这点,引导他知道这事的道理。

继续解释。

是否应该说战争——最终社会化了的好斗性的首要表达场所——把天生的杀人动作引向占领者方面?社会的大动荡减少犯罪的精神错乱的频率,这是个平庸的看法。因此人们完全可能用存在战争来解释这阿尔及利亚人犯罪的退步,这战争把阿尔及利亚分割为二,同时把司法和行政管理机器扔给敌方。

然而,在那些已解放的马格里布国家中,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在解放斗争期间保持原状并随着独立而逐渐明确了。因此,似乎殖民的背景相当独特,足以允许对犯罪作重新说明。这就是我们为了战士们所做的。今天在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犯罪并非阿尔及利亚人天生性格及其神经系统组织的结果。阿尔及利亚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使那些真正的活动家涌现出来。人们指出,在殖民的环境里,一些土著在这些人之间。他们有互相充当屏障的趋势。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隐藏着民族敌人的情绪。而当被殖民者在一天 16 个小时的劳累之后,倒在自己的席子上时,一个孩子的哭声穿过布帘隔墙,阻碍他睡觉,仿佛出于偶然,这是个阿尔及利亚小孩。当他去向杂货商央求一点儿粗面粉或油——他已欠这杂货商几百法郎了——而遭到拒绝这种照顾时,一股巨大的仇恨和强烈杀人的欲望完全占据了他,而这个杂货商却是个阿尔及利亚人。当他躲避当地司法行政长官几个星期了,有一天被这长官堵住逼他缴“税”时,他甚至来不及去恨欧洲行政部门主管官员;当地的司法行政长官在跟前引起他的仇恨,而这长官是个阿尔及利亚人。

由于土著处于每天有杀人企图的危险境地:饥饿、未付房租

被逐出门外、母亲没奶水、孩子们骨瘦如柴、工地关门、失业者像乌鸦般在经理周围游荡，他竟至于把他的同类看作是死敌。如果他的光脚被路中间的一块大石头擦破了皮，那是一个土著把石头放在那儿的，而他准备采摘的几个橄榄却被 X 的孩子们在夜里吃了。对，殖民时期在阿尔及利亚和别处，人们为了一公斤的粗面粉可以做许多事。可以杀好几个人。要明白这些事必须有想像力，或记忆力。在集中营里，一些人为了一块面包互相残杀。我想起一个可怕的场面。这是 1944 年在瓦赫兰（奥兰）。从我们等着上车那地方的兵营，军人们把几块面包扔给几个阿尔及利亚孩子，他们疯狂和仇恨地争夺。兽医们提及在家禽饲养场里看到的著名的“啄的顺序”^①来说明这些现象。受分配的玉米确实是你死我活的竞争目标。某些飞禽，最凶猛的吞吃了所有的谷物，而另一些不太好争斗的则眼看着瘦下去。一切殖民地趋向变成一个大家禽饲养场，变成一个集中营，在那儿刀的权威是惟一的法律。

在阿尔及利亚，自民族解放战争以来，一切都变了。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全部储存可以在一个晚上供给路过的一个连。家里惟一的一头驴可以借出保证运送一个伤员。而在好几天后当物主得知他的牲口被一架飞机扫射打死时，他并不诅咒和威胁借驴者。他并不怀疑牲口之死，而是不安地询问伤员是否安然无恙。

在殖民制度下，人们为了一公斤的面包或一只微不足道的绵羊……可以什么都干得出来。在殖民时期，人和物质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历史的关系，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对于一个被殖民者，在像阿尔及利亚那样的受压迫环境里，生存丝毫不不是体

^① 在鸟类社会，下辈被上辈所啄，其间有一定的顺序。——译注

现价值,不是投入一个世界的协调一致和有成果的发展中。生存就是不死亡。生存就是维持生命。每个椰枣是一个胜利。这胜利不是艰苦劳动的成果,但却是一种带有好像生命获胜味道的胜利。因此偷椰枣,允许自己的绵羊吃邻居家的青草,并不是忽视别人的所有权,违反或不遵守法律。这是杀人的企图。要想理解偷盗是杀人的企图,而不是个不正常或不合法的行为,必须在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利亚见到过一些男女几个星期地到谷底寻找土并用篮子把土运上去。因为惟一的前景是这个胃越来越缩小,当然索取也越来越少,但不管怎么说,必须满足这个胃。责怪谁呢?法国人同警察、军队和坦克一起在平原。山上只有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上面是上苍和它那关于九泉之下的诺言,下面是法国人和他们十分具体的许诺:监狱、用警棍打人、执行。人们被迫支撑自己。在这儿发现自己的这种仇恨的核心,它构成实行种族隔离的社会中根本冲突的特点。

因此,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他的冲动、他那杀人的暴力行为,不是神经系统的组织,也不是性格的古怪,而是殖民环境的直接产物。阿尔及利亚战士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不怕对殖民主义安在他们头上的信仰提出诉讼,他们明白了每个人是另一人的屏障,而实际上每个人如果扑向另外那个人则就是自杀,这些在革命觉悟中该有极大的重要性。再说一遍,被殖民者战斗的目标是结束统治。但他也应该注意清除压迫插在他身上的所有不真实。在一个如存在于阿尔及利亚的那样的殖民制度里,殖民主义公开主张的思想不仅影响少数的欧洲人,也影响阿尔及利亚人。完全解放是有关人格的所有部门的解放。埋伏或交火,拷打或杀害他的弟兄们使得加强决心去战胜,使头脑不清的人面目一新和给想像提供养料。当民族全部地有进展时,新人不是这个民族的后天产物,而是与这民族共存,同这民族一起

发展,一起获胜。这个辩证的要求解释了对已被改变了的殖民化和表面的改良所持的保留意见。独立并不是一个用以驱邪的词,而是一个真正获解放的男女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他们是所有使社会可能彻底改变的物质手段的主人。

结论

好吧,同志们,最好从现在起决定改变意见。我们必须动摇我们所处的那种暗无天日,从黑暗中冲出去。新的太阳已经升起,它该发现我们是坚定的、渴望和坚决的。

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梦想,抛开我们新生活之前的那些陈旧信仰和友谊。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效果的、冗长单调的叙述或令人恶心的模仿上。让我们脱离这个欧洲,它没完没了地谈论人,而一面它却到处逢人便杀,在它自己街上的所有角落,在世界各地杀人。

几个世纪来,欧洲使人停止进步,并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光荣而奴役人;几个世纪来,欧洲以所谓的“精神冒险”的名义,扼杀了几乎整个人类。看看它今天在原子蜕变和精神分裂之间摇摆。

然而,在欧洲,在创造方面可以说它是完全成功的。

欧洲热心地、恬不知耻地、粗暴地领导世界。你们看看它的遗迹阴影延伸得多么长和增加得多么多。欧洲的每个遗迹使空间的界限和思想的界限破裂。欧洲无视一切谦逊、但也不接受一切关心、一切体贴。

它只对人表现出精打细算、气量狭小,是残忍的杀人犯。

因此,兄弟们,怎么不明白我们有比替这个欧洲服务更好的事要做呢。

这个欧洲从未停止谈论人,从未停止宣称它只关心人,今天我们知道对它精神的每一个胜利,人类付出了怎样的痛苦啊。

同志们,欧洲的把戏最终结束了。应该找另外的事。今天我们什么都可以干,只要不笨拙地效仿欧洲,只要不痴迷于赶上欧洲的欲望。

欧洲达到这样快的速度、疯狂和无序,以至于它今天避开一切领导者、一切理智,并可怕地昏头昏脑走向深渊。应该最快地远离这深渊。

然而确实我们需要一个榜样、一些模式和实例。我们中许多人认为欧洲的榜样是最完美的。然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却看到这种模仿把我们带到何种沮丧和失望的地步。欧洲的成就、欧洲技术,欧洲风格应该停止引诱我们和使我们失去平衡。

当我在欧洲技术和欧洲风格中寻找人时,我看到对人的一系列的否定,一大批的杀害。

人的状况、人的计划、为完成总人数增加的任务的人们之间的合作,这些都是全新的问题,要求真正的创新。

我们要决定不模仿欧洲并把我们的肌肉和脑子集中在新的方向,力图创造出欧洲未能使之获得辉煌成就的完整的人。

两个世纪之前,一个旧时的欧洲殖民地带头赶上欧洲。它——美利坚合众国——是那么成功,因此变成了一只集欧洲的缺陷、毛病和不人道于一身的庞然大物,且这些弊病达到了极端。

同志们,难道除了制造一个第三欧洲我们就没有别的事要干了吗?西方曾想成为精神冒险。欧洲是以精神的名义,以扩展欧洲精神的名义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和使自己的奴役合法化的,过去,它把五分之四的人类维持在其奴役之中。

是啊,欧洲精神有些怪诞的依据。整个欧洲想法向越来越

荒芜、越来越峻峭的地方延伸。人们就这样习惯于在那儿越来越少地见到人。

经常跟自己对话、越来越猥亵的自恋不断地给一种准谵妄铺床，大脑工作变成痛苦的，现实丝毫不像是活着的、在工作着的人的现实，而是给自己制造一些词，一些词的不同组合，及词中含义所产生的紧张。然而曾经有些欧洲人鼓励欧洲劳动者打破这种自恋并同这种不现实决裂。

欧洲劳动者普遍地没有响应这些号召。因为劳动者们也自认为与欧洲精神那奇妙的冒险有关联。

解决人类那些大问题的所有因素在不同时刻曾在欧洲的思想中存在过。但欧洲人的行动没有完成属于他的使命，这使命在于强压这些因素，更改它们的安排和存在，改变这些因素，最后把人的问题提到一个无可比拟的高水平。

今天，我们看到欧洲的停滞。同志们，我们要避开这个僵化运动，在这运动中辩证法渐渐地变成了平衡的逻辑。我们重新再说说人的问题吧。再说说大脑的事实，整个人类的大脑质量问题，应该增加人类的连结，使其网络多样化和使其使命重新变得通人情。

弟兄们干吧，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不能玩后卫部队的把戏。欧洲做了它该做的，且不管怎么说它干得不错；我们停止谴责它吧，但坚定地对它说它不该再继续那么大叫大嚷了。我们不要再怕它了，因此停止羡慕它。

今天第三世界像一群巨人般地面对欧洲，他们的计划应该是试图解决这个欧洲未能解决的那些问题。

那么，是不是就必须丝毫不谈收效，不谈加紧，不谈速度。不对，这不是回归自然。这非常具体地涉及不吸引人们到一些毁伤他们的管理中去，不把一些使大脑很快闭塞和出毛病的速

度强加于大脑。不应该以追赶为借口使人陷于混乱,使他脱离自己、脱离自己的内心深处,使他精疲力竭,把他置于死地。

不,我们不想赶上任何人。但我们要随时随地、日以继夜地、在人的陪同下,在所有人的陪同下前进。问题在于别拉长队伍,因为每一行几乎察觉不到在它前面的那一行,且互相不再认识的人们越来越少相遇,越来越少交谈。

对于第三世界,问题在于重新开始人的历史,这历史既考虑到那些有时得到欧洲肯定的、罕见的好论题,但也考虑到欧洲的罪行,其中最可憎的是在人的内部,其功能的病理学上无所适从和其统一体的分散,在一个集体范围内,由一些阶级维持的血腥裂痕、成层现象、紧张,最后在人类广大范围内,根深蒂固的仇恨、奴役、剥削和尤其是把15亿人排斥在外所构成的那种苍白无力的种族灭绝。

人类期待我们的不是这种总体上猥亵和夸张讽刺的模仿,而是别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把非洲改造成一个新欧洲,想把美洲改造成新欧洲,那么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交给欧洲人。他们会比我们中最有才能的人做得更好。

但如果我们要人类前进一步,如果我们想使人类达到的水平与欧洲显示人类的水平不同,那么必须创新,必须发现。

如果我们想对我们人民的期待作出反应,那么必须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找答案。

更为甚者,如果我们想对欧洲人的期待作出反应,则不应扔回给他们一个对他们社会和思想的印象,甚至是一个理想的印象,他们对于社会和思想有时感到极大厌恶。

同志们,为了欧洲,为了我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必须脱胎换骨,发展一个崭新的思想,力图创建一个全新的人。

2002 年版后记

穆罕默德·哈比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境域,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官僚作风的社会主义不复存在。第三世界主义也如此。在它们的失败之前,发生各种各样的悲剧性事件和人类生命从未有过的贬值,当在 60 年代里,主动积极性转入受压迫人民方面时,这失败适合西方所有那些为自己的特权而惊惶不安的人。

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追索,那些工业大国当时被迫只得让出一些地盘。从此,在确信要走出黑暗及进入发展和民主,除了工业大国的道路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方面,最近的发展同这些工业大国作了较量。但事实上,工业大国更多地依靠经济和思想的影响以及它们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无论如何,第三世界危机的加深需要紧急总结后殖民时期和伴随或促进解放运动的思想。从这个角度,重新评价弗朗兹·法农的作品——特别是《全世界受苦的人》——十分重要,尤其因为所获得的有关革命动力的许多思想源自对阿尔及利亚经历

的看法,这种重新评价就更加重要,这经历——他在这本登峰造极的最后著作中的思考的源泉之一——经常被歪曲。

“法农主义”力量的理由之一,是它符合第三世界的“反对精华主义的尖子们”渴望列出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公式,这个公式不同于斯大林分子当时传播的削弱了的马克思主义那种公式。法农用自己的行动和对国内外敌人的认识来捍卫第三世界。我是于1959年5月在突尼斯认识他的,我们两人在那儿合作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筹划决策机构。我们对革命事件和关于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对否决忽视物质的合理化,共同地有着社会的诠释。我们的意见分歧针对他把动力作用授予农民,针对他相信一致的民族觉悟和他靠近宗教现象。关于这最后一点,由于环境——他同一些相当不可知论的战士接触——,法农不能估计出类拔萃的人的思想在阿尔及利亚的文化空间占据微不足道的位置。这种思想只是沧海一粟,它源自大部分比较易受宗教影响的人参加民族解放阵线。

但这对于《全世界受苦的人》的重要性毫发无损。在提出问题的部分和有先兆价值的部分中,此书都使我们能就革命理想的未来和它现在的低落进行深入的争论。“我们要把旧社会打得落花流水”:法农把这《国际歌》的思想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而人们不能理解他对马克思提供的理论进行否定的提问法。

一个革命的目的论化和普遍的提问法由于马克思而成形。对他那时代的彻头彻尾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只考虑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交替,并以资产阶级作为主角,无产阶级为次要角色。社会的其他阶级服从于这两个角色冲突的动力。无产阶级被视为历史的主题:他带来普遍真理,他是在挣脱锁链的同时解放全人类的力量。在这个分析里,被殖民者不在历史动力的中心。(其实,当法国共产党使殖民国家的命运服从

于“法国联盟”的前途时,它是处于这个逻辑:该是法国反资本主义革命给被殖民者——法国无产阶级的隶属同盟者——开辟解放之路。)

在俄国,民粹主义者们为俄国式区别原则作辩护并对马克思的论点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在他们的国家里与其进行无产者的革命,倒不如进行农民革命,且要避免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阶段,以便直接通向社会主义。面对这一异议,马克思对他的纲要插进一个修改(在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维拉·扎索乌利奇的一次通信中)并承认如果俄国革命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球,那么俄国革命将在俄国社会——当时是个广阔的农村和传统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下完成。马克思逝世后,他的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改变俄国例外那种想法:只有无产者和农民是革命的阶级。

因为列宁,革命模式表达发生转折:他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阶级斗争的原则,继续在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把革命列入世界计划中,但考虑那革命可出现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中,即在一些工业和城市成分薄弱的,因而大部分人为农民的社会里。救世主的对象依旧是无产者,但无产者的利益由一个政党承担,列宁认为,因为无产者被托付给了他自己,他自然而然地是工主义者。这不是马克思的意见。我们面对着另一种革命动力的观念,列宁是个实用主义者,且他的思想是等待事件发生给革命开辟道路的机会,不管是在东方——他见到在那里“世界革命的煽动性素材已成熟”(1908)——还是在欧洲。

随着1917年10月,一个主要农村国家发出革命的信号,但火花并未产生希望的大火。且社会主义是在惟一的一个国家里。

在共产国际中,一些未定型的“第三世界主义者”,塔塔尔人

苏丹·加利埃夫、印度人罗伊、印度尼西亚人唐·马拉卡期待运动使被殖民的人民成为改变的动力,而不仅仅如同马克西姆·罗丹松^①所指出的是一个运动战略的目标。他们的努力始终是徒劳,但通过许多波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毛泽东,和除他之外,由于弗朗兹·法农,这种思想取得进展。这两个人都强调农民革命:不再是由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引导被压迫人民进入斗争,而是这些人民的斗争将决定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一看法造就一些信徒,包括在欧洲。

但毛泽东与法农不同,他并不使他的战略“农村化”:无产阶级依旧是先锋,由共产党掺沙子。然而,法农进行改革。他不局限于对帝国主义作纯粹的经济分析。他也使名分和文化的冲突理论化,并试图指出真正的受苦人、绝对的受剥削者是那些被殖民者。西方的诉讼并不坚持在这种如同民族主义者身上的怪诞上面:普遍性的希望才是诉讼的动机。

因此,为第三世界的诉讼辩护词不是盲目的:法农意识到统治下的国家的物质基础和革命计划之间存在着差距。他并不忽略以发展和民主作抵押的社会学的分量。他在突尼斯和尤其在加纳的非洲经历提醒他注意威胁着国家建设中的政治杰出人物的失控:专制、拒绝多元化、腐化和政权的个人化。可能他也有内心的想法,如颂扬一个新的世界革命,单独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苏联经验失败,革命运动转变成堡垒的捍卫者和惟一的一个政党的专制政治。

今天,法农的政治现状并不停留在这些评论上。在他之前,在非洲没有人会分析产生杰出人物的环境,他们同殖民主义者

^① 马克西姆·罗丹松,《马克思主义和穆斯林世界》,瑟伊出版社,巴黎,1972,307页。

的演变关系并指出受过教育的那类“极端尖子主义”，以及他们天生领导角色的观念和他们关于群众不成熟的讲话。民主的障碍之一，而且不是最小的障碍横在那里。

因此，只记住《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一些有争议的诗意的主题、农民的救世主降临说、赎罪的暴力、第三世界的人为组成的地理政治论集团，却视而不见最近那些使我们提防革命浪漫主义的危险的主题，那是不公平的。根本要求并不在于很大希望，而在于警惕对一切促使有利于划分领导者和执行者，对一切充当行政机构的权力的急迫思想，这个权力须要知识和对那些被确定为生来无能力和有待制伏的群众施加影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拓扑学的永久性就在于此：剥削者变了，但被剥削者依旧是同样这些人。

结束时补充几句：法农的影响也被他理解精神病科医生的实践方式接受。他觉得精神病学的教育犹如一台机器，它使“疯子”正常，并强加给他一些跟他的说话表达的东西没有关系的标准。法农被载入反对精神病学运动的史册，他强调让这句话说出来，同时推翻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联系。实话和真实性是在疯狂这一边，应该让他自由锻炼这一点。在法农的绝对自由主义性质的民粹主义和其医学实践之间有明显的相似。

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扔进西方窗户里的一块石头。它是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宣言》，因此对于那些想要理解这场革命背后的情感力量的读者，它极其重要。

——《时代》

对于所有想要理解为自由、平等和尊严而战的意义的人，本书都是必读之作。

——亚历克斯·昆森—萨奇

责任编辑 陆元旭 封面设计 胡 荒

ISBN 7-80657-832-3



9 787806 578322 >

ISBN 7-80657-832-3
I · 601 定价：17.80 元